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目 录

欧亚安全与一体化

- 3 C·卡拉加诺夫 / 克服欧洲危机的欧亚方案——扩大解决问题的空间
- 15 李太龙 / 从大国认同观点谈乌克兰危机中的克里米亚事件
- 40 A·利布曼, A·奥贝坚科娃 / 历史遗产及欧亚区域一体化

欧亚地区民族与认同

- 57 袁勋 / 列夫·古米廖夫“民族过程”理论评述
- 113 王佳 / 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族群意识调控及国家认同建构

俄国农业、工业经济

- 140 曲昊月, 肖金波 / 俄罗斯区域农业经济空间异质性研究
- 177 邓沛勇 /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俄国工业发展特征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冯绍雷

副 主 编: 陈大维 (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 刘 军

封面设计: 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 年 12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7 年第 6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С. Карагано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ыход из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 Расширить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поиска решений (3)

Я. Зайцев

Крымский инцидент в украинском кризис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нятия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15)

А. Либман, А.Обыденко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40)

Юань Сюнь

О теории «этногенеза» Льва Гумилёва (57)

Ван Цзя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сознание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этнической группы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113)

Цюй Хаюэ, Сяо Цзиньб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й неоднородност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140)

Дэн Пэйюн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 конц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177)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7 年第 6 期 (双月刊)

Contents

Sergei Karaganov

Eurasian Way Out of the European Crisis..... (3)

Li Tailong (Yaroslav Zaitsev)

On the Crimean Issue of the Ukraine Crisis from a Perspective of Russian Great Power Identity (15)

Alexander Libman, Anastassia Obydenkova

Why Is the “Post-Soviet” Regionalism Post-Soviet?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urasia..... (40)

Yuan Xun

Review of L. Gumilev’s “Ethnogenesis Theory”... (57)

Wang Jia

Control over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Russian Ethnic Group in Kazakhstan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113)

Qu Haoyue, Xiao Jinbo

On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Russian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Different Districts (140)

Deng Peiyong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20th Century (177)

欧亚安全与一体化

克服欧洲危机的欧亚方案 ——扩大解决问题的空间*

C·卡拉加诺夫**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促使各方积极寻求重建欧洲安全体系的出路。一个紧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跨地区的、整个欧亚大陆的安全体系。第一步可以成立一个欧亚合作、发展与安全论坛。如果能在安全论坛的基础上最终成立大欧亚共同体,那么目前的欧洲安全困境将会是另一个局面,将更容易解决,因为这将是一个更适应世界发展趋势的合作平台。一个对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开放的大欧亚项目,符合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欧亚国家的利益。

【关键词】大欧亚共同体 欧洲危机 俄罗斯精英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7) 06-0003(12)

一、引言

走出冷战的欧洲,却失去了战后的和平。欧洲大陆面临着战略地位衰颓的威胁——或者是重回军事政治分裂与集团对抗的老路,或者是经受不安与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欧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的战略定位”(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3)的阶段性成果。原文发表于《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Russia in Global Affairs*)2015年8月。感谢《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授权本刊翻译发表。本文的中文翻译同时参照了俄文和英文版本。

** C·卡拉加诺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Sergei Karaganov),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院长、俄罗斯国防与外交事务委员会名誉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人。

不确定的煎熬。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的军事政治冲突的升级，还是有可能的。

欧洲在主导了 500 年的全球政治之后，目前正陷入内部危机。随着两大集团对抗的结束以及一个短暂的“单极时刻”，世界进入一个多中心的时代。但这也可能是一个中间过渡期。因为在新的情况下，民族国家的作用在上升，传统的地缘政治在回归。实际上，“去全球化”（деглобализация）或者一个完全另类的全球化，已经开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进退维谷；世界正在分裂成多个政治-经济集团，彼此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争夺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设置非关税壁垒，制定排他性的技术和法律标准，最后一招是使用“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裁。反常的是，“去全球化”的领头人，正是西方。西方也意识到了，自身正在输掉由自己制定规则的游戏。

美国退缩到半孤立的状态，并有意无意地制造出多个不稳定和危机的地区局势：沿着中国东部边界，出现了一个摩擦频发地带；几十年来，中东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在挑起乌克兰危机方面，也能看到美国的介入。

中东动荡的外溢与欧洲新的军事-政治分歧，是欧洲次大陆，包括俄罗斯在内，所面临的最大的安全挑战。这些问题又叠加在欧盟的系统性危机和俄罗斯的经济困境之上，可谓雪上加霜。欧洲的这两个部分（欧盟和俄罗斯），都在寻求新的精神上的和地缘政治上的认同。俄罗斯的步伐要更快，从几乎是完全的欧洲文化和欧洲经济取向，转到了欧亚方向。

动荡期还会持续，而且会有新的内容。在 21 世纪，出现了新的、大型的地缘政治集团。第一个是美国以其尚存的全球实力，联合部分亚太地区国家、大西洋国家的集团；第二个是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伊朗以及其他国家合作为基础的“大欧亚”（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中国在其中可能会成为领袖国，但不是霸权国。2015 年 5 月，中俄就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对接达成了协议，为大欧亚进程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而欧洲在这些事态发展的进程中，在经济和政治上被削弱和半孤立，安全水平下降。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共同经济与人文空间，虽未实现，但仍在日程上，至少对于俄罗斯而言，在“大欧亚”和“小欧洲”项目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仍然是有利的。

二、欧洲安全的几种场景

欧洲安全问题已经淡出了世界的中心，但目前出现了回归的可能，特别是一旦欧洲次大陆成为不稳定甚至是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的话。目前还看不到可以迅速解决问题的方案。曾经有过好的方案和建议，但都失败了，如：把欧安组织变成一个安全联盟；成立欧洲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加入北约，使北约自动变成一个全欧洲的联盟（对此俄罗斯没有得到过积极的答复）；签署新的欧洲安全条约（被欧安组织的“科孚进程”^①给冲淡了）；推动建立欧洲联盟（Union of Europe）——统一的经济、人文和能源空间（对俄罗斯的提议还是没有回音）。

为什么这些建议无果而终？是因为西方已经决定（虽然在口头上不承认）扩大自身的影响和控制区域，同时强迫俄罗斯离开，压缩俄罗斯的市场，争夺俄罗斯在数世纪前得到的“安全缓冲区”，并强加给它“后欧洲价值观”（пост-европейские ценности）。这是再版的凡尔赛政策^②，虽然程度略缓，但是不能不引起俄罗斯强烈的不安全和被排挤的感受。要知道，俄罗斯几百年来在艰难之中形成的主要价值观，是保障主权和安全。当西方试图把乌克兰拉进自身的影响和控制区域的时候，武装冲突就爆发了。关于这一点，二十年来，许多专家，包括作者本人，已经多次多方地加以告诫。显然，这个问题的根源有乌克兰内部的因素，但实质上，却是全欧洲性质的。

俄罗斯也有责任。局势发展到这个程度，与俄罗斯的软弱、与俄罗斯对逐步同西方一体化的幻想（但却不知走向何处）有关。最主要的是，俄罗斯自身发展得不好，经济增长率低，质量差。显然，俄罗斯不应该两次对北约的扩大予以妥协。一次是 1997 年，俄罗斯与北约签署基础文件；一次是在 2000 年代初期，俄罗斯当时只是作了微不足道的抗议。最后，北约对南联盟的可怕侵略，俄罗斯绝对不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幻想事态会自身转圜，但结果并非如此。

① “科孚进程”，指的是 2009 年 6 月欧安组织非正式外长会议在希腊科孚岛举行，与会各方启动“科孚进程”，就欧洲安全问题进行对话和恢复互信——编者注

② 凡尔赛条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条约，主要目的是惩罚和削弱德国——编者注

当然，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让大多数欧洲人（包括俄罗斯人）的生活更为舒适。我们未必会回到从前排长队买食品，或者铁幕隔绝的时代。但是，就我们现在所理解和感受的，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比从前更加安全。

围绕着乌克兰危机，所有的讨论都是关于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安全体系。但除非真正的障碍被排除了，否则不可能有一个长久的解决之道。

俄罗斯绝大多数的精英已经对西方政治失去了所有的信任，他们似乎打算使用武力来教训西方伙伴，使其尊重俄罗斯的利益。西方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度也很高，反俄的语调达到了 1940 年代底、1950 年代的水平，当时苏联威胁着西方精英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和民主。

俄罗斯还没有提出一个解决系统危机的方案，显然，俄罗斯明白，就算提出了，也没有人听。同时，在西方的讨论中，提出了几个选项，彼此有重叠的部分。

第一个选项与场景，是拖垮俄罗斯经济，实现政权更迭。通过挑起精英的不满，使他们发动宫廷政变；或者利用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引发民众不满，发动自下而上的草根革命。在乌克兰冲突的尖锐阶段，这个选项几近被公开考虑使用。但是制裁和敌对的语调产生了相反的预期，俄罗斯的精英和社会更加团结在克里姆林宫的周围，而支持西方的精英和社会群体，在俄罗斯则被边缘化。因此，这个选项被放在了一边。但是，它没有消失，仍然能在具体的行动背后、在不断升级的反俄浪潮中看到，甚至能在德国的“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①之中发现踪迹。

第二个选项与场景，是把俄罗斯拖进乌克兰的全面军事冲突之中。这种主张在美国有市场，但是在欧洲几乎被完全拒绝。因为欧洲人明白，冲突不受控制地升级并超出乌克兰的边界，会意味着什么。美国也看到了这个选项的失败，并逐步转向了欧洲方案。

第三个选项与场景，目前还只是在口头上的，就是让乌克兰加入北约。2007-2008 年，这几乎接近成功，后来又有过尝试，但被叫停了。显然，如

^① 2014 年底、2015 年初，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多次提及“战略耐心”，他认为，无论是回应危机还是重建秩序，都需要“战略耐心”——编者注

果目前乌克兰加入北约，会使局面走向第二种情况。如果第一个选项成功了（即俄罗斯政权更迭，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也有出现第三种场景的可能。

第四个选项与场景，是在原来东西方分界线的东侧，再现冷战期间的对抗。美国在俄罗斯邻国追加部署军队、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莫斯科很可能采取报复行动，包括退出中导条约。有一种感觉（也可能是错觉），即，这个选项对于俄罗斯的部分精英和民众而言，是能够接受的。这些人对于西方的不信任根深蒂固，特别是冷战后的二十年，俄罗斯与西方重建关系的失败，更加深了不信任。俄罗斯部署在其国土欧洲部分的核武器，以及重新修改后的使用核武器的方法，令俄罗斯有充足的能力保护自己免遭打击；同时，俄罗斯有能力给对手制造一切麻烦，而无须卷入苏联时期的耗竭式的军备竞赛。

这种场景可能性也不大，一方面因为美国正在离开欧洲，并任凭欧洲的不稳定与分裂，另一方面，欧洲人在欧洲大陆的东西两端都遭逢困境。

第五种选项与场景，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即目前的欧洲安全和乌克兰形势恶化，进而引发大规模战争。这已经不仅是危言耸听，即便是态度温和的分析家，也都发出了警告。一个突发事件，或者外界因素的挑拨，就可能导致相互不信任的升级，进而触发战争。我不想描述这个灾难性的场景，因为目前的形势和神经已经绷得够紧了。我只想说，这种情景的可能性似乎在增加。因为俄罗斯不会让步，西方也在悄悄地还手。总之，灾难场景不能被完全排除在外。

三、可能的出路

乌克兰危机促使各方积极寻求重建欧洲安全体系的出路。欧洲的一些小国，一些中立的、非集团化的国家，主张通过对欧安组织的更新或者改革（现在还不清楚如何改革）来找寻出路。这种主张，也逐渐影响了欧洲的“显贵”。德国人此前极端强硬的立场缓和下来了，也在寻找出路，包括寻求欧安组织的帮助。而华盛顿对革新欧安组织，即便不是公开的敌对，也是非常警惕的。美国人一直担心欧安组织与北约竞争，后者是其主导欧洲的主要工具。

笔者对欧安组织的工作持怀疑态度，过去二十年来，其存在和活动的效果是弊大于利。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欧亚组织给人一种假象，让人感觉欧洲的安全“都很好”（все в порядке）。《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签署以来的四十余年，回顾欧洲安全的发展以及欧安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可以说，欧安组织微不足道，特别是它无法制止冲突的发生。长期积留的问题，在“都很好”的表象遮掩下，终于导致了乌克兰内战的爆发，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尖锐对抗。

但欧安组织还是有能力迅速组织起数百名观察员，防止乌克兰冲突的升级，监督冲突各方不采取粗暴侵犯人权的行动，并协助明斯克协议的执行（该协议不是在欧安组织框架下达成的）。凡此种种，表明欧安组织还有一定的用处。抛开各种批评不谈，欧安组织特别监督团（Special Monitoring Mission）正在做的工作是建设性的。正因为如此，欧安这个衰败中的组织，被注入了一剂延长生命的强心剂。

目前，关于欧安组织改革的讨论才刚刚开始。讨论中的事项有：提高投入，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中心，多种方式并用以限制在欧洲的武器和武装力量规模，恢复军事政治领域的透明度和互信，等等。一些人甚至建议，可以通过以上的事项，来“检验”俄罗斯是否愿意进行建设性的合作。问题是，俄罗斯明知道欧安组织过去负面的运行成效，会同意重启合作吗？作为例外，一个可以接受的合作领域是在军事领域内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这有助于遏制突发事件酿成直接的军事冲突。

欧安组织即便实现了现代化的更新，也解决不了欧洲的安全问题。往好里说，欧安组织架构更新之后，将被用来服务于一场新的冷战，当然其效率会更加低下；往坏里说，这个组织将变成一个冲突对抗的平台。当然，这不是说欧安组织不需要改进和提高效率，而是说，除非制定一个新的集体安全条约（俄罗斯一直如此建议），欧安组织是无法解决欧洲安全的。但是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新的集体安全条约）极低。

还有一个更加难以企及的方案，也是俄罗斯多年来所提及的，就是建立一个泛欧洲的人文和经济空间，即欧洲联盟（Union of Europe）。在这个空间内，乌克兰将与欧洲、俄罗斯共同发展。为此，需要做以下的工作：

——为整个“大欧洲”建立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与合作体系；

——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一个平等的空间，共同的人文（免签旅行）、经济和能源空间；

——由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签署“欧洲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签约的国际组织包括：欧亚经济联盟、欧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北约。拒绝签署或批准条约的国家，将被排除在新的空间之外。“灰色”地带的国家（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土耳其，等等），会被如此对待。

新的安全条约或者欧洲联盟（大欧洲）条约中关键的一条是，扩员需要得到全体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这实际上是一票否决，但不是否定联盟的开放性理念，而是出于保护成员国安全的考虑。新的安全条约也应该包括公开透明的原则和相互信任的措施。如，共同承认那些“未被承认”的实体。

这个方案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将有助于保障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发展，包括欧洲这一经济和文明空间。但不幸的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乌克兰危机还在持续，这个国家的局势还在走下坡路，仍在滋生问题与冲突。

四、新的形式？

乌克兰危机实际上使潜在的问题浮出了水面，表明现存的欧洲安全体系已经不合时宜。恢复原状完全不现实，因为即便从最好的方面看，欧、俄都极度不信任对方。俄罗斯认为自己在道义上有理，也想教训西方伙伴，让他们尊重俄罗斯的利益和国际规范。在过去的二十年，西方口头上宣称遵守国际法原则，实际上做的是将其践踏的事情：进攻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组织“颜色革命”，包括基辅的暴动。反过来，西方的伙伴却仍想让俄罗斯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继续遵守他们制定的规则。

俄罗斯国内的社会因素也不允许俄罗斯在旧有的模式下与西方接近，更不用说建立一个欧洲联盟了。在苏联时代，很多精英认为苏联的体制没有生命力，希望走民主和市场道路，他们对赫尔辛基进程有很大的期待。而在今天的俄罗斯精英和社会民意中，很少有人觉得俄罗斯低人一等。当然也有一些俄罗斯人心存疑惑，担心俄罗斯能否挺得过去；也有人担心代价太大，希

望寻求妥协。但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明白，退却比前进更危险。

二十多年前，当时的感觉是俄罗斯很快就会成为欧洲的模样。但这没有发生，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西方的政策使然，俄罗斯的西方派（少数派）遭受重创，并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俄罗斯与欧洲主要国家的价值体系，不是并列发展的。俄罗斯的价值体系是旧式的、传统欧洲式的，强调主权高于一切，纯正的基督教和爱国主义。而欧洲的价值体系，走的是后欧洲道路。

过去的老路走不通的主要原因，是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似乎主导着国际事务的所有方面，但现在已经不是理所当然的领头羊了。

新亚洲（новая Азия）正在成长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未来主流的社会政治体系将是非西方国家的威权民主模式，而不是西欧、美国四面楚歌的自由民主模式。

俄罗斯在经济上转向东方的进展一度迟缓，但与西方关系的停滞，实质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转向东方，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还有政治层面，甚至，还可能包含社会与文化层面。过去，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亚洲是与落后、贫穷、不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亚洲是成功的象征。

欧洲由于多重危机、发展放缓，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俄罗斯人越认识欧洲，欧洲的吸引力就越低，部分是因为欧洲偏离了自己宣称的原则：公开的侵略、秘密的监狱和大规模的窃听（甚至针对盟友）。

同时，大部分俄罗斯人已经拥有了欧洲人的生活标准，就是他们所言的“像生活在欧洲一样”，包括个人自由、琳琅满目的货架、清洁的公共厕所、以及绝大多数家庭都拥有的汽车。但是，目前俄罗斯人并不关心法律至上或者现实民主这类事情。

苏联剧变，扬弃了许多传统的价值观、民族和文化规范，俄罗斯人的自我认同还在一个转型和塑造的过程之中；在此时节，俄罗斯人对欧洲的失望，是可怕的事情。俄罗斯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欧洲式的，它根植于与欧洲共同的文化和宗教遗产之中，并且不受俄罗斯政治精英今天如何处理这些共同遗产的影响。

俄罗斯在全球事务中的定位，包括在安全领域，都应该考虑到欧洲这个

因素。俄罗斯对欧洲的需要，不仅是技术与资本，欧洲更是俄罗斯的文化之锚。笔者也斗胆直言，虽然俄欧之间有诸般的相互猜疑，当欧洲处于昔日光辉逐渐下沉、又不知道未来前途之际，它（欧洲）也需要俄罗斯，需要学习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勇敢地面对失意的现实）。

全球版图中的其他组成部分也在变动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在欧洲安全领域，已经无法两次跳进同一条河流，欧洲安全是一个变动中的概念和现实。欧洲的主要威胁（除了欧洲分裂之外）是外在的：近在咫尺的中东，在未来的数十年都将是混乱和激进的，而美国对欧洲的稳定与否逐渐不感兴趣。

局部的去全球化以及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集团，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美国在欧洲大西洋推动的 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对欧洲人其实是不利的。欧洲人不敢拒绝的原因，是担心被完全孤立，也担心无力适应一个高度竞争的新世界。

五、大欧亚共同体？

一个新的集团正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可以称之为“大欧亚共同体”（Сообщество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处于该共同体中心位置的是合作、互动不断加深的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以及其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潜在的成员是印度、伊朗、韩国和巴基斯坦；继而是以色列和土耳其。在这个集团里，中国发挥着领导但不是主导的作用。东盟和东南亚国家将是美国项目和欧亚项目争取和拉扯的对象，日本将继续偏重于美国一方。

大欧亚共同体的核心，是 2015 年 5 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时，中俄双方发表的关于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声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是中国发展其西部省区与中国西侧直到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与物流的项目。很多人希望中俄的这两个大项目之间发生对撞，但是结果相反，二者实现了对接。

从组织功能上，大欧亚共同体可以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目前这是一个半沉睡的机构，需要激活）、亚投行和上合开发银行（两个银行都需要有实际的项目、建立自己的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来发挥功用。

一个对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开放的大欧亚项目，符合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欧亚国家的利益。何况，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还拥有相当强大的金融、技术和文化的积累与潜力。大欧亚不能是对抗性的项目。在安全领域内，大欧亚国家受到的威胁有：中国东部边界地区的紧张，中-印之间的矛盾，印-巴两国的冲突。上述的这些紧张局势，正在慢慢消解。但是对于整个欧亚乃至欧洲的主要威胁，是从阿富汗到北非、东北非广大区域已经持续数十年的动荡。此外，移民、气候、毒品、社会不平等，也已成为整个欧亚大陆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

在此情况下，一个紧要的任务，不是要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安全体系（如欧洲），而是要建立一个跨地区的、整个欧亚大陆的安全体系。第一步可以成立一个欧亚合作、发展与安全论坛（Форум евроазиат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азвития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涵盖专门合作领域的功能性组织机构，可以逐步设立。论坛应该向欧洲国家开放，这些国家也非常希望新的经济和政治空间内占有一席之地。

一个新的共同体需要有自己的原则，但不是重复赫尔辛基条文。最重要的原则应该包括：

- 促进福利增长、经济发展和物流联通；

- 无条件地尊重国家及其民众的主权、权利；一个国家有权决定自身的发展道路；外部干涉仅限于联合国安理会（及扩大会议）授权的情况；

- 无条件地尊重领土完整，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 共同协作应对内外危机，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影响安定的外部力量因素；

- 在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开放合作；

- 相互合作繁荣文化，防止信息战和网络威胁。

如果在欧亚合作、发展与安全论坛的基础上，最终成立大欧亚共同体，那么目前的欧洲安全困境将会是另一个局面，将更容易解决，因为这将是一个更适应世界发展趋势的局面和合作平台。如果一个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在原有的框架下无法解决，那么就需要走出这个框架。

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建立共同的经济和人文空间，是一个更加务实互利

的想法。但过去欧洲人对此不在意，现在当他们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转而提出欧盟-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对话。但这个提议未必能有结果，因为欧亚经济联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了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之中。较为合理的做法是，应该邀请中国（中国也寻求与欧洲紧密合作）和其他欧亚国家参与到这个对话之中，进而逐步建立起一个从里斯本到上海（或者新加坡）的共同经济区。

在这种安排下，在解决既有冲突方面，欧亚组织可以发挥重要的、但是属于中间人性质的功用，可以分享自身的经验——失败之处和成功所在。

许多欧洲国家仍将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一个扩大的合作平台，如俄罗斯此前提出的欧洲联盟（Union of Europe）构想，即俄罗斯-欧盟共同空间，可以为欧盟提供新的机遇和市场。俄罗斯新推出的大欧亚构想，更有吸引力，也更有前景。笔者个人认为，即便没有欧盟成员国的参与，大欧亚项目也将前行。他们若能参与其中，会更好。

2015 年有很多的周年庆典：维也纳会议 200 周年（这个和约创建的欧洲体系保证了当时的世界中心——欧洲，一百年的相对和平）；联合国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成立 70 周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签署 40 周年。

旧的体系正在衰败，部分是因为乌克兰危机的冲击。有一些人试图利用这场危机，恢复已然逝去的机制和做法。其实无须全盘否定既有体系和秩序，合理的做法是，在这个体系内部建立一个新的结构。比如，快速建成大欧亚共同体；在欧亚合作、发展与和平论坛的框架内，就未来展开广泛的对话。

维也纳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及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都是在战争之后举行的。笔者真诚地希望，新体系不是通过一场新的大战而建立（这将摧毁未来），而是以和平的方式成就。

在各种可能的世界发展前景中，美国的作用将不再如以往那般辉煌。这是美国精英需要面对的问题：他们应该确定自身到底想要什么，是退缩到半孤立状态、留下亲手造成的废墟不顾，以图日后东山再起？还是持守几乎无人想看到的“单极时刻”？抑或做一个新的、更为民主和公平世界的负责任建设者？

俄罗斯凭借其具有全球思想的精英、丰富高超的外交经验、独特的地缘

位置，可以在建设这样的世界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为自身也为其伙伴们谋求利益。

（肖辉忠 译）

【Abstract】 The Ukraine crisis has spurred all parties to seek ways to rebuild the previous security system in Europe. A pressing task is to establish a cross-region security system covering the whole Eurasian continent. The first step could be a Eurasian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Forum. Based on this forum, if a Community of Greater Eurasia is established, the current European security impasse will be placed in a different context, better matching the future world and, possibly, making its resolution easier.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Russia, China, and other Eurasian countries to have a common project open to Europe an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Key Words】 Greater Eurasian Community, the European Crisis, Russian Elites

【Аннотация】 Кризис в Украине побудил все стороны активно искать пут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ажной задачей является создание транс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вс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Евразии. Первым шагом в дан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может стать создание форума п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развитию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азии. Если на основе этого форума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жн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создать Сообщество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нынешняя дилемм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опе превратится в иную ситуацию, которую будет легче решить, так как она станет более подходящей для мировых тенденций развития платформой дл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Большой евроазиатский проект, открытый для Европы и остального мира, отвечает интересам России, Китая и других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ран.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общество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кризис,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лит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从大国认同观点谈 乌克兰危机中的克里米亚事件*

李太龙**

【内容提要】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带来了两方面挑战：一方面，这是冷战结束后对现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此次危机对国际关系理论也构成了新的挑战。乌克兰危机中的俄罗斯政策，特别是克里米亚入俄事件，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大量讨论。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俄罗斯为什么会采取如此行动？目前学者对此问题提供了分别基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三种解释。前两种解释虽然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局限于表面上的利益——所谓“国家利益”或“掌权者的利益”，而忽略了塑造这些利益的具体内涵和更深层次的因素——认同。建构主义的解释虽然把认同介入到分析框架之中，但现有的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实际上，俄罗斯大国观念下的大国认同，是俄罗斯行为的最好注脚。

【关键词】克里米亚事件 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外交 俄罗斯大国认同

【中图分类号】D8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7) 06-0015(25)

一、当前理论对乌克兰危机之评析

（一）现实主义理论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章的不足之处，由作者负责。

** 李太龙（Зайцев Яросла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5 级博士生（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

目前对乌克兰危机最常见的解释,是基于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俄罗斯的行为,包括克里米亚入俄一事,是出于对乌克兰靠拢西方之后早晚会加入北约、导致北约军事设施部署到俄罗斯边界的担忧。比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关于乌克兰危机原因的文章,就体现了观察俄罗斯激进外交行动的现实主义视角。米尔斯海默指出了导致乌克兰危机的三套西方战略:北约扩大、欧盟扩张和民主主义之推广。^①这三套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促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的影响并融入西方世界,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核心措施乃是北约东扩。^②米氏称,普京处理该危机的方法很好理解,这个方法实际上是本着现实主义的原理。^③历史上,俄罗斯一直面临来自西方的威胁,而乌克兰则扮演着极为重要的“缓冲地带”角色,因此,任何俄罗斯领导人都不会放任曾经是“死敌”的北约把乌克兰吸纳为成员国。^④

很大一部分俄罗斯外交专家,也倾向于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解析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政策。比如,俄罗斯著名的专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认为,乌克兰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不顾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一直固执扩张北约的理念,造成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因而使得俄罗斯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⑤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安全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阿列克谢·费年科(Алексей Фененко)也认为,美国借着乌克兰危机阻挠欧亚一体化^⑥进程,而俄罗斯在该危机中的目标,就是防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免降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地位与在黑海的军事存在。^⑦俄罗斯国家领导人也或多或少同意现实主义解释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① John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4, Vol.93, No.5, p.80.

② Ibid, p.77.

③ Ibid, p.84.

④ Ibid, p.82.

⑤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Переломный год: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http://www.globalaffairs.ru/number/Perelomnyi-god-predvaritelnye-itogi-17193>

⑥ 欧亚一体化是指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区经济一体化,重要的阶段包括 2010 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成立,以及 2015 年俄、白、哈三国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如今欧亚经济联盟共包括俄、白、哈、吉(吉尔吉斯斯坦)、亚(亚美尼亚)五国。

⑦ Алексей Фененко. Хуже, чем в холодную войну. <http://www.globalaffairs.ru/global-processes/Khuzhe-chem-v-kholodnuyu-voinu-17994>

一直忽略俄罗斯的切身利益，仍将其当作对手来对待，试图把俄罗斯挤到国际政治的边缘。^①

现实主义的确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然而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往往被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解释俄罗斯历年来针对北约扩张的不同态度？早在 1993 年，当北约东扩议题还没有决定之际，俄罗斯就已经开始向西方国家提出相关担忧。^②1994 年，叶利钦称北约接纳前华约成员国的计划，会使欧洲重新分裂。^③1996 年，俄罗斯外交部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表示，俄罗斯不会容忍北约军队接近俄罗斯边界，北约军事基础设施东扩的前景，是不可接受的。^④然而，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伊始，对北约扩张议题并没有激烈反对。2002 年，普京甚至表示，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不是悲剧”。^⑤同年，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关于此议题称，“俄罗斯不会渲染这个情况”，甚至说“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决定它想要加入哪个军事同盟”^⑥。但从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起，俄罗斯逐渐开始强调反对北约继续东扩。在 2007 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以相当犀利的措辞表示，北约扩张是一个“降低相互信任的严重挑战”^⑦。2008 年 4 月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之后，普京称，俄罗斯把强大军事同盟出现在俄罗斯边界视为

① 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ев. Я против любых стен. <http://www.globalaffairs.ru/global-processes/Ya-protiv-lyubykh-sten-17051>;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Возврата к прежней модели не будет. <http://www.globalaffairs.ru/global-processes/Vozvrata-k-prezhnei-modeli-ne-budet-16691>;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Украина: тяжелое сегодня и сложное завтра. <http://www.globalaffairs.ru/global-processes/Ukraina-tyazheloe-segodnya-i-slozhnoe-zavtra-16954>

② Steven Erlanger, “Russian Warns NATO on Expanding East”, <http://www.nytimes.com/1993/11/26/world/russia-warns-nato-on-expanding-east.html>

③ Elaine Sciolino, “Yeltsin Says NATO Is Trying to Split Continent Again”, <http://www.nytimes.com/1994/12/06/world/yeltsin-says-nato-is-trying-to-split-continent-again.html>

④ Rick Atkinson, “Primakov Cites Concerns on NATO Expansio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6/06/05/primakov-cites-concerns-on-nato-expansion/0d172dcf-e902-4b7c-8a74-5cc43a7aa11b/?utm_term=.9302bd84fa2f

⑤ Marcus Warren, “Putin Lets NATO ‘Recruit’ in Baltic”,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russia/1398379/Putin-lets-Nato-recruit-in-Baltic.html>

⑥ Министр обороны в Финляндии//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19 July 2002, p.1, quote from Mark Kramer, “NATO, the Baltic states and Russia: a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enlarge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2, Vol.78, No.4, p.748.

⑦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4>

“对我们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①如果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激进对外政策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反应，那么如何解释普京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期间对北约第二轮扩张的勉强适应态度？现实主义理论并不能对这个问题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

另外，现实主义也无法解释：既然北约扩张是造成俄罗斯激进对外政策的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俄罗斯对北约扩张的反应是不同的呢？譬如，为什么 2008 年俄罗斯仅仅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②，却在 2014 年将克里米亚置于自己的主权之下？站在现实主义理论角度的学者，往往强调克里米亚半岛对俄罗斯的战略重要性。俄罗斯黑海海军驻扎在克里米亚南部塞瓦斯托波尔市，因而能够向黑海投射自身实力。倘若乌克兰加入了北约，北约海军会替代俄罗斯黑海海军驻扎塞瓦斯托波尔。这不仅抢走了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兼黑海出海口，还会给俄罗斯南部带来威胁与压力，于是俄罗斯不得不趁机抢占优势并巩固自己的军事存在。然而，从同样的角度看 2004 年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这对俄罗斯意味着巨大的安全压力。因为在此情况下，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被北约成员国所包围，而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兼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圣彼得堡，距离北约边界才 150 公里左右。^③那么，为什么在面临堪比失去克里米亚的战略威胁时，俄罗斯没有去占领波罗的海三国？这也是现实主义难解之题。

（二）国内制度理论

基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国内制度理论认为，俄罗斯 2014 年的外交政策是俄罗斯国内政治制度的结果，即普京执政带来直接的后果。迈克尔·麦克福尔^④（Michael McFaul）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激进对外政策，是受内政变化之影响所致。他反对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认为，北约扩张这个作为不变的因素，无法解释俄罗斯时而与美国合作，时而与其对抗的两个相反

① Заявление для прессы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по итогам заседания Совета Россия-НАТО.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903>

② 格鲁吉亚一直不承认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独立。

③ 圣彼得堡距离俄罗斯爱沙尼亚边界才 150 公里左右。

④ 迈克尔·麦克福尔在 2009-2012 年间曾任白宫俄罗斯问题首席顾问，2012-2014 年间任美国驻俄大使。

现象，应该把焦点放在变过的变量，即俄罗斯内政。^①麦克福尔强调，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逐渐跟奥巴马发展互赢关系框架，随着“重启”^②政策的实施，两国开始进行多方面合作。^③然而，2012年普京再任总统之后，俄罗斯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原因在于，总统选举前后俄罗斯发生了大规模反政府、反普京游行示威。为了动员选举者并提高支持率，普京将美国描绘成游行背后的煽动者和企图使俄罗斯崩溃的敌对势力。结果，相较于梅德韦杰夫，普京倾向于把俄美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因此，当乌克兰发生革命时，普京把这视为美国导演的阴谋，从而下决心收纳克里米亚并影响东乌克兰，以此保障实力均势有利于俄罗斯。^④更何况危机前夕北约并没有打算接纳乌克兰，乌克兰人自己也没有打算加入其中。^⑤总之，麦克福尔认为乌克兰危机的起因并非北约扩张，而是普京“无拘束、叵测的冒险主义”。^⑥

斯蒂芬·谢思达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指出，即使2008年北约曾答应过乌克兰未来加入该组织，但此后因为北约议题威胁国家团结，几乎所有乌克兰政治人物都避免提出这个话题。奥巴马也没有给予此问题多少关注，所以不久后此议题几乎消失。^⑦一些学者指出，2014年以后，乌克兰的新领导人没有提出加入北约的议题，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黑海海军基地也没有因此而受到威胁。实际上，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倒台，意味着俄罗斯对乌政策的失败。因此，普京的政策是出于“保留面子”的考虑，而非国家安全。^⑧另外，谢思达诺维奇在为北约扩张辩护时表示，当初扩大北约的决定旨在稳

① Michael McFaul *et al.*, “Faulty Powers. Who Started the Ukrain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4, Vol.93, No.6, p.167.

② “重启”（reset）是指奥巴马政府2009年试图改善关系的对俄政策。2009年3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俄罗斯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展示代表“重启”的红色按钮作为象征。按钮上除了英文“reset”（重启）一词外，还应有俄文同义的对照“перезагрузка”（也指重启之意）。但是因为某种失误，写在按钮上俄文的词是“перегрузка”（即，“重担”，overload）。克林顿和拉夫罗夫还是不顾此一错误，一起按下了按钮。<http://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71651,00.html>

③ Michael McFaul *et al.*, “Faulty Powers. Who Started the Ukraine Crisis?”, pp.168-169.

④ Ibid, pp.169-170.

⑤ Ibid, p.169.

⑥ Ibid, p.171.

⑦ Ibid, pp.171-172.

⑧ Ibid, p.172.

固欧洲局势并预防潜在冲突爆发。要不是北约的这一决定，当前乌克兰危机的规模很可能更大，会外溢到欧洲其他国家，可能会导致整个大陆的混乱及恐慌。^①

基本上，采取国内层次分析法的学者，往往把当今的俄罗斯体制理解为“普京制度”，即，把政治体制本身跟领导人个人这两个变量混为一谈。比如，上文提到，麦克福尔区分了俄罗斯与西方合作的梅德韦杰夫时期和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普京时期。然而，梅德韦杰夫上台后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俄格战争。那么，问题到底在于具体的领导人还是在于体制？当然，有些学者否认这种区分，认为梅德韦杰夫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导人，实际上普京当时仍是主要决策者。^②但是即使我们承认所谓“普京制度”并非局限于个人，而是一种制度，这个变量仍不能解释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已经采取过的一些激进对外政策。比如，从制度角度分析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学者，他们承认叶利钦执政下的俄罗斯体制比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体制要民主很多。^③然而，恰好在叶利钦任期内的 1999 年，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俄军抢占了普里什蒂纳机场。换句话说，此前俄罗斯也做过一些虽然没有像接纳克里米亚那么极端、但仍然算得上是激进的决策。再者，没有足够的证明能支持如果 2014 年不是普京，而是另外一个人执政，俄罗斯就不会占领克里米亚的假设。

（三）建构主义

除了上述的两种解释，建构主义学者也试图从理论角度对俄罗斯的政策进行分析。

根据安德烈·齐甘科夫（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的观点，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俄罗斯的情感一直处于“期盼-挫败-害怕与愤怒-再期盼”的循环之中。^④俄罗斯历来要求西方承认其大国地位，并且希望其价值观受到尊

① Michael McFaul *et al.*, “Faulty Powers. Who Started the Ukraine Crisis?”, pp.173-174.

② Mark Urnov, “‘Great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47, p.320, footnote 36.

③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Vol.87, No.1, p.70.

④ Andrei Tsygankov, “The Frustrating Partnership: Honor, status, and emotions in Russia’s discourses of the West”,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47, p.346.

重。^①俄罗斯的价值观不同于西方，其主要包括精神自由和能够保护其国民的强国理念，因此这些价值被西方承认与否，是决定俄罗斯与其合作或对抗的主要因素。^②比如，对于乌克兰危机来说，欧盟把乌克兰与其签订自由贸易区的决定，描绘成乌克兰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文明选择”，这使得俄罗斯领导人把欧亚经济联盟也视为基于价值的共同体，并采取避免被欧盟包围的手段。^③据此，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利益及价值缺乏承认和尊重。^④

力求恢复大国地位，是建构主义学者分析俄罗斯外交政策时的一个核心焦点。一般认为，俄罗斯和西方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看法有着基本矛盾：俄罗斯一直强调，即使它的实力衰弱，它仍是个大国；而西方强调，就是因为俄罗斯的实力衰弱，所以它成不了大国。^⑤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虽然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实力衰弱，俄罗斯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仍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而且拥有长久参与大国政治的丰富经验。既然西方不以为然，他们就认为，俄罗斯应该向外面的世界证明自己具有大国地位以及大国认同。^⑥自从苏联解体以来，恢复大国地位一直是受俄罗斯国内广泛支持的目标。^⑦

俄罗斯政治精英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视为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历史基础，因而西方在这些共和国的政治干涉，在俄罗斯领导人眼中等于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丢失，以及对国家自我评价的威胁。^⑧2014年乌克兰危机证明，后苏联空间国家在俄罗斯作为大国的认同中，占据中心地位。俄罗斯为了确保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宁愿付出很大的代价，包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⑨另外，

① Andrei Tsygankov, "The Frustrating Partnership: Honor, status, and emotions in Russia's discourses of the West", p.348.

② Andrei Tsygankov, "Vladimir Putin's last stand: the sources of Russia's Ukraine policy", *Post-Soviet Affairs*, 2015, Vol.31, No.4, p.287.

③ Ibid, p.291.

④ Ibid, p.280.

⑤ Mark Urnov, "'Great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 p.309.

⑥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47, p.357.

⑦ Anne Clunan, "Historical aspirations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Russia's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47, p.289.

⑧ Ibid.

⑨ Ibid.

打赢小规模战争，历来是确定或保持此地位的途径^①，所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或可被看成维护其地位的手段。

在一些学者眼中，俄罗斯激进外交行动是一种强迫西方重视俄罗斯、尊重俄罗斯的方法。^②多玛斯·福尔斯堡（Tuomas Forsberg）认为，俄罗斯以为西方不尊重它，而西方以为它已经给了俄罗斯足够的尊重，这两种判断的差距，造成了双方关系中的地位冲突。^③对俄罗斯来说，北约扩张剥夺了俄罗斯以平等身份参与欧洲安全体系建设的权利，以此贬低俄罗斯的地位，是西方不尊重它的最显著的表现。^④

综上所述，建构主义相比于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在解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激进对外政策时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认同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所说的俄罗斯“利益”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俄罗斯如此重视它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以及其在该区域的主导地位？如果说俄罗斯激进政策是普京执政的结果，为什么普京的这一政策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和赞扬？如果我们不关注认同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俄罗斯会如此界定自己的利益。二是，俄罗斯在实施激进对外政策时，往往不顾这种政策给它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2014 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引发了西方世界的抵抗，其中对俄影响最大是经济制裁。根据世界银行关于俄罗斯经济的报告，对俄制裁与俄罗斯反制裁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三重负面影响。第一，外汇市场急剧波动以及卢布急速贬值；第二，限制俄罗斯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第三，破坏投资与消费环境。^⑤2015 年俄罗斯GDP呈现 2.8%的负增长，2016 年又是 0.2%的负增长^⑥，国家名誉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俄罗斯不顾成本之高，采取激进外交行动，令人怀疑它的外交政策是否符合理性选择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的逻辑。的确，建立

①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356.

② Tuomas Forsberg, “Status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Perceptions and emotional biases”, pp.323-324.

③ Ibid, p.324.

④ Ibid, p.326.

⑤ The World Bank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 Economy Report”, April 2015, №.33.

⑥ The World Bank.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Code=NY.GDP.MKTP.KD.ZG&id=1ff4a498&report_name=Popular-Indicators&populartype=series&ispopular=y#

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愿意承担如此之高的成本，来追求没有太大物质好处的地位承认。聚焦认同的建构主义理论，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以及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

虽然建构主义的解释让我们从更深的层次看待俄罗斯的激进对外政策，然而目前的研究有一系列缺陷。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变量繁多、逻辑分散。建构主义学者各自提供很有意思的理论，然而它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变量之繁多也是一个明显的问题。笔者尝试在建构主义基础上建立基于俄罗斯大国观念的大国认同理论，并以 2014 年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为检验此理论的案例。

二、大国认同理论建构

在提出理论之前，先需要分别定义何为“大国”、“认同”与“大国认同”。

大国认同，或者大国性（greatpowerness），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议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大国通常垄断和主宰全球的政治和经济，而且“大国在分配他们自己和外国政府的权力及威望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负起责任”。^①从现实主义开始，大国被定义为拥有超过其他大部分国家的综合实力。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提出了大国的五个指标：（1）人口及领土面积；（2）资源分配；（3）经济实力；（4）军事实力；（5）政治体制稳定性。^②沃尔兹强调，大国之所以排名前列，是因为这种国家同时在这五个维度上明显优于其他国家。^③鉴于此，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本质与运转逻辑，受大国的实力分配所决定。据此，大国可被看成是超出普通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对国际政治和经济发挥决定

①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46, pp.161, 172, quoted from Mark Urnov, “Great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 p.306.

②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9, p.131.

③ Ibid.

性作用、有特定行为模式的国家。

随着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利用认同来解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然而,关于“认同”概念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定义非常广泛。其中一个原因是,除了国际关系外,很多其他学科同样频繁利用此概念,而根据具体学科的需求或目的,认同的定义有迥然不同的解读。就国际关系这个学科而言,亚历山大·温特对认同提出了以下定义:认同是“带来动机与行为意向、属于有意行为体的特性”。^①同时他强调说,认同包含两种观念,即自我(the Self)所持有的观念和他者(the Other)所持有的观念,因此,认同被内在与外在结构共同构成。

芦泽久仁子(Kuniko Ashizawa)试图抛开关于认同的所有预设,给认同下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为此,她引用罗纳德·杰佩尔森等学者(Ronald Jepperson et al.)的观点指出,认同是有关于“行为体持有并投射关于自己的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②这样的形象,或自我概念(self-concepts),很大程度上通过与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互动与关系而形成,并被行为体所认知。^③由此,社会经验与互动,加上诸如文化或制度规范等环境因素,能够塑造并影响认同之建构。^④有了关于认同的此种简单定义,芦泽久仁子进而将此用于国家身上。她说,“国家认同是一种认同,是国家在具体国际环境中所持有并投射关于自己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在最简单意义上,国家认同意味着,关于此国是什么、以及它代表什么的观念。”^⑤

在芦泽久仁子关于认同的定义里面,“关于自己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这一部分指的“形象”可以是多元的,反映出具体的国家特色。按理来讲,国家的“形象”应建立在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上,突出其最明显、最能够代表

①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24.

② Ronald L. Jepperson et al.,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P. J. Katzenste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9, quote from Kuniko Ashizawa, “When Identity Matters: State Identity, 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8, Vol.10, p.575.

③ Kuniko Ashizawa, “When Identity Matters: State Identity, 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575.

④ Ibid.

⑤ Ibid.

其“个性”的特征。其中一个较为关键的特征是，国家在历史上与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与角色。从历史上来看，世界上总存在着实力极为强大、对国际政治有着极大影响的国家，被称为大国。以其国际地位为依凭，这样的国家会逐渐发展出大国性，或大国认同。按照汉娜·斯密的定义，“大国性是国家作为世界主导国家之一、能够对国家行为产生一系列影响的自我形象。”^①受大国自我形象影响的国家行为包括，一方面向本国国民不断证明本国是大国，另一方面不断寻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其他大国，对该国地位的承认。^②这里的大国性就是一种自我观念，而且依靠他国承认。由于认同也是依赖于跟他者关系的自我观念，因而“大国性”与“大国认同”两个概念可以互用。

这个定义在抓住关于大国的核心特性的同时，缺乏一个重要部分。大国的自我形象不是自从国家诞生就有之，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形成的观念，它必然要靠国家的领导经验，并由此经验而衍生。此外，这样的经验必须是长期的，国家才能将它内化成自己的认同。换言之，相较于中小国家，大国往往会或单独或集体做世界领袖，通过长期领导经验养成作为领导的习惯，进而把这个“领导性”内化成一种自我感觉并产生自我优越感。鉴于此，笔者认为可在斯密定义的基础上再行补充：大国认同是国家根据其长期作为世界主导国家经验而形成的关于自己所应拥有的地位、发挥的角色、肩负的责任、甚至履行的使命的自我观念。此外，正如温特和其他学者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出的，国家的认同包括基于他者与基于自我两个部分，大国认同也一样，一方面由同他国的关系与互动而生成，另一方面建立在国家自我认知的基础上。现有的大部分研究只是聚焦前者，但是后者也是大国认同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需要对其作用进行严谨分析。

与大国认同息息相关的是大国象征，或者寄托。大国认同根据大国的具体情况包括不同的符号。换句话说，认同的“大国”成分与某些标志着国家“大国性”的历史事件、人物、文化产物等多种象征，有内在联系并结合在一起。当这些象征被冒犯时，大国将此视为对自己认同的冒犯或威胁，遂进

①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 362, footnote 2.

② Ibid.

行回击。当国家恢复或重新获得某种象征,这将强化并再次确定国家的认同。以此角度看,当以激进政策试图恢复认同时,国家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与其大国性相关的象征,公开把这些象征与自己的认同联系在一起,甚至用来辩护自己的行为。比如,占领他国领土的时候,国家领导人会为此提供理由,如:当地居民属于本国种族,占领地是本国的发源地,本国某些重要历史与占领地密切相关,等等。因此,当进行研究时,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领导人的演讲、官方文件、甚至媒体的态度,发现大国认同与大国象征,同国家激进行为间的这种联系。

对于俄罗斯来说,大国认同通常被说成影响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之一。比如,马克·乌尔诺夫(Марк Урнов)认为,大国性是构成俄罗斯自我意识的最为关键的一部分。^①按照他的看法,俄罗斯有关于自身应当是大国的深刻信念,此信念进而^②塑造其认同及行为。在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看来,大国是俄罗斯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所流传下来的一种国家理念,它使俄罗斯人产生了对感到自己是大国公民的强烈诉求,并从这种感觉中获得自尊。^③托马斯·安布罗西奥(Thomas Ambrosio)曾宣称:“俄罗斯寻求被公认为大国,因为俄罗斯有关于其认同及世界地位根深蒂固的观念。”^④汉娜·斯密认为,俄罗斯的大国性不仅在其外交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内政。^⑤就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而言,大国性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条件下,使俄罗斯对西方采取不同的态度,时而接近之,时而反对之。^⑥

与大国认同相关、并被经常提到的另一个现象,是苏联解体与地位下降

① Mark Urnov, “Great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 p.305.

② Ibid.

③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Мир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редво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http://www.globalaffairs.ru/pubcol/Mir-nakhoditsya-v-predvoennom-sostoyanii-17999>;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В предво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и экономике. <http://www.globalaffairs.ru/pubcol/V-predvoennom-sostoyanii-o-vneshnei-politike-i-ekonomike-18108>

④ Thomas Ambrosio, *Challenging America's Global Preeminence – Russia's Quest for Multipolarity*, Ashgate, Farnham, 2005a, p.viii, quote from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355.

⑤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355.

⑥ Ibid.

给俄罗斯带来的心理冲击乃至侮辱感。斯蒂芬·奥尔（Stefan Auer）指出，苏联瓦解之后，俄罗斯形成了类似于一战后德国的社会心理状态。与魏玛德国相似，俄罗斯的精英产生了“背后捅刀”的意念，认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盖达尔等出卖了苏联，导致俄罗斯目前的悲惨境遇。^①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曾将西方对俄罗斯的政策，比喻成“丝绒手套中的凡尔赛政策”，意指冷战以后西方对待俄罗斯的方式，跟对待一战后的德国一般，只不过是用的手段稍微温柔一些而已。^②他进而指出，这种政策使得俄罗斯民族产生了相当于“魏玛综合症”的情结。^③

对于有大国认同的国家来说，高等地位之失落与强烈的侮辱感结合在一起，必定对该国行为带来深远影响。然而，正如汉娜·斯密所言，地位失落与随后产生的侮辱感结合起来，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学界适当的关注。^④鉴于此，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理论，或许能给我们提供看问题的新视角。

建构主义理论大师亚历山大·温特曾经指出，国家互动之中不光有收益的考虑，最关键的是国家认同在此过程当中不断被产生与复制。^⑤认同是所有行为体必不可少的要素。固定的认同是确立确定性的重要基础。确定性之确立，满足人的一种基本需求，即所谓“本体性安全感”。按照詹妮弗·米册（Jennifer Mitzen）的定义：“‘本体性安全’指的是一种对于自我经验的完整性、时间上自我的连续性—比起不断地改变—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为了实现自我的能动感。”^⑥鉴于维持认同对于所有人来说是进行观察、衡量得失、依此做出回应等理性选择模型所建立的步骤的基础，因此，如果认同

① Stefan Auer, “Carl Schmitt in the Kremli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Vol.91, No.5, p.956.

②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Европа и Россия: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ново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http://www.globalaffairs.ru/number/Европа-и-Россия-не-допустит-новой-холодной-войны--16579>;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Мир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менее прозападным. <http://www.globalaffairs.ru/pubcol/Mir-stanovitsya-vse-menee-prozapadnym-16564>

③ Там же.

④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356.

⑤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17, 324-336.

⑥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6, Vol.12, No.3, p.342.

的连续性受到威胁或被间断，为了保障正常活动，人先将致力于恢复认同，尔后才会考虑成本与收益。正好在这个阶段人所做的选择，往往与理性选择模型所预测的结果背道而驰。

因为其强大的物质实力，俄罗斯历来把自己视为能够影响并改造国际体系、有权利参与到重大国际事务中，并决定其发展的主导国家之一。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及维也纳国际关系体系的成立，俄罗斯正式得到作为欧洲大国的公认。据此，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开始围绕其大国地位而形成，其长期扮演的大国角色，逐渐成为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自我观念，最终使得俄罗斯由此产生大国认同。二战以后苏联获得超级大国地位，成为两极体系下的一极，以此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的大国认同。苏联解体导致的地位丢失，不但危害了俄罗斯的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认同危机，威胁到了本体性安全并引发了强烈的焦虑与失落感。按照本体性安全理论，惯例与认同连续性被破坏以后，恢复认同成为优先目标，因此苏联解体所导致的俄罗斯大国认同的破坏，迫使俄罗斯对其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进行重新排序，使得恢复大国地位成为俄罗斯的优先任务。鉴于此，俄罗斯对其地位变得极其敏感，尤其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否承认其大国地位这一问题上。因而，当俄罗斯认为西方对其地位表示蔑视或以不平等态度对待其时，它就会出于本体性安全的考虑，采取保障大国认同的措施。由于本体性安全的需求凌驾于实质性安全，俄罗斯对得失的衡量，不再以物质利益为主，因而其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体现在激进的外交政策上，并具有相当高的物质方面的成本。下面笔者将分析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以检验上述假设。

三、克里米亚案例

2014年2月22日乌克兰政府更迭后，作为乌克兰一部分的克里米亚自

治共和国也开始陷入危机。26-27 日间，无标识、后来被称为“礼貌人”^①、并被普京亲口^②承认为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武装部队，占据了克里米亚主要权力机关和战略要地。2 月 27 日，克里米亚最高议会通过决议，将于 2014 年 5 月 25 日举行关于克里米亚地位的全民公投。根据此决议，公投将提出的问题是：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拥有国家主权并在相关条约与协议基础上，加入乌克兰，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是 / 否）。^③

但 3 月 6 日，克里米亚政府通过决议，决定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④，并宣布将关于克里米亚地位的全民公投时间改成 3 月 16 日。更为重要的是，公投时将提出的问题被分为两个：（1）您是否赞同克里米亚以俄罗斯联邦主体身份与俄罗斯进行统一^⑤？（2）您是否赞同恢复克里米亚共和国 1992 年的宪法，是否赞同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一部分的地位？公投问题的这一新表述，排除了否定答案以及保持现状这两个选项。

11 日，克里米亚最高议会与塞瓦斯托波尔市委员会，通过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与塞瓦斯托波尔市独立宣言。根据此宣言，在公投结果表示大部分居民愿意跟俄罗斯统一的情况下，克里米亚将会把自己宣称为主权国家，并以此身份申请在国际条约基础上，加入俄罗斯联邦作为其新的联邦主体。

16 日，关于克里米亚地位的全民公投如期举行。根据公投结果，96.77%

① “礼貌人”（вежливые люди）与“绿衣人”（зеленые человечки）当时通用，两者都指出现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无标识的武装分子。笔者认为“礼貌人”的说法更常见，而且当时俄罗斯国防部属下的“军事贸易”（Военторг）机构甚至想把“礼貌人”当商标注册，参见https://ria.ru/defense_safety/20140516/1007988002.html; <http://tass.ru/armiya-i-opk/4338463>

② Прямая линия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17 апреля 2014.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796>

③ Крымский парламент назначил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еферендума о расшир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автономии на 25 мая. <http://www.interfax.ru/world/361658>

④ Парламент Крыма принял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общекрымского референдума». http://crimea.gov.ru/news/06_03_2014_1

⑤ 关于公投规定的俄文官方文件当中，表示“统一”的俄语词是“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е”（英文是“reunion”）。这一词的词意很特别，大意指“以前是同一个整体，后来因某种缘故被分开，现在又要合在一起”。这个词的近义词是“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中文：加入，参加；英文：joining），但前者更加强调原有的某种亲近关系，表示“离而复合”之意。

参加公投的克里米亚居民表示愿意克里米亚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①按照官方统计，总共有 83.1% 居民参加了此次公投。^②

17 日，以公投结果为依据，克里米亚最高议会宣布克里米亚为独立主权国家，并正式申请以具有共和国地位的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塞瓦斯托波尔市也单独申请入俄，成为俄罗斯第三个直辖市。同日，普京签署命令承认克里米亚共和国为独立国家，以及批准克里米亚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方案。

18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夫（Владими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克里米亚总理谢尔盖·阿克肖诺夫（Сергей Аксенов）、塞瓦斯托波尔市议会主席阿列克谢·恰雷（Алексей Чалый），共同签署克里米亚共和国与塞瓦斯托波尔市加入俄罗斯的条约。签字仪式之前，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就克里米亚入俄发表讲话。在讲话中，普京多次提到克里米亚在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上具有的特殊地位。他具体阐释道^③：

“为了理解为什么他们（笔者注：克里米亚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笔者注：加入俄罗斯），需要了解克里米亚的历史，需要了解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对彼此意味着什么。克里米亚渗透着我们共同的历史与骄傲。这里有古老的克森尼索城市，在这里圣者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了洗礼。他的这一精神功绩，即接受东正教，奠定了联结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共同文化、价值观与文明的基础。在克里米亚有俄罗斯士兵的墓地，正是他们的勇气使得克里米亚在 1783 年被收纳为俄罗斯领土。克里米亚即是塞瓦斯托波尔，传说之城，伟大的命运之城，堡垒之城，以及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故乡。克里米亚即是巴拉克拉瓦和刻赤，马拉霍夫古墓和萨布恩山。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是俄罗斯军事荣耀与前所未有的英勇精神的象征。克里米亚即是不同民族文化与传统独一无二的结合体。在这一点上，克里米亚与更广大的俄罗斯非常

① На общекрымском референдуме 16 марта 2014 года за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е Крыма с Россией на правах субъекта РФ проголосовали 96,77% крымчан. http://crimea.gov.ru/news/17_03_2014_3

② Там же.

③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相似，在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民族也没有消失或被同化。俄罗斯族人、乌克兰族人、克里米亚鞑靼族和其他民族，历来在克里米亚土地上一同生活、工作，并同时保存了自己的特性、传统、语言和信仰。”

他进而强调^①：

“在人们的心目中和意识里，克里米亚，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份建立在真理与公正基础上的信念一直坚定不移，代代相传，不管是时间、环境、还是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所经历过的动荡，都最终无法改变它。”

普京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分割出去的责任归咎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本人，认为这一决定即使从当时的法理看都是非法的。^②然而，在他看来，因为当时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大家并没有给予此事很多注意，以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不会分开，成为两个独立国家。^③而当苏联解体以及克里米亚突然变成了乌克兰领土后，“那时俄罗斯才意识到，它不仅遭遇盗窃，更是遭遇抢劫。”^④

需要注意的是，普京将克里米亚之丢失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实力的削弱直接联系在一起^⑤：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听过，克里米亚人不久前抱怨说，当时，在 1991 年，他们像一袋土豆似地从一个国家的手里被交到另一个国家的手里。不能不同意这个说法。而当时的俄罗斯呢？做了什么？低下了头并接受了事实，把这个委屈吞了下去。我们国家当时处在如此严重的困境，完全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们没能接受这个不可容许的历史不公平。这些年，普通俄罗斯人和许多社会名人不止一次地提过这个议题，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自古以来的领土，而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斯的城市。”

从上面的这几段话中可以得出两个推论。

①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⑤ Там же.

第一，克里米亚在历史上标志着俄罗斯的荣耀和威力，是俄罗斯文化的摇篮。普京自己若干次强调这一点。比如，在 2015 年上映的《克里米亚：回归之路》纪录片中，普京很明确地指出^①：

“克里米亚在俄罗斯公民与俄族人意识里，跟我们历史上最英勇的事迹联想在一起。这包括俄罗斯得到这些领土的时期，二战期间克里米亚与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防御。克里米亚跟俄罗斯历史、俄罗斯文化、艺术、皇族联系在一起。总之，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历史互相交缠。”在 2014 年发表国情咨文时，他又强调说^②：

“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而言，这个事件（笔者注：克里米亚入俄）有着特别的意义。这就是因为生活在克里米亚的是我们的人，因为这个领土本身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以及因为这里正是多元化、但同时团结坚如磐石的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的精神根源。<...>这一切给我们理由，说克里米亚、古老的克森尼索、塞瓦斯托波尔对俄罗斯具有巨大的文明和神圣意义。”

普京甚至把克里米亚比作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表示克里米亚对俄罗斯的神圣。^③

这一切说明克里米亚跟俄罗斯大国认同密切相关。正如金伯利·马尔登（Kimberly Marten）指出，因为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把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版图，正好是俄罗斯崛起为欧洲大国的时候，所以克里米亚在其大国认同中占据核心地位。^④更何况，苏联作为冷战期间第二个超级大国的历史也是始于此地。1945 年初，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市举行会面，就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达成协议，建立了以美苏两极为中心的所谓雅尔塔体系。这一切都有象征意义，是构成俄罗斯大国意识的关键成分。

第二，在俄罗斯领导人眼中，克里米亚的失落和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丢失，这两个事实息息相关，不能分开来看。大国地位的丢失导致俄罗斯陷入系统

① 《克里米亚：回归之路》，纪录片，2015。

②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4 декабря 2014.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7173>

③ Там же.

④ Kimberly Marten, “Putin’s Choices: Explaining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5, Vol.38, No.2, p.195.

危机、实力衰落、影响力衰退，甚至无法留住克里米亚。而没能留住克里米亚反过来又成为俄罗斯地位下降的表现，加强了大国的失落感和被侮辱感。克里米亚之丢失因而跟俄罗斯大国地位之丢失联系在了一起。由于克里米亚一方面是俄罗斯荣耀的象征及其国家性的发源地，另一方面它的失落代表俄罗斯的衰弱与侮辱，因此，它的地位，即或者属于俄罗斯，或者不加入其中，成了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指标之一。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当俄罗斯非政府调研机构列瓦达中心在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向被调查者提出“在您看来，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首先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时，分别有 79%、72%、79% 被调查者回答说，这意味着俄罗斯回到作为大国的传统角色，以及在后苏联空间确立自己的利益。^①在 2014 年 3 月 21 日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罗斯法案的签署仪式上，国家杜马发言人谢尔盖·纳雷什金（Сергей Нарышкин）说：“今天我们为所采取的历史决定和历史事件感到由衷的自豪。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们非常感谢您所表现的坚定立场，它提醒了很多，俄罗斯的伟大不但在过去，不但在未来，还在当下。”^②

当然，上述的原因不是唯一的，俄罗斯领导人还考虑了其他因素。在 18 日的演讲中，普京还提到乌克兰自独立以来一直试图强制同化当地俄罗斯族人，使他们放弃历史记忆和自己的母语。^③他强调新政权对建立纯乌克兰民族国家的追求，以及他们强烈的反俄情绪。关于这一点，普京说了这样一段话^④：

“那些抵制政变的人受到了镇压和惩罚的威胁。而首当其冲的，毫无疑问，就是说俄语的克里米亚。因此，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请求俄罗斯保护他们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保障克里米亚不会发生当今在基辅、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其他乌克兰城市正在发生的（混乱）【笔者注】。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这个请求，不能抛弃正处在灾难中的克里米

① Крым два года спустя: внимание, оценки, санкции. <http://www.levada.ru/2016/04/07/krym-dva-goda-spustya-vnimanie-otsenki-sanktsii/>

② Церемония подписания закона о принятии Крыма и Севастополя в состав России. 21 марта 2014.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26>

③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④ Там же.

亚及其居民，否则这会是一个背叛。”

在4月17日“直线对话”上普京又提到了这一点^①：

“（笔者注：当时）主要风险在于，针对说俄语人群的威胁十分具体和现实。正是这个威胁使克里米亚人民出于对未来的考虑向俄罗斯求助。这也是我们（笔者注：做出行动时）所考虑的因素。”^②

在《克里米亚。回归之路》中普京也强调说：

“对我们而言，克里米亚并不是陌生的土地。克里米亚在历史上都是俄罗斯的领土，其大部分居民也是俄罗斯族人。<...>我们当时必须保护那些人。”

普京上面指出的原因，可以简单表述为“保护与本国有文化、语言、宗教等内在联系人群的责任”。这也是大国认同的一种体现。凡是称得上大国的国家，必须有能力对自己公民及相关人群提供安全保障，否则会损害该国威望以及作为大国的形象。这是因为，公民是构成大国的集体，也是该国文化精神的载体，大国与其公民互相离不开。大国保护其公民尤其是境外公民的权益与安全，一方面是其所当然的义务，另一方面也是其大国地位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同时，感觉到背后有国家保护是该国公民自豪感的来源，此自豪感与大国威望交织在一起。如果大国辜负了公民的这一期望，便是软弱的迹象，是向内外传播的消极信号。

除了自己的公民外，大国还会至少关注属于本国主体民族、拥有与本国同样文化背景、但是属于其他国家公民的人。这样的人虽然是其他国家的公民，但因为他们保留该大国的文化认同，所以一定程度也是这个大国的文化载体，不能被大国视为完全陌生的人。由于他们与大国的此种联系，对他们的侵犯至少会引起大国的注意乃至强烈反应。在其著名的18日演讲中，普京强调说^③：

“无论当下还是将来，乌克兰都会有千百万俄族人、说俄语的公民，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当然，这样的人遭遇歧视或生命威胁本身不足以构成大国干预别国内政

① Прямая линия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17 апреля 2014 года.

② Там же.

③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甚至使用武力的理由，但至少会引起大国的不满。与此相类似，大国会关注和保护与自己相关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比如雕像、建筑、艺术品等，因为这些遗产是代表大国的象征。对这些象征的不尊重乃至侮辱行为，便是对大国本身的不尊重和侮辱。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一直坚决反对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数年来试图拆除纪念苏联红军解放雕像。当这些雕像遭到侮辱时，俄罗斯也一直表示强烈抗议。

从这一角度看，在俄罗斯领导人眼中，乌克兰新政权敌视境内俄族和说俄语人群，对他们构成实际威胁，而俄罗斯作为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主体，是这些人的最后依托，不能袖手旁观。虽然大部分克里米亚人不是俄罗斯国籍，但因为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们没有被俄罗斯领导人视作外人。在上文引用的一段话里普京自己指出，“生活在克里米亚的是我们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民众对此一问题有非常明确的态度。根据克里米亚公投前后进行的民调，94%被调查者认为，俄罗斯应该保护克里米亚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利益；83%的人认为，即使这将会导致俄罗斯跟其他国家关系的复杂化，俄罗斯仍应该保护克里米亚各族人民的利益。^①不过，即使将这一种对非俄罗斯国籍克里米亚人的亲近感排除在外，克里米亚除了本地俄族人外仍有不少俄罗斯公民，包括俄罗斯驻军。总之，正如普京所言，如果不保护这些人，这会是一个背叛，是对俄罗斯大国形象的巨大危害。

根据普京的说法，俄罗斯决定统一克里米亚的另一个原因，是乌克兰加入北约会使俄罗斯遭逢失去黑海军事基地的威胁。他对此表态称^②：

“克里米亚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也是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这片战略要地应当处于强大而稳定的主权之下，而今天这样的主权只能是俄罗斯的……我还想提醒一下，在基辅已经有人声明要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了。这个前景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俄罗斯的军事荣耀之城会出现北约舰队，同时意味着对俄罗斯整个南部的威胁——不是虚拟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我们并不反对跟北约合作，完全不反对。我们反对的是军事同盟，而北约无论其内部怎样

①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о Крыме. <http://fom.ru/Mir/11401>

②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改革，仍然是一个军事同盟组织，我们反对这个军事组织霸占我们家门口以及我们的历史领土。”

在“直线对话”上，普京再次强调北约扩张和导弹防御系统，是影响统一克里米亚决定的因素。^①据他解释，俄罗斯担心北约会像以前那样先把乌克兰拉入其中，再对俄罗斯说这跟它没什么关系，结果北约战舰将驻扎在“俄罗斯海军荣耀之城塞瓦斯托波尔”。^②他进而指出，尽管克里米亚有很重要的战略位置，但因为现有的现代武器，从军事方面看，它已经不像 18-19 世纪那样重要。^③问题在于，俄罗斯担心一旦北约军队进驻克里米亚，随后必定将这些现代武器部署在那里。^④

“... ...而这对我们有地缘政治意义，这样俄罗斯将会被挤出黑海地区。我们只会剩下一小片沿岸，大概 450 到 600 公里。仅此而已！”^⑤对此普京表态说^⑥：

“这无非是把俄罗斯挤出对我们极其重要的世界地区的十分现实的威胁，在过往的数世纪中，多少俄罗斯人的尸骨被葬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件严重的事。”

从普京上面的讲话中，能清楚地看到，安全考虑，即乌克兰加入北约，加上对克里米亚失控的担忧，的确是决定拿下克里米亚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能完全否定其作用。然而，即使有作用，也不是决定性的。对此，笔者想指出这样几点来进行论证：

第一，正如丹尼尔·德雷斯曼（Daniel Treisman）所说，“……这一理论的最大难处在于，当普京攻击的时候，乌克兰并没有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计划。”^⑦至于普京所指出的关于基辅的一些人声明尽快加入北约，德雷斯曼强调，这些声明是在俄军出现在克里米亚之后，才被乌克兰领导人提出来的。

① Прямая линия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17 апреля 2014.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⑤ Там же.

⑥ Там же.

⑦ Daniel Treisman, “Why Putin Took Crime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6, Vol.95, No.3, p.48.

①再者，德雷斯曼又指出，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于 2013 年 10 月很明确地宣称，乌克兰不会在 2014 年加入北约。②迈克尔·麦克福尔在 2009–2012 年间任奥巴马俄罗斯问题顾问，并在 2012–2014 年间任美国驻俄大使，他参与过所有奥巴马与俄罗斯总统的会面，也听过他们的所有电话会谈。③据他说，他一次也没听过北约扩张问题被俄罗斯总统，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普京，摊在桌上。④如果俄罗斯领导人真的担心乌克兰会加入北约，很可能早就跟美国总统谈到此事⑤。更何况，如果俄罗斯的目标是预防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安排到其边界，那并吞克里米亚之举达到的结果是相反的，因为正是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提高了毗邻国家的不安全感，使北约活跃起来，加紧军事建设与合作。⑥

第二，据普京自己所说，统一克里米亚的决定只是**部分地**取决于安全考虑。⑦也就是说，即使确实有安全考虑，也不能把这些考虑当作解释克里米亚入俄事件的唯一原因。另外，若我们考查普京关于北约和导弹防御系统问题的表述，便会发现，里面交叉着关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不少情感化的言辞。比如，在上文引用的话中，可以看到普京若干次将塞瓦斯托波尔称为“俄罗斯军事荣耀之城”。在提到黑海地区对俄罗斯的重要性时，除了其战略位置外，普京还强调过去有许多俄罗斯士兵为此牺牲了性命，并把这一点作为必须确保俄罗斯在该地区存在的理由。在提出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担忧时，普京又说：“你们知道吗，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会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北约水兵那里去作客。”⑧由此可见，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北约驻军克里米亚、北约舰队出现在塞瓦斯托波尔，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是个噩梦。这里不仅有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因素，更是大国名誉在起作用。让曾经是“死敌”的北约占领代表俄罗斯辉煌历史的地方，是对本国难以承受的侮辱。更何况，俄罗斯曾经是北约唯一的对手，实力与北约相当，倘若北约驻军克里

① Daniel Treisman, “Why Putin Took Crimea”.

② Ibid.

③ Michael McFaul *et al.*, “Faulty Powers. Who Started the Ukraine Crisis?”, pp.168-169.

④ Ibid.

⑤ Ibid

⑥ Ibid.

⑦ Прямая линия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17 апреля 2014.

⑧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米亚，便是俄罗斯地位下降的最显著表现。苏联解体后因为产生了本体性不安全，而对地位变得非常敏感的俄罗斯，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前景。这是在安全考虑背后、影响到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政策的更深层次的因素。

结 语

俄罗斯敢于占领克里米亚的决策，似乎出人意料，至今对此事件发生的原因有不少争论。上文试图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从俄罗斯的大国认同的角度，解释俄罗斯所做的决定。正如上文所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产生了严重的认同危机。此时，俄罗斯出于本体性安全考虑，对其国家利益进行重新排序，使得恢复大国地位成为优先任务，以此保持其大国认同的连续性。既然恢复地位成为优先目标，因此俄罗斯对地位本身变得极其敏感，尤其是对西方是否承认其地位的态度。乌克兰危机被俄罗斯领导人理解为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势力范围、加入北约的策略，因而被视为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挑战。而克里米亚是俄罗斯大国性的象征，这里的一切与俄罗斯作为大国的辉煌时期联系在一起。因此，占领克里米亚的决策，不仅是本着保障黑海海军基地的目标，更是本着证明俄罗斯是个大国、以此保持认同连续性的需求。

【Abstract】 The Ukraine crisis has brought two challenges since 2014. On the one hand, it's a big shock towards the existing U.S.-led international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On the other hand, this crisis has also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Russian policies during the Ukraine crisis, especially Putin's taking of Crimea, have aroused heated debate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rcle. The most critical question is why Russia acted like this. So far, scholars have provided interpretations respectively based on realism,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lthough the former two are strongly persuasive, yet both are limited by superficial interests, namely, so-called "national interests" or "interests of those in power", neglecting a more in-depth shaping factor, namely, identity. Although constructivism interpretations introduce identity 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yet the existing framework is

incomplete, unsystematic and not unified. In fact, Russian great power identity is the best footnote for Russian behaviors.

【Key Words】 the Crimean Issue, the Ukraine Crisis, Russian Diplomacy, Russian Great Power Identity

【Аннотация】 Кризис в Украине с 2014 года вызвал д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это был колоссальный удар по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ой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е, возглавляемой Соединё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кризис бросил новый вызов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кризисе Украины, особенно инцидент с вхождением Крыма в Россию, вызвали широкую дискуссию в сфер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данных дискуссий: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предприняла та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учёные предоставляют три объяснен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еализма,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и 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а. Хотя первые два объяснения и более убедительны, они ограничены поверхност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ил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людей во власти», и игнорируют при этом конкрет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ие факторы, формирующие эти интересы —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Объяснен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а, хотя и включают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рамки анализа, однако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е имеют единой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 ней отсутствует целостность и систематичность.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рамках концеп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ия — лучшее объяснение п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рымский инцидент, кризис в Украин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历史遗产及欧亚区域一体化*

A·利布曼, A·奥贝坚科娃**

【内容提要】苏联历史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欧亚区域主义(Eurasian regionalism)? 尽管很多文献已注意到“后苏联”区域主义概念本身, 即已蕴含着历史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但关于“苏联”历史遗产具体影响的研究, 尚散布于文献之中且少被关注。这种历史遗产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着欧亚区域主义: 一方面, 它是区域组织(regional organizations)发展的隐性环境因素; 另一方面, 通过路径依赖的惯性作用, 直接影响欧亚区域组织本身的演进。由于苏联遗产, 欧亚区域主义的发展与其他地区的区域主义大相径庭。

【关键词】欧亚一体化 欧亚区域主义 苏联历史遗产 后苏联空间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6-0040(17)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大欧亚伙伴关系与地区化进程, the Partnership in the Great Eurasia and the Regionalization Process”(项目批准号: 16JJDGJW004)的阶段性成果。

** A·利布曼(Alexander Libman), 德国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Ludwig Maximilians University of Munich)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人;

A·奥贝坚科娃(Anastassia Obydenkova), 西班牙科学研究理事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Council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SIC-IAE))、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应用分析与社会资本实验室研究员(Laboratory for Applied Analysis of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of the Center for Institutional Studies of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一、引论

学界对于“后苏联”区域一体化（‘post-Soviet’ regional integration）的概念早有研究，只是近几年这一概念才逐步让位于“欧亚区域主义”（Eurasian’ regionalism），但“欧亚”的边界仍主要与前苏联的边界相重合^①。这就使得对于欧亚区域主义的讨论显得十分独特，毕竟，并非所有的区域空间都是由历史遗产来界定的。诚然，殖民遗产形塑着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组织的边界，但就欧亚国家超越其共同的苏联遗产，在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巨大差异而言，欧亚仍然保持着独特性。从这个角度看，对欧亚区域主义的讨论，显然应将共同历史遗产的影响纳入考量。历史遗产也是地区组织的制度设计及地区机构运行效果的重要影响参数。

尽管学界对这一观点少有争议，但就苏联遗产是如何影响着欧亚区域主义的议题，尚未达成共识。在一定意义上，人们也许会问：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后苏联”区域主义打上了深深的“后苏联”的烙印？本文旨在回顾既有文献中的学术依据和理论争鸣，努力对其进行整合，并探究苏联历史究竟在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欧亚区域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本文还希图研究历史遗产，尤其是苏联政体的遗产，是如何影响着当代欧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② 尽管学界对此已有所研究^③，但本文以欧亚区域主义（Eurasian regionalism）作为特殊的案例来研究，这在学界还是较具新意的。

我们所讨论的欧亚区域组织（Eurasian regional organizations），均由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构成，包括：独联体（其下有多个小型组织）、欧亚经济联盟（EAEU, Eurasian Economic Union，包括欧亚发展银行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国家。显而易见，所有这些组织都可以称为是“后苏联”的，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可以从

① K. Hancock, A. Libman, “Eurasia”, in T. Börzel, T. Risse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② A. Simpser, D. Slater, J. Wittenberg, “Dead But Not Gone: Contemporary Legacies of Communism, Imperial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Mimeo, 2017.

③ M. Beissinger, S. Kotkin eds., *Historical Legacies of Communism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G. Pop-Eleches, J.A. Tucker, *Communism’s Shadow: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ttitu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追溯它们的发展轨迹。比如，欧亚经济联盟的前身是 1995–2000 年的关税联盟（Customs Union），其后为 2000–2014 年的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其中，在 2010 年，成立了新的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①甚至在其官方的机构介绍中，欧亚经济联盟，也将其起源追溯至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对欧亚联盟的论述，尤其是 1994 年纳扎尔巴耶夫所做的演讲。与此类似，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肇始于《塔什干条约》，甚至连欧亚发展银行也是继独联体跨国银行（the Interstate Bank）之后，在后苏联欧亚大陆上建立政府间金融机构的第二次尝试。^②

总体而言，在历史遗产的框架之下讨论欧亚区域主义有两种方式。首先，我们可以观察现有的组织及其运行特征，分析这些组织（或者其成员国）是如何受到历史遗产的影响。其次，我们可以将这些欧亚组织本身看作是“制度性”遗产的个案^③。正如后文将要讨论的，后苏联区域主义的出现，其实与苏联解体同步。在 1991 年后至少 15 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欧亚区域组织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它们是“文明离婚”的工具，旨在降低苏联解体可能带来的冲突。本文主要聚焦于第一种观点，当然，倘若在比较区域主义的视角中探讨欧亚区域主义，则将更为有趣。

就第一个视角而言，还有两个更为深入的角度。第一，我们可以观察欧亚区域主义发展的**环境**，是如何受到苏联遗产的影响，以及这一环境是如何改变着区域组织的设计与成效。举例来说，苏联遗产影响着欧亚区域组织成员国的治理模式、基础设施，以及成员国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类型；此外，苏联遗产对社会纽带、社会认同，以及大众和精英对于欧亚区域主义的认知等等都有影响。因此，欧亚区域主义，可能迥异于那些仅仅从**当代**的指

① 有些人可能会提及 2003 年的共同经济空间协议，然而由于橙色革命的影响，该协议并未能实施。

② 这一列表中可能还可以包括两个组织，一个是已不复存在的中亚合作组织（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该组织于 2005 年与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EC）合并；另一个则是古阿姆民主与经济发展组织（GUAM Organization for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这两个组织都不包含俄罗斯，因此在很多重要方面与我们所讨论的组织并不一样。

③ J. LaPorte, D.N. Lussier, “What Is the Leninist Legacy? Assessing Twenty Years of Scholarship”, *Slavic Review*, 2011, Vol.70, No.3, pp.637-654.

标，比如经济发展或者权力的非对称性，来考察的人们的期待。^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采用历史制度主义^②，并且通过路径依赖的逻辑来追溯**这些组织本身**的发展，毕竟，当前的状态有赖于过去的决定。我们将考虑以上两个角度，并对第一个角度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历史遗产以及后苏联区域主义所处的外部环境

（一）经济联系和物质性的基础设施

当前，对于区域主义的既有研究认为：国家之间经济和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是区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多伊奇（Deutsch）关于“政治共同体”的讨论，以及克鲁格曼（Krugman）关于“自然的”区域主义的概念，都强调区域组织应该由高度互联的国家（highly interconnected countries）创建，而且，区域组织反过来也会增强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当然，欧亚大陆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正是通过苏联经济组织的方式，创造出了相互间极其依赖的关系。苏联的中央计划者明确地安排供应链的结构，以跨越那些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边界，而在很多情况下，工厂往往只有单一的供应商和单一的客户。工厂被完美地纳入到一个特定的供应链中，如果想脱离这个体系，寻找新的客户，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本，而且无法操作。^③此外，在基础设施方面，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也相互依赖，也唯其如此，它们才能进入全球市场。举例来说，欧亚的管道系统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世界上少有一个管道系统能够横穿如此众多的国家边界，毕竟每个国家都很担心“被套牢”和出现再分配的冲突。然而，在苏联，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被认为是单一的经济有机体的一个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共同的历史”最为直观的效应是，欧亚国家对于通过发展经济区域主义，来管理共有的基础设施，并从经济依

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当代的特征自然也会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但这一点却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② P. Pierson, “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96, Vol.29, Issue2, pp.123-163.

③ A. Libman, A. Obydenkova,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 Limiting Factor in Democr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Sub-National Regions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4, Vol.49, pp.168-196.

赖中受益，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然而，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实际效应远为复杂。利布曼和维诺库罗夫（Vinokurov）特别指出，现存的依赖关系造成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使得欧亚区域主义的路径，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主义的路径明显不同。^①

第一，相互依赖与欧亚国家的威权政体相互叠加，让人们担心会出现像斯通（Stone）所提出的“操控”现象。^②即，个别国家滥用谈判权力，辖制而不去鼓励欧亚地区国家尝试减少它们对于邻国的依赖。^③因此事实上，高度的相互依赖，不是增益，反而限制了经济区域主义的发展。

第二，在高度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欧亚区域主义在经济危机期间似乎更为繁荣，而在经济增长期却显得并不成功。即，出现了危机背景之下的一体化。这是因为在经济增长期，该地区内的国家有更大的能力，去寻找发展经济新型组带的替代方案；但在经济衰退期，这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相互依赖。

第三，在高度相互依赖的情况之下，官僚们的动机也有所不同。在一个正常的，大家自愿、主动聚合在一起的区域性组织当中，超国家的官僚机构能够通过扩大他们的议程、加深一体化进程而获利。然而，若要在一个已经高度一体化的空间当中寻租，去一体化进程则更有利可图。因为去一体化要求建设大量新的、昂贵的基础设施。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显示的，官僚们是预算最大化的始作俑者；并且在后苏联的情境之中，跟其他很多组织不同，预算的最大化往往是通过去一体化进程而非一体化进程取得的。去一体化要求建设新的基础设施，而维持原来的一体化仅仅意味着保养旧有的基础设施。因此，就欧亚大陆的情况而言，功能主义有关“溢出效应”的观点并不

① 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the Post-Soviet Integr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A. Libman, E. Vinokurov, “Post-Soviet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of Functional Bureaucrac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2, Vol.19, No.5, pp.867-894; A. Libman, E. Vinokurov, “Autocraci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asian Case”, Mimeo, 2017; E. Vinokurov, A. Libman, “Do Economic Crises Impede or Advanc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14, Vol.26, pp.341-358.

② R. Stone, *Controlling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A. Libman, A. Obydenkova, “Informal governance and participation in non-democrat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13, Vol.8, pp.221-245.

适用。

以上三点似乎解释了欧亚经济区域主义的一些特点。首先，尽管当前已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如，出于共同管理一些基础设施的需要，在低阶政治层面进行经济合作，包括铁路或者电力网格，但它们并未为区域一体化创造“溢出”效应。其次，欧亚经济区域主义的主要进展，是 2010 年关税同盟的成立，这恰巧是一场重大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但不是每一场危机都能促进欧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的。再次，同样，尽管欧亚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度远比 20 世纪 90 年代低，但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却得以建立。看起来似乎矛盾的是，经济联系的减少，却促进了欧亚区域经济组织的发展。

所以，尽管欧亚国家间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苏联决策者曾用特殊的方式来“整合”过他们的经济空间，包括建构强大的技术互补与依赖，但这些都不足以促进欧亚区域主义的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互依赖以及苏联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欧亚地区组织的发展和演变的特质。有趣的是，到底何时欧亚区域主义的这种“特质”将消失？对于欧亚地区进行研究的早期观察者期望，随着新的基础设施的修建，以及公司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欧亚国家之间的经济纽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

在实践中，我们观察到一些新型的、以市场为驱动的纽带的出现，这些纽带建立在地理上相互毗邻且拥有相同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之上。比如，欧亚地区出现的大规模劳动力迁移，就遵循着市场经济的规律；俄罗斯零售连锁业和欧亚地区电信公司的扩张，也是这一简单商业逻辑的产物。^①这些由市场驱动而形成的纽带，本应脱离过去的那种技术依赖问题的困扰，但同时这些纽带使得国家间继续保持高度的相互依赖，进而导致上述一些负面效应的出现。目前欧亚国家的市场化既不完善，也不完整，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二）社会联系

欧亚国家不仅从前苏联继承了经济上相互依赖的遗产，而且还承继了前苏联时期国家间的社会纽带，当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从俄罗斯帝

^① A. Libman, „Russische Direktinvestitionen in Eurasien: Machtpolitik mit anderen Mitteln?“, *SWP-Studie*, 2015, 2015/S 15.

国继承过来的。根据民意调查，在欧亚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有相当多的人在欧亚其他国家中拥有亲戚或朋友。^①俄语仍被广泛使用，因此可以说在文化上，欧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体化的。例如，大多数欧亚国家仍在出售俄语书籍^②；在俄罗斯境外，很多欧亚国家的人们，仍在收看俄罗斯媒体的节目等等。^③然而，这种文化共性似乎也正在逐渐减少，一方面是因为俄语地位的弱化，另一方面也由于各国政府的刻意限制。比如，在尊严革命（the Revolution of Dignity）之后，乌克兰在限制这些社会纽带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法令。^④

然而，文化纽带的作用比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要更为多样。对于这一点，起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共同的文化可能会带来共同的认同，这对于经济和安全区域主义（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onalism）的成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尽管在威权主义国家，政府对民意的重视程度相对较弱^⑤，因此共同的身份认同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但不能完全否认其功用。^⑥当然，欧亚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共享一种身份认同，仍有待讨论。俄罗斯的民调显示，很多人支持俄罗斯所拥有的“欧亚”身份认同。^⑦然而，对于这些结果也不应给予过

① 关于欧亚地区组织内部欧亚空间及支持率的调查，可参见<http://www.eurasiamonitor.org/rus/>以及http://old.eabr.org/r/research/centre/projectsCII/integration_barometer/

② 以乌克兰为例，该国在传统上不仅会举办大型的俄语书市，同时还发展出了一个巨大的、非法复印俄语书籍的行业，参见 <https://eksmo.ru/news/1919430/>

③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媒体本身也已成为西方研究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对象，比如欧盟已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参见 A. Obydenkova, “Regime Transition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The Freedom of Mass Media: Transnational Impact on Sub-National Democrat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8, Vol.47, pp.221-246.

④ 然而，即便是 2017 年，俄罗斯出版商仍估计，大约有一半的乌克兰书市仍在出售俄语书籍，参见<https://rns.online/it-and-media/V-Eksmo-aST-zayavili-o-fakticheskoi-potere-ukrainskogo-rinka-dlya-rossiiskih-knig-2017-09-08/>

⑤ A. Obydenkova, A. Libman, *The Challenge of Authoritarian Regionalism: Non-Democrat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Eurasia*, Unpublished Book Manuscript, 2017.

⑥ 因此，尽管存在着广泛的仇外情绪，但相对于中亚国家而言，俄罗斯还是能够保持比较自由的移民，这被用来作为确保俄罗斯控制整个欧亚地区的一种工具，参见 D. Shlyapentokh, “Tajikistan, Russia, and Migrant Workers”, 2013, *Caucasus International*, Vol. 3, pp.143-158.

⑦ R. Rose, N. Munro, “Do Russians See Their Future in Europe the CIS?”,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pp.49-66.

高的评价：在大多数情况下，俄罗斯人所指的“欧亚”身份认同，并不是为了突出其与苏联邻国的共同点，而是为了凸显他们独特的“文明”认同，从而使他们与欧洲和亚洲有所区分。毕竟，来自后苏联的移民，常常并不为俄罗斯社会所接受。^①对于很多俄罗斯人来说，“欧亚”的概念，主要指涉俄罗斯的独特性，而非欧亚的共性。

根据民调，对于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或者说对于更广阔范围的欧亚空间的自我认知，并不能表明欧亚大陆的人们将他们自己视为共同体的一个部分。^②然而，社会纽带与对苏联的怀旧，这两个因素使欧亚区域主义的观点倍受欢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缘何后苏联空间内的各国政府，都十分关注该问题。

然而，另一方面，实际上大多数欧亚国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成立的，这一事实推动着这些国家积极投身于自身的国家建设。^③这一点给欧亚地区主义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从工具的角度出发，欧亚国家的精英往往担心，广泛的区域一体化协议会使少数族群反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建设项目，或者直接支持俄罗斯^④。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往往容易把强权作为比对的“他者”，从而来构建新的、自身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使得先进的区域一体化变得更为困难。一些文献已认识到：欧亚国家在国家建构方面的努力和追求，极大地影响着他们对待区域主义的态度。^⑤

① 有趣的是，在俄罗斯，无论是对“外国人”（比如来自中亚的移民）还是对“少数民族”（比如来自北高加索的人），俄罗斯主流社会都表现出一种仇外情绪。这种仇视其实也是苏联遗产的一个方面，与欧洲的反移民情绪大为不同。参见 C. Schenck, “Open Borders, Closed Minds: Russia’s Changing Migration Policies”, *Demokratizatsiya*, 2010, Vol.18, pp.101-121; M. Reeves, “Living from the Nerves: Deportability, Indeterminacy, and the ‘Feel of Law’ in Migrant Moscow”, *Social Analysis*, 2015, Vol.59, pp.119-136; J. Round, I. Kuznetsova, “Necropolitics and the Migrant as a Subject of Disgust: The Precarious Everyday of Russia’s Labor Migrants”, *Critical Sociology*, 2016, Vol.42, pp.1017-1034.

② 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the Post-Soviet Integr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③ T. Kuzio, “Transition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Triple or Quadruple?”, *Politics*, 2001, Vol.21, pp.168-177.

④ H.E. Hale, *The Foundations of Ethnic Politics: Separatism of States and Nations in Eurasia and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⑤ R. Abdelal, *National Purpose in the World Economy: Post-Soviet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此外，社会与文化纽带的存在，以及对过去的历史记忆（下文将有所论述），都令欧亚地区主义呈现出高度政治化的特点：^①这使得欧亚国家间的合作，很难将地区主义发展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性工程（如果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项目，不会有什么障碍）。欧亚经济联盟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尽管相关国家耗尽心思，希望以经济一体化倡议的面目推出这个项目，然而人们还是主要从政治后果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联盟。另一方面，学者史密斯推测，历史遗产也同样影响着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表现，并且削弱了地区主义的成果。学者们判断，就既有的经济相互依赖水平而言，如果无须处理社会和文化遗产，欧亚的区域合作可能会更为成功。

（三）历史记忆与观念因素

在谈论苏联的历史遗产时，有必要对我们的讨论作进一步的细化。一方面，为了理解当前欧亚区域主义的表现，在狭义上，我们可以参考“苏联遗产”方面的研究，即，理解以前的制度和实践，是怎样影响着当代的制度和实践。另一方面，独联体的运转也可能受到社会所建构的苏联历史的影响，即，后苏联国家的上层精英和普通民众是如何认知和解读苏联时代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在这一背景之下，历史学家常常会探讨**苏联记忆**。它们可能是，也常常真就是受政府宣传所影响的、对于过去的一种并不那么准确的认知和记忆；然而，它们却又能为区域组织的表现提供一种重要的解释。^②前面的讨论我们聚焦于历史遗产，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历史记忆**。

就“历史记忆”而言，需要提及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欧亚很多国家内广泛存在的对于前苏联的怀旧情怀^③，是推动欧亚地区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一方面，对于欧亚地区主义的正面认知，

① 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the Post-Soviet Integr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② V. Gel'man,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Bad Governance in post-Soviet Eurasia: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7, forthcoming.

③ S. White, "Soviet Nostalgia and Russian Politic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0, Vol.1, pp.1-9.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正面的苏联往事影响的结果^①。对于俄罗斯精英而言，也是如此。在俄罗斯，很多精英，包括普京总统本人，都将苏联解体看作是消极负面的。众所周知，普京总统曾将苏联解体比作是地缘政治灾难^②。尽管明显缺乏经济合作效应，然而，作为最后一个将后苏联国家整合在一起的机制，人们仍很珍视欧亚地区主义的价值与意义。

其次，与此同时，人们常常从对苏联怀旧情怀的视角来审视欧亚地区主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缘何保守势力对于一体化进程会进行政治层面的解读，而且，特别关注欧亚区域主义应该怎么发展。在俄罗斯，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多年来直言不讳地支持欧亚地区主义。当然，叶利钦和普京时期的政府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俄罗斯一位关键的欧亚地区主义倡导者——谢尔盖·格拉季耶夫（Sergey Glazyev），也因其对于管制经济政策的支持而闻名。^③达登认为，在接受欧亚地区主义与非自由的经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④反之，这也意味着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们，对于欧亚地区主义持怀疑态度，当然他们不占主导地位。这个议题，是由保守主义者所“劫持”的。在一段时间内，就极端情况而言，俄罗斯学界对于欧亚地区主义的研究，几乎完全由那些在苏联时期关注经互会的研究者们所主导。这或许也解释了，缘何欧亚地区主义有一种要成为区域联盟保护者的强烈倾向。^⑤但在俄罗斯，保守势力对于经济政策通常只有相当有限的影响。政府内部的决策者们受保守势力的影响有限，他们对于区域主义的实际支持度并不高。

① 这当然不是否认欧亚地区主义能带来经济利益，但民众的观念是由有形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的还是被对苏联的怀念所影响，这尚未有定论。

② Распад СССР: «крупнейш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XX века». 18.08.2016. <https://ria.ru/accents/2016-08-19/1474769420.html>.

③ A. Aslund, “Sergey Glazyev and the Revival of Soviet Economics”, *Post-Soviet Affairs*, 2013, Vol.29, pp.375-389.

④ K. Darden,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Its Rivals: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mong the Post-Soviet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⑤ 当然，这并非唯一的解释：在这方面，理性选择的寻租论点具有关键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此外还应注意，欧亚地区主义的认知常常受到一体化研究的“苏联学派”的影响，而这一论点却并不能印证当前的经验和理论论据。参见 Ушкалова Д.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эффект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Вестник ИЭ РАН. 2017. No.4. С.120-137.

（四）治理

我们也需要承认，在文献中对于苏联政体遗产传统的讨论，也强调了低效机构、腐败的官僚机构以及威权政体的盛行等负面因素。^①大量的研究表明，苏联的诸多遗产可能已经对民主化以及治理水平产生了负面的影响。^②但是，也很难将苏联遗产与那些更为久远的遗产（比如沙皇帝国的遗产）截然分开。^③然而，兰基娜（Lankina）等人甚至认为，苏联政体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并削弱了沙俄时期累积起来的人力资本。对于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这些遗产对于欧亚区域组织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可以加以分析。一方面正如马纳菲尔德（Manafield）等人雄辩地证明的，通常而言，威权主义制约着国家追求经济一体化的能力。首先，民主国家有明确的动机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而非民主国家则缺乏这种动机；其次，非民主国家在提供可信的承诺及授予权利方面存在着的问题，这毫无疑问限制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前景。研究文献认识到，威权主义导致了欧亚经济区域主义的表现差强人意。^④因此，历史遗产再次限制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这与国内政治相关）。同样，国家的高度腐败以及较差的官僚素质，制约了区域协议的实施；^⑤而且这些因素还影响了公众意见以及公众对于区域组织的信任度

① A. Libman, A. Obydenkova, "Communism or Communists? Soviet Legacies and Corrup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conomics Letters*, 2013, Vol.119, pp.101-103; A. Libman, A. Obydenkova, "CPSU Legacies and Regional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Russia", *Political Studies*, 2015, Vol.63, pp.173-190; A. Obydenkova, A. Libman, "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post-Communist Corruption in Contemporary Russia: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Legacies", *Post-Soviet Affairs*, 2015, Vol.31, pp.304-338.

② 应该承认，历史遗产仅仅是众多影响后苏联民主化、国家及次国家层面中的一个因素，此外还有诸如国内及国外因素等，参见 T. Lankina, A. Libman, A. Obydenkova,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Diffusion in Post-Communist Reg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6, Vol.49, pp.1599-1629; A. Obydenkova, "Democratization at the Grassroots: the European Union's External Impact", *Democratization*, 2012, Vol.19, pp.230-257; A. Obydenkova, A. Libman, "The Impact of External Factors on Regime Transition: Lessons from the Russian Regions", *Post-Soviet Affairs*, 2012, Vol.28, pp.346-401.

③ G. Pop-Eleches, J.A. Tucker, *Communism's Shadow: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ttitu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④ 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the Post-Soviet Integr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⑤ J. Gray, "Domestic Capaci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Gap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4, Vol.47, pp.55-84.

①。国内的政治制度也影响着区域主义的类别及区域组织的功能。施德布（Soderbaum）详细地阐述了非洲区域组织在非洲的多个特殊的功能^②，这些和欧亚大陆很相似；欧亚成员国的政治体系的特点理应、并且也实际地影响着欧亚地区主义的设计和功能。^③

另一方面，成员国自身糟糕的治理水平，无疑会影响地区间国际组织机构的运作，因为这些机构中的官员最终还是由本地区国家的官员担当。不幸的是，对于欧亚组织的国际官僚主义的研究仍十分有限，因此我们的结论也仅停留在推测的层面，但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则是极为必要的。

三、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看历史遗产及其在欧亚地区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其实这个视角也是从历史制度主义中衍生而来的。为此，我们需要追溯欧亚组织的发展足迹，并且探讨其发展特性如何影响着当前的表现。路径依赖的惯性作用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独联体身上。该组织在欧亚地区的所有地区组织中，似乎是一个最缺乏清晰思路和周详考虑的设计。独联体形成于苏联解体期间（更确切地说，它的形成甚至先于苏联的正式解体）。最初，有关它的宗旨、结构以及对象，即便是它的成员国都不确定，也不确定独立后国家间的经济和政治纽带，将在多大程度上依旧保持。部分独联体的机构，是从前苏联的官僚机构蜕变而来的（前苏联军队作为独联体的联合部队运作了一年；共同货币的使用催生了一个事实上的“卢布区”的货币联盟的出现，但却并没有出现任何目标明确、运转良好的机构）。于1991年9月成立的共和国间经济委员会（the Interrepublican Economic Committee），成为苏联的最高经济机构，这个机构在《经济共同体条约》（the Economic Community

① A. Obydenkova, B. Arpino, “Corruption and Trust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ional Institutions: Changes over the Great Recession across European Stat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7, Published online: DOI:10.1111/jcms.12646

② F. Söderbaum, “Model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Africa: Neoliberalism, Sovereignty Boosting, and Shadow Networks”, *Global Governance*, 2004, Vol.10, pp.419-436.

③ A. Obydenkova, A. Libman, *The Challenge of Authoritarian Regionalism: Non-Democrat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Eurasia*, 2017, Unpublished Book Manuscript.

Treaty)^①的框架之下，同年 10 月更名为独联体国家间经济委员会（the Interstate Economic Committee），尽管随后被合法解散，但在 1994 年又以独联体经济联盟（Economic Union of the CIS）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这种复杂性也部分地解释了缘何独联体的权限及设计，结合了大量的自相矛盾的元素。一方面，独联体拥有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广泛授权，同时还有着一些非常宏伟的目标。另一方面，独联体的管理结构完全是政府间的，这反映出苏联加盟共和国在 1991 年 8 月之后所获得的地位；正如之前关于苏联命运的讨论所提到的，所有的成员国都有权退出在组织框架之内签署的任何协议。可以说，这一“退出”的规定，解释了后苏联地区主义过早地呈现出大量组织和协议的“意大利面碗”的现象（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②：这种现象已在独联体国家发生。这些组织之间的界线依旧模糊不清；因此，在几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独联体经济法院（the CIS Economic Court）也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法院（Court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2010 年-2014 年，关税同盟是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EC）的一个部分，而集安组织则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一种直接延续。欧亚地区的组织，只能以这种渐进的方式发展，逐步地设定更为集中和细化的议程，逐步地建立结构更趋完善的治理机构。欧亚经济联盟（EAEU）是这一进程的最后一步。

此外，欧亚地区主义的苏联遗产还造就了另一个特征：尽管这些国家签署了条约，但却常常出现不遵守条约的情况。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一现象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即已出现。当时，后苏联地区主义正处于形成的阶段。在那一时期，历史变迁的速度超出了条约制定的速

① 通过这个条约，我们也可以发现，追溯欧亚地区主义的起源是相当困难的。当时，这份协定由几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签署，旨在在他们之间保持一个共同的经济空间；其中，一些共和国试图成为苏联的一部分，另一些共和国已视自己为独立国家。这份协定是在这些共和国“搁置现状”的情形之下签署的，这就使得这份条约具有国内条约和国际条约的双重性质（苏联总统也签署了这份条约）。

② “意大利面碗现象”，这个词源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巴格沃蒂（Bhagwati）1995 年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一书。指的是各种贸易政策和原则，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编者注。参考百度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

度。比如，主权国家联盟（the Union of Sovereign States）——在 1991 年协商下形成的苏联的新化身——在八月政变的条约签署之前，即已被废弃。还有，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创建的、旨在为成员国之间进行交易提供便利的独联体支付联盟（The Payment Union of the CIS），也很快就变得可有可无，因为独联体国家允许他们自己的货币进行自由兑换。因此，这些国家常常会签署很多协议，但却并没有真正地想去实施；同时，他们也深深明白，不确定的未来，使得任何长期规划都毫无意义。只有 2010 年成立的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似乎打破了这一传统。然而，即便是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框架下的众多一体化项目（由这些国家制定），它们也没有加以实施的清晰意图。它们的想法是，在之后的十年里（协议实施的阶段），成员国的外部冲击和内部变化，都会使得这些项目可有可无。简而言之，从一开始，后苏联的地区主义就被认为是无须加以实施的，并且这一认识竟延续了二十多年。这反过来也影响了欧亚地区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对于成员国而言，上至精英专家，下至普通百姓，他们都极度怀疑这些项目能否落地。这也是为何关税同盟的出现，让众多观察家大为惊讶的一个原因：人们似乎已经形成一个思维定式，即，从不指望欧亚国家签署协议后能付诸实施。

总而言之，与其他区域组织类似，欧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同样也是路径依赖型的：在特定时刻所做出的决定，影响着组织的长期运转。对欧亚地区来说，当第一个区域性协议（成立独联体）孕育并成型时，当时的各方面条件，都对后来欧亚区域主义的设计、表现及公众的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 2010 年关税同盟的成立，才开始有所转变。

结 论

下表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该表列出了苏联时期留下的诸多历史遗产，这些遗产影响着欧亚区域主义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历史遗产推动着欧亚一体化的进展；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历史遗产则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消极”和“积极”是指区域组织的进步与否，而非指它们对于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重要的是，历史遗产解释了为何欧

亚地区主义对于外部事件的反应（比如对于经济危机的反应）与其他的地区组织不同；但同时，却并没有表现出地区主义理论所预测的一些特征，比如功能主义者所言的外溢理论。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历史遗产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不仅可以“预判”（predictors）欧亚地区主义的成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孕育”（moderators）着欧亚地区主义的未来形态。

表 1 苏联遗产及欧亚区域主义

遗产种类	影响
外部环境	
经济的相互依赖及技术的相互补充	地区主义要求去管理共同的基础设施→积极影响 对于过度依赖国外合作方的担忧（尤其是俄罗斯）→消极影响 官僚的动机以及功能外溢效应的缺失→消极影响 危机驱动下的一体化→经济危机中的积极影响
社会纽带	共同认同及区域主义对于维护社会纽带的需求→积极影响 与国家建设工程的冲突，以及对于向亲俄少数民族群赋权的担忧→消极影响
对于前苏联理想化的历史记忆	对苏联的怀旧→积极影响 保守势力对于一体化议程的劫持→消极影响
成员国低下的治理水平	低下的治理水平→消极影响
历史制度主义	苏联解体期间出现→大范围的、政府间的设计，不同协议的“意大利面碗”现象，承诺的低信任度，对于政府的极度不信任

当然，欧亚地区不同的区域组织，受到历史遗产的影响各不相同。比如，那些不包括俄罗斯的组织（中亚区域主义以及“古阿姆”），似乎并未呈现出我们所描述的一些特征。俄罗斯的存在，对于欧亚地区主义的治理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俄罗斯的存在，也直接影响着公众对该组织的认知。但即便是这些（没有俄罗斯存在的）组织，我们也能清晰观察到一些遗产的效应。比如，无论是在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组织内，还是在中亚地区主义的架构中（没有俄罗斯存在），都没有功能溢出效应。

当然，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人们是否能期待这种遗产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本文间接地提到有些遗产效应正在消失，但有待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还有一些遗产效应仍将长期存在。

最后，对于欧亚区域主义来说，本文所描述的因素并非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中一些因素在其他的区域组织中也有所体现。然而，其他的因素则与苏联经济组织（由生产链条及技术互补形成的组织）、治理或意识形态相关。不管怎样，历史遗产在解释欧亚区域主义的路径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有志于对此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都需要将其纳入到考量的范围内。

（张红译）

【Abstract】 The goal of the paper i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variety of arguments describing how the Soviet past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asian regionalism. While many references to the “post-Soviet” regionalism imply that history should matter substantially for its evolution, to our knowledge, the arguments about particular effects of the historical legaci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literature and rarely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We argue that the historical legacies can matter for the Eurasian regionalism in two instances: by affecting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rough the path-dependent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s themselv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asian regionalism should indeed differ from that observed in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Soviet legacies.

【Key Words】 Eurasian Integration, Eurasian Regionalism, Soviet Historical Legacies, Post-Soviet Space

【Аннотация】 Как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лияет на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ализм? Хотя многие упоминания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о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регионализме подразумевают, что история должна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влиять на его эволюцию, однако аргументы о конкретном влиян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наследия разбросаны по все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редко сравнивают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анн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может иметь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в двух случаях: воздействуя на окружающую среду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 через зависящую от пути

эволюцию сам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Развити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из-з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развития, наблюдаемого во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частях мир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ализм, советск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欧亚地区民族与认同

列夫·古米廖夫“民族过程”理论评述*

袁勋**

【内容提要】在列夫·古米廖夫的“民族过程”理论中,民族有固定的生命周期,其从出现到消亡的过程就是“民族过程”。“民族过程”的内在动力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化学能量——“进取精神”。从“进取精神震荡”开始,完整的“民族过程”一般会经历上升时期、巅峰时期、裂变期、惯性发展时期、蒙昧时期和追忆时期六个阶段,大约持续1200-1500年左右。在古米廖夫看来,“罗斯民族体”的“民族过程”从公元1世纪斯拉夫人出现开始,到公元13-15世纪左右的基辅罗斯彻底解体结束;13世纪初,伴随着新一轮的“进取精神震荡”,“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民族过程”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古氏认为,民族接触是“民族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和推动力,“民族场”和“迎合性”是民族接触的基础;民族之间积极地接触模式会促进民族进程的顺利进行,反之,消极的接触模式会阻碍“民族过程”,使得民族抵抗力下降,甚至走向衰亡。在古米廖夫的理论中,13-15世纪罗斯与蒙古民族之间的接触,就是典型的积极接触模式,对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古米廖夫的理论阐述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从自然科学角度对“进取精神”的论述,受到广泛的批评,因此其学说并非“自然科学理论”,只能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说。

【关键词】欧亚主义 俄罗斯民族 列夫·古米廖夫

【中图分类号】D751.2;B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6-0057(56)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章的不足之处,由作者负责。

** 袁勋,莫斯科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今天的俄罗斯正处在民族复兴，国家变革的攸关时代，整理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定位民族价值观，规划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已成为俄罗斯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于俄罗斯民族历史和民族属性的解读。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俄罗斯民族历史的解读由来已久，彼此看法也大相径庭，至今仍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从 18 世纪开始，争论各方提出的每一种观点无不与民族情感、阶级立场和特定的政治背景相关联。在这些学者中，列夫·古米廖夫(Л.Н. Гумилев)提出了“民族过程”(Этногенез)^①的理论，从独特的角度描述了民族的发展进程，探究了民族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周边其他民族之间相互关系，并对俄罗斯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还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极富特色。古米廖夫自称是“俄罗斯最后一位欧亚主义者”。列夫·古米廖夫的民族历史理论深化发展了欧亚主义的理论，继承和发扬了维尔纳茨基(Г. В. Вернадский)对俄罗斯史，尤其是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历史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吸纳了斯宾格勒(A. Spengler)、汤因比(A. Toynbee)等国外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创立了新的学科方向。

古米廖夫的著作自面世以来，在俄罗斯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争论。支持和否定的观点各执一词，各种论辩层出不穷。国内学界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和介绍古米廖夫的理论 and 著作，但总体而言，介绍得不够详尽，而且侧重于介绍其理论的“欧亚主义”特点，对于古米廖夫的俄罗斯“民族过程”理论鲜有介绍。因此，笔者想在本文中尽可能细致地介绍古米廖夫的“民族过程”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加以简要评述。

^① “Этногенез”一词由俄语中的“этнос”(民族)和拉丁语中的“起源”一词的词根构成。俄语的原意也是民族历史的起始阶段(Этногенез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ачальный этап этн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国内学者多翻译成“民族起源”。然而，古米廖夫在其代表作《从罗斯到俄罗斯》中将其释义为“民族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又将此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由此构成对一个民族完整“生命”的诠释。因此，笔者认为，此处译为“民族过程”更为恰当。

一、古米廖夫的学术生涯简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1912–1992 年），是俄罗斯白银时代伟大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从儿时起便对历史地理等学科有着浓厚的兴趣。1930–1934 年间，年轻的古米廖夫曾远赴西伯利亚、克里米亚等地考察。1934 年，他进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系学习，然而 1935 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并被列宁格勒大学开除，后经其母亲求情才得以获释并于 1937 年恢复学籍。1938 年因出身问题再度被捕，并被判刑五年，后流放至位于北极地区的诺里尔斯克集中营服刑，并禁止返回。直至卫国战争爆发，他得以入伍，并在 1944 年参加了苏军攻克柏林的战役。战争结束后，古米廖夫退役并于 1945 年再次返回列宁格勒大学学习。1946 年，他进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列宁格勒分院研究生部深造，然而 1947 年又以莫名其妙的理由被开除，后经努力周旋，终于获准参加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于 1948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答辩，论文题目为：《第一突厥汗国的具体政治问题研究》。1949 年 10 月，他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数次更改服刑地点，直至 1956 年才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并恢复名誉。服刑期间，古米廖夫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着匈奴、突厥和蒙古等民族的历史研究，还曾在俄罗斯科学院《古代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有关匈奴历史的论文。1956 年后，古米廖夫在艾尔米塔什图书馆工作。1960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匈奴：古代的中亚》。该书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观点，并以明显的自然决定论视角解读社会历史现象，在当时的俄国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批评意见占据主导，主要集中在史料来源问题上。1961 年，古米廖夫凭借论文《5–8 世纪的古突厥人》，通过了历史专业博士的论文答辩，终获博士学位。1962 年，古米廖夫转至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工作，利用工作之便，结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欧亚大陆上诸多民族的历史做了大量研究。尤其是对哈扎尔汗国（可萨汗国）的历史做了大量的史料考证和逻辑推演。他认为，汗国统治阶层犹太人

和被统治的哈扎尔人之间，存在着“喀迈拉”（Химера）^①的消极关系，正是这一关系导致了哈扎尔民族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这一观点引起相关历史学家的广泛批评和讨论。

1964-1967 年，古米廖夫在《列宁格勒大学学报》上先后发表了 14 篇论文，并装订成论文集《地形与民族》（Ландшафт и этнос），其中 9 篇文章涉及其“民族过程”理论，为这一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1967 年，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古突厥人》。书中明确界定了“欧亚”的地理范围，并指出俄罗斯民族与欧亚草原诸族的密切联系。该书体现出明显的欧亚主义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古米廖夫在此书中明确地将中国超级民族体排除在“欧亚”范围之外，认为中华民族与欧亚大陆诸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心理隔阂和地理界限，变相地为沙俄侵吞中国领土提供理论依据。古米廖夫后来自己在作品中承认：“此书（《古突厥人》）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属于俄罗斯而非中国，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我一定会因此而受到中国人的诅咒。”^②

1974 年，古米廖夫出版了《匈奴人在中国》一书。^③此书是其首部详细诠释民族接触理论的专著，主要写了中国（汉族王朝）和草原民族两个世纪的矛盾与冲突。书中，古米廖夫认为由于干旱频发，草原民族从中亚被迫迁移至中国边境，尽管其贵族主动学习汉文化，然终究未能融入中原文明，也从来未被汉人所接纳。后来匈奴人（草原民族）建立政权，与中原政权为敌并侵扰中原，后战败西走，直至湮灭。据此，古米廖夫得出结论，两个互相没有好感甚至敌对的民族，在对方的领土上形成的政权或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危险而脆弱的“喀迈拉”，给双方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此书是古米廖夫草原民族研究的重要作品，并承袭了《古突厥人》的欧亚主义特点，是古米廖夫涉及中国的少量代表作品之一。但由于古米廖夫并不通晓汉语，因此在中国周边民族的历史研究上，存在着史料来源不足且准确性难以考证的缺

① “喀迈拉”（Химера）原本是指希腊神话中一种前半部分像狮子，中间像山羊，后身像蛇的吐火怪物，后来演化成生物学术语，用来形容来自不同个体的生物细胞或组织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完整生物体。古米廖夫在这里引用“喀迈拉”来形容原本属于不同超级民族体的两个或多个互不相容的民族“共存”于一个社会的现象。

② Гумилёв Л.Н. Автонекролог// Лев Гумилёв: Судьба и идеи. М. 2007. С.17-36.

③ Гумилёв Л.Н. Хуны в Китае. М., 2013.

点，在学术界受到广泛批评。对于此书，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中国历史专家瓦西里耶夫（Л.С. Васильев）却评价颇高，认为“史料问题并不代表该书内容是不充分和值得怀疑的，而恰恰相反，古米廖夫的论述是翔实且具有说服力的。”^①

1974 年，古米廖夫凭借论文《民族过程与地球生物圈》，通过了地理学的博士论文答辩。1979 年《民族过程与地球生物圈》^②正式发表，一时间洛阳纸贵，在俄罗斯文化圈引起巨大轰动。该书详细论述了其有关“进取精神民族过程”的理论，着重分析了民族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阐释了他认为的民族发展的自然规律。这部作品成为古米廖夫民族学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古米廖夫将自己的“民族过程”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历史进程分析中，典型的两部代表作品是《从罗斯到俄罗斯》^③和《罗斯与大草原》^④。

古米廖夫在《从罗斯到俄罗斯》中运用自己的“民族过程”理论详细分析了从留里克王朝到彼得一世改革期间俄罗斯的民族历史进程。《罗斯与大草原》则被认为是其最具有欧亚主义主张的一部作品，在该书中，古米廖夫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罗斯与草原民族接触的历史，总结出欧亚超级民族体形成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古米廖夫一生坎坷，年轻时数度入狱，却仍坚持研究。其作品的出版也长期遭到苏联当局的禁止，被贴上诸如资产阶级地理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地缘政治论的标签，一直被诟病，并将其与唯心主义的“英雄与群盲”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20 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其理论逐渐受到俄罗斯学界的关注、讨论，甚至追捧。

① 转引自Беляков С.С. Гумилёв сын Гумилёва М., 2013. С.797.

② Гумилев Л.Н. Этногенез и биосфера Земли. М., 2007.

③ Гумилев Л.Н. От Руси до России. М., 2007.

④ Гумилев Л. Н.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и Великая Степь. М., 2007.

二、古米廖夫理论体系中的“民族”与“民族层级”

“民族”可能是人文社科领域最富争议的词语之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学者对这一术语做出了自己的诠释。在这部分，我们主要探讨古米廖夫对“民族”概念的诠释，及其在“民族”概念诠释的基础上构建的历史哲学理论。

（一）古米廖夫对“民族”与“民族过程”概念的诠释

在苏联的学术传统中，用来表示“民族”概念的主要术语有“Нация”，“Народ”和“Этнос”等词汇。其中，“Нация”和“Этнос”使用最为广泛，这两个词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的“Natio”和“έθνος”。其使用情况的变化，也反映出了西方和俄罗斯学界对于民族这一术语基本内涵的解读过程。

“Natio”是罗马人用来表示民族的概念，指的是具有同一出生地的居民团体，常用来指称具有相同籍贯的外国人群，在一定程度上有贬义。^①后来，在英文中，拉丁语的“Natio”一词逐渐被“Nation”所取代，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与政治高度相关的词汇。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Nation是自我宣称具有国家情感的共同体，同样，它也倾向于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共同体。”^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Nation）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且，他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③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民族（Нация）的定义，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

① 高永久、秦伟江：“民族”概念的演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② H.H. Gerth, ,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1958, p.171.

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苏联建立以后，斯大林民族理论逐渐在苏联的学界和政界占据了支配地位。在其理论模式指导下，苏联形成了一套“部落-部族-民族”为基本公式的“族类共同体”分类体系。根据斯大林的定义，只有那些具备建立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条件的族群才可以被称为“民族”（Нация），其他不具备建立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族群则被分别称为“部落”（Племя）、“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和“族体”（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等。这种分类体系不仅具有学术上的分类意义，也具有政治上的权利意义，成为确定苏联各民族共同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和地位的依据。

从西方和俄罗斯学者对于“Нация”或“Nation”的解读上，可以看出，这一词汇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强调了民族是一个享有政治主权的群体。

而“Народ”一词在俄语中则有多重含义，既指劳动大众，又指民族集团，还可泛指人群，学术意味不强。古米廖夫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享有主权并希望建立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的。而斯大林将那些俄罗斯境内达不到建立自治共和国条件的民族，称为部落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此，古米廖夫在作品中阐述民族问题时，选择了政治色彩相对淡化而学术意味更浓重的词汇——“Этнос”。

“Этнос”的古希腊词根是“ἔθνος”，在拉丁化后成为形容词“Ethnic”，与“group”连用构成复合名词“Ethnic group”（族群）。该词语进入西方民族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其政治意义逐渐弱化，而历史和文化意义得到加强。随着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Ethnic group”（族群）取代了“Race”（种族）和“Tribe”（部族），逐渐成为西方社科界的新选择。1969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词典》对“Ethnic group”（族群）的解释为：“一种带有某种共同文化传统和身份感的群体，这种群体作为大社会中的亚群体而存在。”^②20世纪80年代后，“Ethnic group”（族群）的使用日趋流行，其含义也变得更加抽象和泛化，并突出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1979年，第64页。

② 郝时远：“Ethnos（民族），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了其成员主观认同和得到他人认同的意思。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认为,“Ethnic group”(族群)是指“具有共同祖先神话和历史记忆、具有共享文化成分、与历史版图有一定联系、具有一定团结的(至少精英阶层是这样的)、有名称的人口单元。”^①

20 世纪 40-50 年代,苏联民族学界才开始使用“Этнос”这个概念。勃罗姆列伊(Ю.В. Бромлей)是苏联民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其著作《民族学基础》中总结了民族分类中最常用的四个方法,即,(1)按照民族所处地理区域粗放的划分民族的地理分类法;(2)按照人种与血缘关系划分民族的人类学分类法;(3)按照民族语言划分的语言分类法;(4)按照族群间经济关系与文化认同来划分民族的经济文化分类法。在这四种方法中,勃罗姆列伊更重视经济文化分类方法,他认为“只有这种方法属于纯粹的民族学分类法。”^②

古米廖夫的民族分类法与之前所有的分类方法都有着显著的区别,他对传统的分类方法进行了批判。首先,古米廖夫反驳了将语言、文化(宗教等)作为划分民族的标准。他举例说,“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俄罗斯贵族之间的交流、阅读和写作都是使用的法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完全不会说俄语,然而,他们仍然是俄罗斯(族)人。德意志皇帝弗里德里希大帝也选择说法语,然而他却是德意志民族的代表。”^③而且,将文化看作是一种“心理一致性”的形式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准,在古米廖夫看来也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很难看出数学家和足球运动员、宗教狂热者和无神论者、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什么心理的一致性。古米廖夫还举例道:“曾在巴黎做出租车司机的俄罗斯作家盖道·葛兹丹诺夫(Г.И. Газданов),在比较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后发现,各个‘文明’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除非(不属于同一民族的)人们居住的地区之间的距离远到几乎无法到达(那么他们的文化才会有本质的差异),倘

① 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语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予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第 56 页

② Ю.В. 勃罗姆列伊、Г.Е. 马尔科夫主编:《民族学基础》,赵俊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2 页。

③ Гумилев Л. Н. Этногенез и биосфера Земли. М., 2007. С.58.

若他们生活在一个国家或者城市里，那么他们会说着同样的语言，并有着相同的行为。哪怕一个是爱斯基摩人，而另一个是澳大利亚人……’而且，他发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要远远大于处在同一阶层西欧各民族之间的差异。’”^①

同样，古米廖夫也反对强调血统论的人类学民族分类法。他认为纯粹的血统是不存在的，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同民族交融的产物。许多俄罗斯贵族的姓氏来源于外族（德国、波兰、立陶宛、鞑靼等等），这就是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交融的佐证。而法兰西民族的祖先也不只有高卢人，还有西哥特人、勃艮第人、阿尔曼人等等。所以，以血统或统一的历史来划分民族是非常可笑的。

1979 年，古米廖夫在其作品《民族过程与地球生物圈》中，对民族作了较为具体的表述：“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有别于其他集团的群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在历史进程中产生、发展和消亡。语言、血统、习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等因素有时是区分民族的重要的标志，有时则不是。对于民族的概念，我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是这样的人，而其他人则是另外一种样子的。”^②此外，古米廖夫还进一步解释说，民族的界定标准是“行为模式”（Стереотип поведения）上的区别。所谓的“行为模式”，即“日常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所接受的艺术形式、对时间的感知、与长者的交流方式及婚嫁习俗等的集合。”^③

在古米廖夫的民族理论中，除了将“行为模式”作为区分民族唯一确定的标准以外，对于民族的特点，也有详尽的诠释。总结起来，在其理论之下，“民族”的显著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民族”具有自然属性。勃罗姆列伊 (Ю.В. Бромлей) 最先明确提出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客观性：“（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类型，是人们集体存在的特殊形式。这个共同体按照一定的自然历史途径形成和发展，它不以加入共同体的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能够依靠自我再生

① Гумилев Л. Н. Этногенез и биосфера Земли. М., 2007. С.58.

② Там же. С.95.

③ Гумилев Л.Н. Этногенез в аспекте географии (Ландшафт и этнос.1.)// Вестник ЛГУ.-1970.-Сер. Геология и география. №.12. С.11.

产而稳定地长期地生存。”^①这一观点得到了古米廖夫的借鉴和肯定。同时，古米廖夫还积极借鉴了部分学者不将民族看作一种社会组织，而是看作一种历史状态(Состояние)的说法。古米廖夫进而将民族阐释为一种客观的动态“过程”(Процесс)^②，并创造了民族学术语“民族过程”(Этногенез)，用来描述民族从诞生发展到消亡的整个过程。

古米廖夫曾长期与苏联著名地质学家、欧亚主义者П.Н.萨维茨基(П.Н. Савицкий)通信，萨维茨基的“发展地”(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理论认为，地理环境对于民族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对古米廖夫民族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列夫·古米廖夫 1967 年写道：“民族和民族过程(Этногенез)是一种自然现象，应当运用物理、地理、生物遗传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③1967 年，古米廖夫与苏联奥博宁斯克放射医学院教授Н.В·季马费耶夫-瑞索夫斯基(Н.В. Тимофеев-Ресовский)合作，探究“民族过程”理论中的基因生物学基础。虽然后来并未取得有效成果，但古米廖夫已经将民族学从社会历史研究范畴中释放出来，进而阐释民族的“自然”属性。

古米廖夫认为，组成“民族”的个体——人类，有着动物的属性，因此，人类的“集群”——“民族”，也有着类似于蚁群或者狮群等动物“群落”的特征。只是生理结构的不同使人可以掌握语言文字，利用工具，这使人与动物得以区别，也使得民族与动物群落得以区分。其次，“民族”的自然属性还体现在该民族与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包容性地理环境”(Вмещающий ландшафт)^④之间的关系上。“包容性地理环境”，会深深地影响到民族的生存方式、经济活动和行为模式等方面。民族的出现和发展必然要适应“包

① 参见张宏莉：“俄罗斯(民族)理论中的几个术语”，《民族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② 张宏莉：“俄罗斯(民族)理论中的几个术语”，第 61 页。

③ Гумилев Л.Н. Роль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х колебаний в истории народов степной зоны Евразии//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67. №.1. С.14-15.

④ “Вмещающий ландшафт”(包容性地理环境)这一术语是古米廖夫借鉴维尔纳茨基和萨维茨基“发展之地”(Место развития)的理论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民族或超级民族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诸如森林、草原、河谷、沙漠等。古米廖夫在著作中亦将其基本等同于“Кормящий ландшафт”(哺育性地理环境)。

容性地理环境”，为此，某种特定“包容性地理环境”中的民族拥有与环境相适应的“行为模式”，并且世代相承。然而民族的生产活动也会导致“包容性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影响到民族的发展，致使新的适应形式（行为模式）的出现，使得民族的稳定性丧失，迫使其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古米廖夫的这一论断，在诞生伊始就引起巨大反响。苏联著名民族学家、苏联科学院民族学院历史科学博士科兹洛夫(В.И. Козлов)的批评尤为激烈，他认为，“民族是社会性的群体，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其起源和发展都不受生物和自然规律的控制。”^①由于科兹洛夫的理论在苏联民族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论断也使得古米廖夫的观点遭受到长达 20 年的口诛笔伐，直至 80—90 年代才结束。勃罗姆列伊也对古米廖夫的这一观点提出批评，在《关于“民族过程”的社会与自然科学真相的若干注释》一文中，他指出：“民族有机体只与具有社会经济形态的成分直接相关。”^②

第二，“民族”具有“系统”的属性。古米廖夫在解释“民族”的含义时，借鉴了奥地利著名生物学家冯·别尔塔兰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系统方法”^③，对民族进行研究和诠释。古米廖夫认为，民族是一种“闭合的离散系统”(Закрытая и корпускулярная система)^④即，最初从外界一次性获取初始能量，这种最初的能量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消耗，而系统的混乱程度就会不断增加，即系统的“熵”^⑤值增高。最终民族会与外界

① Козлов В.И. О биолог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этн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74. №.12. С.74.

② Бромлей Ю.В. 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чаний о социальных и природных факторах этногенеза// Природа. 1971. No.2. С.83.

③ 系统方法是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中的一种方法论，最早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由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冯·别尔塔兰菲(Bertalanffy)提出的。概括说来，其基本原理是：把对象看作某种系统：每个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成分的集；系统方法的研究目标是揭示对象的整体性，查明对象中各种类型的联系，并将其归纳成统一的理论。系统方法的原则在生物学、生态学、心理学、控制论、技术科学、经济学、管理学及其他学科中都得到应用。系统方法同唯物辩证法有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化。

④ Гумилев Л.Н. Этнография этнос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Пб., 1989. С.25.

⑤ 此处，古米廖夫借用热力学和化学术语“熵”的概念，“熵”是人们用来描述、表征体系混乱度的函数。或者说是体系混乱度的量度。体系的混乱度越大，熵值也越大，反之亦然。而体系的混乱度是体系本身所处状态的特征之一。指定体系处于指定状态时，其混乱度也是确定的，而如果体系混乱度改变了，则体系的状态也就随之有相应的改变。

环境的能量达到完全平衡，成为环境的附庸。或者由于系统内部的混乱而走向衰亡。民族系统必须不断与外界进行能量和“熵”的交换，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古米廖夫还借鉴了著名物理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原理，指出系统与外界的能量交换，须由系统内部的“信息反馈”来实现。而在民族系统中，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某一特定民族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中包含民族的传统习俗、生产方式和文化认同等因素；这些因素与外界自然环境和其他相邻族群相互影响，相互适应，并且不断发展变化，使民族系统维持动态平衡。这种“能量交换”若是超越某一界限，即民族的“行为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便会导致民族系统的消亡或者导致该民族转变为更高一级的系统。

总之，对于民族概念的诠释贯穿古米廖夫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在诠释的过程中，他运用了诸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最终形成自己的见解，为其历史研究和文化理论的阐释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其关于民族自然属性的结论，缺乏科学的论证，在当时和后世都遭到诸多批评和指摘。

（二）古米廖夫对“民族系统”层级的划分

民族系统层级的划分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不同时期的学者为了解释自己的学术理论，对民族系统依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S. Huntington)等西方学者，大都使用“文化”或“文明”等术语。他们对“文明”或者“文化”的分类大多是以地域、宗教、语言、文化共同点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的。在古米廖夫看来，这种划分标准虽然解释了“文明”的特征和演进过程，但是却忽视了其系统内部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因此，古米廖夫摒弃西方学者的分类方法，对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的“民族系统”进行划分，并且引入“超级民族体”的概念代替“文化”或“文明”的说法，强调从属于同一“超级民族体”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以此解释民族之间的接触和文明的演进。

1、最大的民族单位——超级民族体

如图1所示，古米廖夫认为，在整个民族生态圈中，最大的单位是“超

级民族体”（Суперэтнос）。超级民族体指的是生活在同一个“包容性地理环境”中的不同民族的结合体，这些民族在历史过程中互相依存，共同构成完整的共生系统。构成超级民族体的民族之间的行为模式（Стереотип поведения）和民族心态（Менталитет）大致相同，彼此之间有着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交流。彼此之间认同感，明显高于对超级民族体外的其他民族的认同感。对于超级民族体的概念，古米廖夫这样解释：“类似于民族，超级民族体的典型特点，也是将自己与其他的超级民族体对立起来。然而，有别于民族的是，超级民族体不具备辐散（Дивергенция）^①的能力。超级民族体不是以规模或是实力来界定的，其决定条件仅仅是内部民族之间的相互的亲近关系。”^②古米廖夫超级民族体这一概念和西方学者的“文明”“文化”“世界”等文化概念类似。“超级民族体”内部的各个组成民族之间，并不是只有合作与融合，彼此之间也会经常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对方，而是要战胜对方，因为冲突的另一方也是“超级民族体”系统的组成要素，对整个系统完整性的维系必不可少，所以，此系统内部的战争与冲突，只是“各要素对系统主导地位的争夺。”^③

① “Дивергенция”即气象学名词“辐散”，原指空气由一个中心向四周散开的现象。在古米廖夫民族理论中，民族的辐散指的是民族系统完整性的丧失，其内部某些组成部分分裂出去，形成新的民族的现象。超级民族体则一般不会“辐散”，一旦超级民族体形成，就会保持其完整性（除了“裂变”时期），并经历1200-1500年的“生命”，直至消亡。

② Гумилев Л. Н. Этногенез и биосфера Земли. М., 2007. С.139.

③ Там же. С.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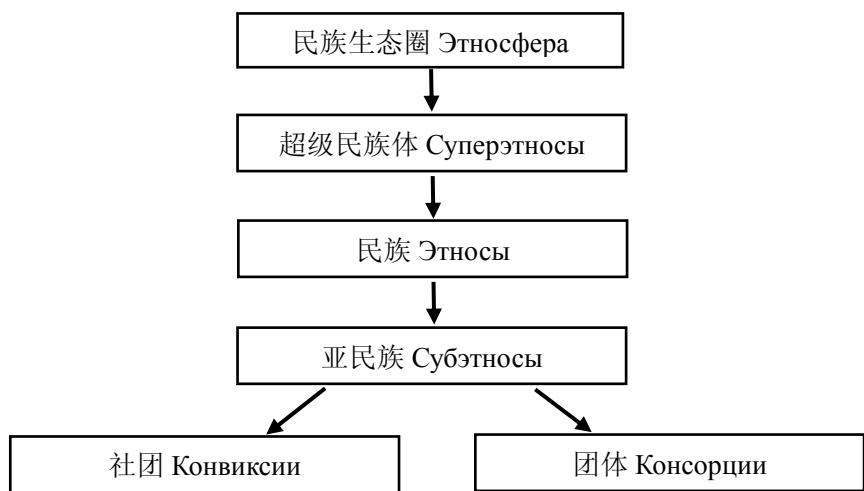


图 1 民族系统层级示意图

古米廖夫认为，当今世界上主要有十一个超级民族体（详见下表），且超级民族体之间一般有明显的地理分界线。

表 1 超级民族体列表^①

序号	超级民族体名称	主要组成民族	描述
1	欧亚超级民族体（俄罗斯超级民族体）	原苏联内部各民族、蒙古等。	是以俄罗斯民族为主导的超级民族体
2	环北极圈超级民族体	俄罗斯西部芬兰-乌戈尔民族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楚科奇-克里尔克民族（不包括勘察加半岛的民族）。	北部民族，与欧亚超级民族体之间基本以北极圈和永久冻土层为界。
3	西欧超级民族体（西欧天主教超级民族体）	波兰的维斯瓦河以西的所有国家和民族，但不包括该河南部地区，以及北美、澳洲、南非等欧洲移民国家和民族。	这一超级民族体现在正向东部和南部扩张，现已囊括了原属欧亚超级民族体的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

① Текст из телевизионных передач из цикла «Этносы Земли» (СПб - 5 канал, 1993г. - запись 1988 г.) – «Природа суперэтноты» (№.25), и «Блуждающий суперэтнос» (№.20) эфиры 1994-1995 гг. Адрес в Интернете: <http://kulichki.rambler.ru/~gumilev>

4	巴尔干超级民族体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和民族。	这一超级民族体的组成国家主要是原拜占庭超级民族体的残存民族，其地域中包含少量的穆斯林超级民族体的“飞地”。自19世纪，这一超级民族体多受西欧的影响，逐渐走向衰亡。
5	中华超级民族体	天山-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的各个民族。	在古米廖夫理论下，中国北部的新疆、内蒙古等地区的各民族属于欧亚超级民族体。而朝鲜民族则属于中华超级民族体。
6	日本超级民族体	日本	
7	马来超级民族体	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民族。	
8	印度超级民族体	除巴基斯坦外的南亚地区各民族。	拉吉普特人统治时期形成。
9	拉美超级民族体	拉丁美洲各国家和民族。	16-17世纪在两大超级民族体的接触的基础上形成。
10	犹太超级民族体	主要集中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也包括散居在全世界的犹太人。	犹太超级民族体内部包含许多民族：如贝塔以色列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等。
11	穆斯林超级民族体	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摩洛哥的穆斯林世界内的各民族和国家。	内部民族和教派众多，现在正在侵蚀和扩张到其他超级民族体中。

古米廖夫的超级民族体分类方法，具有主观性和时代局限性。以俄罗斯超级民族体和中华超级民族体为例，古米廖夫将中亚诸国和中国长城以北的东北亚地区，悉数归入俄罗斯超级民族体之中，这显然带有帝俄时代或是苏联时代的思维印记。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诸国脱离俄罗斯超级民族体，融入了穆斯林超级民族体的势头明显（如土库曼斯坦）。而中国境内长城以北和新疆的大部分民族（如满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在长期与汉民族的共同生活中，早已完全融入中华超级民族体，属入俄罗斯超级民族体只是俄罗斯帝国时期殖民主义思维的一厢情愿，不具备任何现实性。这些事实显然与古米廖夫的超级民族体理论相矛盾。勃罗姆列伊曾在其作品中写道：“民族学的发展，向来都是同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与意识形态斗争息息相关

的。”^①古米廖夫对于超级民族体的划分，显然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具有显著的欧亚主义特点，强调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主导作用；同时，古米廖夫刻意割裂中国与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各草原民族之间紧密的历史联系，为俄罗斯帝国侵占中国东北和新疆远东领土的野蛮行径寻求“合理”解释。由此可见，在某些超级民族体的范围界定上，古米廖夫显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时代局限性，缺乏令人信服的史实论据和科学严谨的论证过程，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

尽管如此，古米廖夫能够用系统的视角去审视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形象地揭示出不同超级民族体之间的对立关系，为解释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和政治纠纷，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相关理论的得失，也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2、民族分类体系中的其他民族单位：民族、亚民族、社团和团体

正如图 1 所示，超级民族体是民族生态圈中最大的单位，而构成超级民族体的单位是民族。民族是一种结构非常复杂的系统，而正是其复杂的结构维持了系统的稳定发展和正常衰亡。构成这一复杂结构的就是在民族分类体系中低于民族的单位——“亚民族”（Субэтноты）。古米廖夫将民族诠释为一种“闭合的离散系统”，其特点是系统内部各元素位置与职能并非固定，随着系统的发展变化，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甚至彼此替代，对系统的完整性并不构成本质影响。若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联系丧失，那么系统就会面临终结，其内部的残存元素则会进入其他系统中。亚民族指的是一个民族内部比较稳定、存在时间比较长久、有自己独特文化的群体。他们保留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和行为模式，如行为举止规范、待人接物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等。“从属于同一民族系统的亚民族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的竞争关系，并以此来共同维持民族系统的完整性。”^②当民族系统衰退，其内部结构简化，大量

① Ю.В. 勃罗姆列伊、Г.Е. 马尔科夫主编：《民族学基础》，赵俊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5 页。

② Мичурин В.А. Двадцатое столетие в России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теории этногенеза Л.Н. Гумилёва. Доклад на четвёртых Гумилёвских чтениях(Москва, 2000г.)//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2. №.11. С.493-542.

亚民族就会消失或进入其他民族系统。因此，亚民族的数量表明了民族系统的活力和对抗外来“打击”的抵抗力。一些民族在成长初期，其内部会自发生成不同的亚民族，以增强抵御外部干扰的能力。有时，这些亚民族是以一种社会阶层或者区域性团体的形式呈现的。如 14-15 世纪的俄罗斯，在其南部形成了哥萨克亚民族，北部则出现了滨海亚民族^①，后来的“领土开拓者”^②也成长为俄罗斯民族内部的亚民族，并成为西伯利亚各亚民族的源头。

下面来探讨，在古米廖夫的民族学理论中，民族系统内部的亚民族的形成方式。如图 1 所示，民族系统中的最低一级单位——团体(Консорция)和社团(Конвиксия)便是构成亚民族的基础。在古米廖夫民族学概念中，团体指的是有着共同目标和历史命运而自愿结合起来的一群人。常见的团体形式有政治集团、(小规模)宗教教派、劳动组合、帮派等。“在历史进程中，团体通常会解散消失，但有时也会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得以保全，从而形成独特的习俗和家庭联系，最终发展成社团。”^③社团的常见形式有村社、西欧中世纪的手工业者街区、小型的部落等。社团虽比团体的结构稳定，但仍不具备较强的创造性和抵抗力，在外界环境剧烈变化之时极易衰亡，若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得以保存，便可发展为亚民族。民族体系层级理论，是古米廖夫理论的精髓之一，在其层级划分的基础上，古米廖夫又阐发了进取精神理论和民族接触理论，这些共同构成了其民族理论的基本框架。

① 俄语为“Поморы”，指的是旧俄时期居住在俄罗斯北部白海沿岸地区的特殊组群，其民族认定至今仍有争论。

② “Землепроходцы”，指的是 17 世纪的俄罗斯领土开拓者，占领并殖民西伯利亚、远东等地。

③ Гумилев Л.Н. Этногенез и биосфера Земли. М., 2007. С.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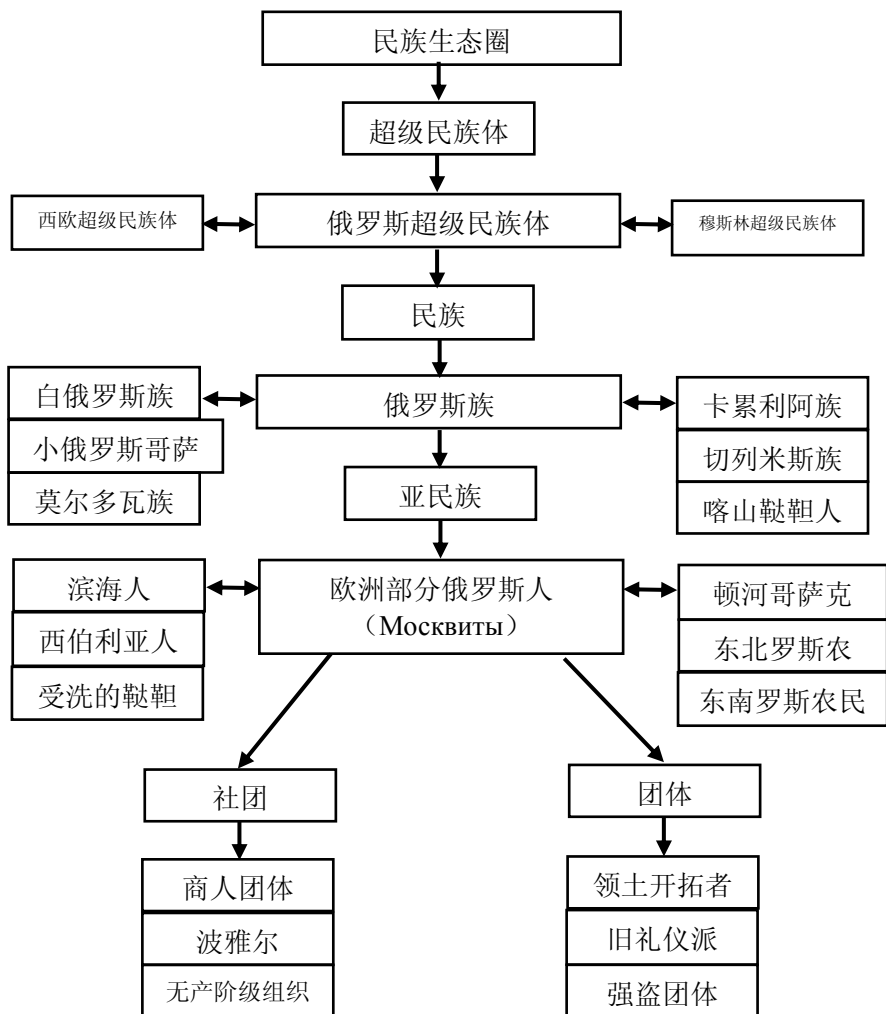


图2 俄罗斯超级民族体（欧亚超级民族体）结构体系

为了进一步阐述古米廖夫的民族层级划分理论，笔者简单梳理一下俄罗斯超级民族体（Российский Суперэтнос）在整个超民族生态圈中的地位和其内部层级的划分。古米廖夫曾在其重要作品《历史阶段中的民族地理学》(География этнос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中，作为解释民族系统结构的例子，曾绘制过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结构体系图（图2）。但是并未做清晰的解释说明。在这里，笔者就以该图表为例，详细介绍一下古米廖夫理论中的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结构。如图2所示，俄罗斯超级民族体（也可以称之为欧

亚超级民族体)处在系统的最高层级,与西欧超级民族体、穆斯林超级民族体、中华超级民族体等,处于民族生态圈的同等地位。同时,与其他超级民族体之间有着明显地理边界:西部以波罗的海-黑海为界与西欧超级民族体接壤,南部则是以高加索山-伊朗高原-天山-长城为界与中华超级民族体和穆斯林超级民族体毗邻。俄罗斯超级民族体所占据的这片广大的区域被古米廖夫定义为“欧亚大陆”,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1)东部地区,包括东亚的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2)南部地区,即现在的中亚地区;(3)西部地区,这是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核心地区,即东欧地区。^①在这片共同“包容性地理环境”中产生的民族,彼此之间有着较高的认同度,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生活在这片共同“包容性地理环境”中的民族便是构成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次级民族单位。除了俄罗斯族,还包括俄罗斯境内的鞑靼族、莫尔多瓦族、马里族(切列米斯);还有白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等东斯拉夫民族,以及中亚各民族和俄境内的东北亚诸民族等。

在超级民族体系统内部的众多民族中,俄罗斯民族占据主导地位。而俄罗斯民族又是由众多亚民族构成的。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系统内部的各亚民族构成不断变化,相互竞争,争夺系统内部的主导权。最终,莫斯科(公国)战胜了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里等亚民族体,成为俄罗斯民族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亚民族。而其他的亚民族命运也有差别,大部分融入莫斯科亚民族中,共同组成欧洲部分俄罗斯亚民族(Москвиты)。还有一些受到外力的影响,离开了俄罗斯(罗斯)民族体,或成长为新的民族,或以亚民族的形式融入其他民族中去。俄罗斯民族体内,与欧洲部分俄罗斯人同属于亚民族的还有滨海人(Поморы)、顿河哥萨克人、西伯利亚人、受洗的鞑靼人等等,他们与欧洲部分俄罗斯亚民族一起,维持了俄罗斯民族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在民族系统层级中最底层的社团与团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领土开拓者(Землепроходцы)和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ы)。前文提及,俄罗斯领土开拓者是17世纪形成的,最早他们是由商人、哥萨克和军官组成的团体,最初是以生计或军功为目的而远赴东方征服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后来便居住在当地,经过几代人的时间,由一个团体发展成为西伯利亚

^① 参见 Гумилев Л.Н. Ритмы Евразии// Лев Гумилев: pro et contra. СПб., 2012. С.432.

亚民族体。17 世纪，由于反对尼康的宗教改革，一部分人从普通民众中分离出来，组成特殊的宗教团体，被人们称为“旧礼仪派”。彼得一世时期，他们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独立团体。18 世纪末，他们形成了独特的行为模式，包括宗教礼仪、生活习惯和服饰等，这一团体转变成了社团。19 世纪末，这一社团的人口规模扩大到了 800 万人，转化为亚民族。但在 20 世纪，由于政治因素，这一亚民族在外力的侵蚀下逐渐消失了。^①

由此可见，古米廖夫从整个民族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运用系统分析法等跨学科的研究手段，对民族系统进行的分级，试图说明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垂直结构与其内部子系统的发展变化情况。

三、“民族过程”的内因——“进取精神”（Пассионарность）

“进取精神”（Пассионарность）^②可谓是古米廖夫文化和民族学理论中最重要、最有特色、同时又最具争议的一个术语。根据古米廖夫的理论，进取精神是决定民族进程的本质因素，对于“进取精神”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一）“进取精神”是一种自然能量和精神状态

“进取精神”是一种生物-化学能量，在人的身上表现为，为追求目标（通常，这一目标是虚构的）而付出最大努力、做出牺牲的“进取精神”。^③在民族系统中，有些人具有较多的“进取精神”，并将这种能量用来改变外部环境（自然和社会环境），这些人被称为“进取精神携带者”（Пассионарии），他们的特点是能够为实现目标付出最大的努力和牺牲。

① 参见 Гумилев Л. Н. Этнография этнос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Пб., 1989. С.22.

② 来自于拉丁语词根“passio”，本意是“激情”。古米廖夫提出此术语，用以表明人们从外界获取的一种“进取性”能量，并受其支配，为目标奋斗，甚至作出牺牲。国内学者对此术语译法不一，有诸如“进取精神”、“激情性”等翻译。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英男教授在《列夫·古米廖夫欧亚主义历史观念》的报告中，将其译作“元气”，以体现“Пассионарность”获取于自然，存在于人体的状态。但此处笔者为强调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元气”的区别，强调其包含的精神性因素，故而采用“进取精神”的翻译。

③ Беляков С.С. Гумилёв сын Гумилёва. М., 2013. С.441.

民族系统内部的“进取精神”总量，由系统内部的“进取精神携带者”的数量决定，古米廖夫将其称为“进取精神强度”（Пассионарное напряжение）。一个民族“进取精神强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存亡与发展。那么，“进取精神”这种能量形式来自哪里呢？

古米廖夫在借鉴了维尔纳茨基的“生命波”学说（Волны жизни）中有关“生物能量”的观点，认为，“进取精神”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生物-化学能量，最初来自宇宙射线（太阳辐射等）造成的基因突变。同时，古米廖夫认为，“进取精神”还有遗传的特点。他解释道，有目的的进取行为的出现，与人的遗传有关，就像性格受遗传基因控制一样，“进取精神”同样也可以遗传。古米廖夫发现，在某一地区会大量出现过分活跃的人，他们破坏原有的秩序，改变周边环境，构建新的民族系统，建立一系列新的社会制度。随后，这些“进取精神携带者”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进入浮动下降的阶段，这个过程会持续 100 年左右。这种现象符合隐性遗传的某些特征，即某种隐性性状不会直接遗传给子辈或孙辈，而会在第四代得以显现。而随着时间推移，“进取精神携带者”数量也将逐渐减少，最终经过大约 1200 年，“进取精神携带者”消失殆尽，民族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所以，古米廖夫认为，基因遗传控制着民族系统“进取精神强度”的变化，同时也证明了“进取精神”这种能量的自然属性。

古米廖夫的“进取精神”学说将民族产生与衰亡的原因，归结为进取精神的增减变化，对原有的刻板的历史文化研究方法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拓宽了人文学科的研究视野，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但是，对古米廖夫的进取精神学说，不少学者也提出了反对和质疑。如俄罗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克莱恩（Л.С. Клейн）便对古米廖夫的理论推导方法提出批评。克莱恩认为：“在自然科学中并不存在类似于‘进取精神’的‘生物能量形式’。古米廖夫对‘进取精神’产生原因（宇宙射线相关学说）的解读也是不科学的。”他还举例说，如果是宇宙射线导致进取精神的产生，那么高海拔和低纬度地区的射线强度，应当大于高纬度平原和沿海的低地地区，按照古米廖夫的理论，在海拔高的地区和低纬度地区新民族出现的概率应当更大才对，但是

“事实并非如此。”^①同样，历史学家雅诺夫（А.Л. Янов）也指出，“由于缺少客观的校对标准，使得古米廖夫的假说和自然要求的原则格格不入，其理论完全算不上科学，只能称之为一种容易获取的‘爱国主义唯意志论’的产物。”^②

当然，在现有科技水平下，想要“发现”和“测量”进取精神这种能量，是不现实的，而且古米廖夫在论述“进取精神”时，在缺乏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将其想当然的定性为一种“自然能量”，这一点也几乎受到了各领域学者的一致批评。不得不说，古米廖夫在缺乏相关知识和实验条件的基础上强行借助自然科学假说来解读社会科学理论是很难站住脚的。但是，不得不承认，退去“进取精神”“伪自然科学”的外衣，将其当作一种文化理论来看待的话，它确实能为我们探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路，值得探究和发掘。

（二）“进取精神”表现为个体和民族的一种心理和行为特征

前面已经谈到，古米廖夫认为，“进取精神携带者”在“进取精神”的作用下，为追求目标会做出牺牲。这种牺牲的含义是比较宽泛的，即，为了达成目标而放弃对近期现实需要的追求，哪怕这种现实需要是性命攸关的。他们将某种社会 and 精神的追求作为自己的目标，当“进取精神携带者”的进取精神水平很高时，为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甚至会付出自己的生命。这就说明对于“进取精神携带者”来说，精神方面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其本能需求。因此，古米廖夫将“进取精神”描述为“对于不同时期和不同民族的稳定不变的行为和心理特点的综合。”^③在“进取精神”的影响下，人们会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臆想”的目标，有些人会热衷于追求荣誉、爱慕虚荣，有些人会变得贪得无厌、争风吃醋等，总之，“进取精神”是一种“反

① Клейн Л.С. Горькие мысли «привередливого рецензента» об учении Л.Н. Гумилева. http://scepsis.net/library/id_86.html

② Янов А.Л.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в сочинениях Льва Гумилева. М., 1994. №10.

③ 参见 Мичурин В.А. Двадцатое столетие в России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теории этногенеза Л. Н. Гумилёва. Доклад на четвёртых Гумилёвских чтениях (Москва, 2000г.)// Интернет-журнал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2. №11.

本能”（Антиинстинкт）的自然能量。^①而本能指的就是对于自身生命的保全和对于所处外界环境的适应。

古米廖夫将那些能够维持自己和后代生命，并与外界环境保持和谐的人，称为“和谐者”（Гармоничные люди）。这些人不具备“进取精神携带者”的“进取性”，也较少对周边环境做出实质性改变。古米廖夫还把那些“进取精神强度”较低的“进取精神携带者”也归入了这一范畴，这些人能够积极地追求胜利，但是却不能为此冒生命危险。然而，“和谐者”对于维持民族系统的稳定性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维持日益复杂的民族系统和“包容性地理环境”之间的联系，意义重大。“进取精神携带者”有时会对周边的“和谐者”造成影响，使“和谐者”在行为方式上模仿“进取精神携带者”，表现出一定的“进取性”，并协助“进取精神携带者”完成目标。这种现象被古米廖夫称为“进取精神感应”（Пассионарная индукция）。这种现象在战争中表现最为明显。例如拿破仑、苏沃洛夫等统帅，属于典型的“进取精神携带者”，而他们所率领的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则属于“和谐者”。在战争中，这些“进取精神携带者”统帅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精神，感染了“和谐者”。于是这些“进取精神强度”相对低的“和谐者”模仿“进取精神携带者”，并将这种情绪相互“感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和谐者”只是受到了某种感染或鼓动的影响，才表现出“进取精神携带者”的行为和心理特征。一旦这种影响的来源——“进取精神携带者”消失，他们就会丧失战斗力，变得跟之前一样。关于“进取精神诱导”的另外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演说家的鼓动。作为“进取精神携带者”的演讲者的演说内容，对在场听众具有很大的激励或蛊惑作用，但人们如果只是在纸上去读这些内容，就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了。

除了“进取精神携带者”和“和谐者”之外，在民族系统中，还有一类人，他们的“进取精神强度”为零。他们从外部获取的能量，甚至不足以使自己适应所处的环境，这些人被古米廖夫称之为“亚进取精神携带者”（Субпассионарии）。在行为和心理方面，“亚进取精神携带者”的特点，表现在他们不能满足自我的欲求，对自己和后代的生活也漠不关心，大部分

① 参见 Гумилев Л. Н. Этнография этнос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Пб., 1989.

过着“今宵有酒今宵醉”的寄生颓废的生活。“亚进取精神携带者”的典型代表，就是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末期的“腐化贵族”，以及充斥在城市中的流浪汉等。但是，对于民族系统而言，“亚进取精神携带者”和“进取精神携带者”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对于民族系统的演变发展具有自己的作用。这类人群在民族系统中数量的增加，预示着民族系统的衰亡。

古米廖夫根据民族系统中组成个体的“进取精神强度”和他们的心理行为特征，对人们的“进取精神水平”，作了更加详细的区分。

表 2 民族系统中成员“进取精神强度”等级划分

“进取精神强度” 等级分类	详细分类	行为、心理特点	典型代表
“进取精神携带者” (Пассионарии)	坚定的牺牲者	这类人有着最高的“进取精神强度”(Сверхнапряжения)，能够毫不动摇地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	扬·胡斯、圣女贞德、伊万·苏萨宁、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阿瓦库姆等
	理想实践者	这类人能够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冒生命危险，但是却很难做到真正去牺牲生命。	尼康、斯大林等
	过渡型“进取精神携带者”	这类人的“进取精神强度”低于上面两种。但他们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热衷的工作和理想的实现中去。	牛顿、达芬奇、维特等
“和谐者” (Гармоничные люди)	弱“进取精神携带者”	这类人也会有对知识、美、艺术等的追求。他们拥有“进取精神”，但是进取精神比较弱。	绝大部分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
	冒险者	这类人为了取得成功（大多是物质上的），有时会去冒生命危险。	追求利益的商人、赌徒、强盗、殖民地的士兵等。
	稳定追求者	追求一种没有挑战和威胁的平稳、安定、顺利的生活。	底层公职人员，教师等大部分普通社会从业者。
	平庸者	安静顺从的人，对外界环境和规则完全适应，不想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外界环境，“进取精神强度”为零。	沙俄时期的农奴、士兵等。
“亚进取精神携带者” (Субпассионарии)	怠惰者	这类人不能够完全适应周边环境，缺乏进取心，只能过着寄生的生活，不想也没有能力关心下一代，无法为别人着想。	流浪者、乞丐、小偷等。

由此可见，在古米廖夫的理论中，“进取精神携带者”只是“进取心强”的人，他们当中不只有经天纬地的英雄人物，更多的则隐匿在普通群众中。科学家、艺术家等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也拥有较高的“进取精神强度”。这是因为创造性的活动也需要人的牺牲，只是不一定牺牲生命或健康，而是牺牲精力和对生活的享受。因此，古米廖夫将牛顿等科学家和托尔斯泰等文学家，归为“进取精神携带者”之列。另外，还应当注意的是，对于民族系统而言，并不是“进取精神携带者”越多越好，“进取精神携带者”的行为和心理特点之中，还包括“好战”、“善妒”、“暴虐”等因素。民族系统的“进取精神过热”（Перегрев пассионарный）会导致系统的内部混乱，大量热衷于内讧的集团出现，大大降低系统的稳定性和对于外界侵略的抵抗能力。而且，“和谐者”有时候会比“进取精神携带者”更加聪明且富有天赋，他们往往能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取得突出的成绩。在一个正常、繁荣的社会中，应当是“和谐者”占绝对比例。

在古米廖夫根据“进取精神强度”对社会成员的分类中，不管是哪一类个体，对民族系统的正常发展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几类有不同“进取精神强度”水平和行为心理特点的个体，在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即“民族过程”（Этногенез）的不同阶段，他们所占的比例也有所不同。而民族系统的整个“进取精神强度”水平对“民族过程”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古米廖夫对于民族内部成员“进取精神强度”等级划分的理论，在苏联和当今俄罗斯学界都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与争议，总体而言，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联时期大部分民族学家认为，古米廖夫对民族成员的类型阐释，片面地夸大了英雄人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而否定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决定作用。如阿尔塔蒙诺夫（М.И. Артамонов）批评其古米廖夫观点是明显的“英雄与群氓”（Герои и Толпа）论的表述。^①

第二，“进取精神携带者”的“进取精神强度”无法测量。使得整个“进取精神学说”成为“犹如建在沙子上的楼宇”，^②缺乏可靠的理论依据。

① 参见 Артамонов М. И. Снова «герои» и «толпа»// Природа. 1971. No.2. С.75-77.

② Клейн Л.С. Горькие мысли «привередливого рецензента» об учении Л.Н. Гумилева. 1992(4). С.237.

第三，跨学科研究方法存在弊端，借鉴自其他学科领域的概念时常出现意义界定模糊或错误的情况。比如施尼雷尔曼（В.А. Шнирельман）和帕纳林（С.А. Панарин）指出，古米廖夫并未将“进取精神携带者”与“基因突变者”的概念描述清楚，且“古米廖夫的‘进取精神携带者’的概念和冈策尔（Guentzel）的‘理想主义者’表述出奇地一致……诸如此类术语都是从社会科学和神经学文献借鉴而来的，但意义却相去甚远”。^①

诚然，古米廖夫在利用“进取精神”假说在解释历史进程和民族发展问题上，独辟蹊径，自成一派，其相关论述也充满了趣味和“奇思妙想”。但是不得不说，正如绝大多数俄罗斯学者批评的那样，古米廖夫利用自然科学对“进取精神”的相关论述实在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我们也只能将其看作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以此来研究古米廖夫对民族和社会的观点。

四、古米廖夫理论中“民族过程”的阶段与特点

古米廖夫将民族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动态过程称之为“民族过程”（Этногенез）。影响“民族过程”的因素有很多，如，社会与政治因素、自然因素，以及技术的发展等。在所有的因素中，古米廖夫坚定地认为，只有“进取精神”才是决定“民族过程”的根本因素，^②即民族系统中“进取精神携带者”的比重（民族系统的“进取精神强度”水平）决定“民族过程”的阶段。古米廖夫理论中“民族过程”所经历的阶段和表现特征如下。

（一）“进取精神震荡”（Пассионарные толчки）——“民族过程”的开始

“民族过程”的“起始点”（Пусковой момент），被古米廖夫称为“进取精神震荡”（Пассионарные толчки）。“进取精神震荡”指的是由于受到外界（宇宙中）的“射线照射”，地球上的一部分人出现“基因突变”，因此，大量“进取精神携带者”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出现、并在这些区域诞

① Шнирельман В.А., Панарин С.А.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умилев: основатель этнологии?// Вестн. Евразии. 2000. №3.

② Беляков С.С. Гумилёв сын Гумилёва. М., 2013. С.445.

生新的民族系统的现象。古米廖夫选取了从公元前 18 世纪到公元 13 世纪的 40 多个民族，把基本处于同一时期（世纪）兴起的民族所生活的地域，在地图上进行连接，发现“进取精神震荡”的发生区域，呈现宽约 200-400 千米，长约 6000 千米左右的带状分布。这些狭长的带状区域与地球纬线成一定角度（如下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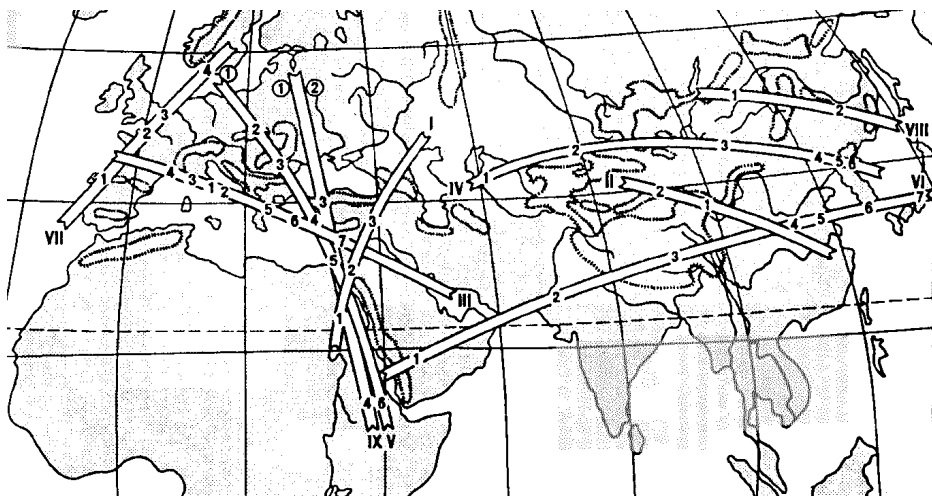


图 3 “进取精神震荡”带状分布示意图^①

在图中代号为 I 的带状区域，表示的是公元前 18 世纪出现的“进取精神震荡”现象，标注在带状区域上的阿拉伯数字，则表示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民族系统。我们由此可见，这种新民族系统崛起的“进取精神震荡”带，可以跨越地球上的任何**地理障碍**（如图中代号为 VI 的“进取精神震荡”带跨越了青藏高原），而且，同一条“进取精神震荡”带上的民族距离遥远，不可能是从一点扩散开的。据此，古米廖夫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只有“宇宙射线照射造成的基因突变”才能解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这

^① Гумилев Л.Н. Этногенез и биосфера Земли. М., 2007. С.455.

些新兴的“民族系统”，往往处在不同地形的交界处。在古米廖夫看来，这是因为在这些不同地形交界地域，容易聚集从原有民族分离出的“进取精神携带者”。原有民族一般居住在特定的地形地貌区域，有着稳定的“包容性地理环境”和稳固的系统结构，对于新出现的“进取精神携带者”企图改变民族系统固有环境的做法，持反对态度。因此，往往出现“进取精神携带者”被原民族其他成员迫害的现象。大量“进取精神携带者”迁移至原“包容性地理环境”的边缘地带，以逃避迫害。所以，在这些区域易出现新的民族系统。在古米廖夫看来，从“进取精神震荡”开始，新民族的“生命历程”便开始了。

（二）“民族过程”的阶段

古米廖夫认为，“民族过程”有着一定的规律。由于系统“进取精神强度”的变化，从“进取精神震荡”发生，民族系统出现开始，在其 1200-1500 年的生命中，民族系统会经历上升时期（Фаза подъема）、巅峰时期（Акматическая фаза）、裂变期（Фаза надлома）、惯性发展时期（Инерционная фаза）、蒙昧时期（Фаза обскурации）和追忆时期（Мемориальная фаза）六个阶段，有的民族在此之后还会处于一种“恒定状态”（Этнический гомеостаз）。^①

在古米廖夫的理论中，“民族过程”的第一个时期是上升时期，这一时期大约出现在“进取精神震荡”后的 300 年间。处在这一时期的民族系统（不管是阿拉伯人、拜占庭人还是蒙古人、古犹太人），都有着这样的民族主旋律，那就是：“成为你该成为的人！”（Будь тем, кем ты должен быть!）这一时期的民族系统内部，等级严格，人们都自觉地遵守着这一模式，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如果有人争权夺位，引起内讧，那么他就会被大家反对并

① 对于“民族过程”阶段的部分翻译方式，本文借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编辑李晶晶的论文《列夫·古米廖夫与其民族接触理论》中的译法。术语“гомеостаз”源于希腊语“ὁμοιότης”其中，“ὁμοιος”指的是“一样的”、“相似的”，“στάσις”意为“站立的”、“不动的”。生物学上将其译为“稳态”，指的是在一定外部环境范围内，生物体或生态系统内环境有赖整体的器官的协调联系，以维持体系内环境相对不变的状态，保持动态平衡的这种特性。这里，古米廖夫借用此生物学术语来形容民族失去“进取精神”，与周边环境完全和谐的状态。

被杀死。由于继承了旧有（已消亡的）民族的认知和习惯，这一时期的文化有着保守和顽固的特点。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往往会给人一种停滞发展的错觉。而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民族系统内部充满斗志的“进取精神携带者”数量正在不断积累和增多，随着他们的日渐活跃，民族的“进取精神上升”特点才慢慢彰显出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残酷和频繁战争，民族系统迅速扩张着自己的疆土。随着吞并的“亚民族”数量的增加，民族的“进取精神强度”持续增强，“民族过程”也便进入下一个阶段。在世界历史上，处在上升时期的典型民族系统有：公元1-3世纪的基督教社团（人数和影响力都大大增强，日后发展成拜占庭超级民族体）；第一任皇帝统治时期的古罗马帝国（公元前8-6世纪）；6-8世纪的阿拉伯（建立哈里发并传播伊斯兰教）；11-13世纪的蒙古（侵占了亚欧大陆的大片领土）等。

很快，民族系统中具有牺牲精神的“进取精神携带者”人数不断增加，并且在民族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在“进取精神震荡”发生后300-600年间，民族系统迎来自己的“巅峰时期”。在这一时期，民族内部的亚民族数量和系统的“进取精神强度”水平均达到最大，“超级民族体”最终确立。与上升时期不同，这一时期，“进取精神携带者”们破坏和改变了民族系统的固有规则，开始最大限度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不是单纯追求民族的整体利益和目标。因此，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为：“发挥自我个性。”（Будь самим собой）个人主义的膨胀和“进取精神携带者”的增多，容易造成民族系统“进取精神过剩”（Пассионарный перегрев）。人们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民族系统内部的争斗中来。新出现的“进取精神携带者”不断改变着原有的制度和规范，民族系统成了“新旧”势力斗争的平台。民族的“进取精神”被慢慢耗损，“民族过程”也过渡到了下一个阶段。古米廖夫认为，俄罗斯的“混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蒙古兀鲁斯的分裂和中国唐朝安史之乱，就是“巅峰时期”的民族系统“进取精神过剩”导致动乱的表现。

随着民族系统“进取精神”的不断耗损，“亚进取精神携带者”数量不断增加，民族系统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升级，民族系统对外界侵扰的“抵抗力”明显下降。民族系统进入了“民族过程”的“裂变期”。这一阶段大约持续100-150年，这一时期，超级民族体中的民族数量和亚民族数量急剧减

少，民族系统面临分裂和消亡的危险。所以，“裂变期”对于民族系统来说是一段危机时期。古米廖夫在《民族过程与地理环境》一书中列举的处在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有：10世纪初的中华超级民族体（唐朝末年），随着“进取精神”的耗损，唐王朝经历“民族过程”的“巅峰时期”，进入分裂和动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宗教改革时期的西欧超级民族体，在宗教战争和动乱中，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两大阵营，超级民族体的凝聚力和抵抗力都大大削弱。

经过剧烈的震荡，民族系统的“进取精神强度”会进入曲折缓慢下降的时期，这表明，民族系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惯性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一般出现在距离“进取精神震荡”750-1000年之间。在这一时期，民族系统内部的“进取精神携带者”、“和谐者”和“亚进取精神携带者”的数量，达到比较“均衡”的比例。追求稳定和秩序的“和谐者”占据主导地位。民族系统的组成结构得到简化，凝聚力增强，国家制度得以巩固完善，物质和精神文明财富不断累积，“包容性地理环境”得到空前的开发。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变成像我一样的人。”（Будь таким, как я）这意味着，在民族系统内部，人们对于公认的社会典范的追捧与膜拜（如17-19世纪英格兰人民对于“绅士风度”的推崇）。同时，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还有强势中央政府的出现。这有效地保证了国家的管理和建设，减少了内部的矛盾冲突。但是这一时期同样存在着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对民族系统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另外，处在这一阶段的超级民族体，往往会认为自己的文化和规范举世无双，完美无缺，其他地区都是“荒蛮之地”。典型的代表就是罗马帝国和西汉王朝。然而，随着民族系统“进取精神强度”的进一步降低，民族系统从“文化的金秋”进入“文明黄昏”——“蒙昧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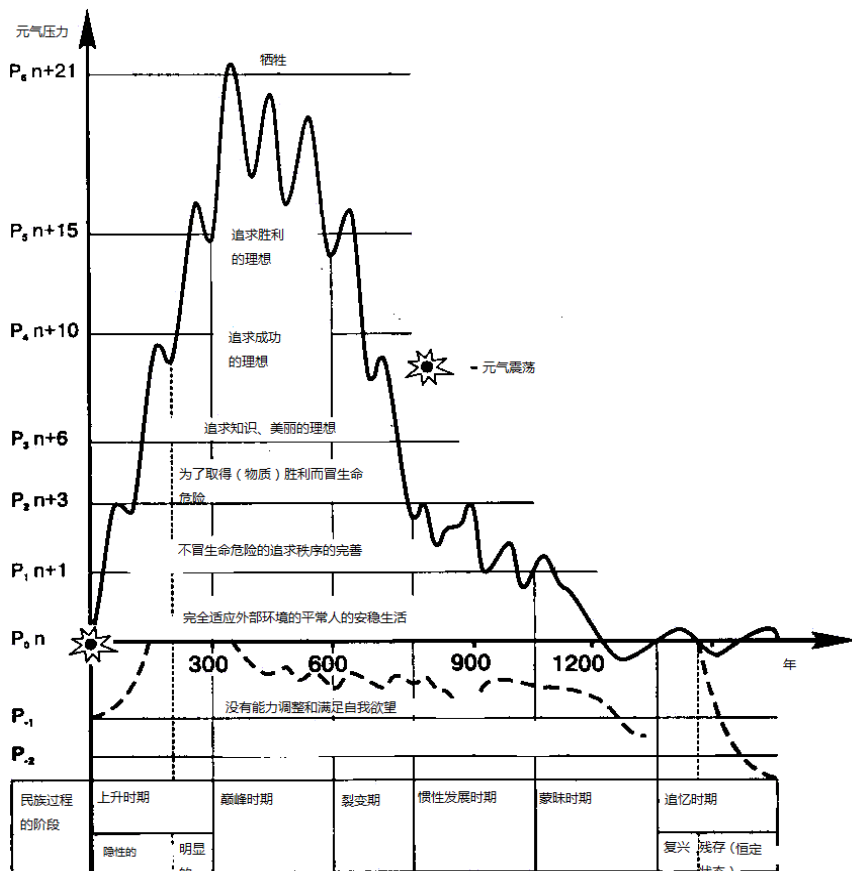


图4 民族、超级民族体系统的“民族过程”阶段
与“进取精神强度”变化示意图^①

说明： P_i^k 代表系统（民族或超级民族体）进取精神强度水平（пассионарное напряжение），这反映民族系统的“平均水平”，虽然在不同时期民族系统中总会存在着各种类型的个体，但是只有一种类型占据主导位置，对民族系统造成决定性影响。 i 是依据具体行为准则而划定的系统进取精神强度的水平， i 数值越高，强度水平越高。 k 指的是系统中低一级的民族单位的个数。 n 指的初始时期系统中低一级民族单位（亚民族或民族）的数量。

① Гумилев Л.Н. От Руси до России. М., 2007. С.15.

在距离“进取精神震荡”的1000-1150年间的“蒙昧时期”，民族系统中的“进取精神携带者”数量急剧减少，几近消失。而“亚进取精神携带者”的数量膨胀，甚至占据民族系统的主导地位。在“惯性时期”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维持着民族的继续“存活”。但此时的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创造力，整个社会被“随大流”（Будь таким, как мы!）的思潮笼罩着。科学活动中，整理汇编取代了创新研究，社会中腐败滋生、犯罪猖獗，军队战斗力下降，哗变频繁。民族系统的生命即将走向衰竭，很容易成为周边“进取精神强度”大的民族的猎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走到这个阶段，绝大部分的民族系统在此之前就已经消亡了。中华超级民族体在17世纪进入这一阶段，明王朝灭亡，清朝的腐朽僵化的统治开始。古罗斯在12-13世纪，也处于这一阶段。

有些民族系统，在经历了“蒙昧时期”后，在其残存的“进取精神携带者”的引导下，民族系统会出现短暂的“复兴”（Регенерация）。但是这些所谓的“复兴”现象受到整个民族“进取精神强度”水平的影响，具有短暂且随机的特点。不会对“民族过程”的正常走势造成影响，其实，这种“复兴”现象存在于每一个时期，只是在“进取精神”旺盛的时期表现得不那么明显罢了。这是民族系统自我修复的方式，也是造成图中每一个时期区间内“进取精神强度”曲线波动变化的原因。

“蒙昧时期”之后，有一些民族系统会进入下一个时期——“追忆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系统完全失去了“进取精神”，但是仍保留着过去的文化传统，其先辈的英雄事迹往往通过传说的形式继续流传。古米廖夫举例说，“在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的山谷地区，生活着某个草原民族的后代（应当是古突厥人后代）。他们的民族已经失去了‘进取精神’，但是其先辈的英雄事迹，仍以壮士歌的形式在民族中流传。”^①古米廖夫认为，“亚民族”同样也会经历这一阶段，如俄罗斯17世纪开始形成的“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цы），“他们采取了与大众隔离的方式，来保存自己的生活

① 参见 Гумилев Л.Н. Алтайская ветвь тюрк-тугю//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59. №.1. С.105-114.

方式和世界观，并向后代诉说着先辈的事迹。但显然，他们的‘进取精神强度水平’早已荡然无存。”^①

在经历了所有的阶段之后，有的民族还会继续老化，会进入“恒定状态”（Этнический гомеостаз），这是一种完全“静止”的状态，民族与所处的“包容性地理环境”保持完全的平衡。在这一状态下，民族系统的“进取精神强度水平”绝对为零。与之前各阶段不同的是，在“恒定状态”下，民族系统中“亚进取精神携带者”基本也不存在了。此时，“亚进取精神携带者”因为缺乏劳动和适应环境的能力而消亡。系统完全由“和谐者”组成。他们勤劳能干，完全依靠“包容性地理环境”，自给自足，抚育后代，和周边环境保持完全的和谐，但是已经失去了改变生活的能力。他们努力地不断重复父辈们的“行为模式”，不会做出任何改变，如果没有外界的威胁，民族系统就会在长时间内维持其稳定性。在民族内部，年龄决定了一个人的威望，社会生活和管理方式不会有任何的发展变化。处在这一时期的典型民族系统的代表，一般是在我们现在看来非常“原始”、“落后”的部落，如：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亚马逊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北极地区的某些民族（楚科奇人、爱斯基摩人等）、热带雨林区的俾格米人等。

总而言之，古米廖夫认为，民族系统的“进取精神强度”水平，决定着其“民族过程”所处的阶段。换言之，在民族系统中“进取精神携带者”、“和谐者”和“亚进取精神携带者”在民族中的比例和作用，决定着民族系统的发展阶段。但对于民族系统的稳定性和内部人民的生活而言，并不意味着“巅峰时期”状况就最好，过多的追求“理想”、富有牺牲精神的“进取精神携带者”，会导致内讧和灾难。反而是“进取精神强度”水平较低的“惯性时期”，民族系统会迎来物质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民族的生命有可能在其发展的任何一个时间结束，只有极少数的民族系统能够经过完整的六个阶段，进入“恒定状态”。民族系统很有可能因为自身进取精神的降低或稳定性的恶化，而成为其他民族系统的“猎物”，走向消亡；也有可能在其日益僵化没落的躯壳中因为新一轮的“进取精神震荡”，而诞生出新的民族。

^① Гумилев Л.Н. Этногенез и биосфера Земли. М., 2007. С.600.

1970-1971 年，古米廖夫在俄罗斯科学院《自然》杂志上开设了《民族过程与民族生态圈》专栏，陆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文章首次完整地阐释“民族过程”理论，后两篇文章皆是回应苏联几位著名民族学家的批评。总体而言，在古米廖夫早期发表的这些文章中，对“民族过程”理论的阐述，与其之后发表的著作的论述略有差异，此时古米廖夫的侧重点大多集中在民族起源的“宇宙射线说”因素的论证上，而对于“进取精神”学说的介绍则显得单薄简单。然而，其“宇宙射线说”因缺乏有效的科学理论支撑，遭到各方的强烈批评。古米廖夫在后来的答辩论文以及以此为基础出版的著作《民族过程与地球生物圈》中，对于“宇宙射线”相关的内容只是做了简单的假设和说明，而将重点放在了“进取精神”的增减与民族生命进程方面的论述上。^①

古米廖夫在推导“民族过程”理论时，分析了大量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历程，翻阅了诸多史料。然而，在史料选择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结论的推导过程也显得不够严谨缜密。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卢里耶（Я.С. Лурье）便指责古米廖夫的结论缺乏足够的史实佐证。在谈及古米廖夫将民族的寿命推算为 1200-1500 年的说法时，卢里耶强调：“古米廖夫并没有用足够的事实去证明这一推断，只是说‘根据民族学家的研究’，而提过类似观点的列昂季耶夫（国家的寿命最长只有 1200 年）和斯宾格勒（文明生命接近 1500 年）没有一个是‘民族学家’，而且这些人所提的相关时间也没有涉及‘民族’这一概念。”^②济利别尔特（М.М. Зильберт）在作品中充分肯定了古米廖夫对于民族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创新，但同时也指出了其在历史研究上对于史料的选择存在重大问题，认为“他有时为了自己的理论解释而选择甚至捏造历史事件。”^③古米廖夫认为，“史料法并不是研究历史问题的唯一手段，单

① 参见 Коренько В.А. К критике концепции Л.Н. Гумилева// СКЕПСИС. http://scepsis.net/library/id_3308.html

② Лурье Я.С.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в сочинениях Льва Гумилева// Лев Гумилев: теория этногенеза-великое открытие или мистификация? СПб, 2013.

③ Зельберт М.М. Великий ученный или великий фантазер?// Лев Гумилев Теория этногенеза: Великое открытие или мистификация? М., 2013. С.619.

纯依赖史料会导致历史研究任务的偏离,无法完整、正确地揭示历史进程的规律。”^①

（三）古米廖夫理论视角下的罗斯与俄罗斯“民族过程”分析

列夫·古米廖夫著有《从罗斯到俄罗斯》一书,该书介绍了俄罗斯从公元9世纪到彼得大帝改革前的民族历史进程。古米廖夫在书中将俄罗斯的历史拆分成两个超级民族体的“民族过程”,即1-13世纪的“古斯拉夫-古罗斯民族体”^②,和13世纪至今的“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笔者参考古米廖夫在《从罗斯到俄罗斯》中论及的历史事件,重新绘制了罗斯民族体和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民族过程”示意图(图5和6),以便更直观地展示和介绍古米廖夫的理论中罗斯—俄罗斯的“民族过程”阶段,并作简要评析。

1、罗斯民族体“民族过程”阶段分析

古米廖夫认为,在公元一世纪发生的“进取精神震荡”中(见图3中第V震荡带),诞生了斯拉夫民族。但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对于斯拉夫诸民族的发源地和早期活动的推断,只能依靠语言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进行推断。语言学家们为印欧语系的所有民族事先假定了原初语言及其发祥地,也为后来的进一步分化和变异前的语族假定了各自的原初语言及其发源地。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维斯杜拉河流域和喀尔巴阡山脉北麓地区,常被认为是斯拉夫诸族的发源地(图3震荡带V中的阿拉伯数字2所在地)^③。斯拉夫民族在大约公元300-600年之间在中东欧和南欧地区扩散迁移,成为欧洲分布最广泛的民族体之一。根据语言学家沙赫马托夫(А.А. Шахматов)等人的研究,斯拉夫人的分化始于公元6世纪左右,而“东斯拉夫人则在公元7-9世纪定居在了欧俄大平原上”^④。但是由于史料的缺失,人们对于这一时期的东斯

① Гумилев Л.Н. В поисках вымышленного царства. М., 1992. С.19.

② 古米廖夫在其著作中也将其看做是基辅罗斯民族体,包括诺夫哥罗德公国在内。13世纪以后的“俄罗斯超级民族体”也被称作“莫斯科罗斯超级民族体”。为方便行文,笔者在下文将两者分别称为“罗斯民族体”和“俄罗斯超级民族体”。

③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卿文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④ 《俄罗斯史(第七版)》,第16页。

拉夫人的活动知之甚少，不同文献对这一地区的部落和民族的称呼也大相径庭，在此不再赘述。

如图 5 所示，古米廖夫认为公元 1 世纪到 3 世纪初，是古罗斯“民族过程”的“上升时期”，而 3-6 世纪斯拉夫民族大迁徙时期，是该民族系统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民族系统内部的进取精神膨胀，扩张的势头强劲。随着民族进取精神的下降，7 世纪到 9 世纪，斯拉夫民族分裂，斯拉夫民族进入裂变期。东斯拉夫民族在这一时期定居在东欧平原上，建立了一些早期的国家，这些国家经常爆发冲突，争夺利益。同时，其四周强敌环伺，东斯拉夫民族诸国也经常与其他民族和部落发生激烈的战争，慢慢地这一地区的部落相互融合，成为基辅罗斯形成的基础。古罗斯民族体渐渐形成。

公元 9-12 世纪初，古罗斯民族体进入“惯性发展阶段”，正如前面所说，这一时期的阶段性特点是：民族的“进取精神”在经历剧烈震荡后进入平稳下降的阶段。与此同时，民族凝聚力增强，统一的权力机构开始出现，国家制度得到巩固完善，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这一时期，罗斯民族体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显著特点：首先在军事扩张方面，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如奥列格、弗拉基米尔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和莫诺马赫等“进取精神携带者”，基辅罗斯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战争，但其中大部分战争的目的已经不是开疆拓土，而是为了稳固政权，同时抵御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因为在这一时期，民族内部“和谐者”数量占据优势，他们厌倦了无休止的征战，期盼安定的生活，追求物质利益和制度的完善。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这一时期，罗斯开辟了“从瓦兰到希腊”的商路，大大促进了基辅罗斯商业的繁荣。同时，庄园经济盛行，农业也得到极大发展。再次，在文化与宗教方面，公元 988 年，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为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明的全面进入敞开了大门。书面语言（教会斯拉夫语）开始在基辅罗斯流行，教育机构出现，教堂建筑蓬勃发展。在社会组织与政治方面，《罗斯法

典》、贵族杜马和“维彻”（Вече）^①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增强，基辅罗斯的社会制度日趋完善。

在 1150-1300 年左右，基辅罗斯走向衰亡，进入“蒙昧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民族系统的“进取精神”耗损殆尽，民族过程也接近尾声。基辅作为中心的地位丧失，各公国基本彻底从基辅公国独立出去。北部的大诺夫哥罗德崛起，取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西南部的加利西亚和沃伦公国的达尼尔大公，在 1253 年首次接受了教皇的皇冠，与天主教国家结盟对抗蒙古人。后来，沃伦被崛起的立陶宛吞并，而加利西亚与波兰结盟，导致天主教文化在这一地区迅速传播，西南罗斯逐渐失去了作为基辅罗斯一部分的特点，脱离了丧失“进取精神”的罗斯民族体，融入了信奉天主教的西欧超级民族体中。而东北地区则分裂成罗斯托夫、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和梁赞等公国，成为政治斗争的主战场。这一时期，罗斯民族体的进取精神完全耗尽，各个亚民族分崩离析，民族系统的统一性损失殆尽。此时的基辅罗斯，因为“进取精神强度”水平低下，极易成为周边“进取精神”旺盛民族的“猎物”。13 世纪初，在罗斯大地西面崛起的立陶宛部落“进取精神强度”迅速上升，以极快的速度扩张壮大。同时，东方的“不速之客”蒙古民族也开始了大规模西征。随着基辅的没落，大量南部地区的罗斯人为了逃避蒙古的重税压迫，纷纷逃往情况相对较好的北部“森林罗斯”地区。即特维尔、科洛姆纳和莫斯科等地，“包容性地理环境”的改变，对于基辅罗斯的“民族过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原有的“草原地带”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罗斯民族体在 13 世纪末终结了其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命”。在其“躯壳”上，随着新一轮的“进取精神震荡”（图 3 中的 IX 震荡带），一批新的“进取精神携带者”在 1200 年左右出生，新的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民族过程”伴随着罗斯（基辅罗斯）民族体的消亡而开始。

① “维彻”（Вече），也被称为“Народное Вече”，是斯拉夫各民族和部落在封建政权形成之前的一种类似市民大会的制度。在此会议上讨论国家或部落的政治和生活中的各项大事。参与会议的成员被称为“мужи”，即部落或城市中享有自由权利的男性家长，他们在“维彻”中的话语权与其社会地位有关。“维彻”与大公和贵族杜马之间联系密切，在早期斯拉夫各民族和部落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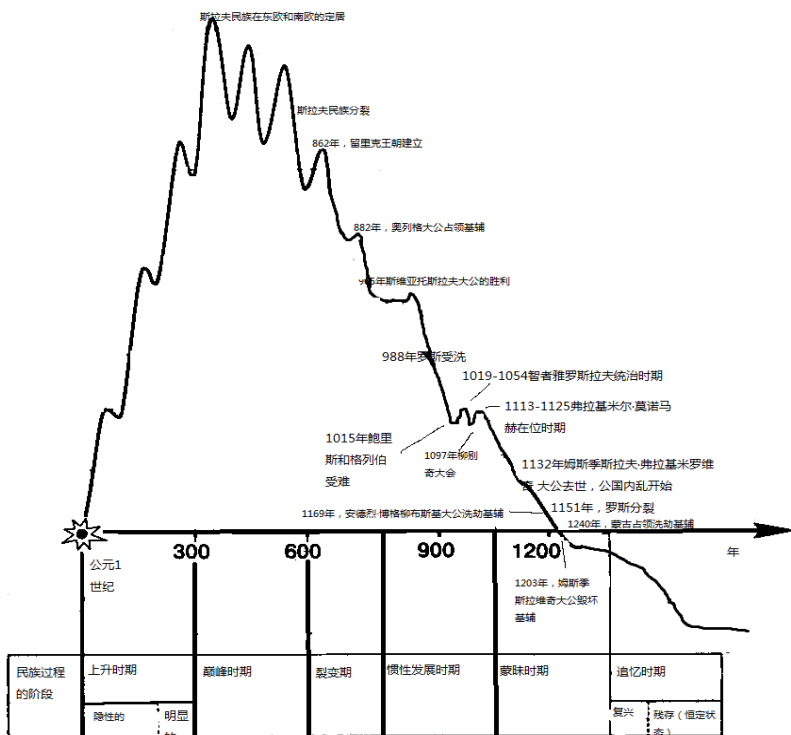


图5 罗斯“民族过程”阶段示意图

2、俄罗斯超级民族体“民族过程”分析

按照古米廖夫的理论，13-16 世纪，俄罗斯超级民族体应处于进取精神的上升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两个阶段，其中 1200-1380 年这段时期属于“隐性上升期”，而 1380 年以后直至 16 世纪初，属于民族系统的“明显上升期”。这两个阶段的特点也有所不同。“隐性上升期”是古罗斯民族体解体和消亡的阶段。旧有罗斯民族体的文化还顽固地存在，新出现的“进取精神携带者”还没有能力完全破坏罗斯民族体的残余影响。在这一时期，“进取精神携带者”的典型代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面对是与西方天主教超级

民族体结盟还是与东部蒙古超级民族体结盟^①的问题上，做出果断的决定，“牺牲个人情感选择了与金帐汗国结盟。”^②在汗国的保护下，诺夫哥罗德避免了被西方侵占、融入天主教超级民族体的“危险”，维护了罗斯人的信仰和传统。在 14 世纪，以基辅罗斯为代表的古罗斯民族体，已经走到了其“民族过程”的末期阶段，国家完全分裂，而这一时期维系着罗斯人民的唯一纽带，只剩下了统一的宗教信仰。莫斯科逐渐取得了东正教中心的地位，并笼络了来自罗斯各地的“进取精神携带者”。在“神圣的罗斯”大地上，渐渐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系统——“大罗斯”（Великороссия），或者“莫斯科罗斯”（从 15 世纪开始被正式称为俄罗斯）。14 世纪末，金帐汗国的进取精神明显下降，内讧不断，原本作为蒙古超级民族体亚民族体的罗斯诸国纷纷脱离。1380 年，金帐汗国马迈联合立陶宛进犯罗斯大地，双方在库利科沃原野展开激战，最终以莫斯科公国为首的一方取得胜利。这场战争也被古米廖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进取精神进入明显上升期的标志。在马迈与立陶宛的军队中，有大量来自明斯克、波罗茨克和格罗德诺等原“基辅罗斯”的将士。这就表明，基辅罗斯即“古罗斯民族体”已经彻底分裂成“莫斯科罗斯”（即俄罗斯）和立陶宛两个民族体了。而且 13 世纪立陶宛皈依天主教后，就成了西欧天主教超级民族体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场战役具有超级民族体层面冲突的意义。自此次战役之后，摆脱了蒙古超级民族体的束缚，又与西方超级民族体格格不入，以莫斯科公国为主导的俄罗斯民族体开始向着超级民族体的方向前进。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民族过程”也就进入了“明显上升期”。这一时期，在宗教文化上，俄罗斯民族彻底摆脱了对拜占庭教会的行政依赖，取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③在军事上，“进取精神”急剧上升的莫斯科公国发动了一系列扩张战争，不但成功“摆脱”了“进取精神”耗失殆尽的金帐汗国，还成功吞并了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等老对手，也

① 古米廖夫认为罗斯与蒙古是一种“结盟”的关系，而所谓的“鞑靼-蒙古桎梏”根本不存在。这个在下一章会详细介绍。

② Гумилев Л.Н.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и Великая Степь. М., 2007. С.116.

③ 1439 年佛罗伦萨基督教会议上，为赢得西方支持，对抗土耳其，拜占庭主教们与罗马签订了一项最终未能生效的协议，承认了罗马教皇的至高地位。但这遭到了莫斯科的强烈反对，莫斯科趁机脱离拜占庭教会，并选举拿斯主教为总主教。

版图；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彼得大帝为俄罗斯打开了北方出海口；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与西欧超级民族体诸国共同瓜分了波兰、夺取了克里米亚，使俄罗斯的版图从波兰延伸到了阿拉斯加。第二，思想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变革不断。从伊凡四世的重臣拉达的改革、特辖制的实行，到尼康的宗教改革，再到彼得大帝的改革，直至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于开明君主专制的尝试。俄罗斯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密集的变革与创新，俄罗斯也逐渐形成了新的行为模式，俄罗斯超级民族体最终确立。第三，动乱和内讧频繁爆发。根据古米廖夫的理论，民族体“巅峰时期”的主旋律是：“发挥自我个性”。因此，“进取精神携带者”们不仅是完成自己的任务，实现自我理想，还要最大限度地打击对手，控制局面。当俄罗斯的版图扩张到一定规模时，“进取精神过剩”的俄罗斯民族便又陷入了内耗，导致俄罗斯对外界干扰的抵抗力下降，典型的例子就是在 1598-1613 年俄罗斯经历了悲惨的“动荡时期”，以及俄罗斯帝国时期数不胜数的农奴起义和宫廷政变。

随着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终结，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进取精神强度”也开始迅速下降。“进取精神携带者”数量不断减少，俄罗斯的“民族过程”也在 19 世纪进入了“裂变时期”。

根据古米廖夫的理论可推知，1800-2000 年间，俄罗斯处在“民族过程”的“裂变时期”。这一时期的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由于“进取精神”不断丧失，系统的凝聚力下降，内部不稳定性增强。系统内“进取精神携带者”的数量大大减少，到 19 世纪末，俄罗斯贵族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完全失去“进取精神”，变成契诃夫《樱桃园》中无力改变现实的“和谐者”，或是纵情声色，醉生梦死的“亚进取精神携带者”。而与此同时，系统的不安定因素增多，革命力量渐渐发展壮大，由“社团”发展成有着特殊信仰和“行为模式”的“亚民族”。到 20 世纪初，系统达到崩溃的边缘，革命导致的内战造成双方的“进取精神携带者”大量消亡。苏俄的建立和无神论的推行，使得原有系统的联系遭到破坏。苏联的建立虽然表面上维持了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身躯”，然而，“进取精神强度”的持续降低，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俄罗斯超级民族体受挫。大量民族从超级民族体内分离出去，融入西方天主教超级民族体或是南部穆斯林超级民族体的怀抱。大量的“进取精神

携带者”迁移到了西方，还有一部分敢于为（物质）利益和理想冒险的“进取精神携带者”，走上犯罪道路，或成为“寡头”，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90年代的俄罗斯，处于民族过程阶段由“裂变时期”到“惯性发展时期”过渡的阶段，民族系统中的进取精神强度急剧下降，毫无工作愿望和能力低下的“亚进取精神携带者”日益增多，整个社会被一种悲观、冷漠和颓废的情绪所笼罩。国家政权日益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国家内忧外患，亟待变革。

古米廖夫在《从罗斯到俄罗斯》一书中断定，在21世纪初，俄罗斯超级民族体将进入“惯性发展时期”。“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将迎来长达三百年的惯性发展期的金秋，这是一个收获果实的季节，这一时期民族体将创造独一无二的文化……”^①尽管古米廖夫于1992年离世，但其对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预测却基本准确。从2000年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俄罗斯逐渐回归到稳定的发展轨道。政治制度逐渐趋于完善，地方分裂势力基本消除；经济上，依靠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家经济实力大大提升；文化上，东正教信仰开始复苏，教育和科技也取得长足发展。尽管民族体内部的“进取精神强度”水平持续降低，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也会影响俄罗斯社会经济的稳定，根据古米廖夫的理论，21-24世纪，处于“惯性发展时期”的俄罗斯超级民族体，法律制度会不断完善，经济文化建设将进一步发展。但在24世纪后，随着民族体“进取精神”的进一步下降，俄罗斯将进入“蒙昧时期”，随着“进取精神携带者”的消亡殆尽，俄罗斯超级民族体也会随之解体。只有出现新的“进取精神震荡”，诞生新的“进取精神携带者”，新的民族历史才会再度展开。

古米廖夫的“民族过程”理论基础是具有“自然科学”属性的“进取精神”理论，而对于这一理论的论述，古米廖夫的论述显然是带有极大主观臆想特点的，这也决定了其理论绝非严谨的“科学论断”，对于其结论更不能盲目相信。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将其理论当作看待历史和现实的一个特殊视角，尤其是在解读俄罗斯历史进程方面，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① Гумилев Л.Н. От Руси до России. М., 2007. С.187.

五、古米廖夫理论中“民族过程”的推动力

——民族接触（Этнические контакты）

民族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共同的区域内，不同的民族系统之间彼此接触，相互作用，这种现象被古米廖夫称为民族接触（Этнические контакты）。古米廖夫在研究了多个民族聚居区的民族交往关系的基础上，将民族接触的类型分为四种模式：共存（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同化（Ассимиляция）、通婚（Метисация）和融合（Слияние）。第一种模式——共存，是指民族彼此相对独立，只是彼此吸收借鉴技术成就，各方都保持自己的传统习俗和行为模式。第二种模式——同化，就是相互接触的民族中的一方完全被对方吸收的现象。第三种模式——通婚，进行这种形式接触的族对于传统习俗的保持具有不确定性，这是因为新的“（民族）混血”在民族属性上具有不确定性。第四种模式——融合，这种接触形式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接触双方原有传统习俗的丧失（即原有民族的消失）和新民族的诞生。正如古米廖夫所言，“不管新的民族系统的结构多么复杂和多元，在这种情况下都具有作为统一系统的完整性。”^①古米廖夫将这种形式视为民族之间接触的最主要形式。另外，古米廖夫还指出，在这种接触的过程中，参与接触的族之间经常出现的流血冲突现象，比平和、萎靡、老化的族关系，更有利于维持新兴族系统的统一性。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族接触方式与结果的差别？不同的接触结果对于“族进程”又有怎样的影响？古米廖夫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族系统之间接触的基础和具体表现，并对12-15世纪俄罗斯与蒙古的接触历史进行了分析。

（一）古米廖夫“族场”与“迎合性”学说视角下的族接触类型

1、“族场”（Этническое поле）

上文提到，在古米廖夫的理论中，族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系统，具备生物的特性。根据生物学家古尔维奇（А.Г. Гурвич）的假说，有机生命体内

^① Панченко А.М., Идеи Л.Н. Гумилева и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Гумилев Л. Н. От Руси до России. М., 1997. С.132.

部存在有“生物场”（Биополе, 一种生物体内特殊形式的电磁场），特定生物族群内的成员的“生物场”有着特定的振动频率。有些生物学家认为，“生物场”能够调节生物体的行为，维持生物族群系统的完整性。古米廖夫利用这种生物学上的假说来分析民族问题。他认为，民族系统同生物体一样，也具有“民族场”（Этническое поле），特定民族系统的“民族场”有着与其他民族系统截然不同的、特定的振动频率。这是因为，在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生物场”有着相似的振动频率。并且，从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彼此之间，会因“生物场”振动频率的相似而具有某种亲切感，并以此与其他民族的人们区分开来。古米廖夫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去解释“民族场”：俄语中的“Ностальгия”指的是类似于中文中“乡愁”的一种感情，古米廖夫认为，用“民族场”的学说能很好地解释这种心理状态。因为在同一个“民族场”中，个体的“生物场”振动频率与周围人群相似，心情就会相对平和稳定。当个体脱离原本所属的“民族场”的影响，去到另一个“民族场”中，新“民族场”的振动频率因为与原本的频率不同，所以就会使个体产生一种陌生和不适应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古米廖夫看来就是“Ностальгия”^①

另外，上文提及的“进取精神诱导”现象（Пассионарная индукция），也可以用“民族场”的相关理论来解释。在民族系统内，由于“进取精神携带者”的“进取精神强度”水平较高，其“生物场”强度较大，因此能够影响民族系统中的其他成员，使其振动频率与之“共鸣”，从而促使民族系统各成员具有“进取精神携带者”的特征，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因此，古米廖夫也将“民族场”称为“进取精神场”（Пассионарное поле）。这也表明了“民族场”的能量强弱，由该民族系统中的“进取精神强度”决定。而且，“民族场”的变化与“民族过程”保持一致。在旧民族迫近消亡之时，原有“民族场”的振动频率会随着民族系统内部联系的损坏而消失，又会由于“进取精神震荡”发生而获取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新的振动频率。新的“民族场”在民族系统开始“民族过程”的初期，由于民族系统“进取精神强度”

① 参见 Гумилев Л.Н. Этнография этнос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Пб., 1989. С.40-42.

的上升,能量开始变强,但伴随着“民族过程”的“进取精神”的耗损,“进取精神场”的强度减小。

2、“迎合性”(Комплементарность)

由于每个人身体的“生物场”振动频率不同,那些振动频率相似的个体之间会有一种“自己人”的亲切感,而对那些与自己“生物场”振动频率不同的人,会产生一种潜意识的生疏甚至是厌恶的感觉,即“外人”的感觉。这种能将不同人区分为“自己人”和“外人”的感觉,被古米廖夫定义为“迎合性”(Комплементарность)。“自己人”的亲切感,是“积极迎合性”(Положительная комплиментарность),反之,则是“消极迎合性”(Отрицательная комплиментарность)。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中立迎合性”(Нейтральная комплиментарность),古米廖夫认为,这种“中立迎合性”是一些“进取精神强度”低下的民族所具有的,通常表现为对接触民族的“忍耐、冷漠”等感觉。^①“迎合性”现象是民族划分的心理基础。在民族形成之前,“积极迎合性”会将“进取精神携带者”们聚在一起,并维系其内部的稳定,随着其力量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自己人”被聚集到一起,组成“团体”或“社团”,进而发展成民族。“迎合性”在民族或者超级民族体的层面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有时,其他民族的人也许会引起某些个体的“亲切感”,但如果从整个民族或超级民族体的立场来看,范围外的其他民族体的人都是“外人”。“民族场”和“迎合性”的学说对于解释“民族接触”中的现象有重要意义。

3、接触模式

当民族的接触类型为“同化”模式时,“民族场”能量强大的民族会对周边“民族场”能量微弱的民族产生“同化作用”,使其“民族场”的振动频率慢慢与自己的频率趋同,最终使其彻底融入自己的系统内部。在这种情况下,参与接触的民族之间的“迎合性”一般来说都是积极的,或者是中性

^① 参见 Пушкин С.Н. Проблема межэтническ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Л.Н. Гумилева// Лев Гумилев: Pro et contra. СПб., 2012. С.713.

的。倘若双方之间的是“消极迎合性”，可以理解为其“民族场”振动频率差别过大，无法完成“同化作用”。那么此时的“民族接触”很有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残酷的状态，那就是“种族灭绝”。势力强大的民族会杀死弱小民族的“进取精神携带者”和大部分的成员，从而达到“同化”的目的。如18-19世纪，美国殖民者对北美印第安土著的屠杀。还有两晋时期，中国北方胡人和汉人的相互残杀。

在接触模式为“融合”时，参与接触的两个民族的“民族场”振动频率相似。而且两个民族的“民族场”能量都比较弱，即双方都处于“民族阶段”的末期。当发生“进取精神震荡”时，在彼此接触的两个民族中，新出现的“进取精神携带者”的“生物场”振动频率一致，并且共同破坏了原有民族的组织结构，并且在“积极迎合性”的支配下，接触双方联合在一起，成为具有完整结构和全新“行为模式”的团体，并进一步发展成统一的民族。

“通婚”也是民族接触的基本模式之一（这只是一种过渡模式），一般来说，“通婚”的最终目的是走向民族的“融合”，只是这个过程复杂而漫长。一般来说，婚姻是建立在双方好感的基础之上的。而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婚姻都是发生在同一民族系统之内，即使在民族混居的地区，发生跨民族（不同超级民族体之间的）婚姻的现象也要少得多。也就是说，两个民族以普遍的族际通婚为最主要的接触方式，则至少说明二者的民族关系是由“积极迎合性”支配的。通婚后所生孩子的民族属性，在归属上并不确定。一般而言，孩子成长的环境决定了其民族属性。这是因为孩子的“生物场”，长期受到其所处的“民族场”的同化，最终成为该民族的一部分。另外，广泛的族际通婚，也可以加深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了解，促进民族走向融合。

“共存”这种接触模式是最复杂的。这种模式指的是，在两个或多个民族接触的过程中，各自保持独立的状态。根据“民族场”和“迎合性”的原理，这种接触模式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消极的接触类型，被古米廖夫称为“喀迈拉”（Химера）。

“喀迈拉”原本是指希腊神话中一种前半部分像狮子，中间像山羊，后身像蛇的吐火怪物。后来演化成生物学术语，用来形容来自不同个体的生物细胞

或组织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完整生物体。古米廖夫在这里引用“喀迈拉”，来形容原本属于不同超级民族体的两个或多个互不相容的民族，“共存”于一个社会和“包容性地理环境”的现象。即，两个不属于同一个超级民族体的民族“民族场”振动频率完全不能和谐，民族关系系由“消极迎合性”支配。在彼此接触的过程中，各民族都失去了各自的民族独立性，而在接触地区形成了脱离原有“超级民族体”的特殊存在。在“喀迈拉”中，因接触各方的传统习俗和意识形态千差万别，因此社会中充斥着各种各样互不相容的思想、观点和取向。由于“喀迈拉”中“民族场”相互不协调，因此各种各样与系统背离的异端学说十分兴盛，并可能发展成各种流血冲突的导火索。各民族原有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也被完全的混乱所取代，人们也渐渐脱离了与“包容性地理环境”的联系。因此，“喀迈拉”就成了一种由从原有民族脱离出去的“反民族化”的个体组成的矛盾体。与“民族系统”不同，“喀迈拉”不会长时间存在，很快就会走向衰亡。古米廖夫认为，公元十世纪里海沿岸的哈扎尔汗国（可萨汗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喀迈拉”。哈扎尔人和犹太人混居在一个社会中，但两个民族原本隶属不同的超级民族体，其“行为模式”和民族心态各不相同。犹太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哈扎尔人的关系，被典型的“消极迎合性”控制，彼此缺乏认同感，相互之间冲突不断。汗国甚至没有自己的军队，需雇佣周边部落的军队来维持安全。古米廖夫认为，这种畸形的社会是造成哈扎尔汗国湮灭于历史长河的根源。

第二种是中和的接触类型——“可塞尼”（Ксения）。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语的“ξενία”，意思是“异己的、异乡的”。这个词被古米廖夫借鉴来，表示在同一个区域内不同民族共同存在的中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民族能保持彼此的独立性，不发生“融合”的现象。这些民族一般从属于同一个“超级民族体”，其“民族场”振动频率虽有不同，但是因为强度弱而避免了相互干扰。民族关系也处于“中立迎合性”支配之下。因此，彼此之间既没有共生共存的依赖感，也不太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加拿大境内英国移民和法国移民、芬兰境内的芬兰民族和瑞典民族、比利时的佛拉芒人和瓦隆人的关系，都是“可塞尼”这种接触形式的典型代表。

第三种是“共生”模式中理想的接触类型——“共生”（Симбиоз）。这是一种积极的接触方式，在民族接触的过程中，不同的民族体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划分“包容性地理环境”，各取所需，相互依存。在这种类型下，尽管各民族的“民族场”振动频率有差别，但是在共同生活中已然能够和谐“共鸣”。民族关系被“积极迎合性”所支配，彼此之间有较强的亲切感，但是由于所处地域和产业的分工不同，所以在接触中各民族都能保持独立，互补共存，不会发生“融合”的现象。在“共生”这种积极的接触类型中，会有一些规范和准则去限制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自由，如宗教、法律、道德等。尽管个别人不赞同，但是正因为这些规范和限制，人们才能够和谐共处。而这些对自由的限制，在“喀迈拉”中是不存在的。俄罗斯超级民族体中的民族接触，具有典型的“共生”特征：俄罗斯族居住在河谷和平原地区，哈萨克人生活在空旷草原上，而森林带成了与芬兰-乌戈尔人的分界线，各民族共同在“积极迎合性”的作用下，共同遵守某些规定和原则，以维系超级民族体的完整和统一。这种“共生”现象也会出现在民族系统内部的“亚民族”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亚民族之间会有明显的等级和社会分工，各阶层或团体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以保证其和谐共存。如俄罗斯民族内部的农民、贵族和哥萨克人等，各有所司，各有所取，共同维系民族的稳定。

在“民族过程”中，民族接触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进取精神震荡”发生时，“融合”的民族接触模式，能够促进民族的形成；在民族系统发展的过程中，“共生”的民族接触类型，会促进超级民族体的形成，维护民族的稳定和统一。而消极的民族接触（“喀迈拉”的出现），会破坏民族系统的内在联系，导致民族系统偏离其原有发展轨迹和需要经历的阶段。这种由消极民族接触造成的结果，被称为“位移现象”（Смещение）。这种“位移现象”多发生在民族系统阶段的过渡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民族的内部结构会经历重构，系统稳定性下降。这时，如果民族系统遭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或者内部出现反系统力量，那么民族的传统习俗和行为模式势必遭到破坏，民族会出现混乱，甚至有解体或消亡的危险。当民族处于从“巅峰时期”向“裂变时期”过度的阶段时，因为系统“进取精神”的骤然下降，“民族场”能量迅速衰减，此时在与其他民族的消极接触过程中，若其他民族的

“民族场”强大，则原有民族系统内部的低级民族单位就会被“吸附”过去，原有民族系统就会面临解体的危险。大部分民族系统有着“自我修复”的功能，“积极迎合性”会一定程度地弱化这种“反系统力量”，使得“民族过程”得以延续。

分析古米廖夫民族接触类型，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即同属于一个超级民族体的民族之间的接触，往往在“积极迎合性”的支配下，容易形成相对积极的接触模式；而分属不同超级民族体的民族，在接触时往往表现为消极的接触形式。古米廖夫自己也表明，“尽管超级民族体之间的接触有时是中性的，但它们的后果常常是极其负面的。”^①因此，依据古米廖夫的理论，超级民族体之间应当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民族接触。这与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避免原则”（Abstention rule）极为相似，即“核心国家避免干预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的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要求。”^②

（二）古米廖夫理论视角下的 13-15 世纪罗斯-俄罗斯与鞑靼蒙古民族接触类型分析

13-15 世纪的俄罗斯历史，被绝大多数俄罗斯史学家称为“鞑靼蒙古桎梏”，表明与鞑靼蒙古的接触，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有着消极和阻碍的作用。与传统观念相反，古米廖夫认为 13-15 世纪恰恰是俄罗斯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期，“鞑靼蒙古桎梏”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罗斯-俄罗斯与蒙古民族之间是一种“共生”的积极接触模式，两个民族体在接触过程中形成了“同盟”关系，对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俄罗斯-蒙古的“共生”接触关系

可以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去理解古米廖夫理论中俄罗斯与蒙古的“共生”接触关系。

① Гумилев Л.Н. Этногенез и биосфера Земли. М., 2007. С.523.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年，第 316 页。

首先，“积极迎合性”是俄罗斯-蒙古“共生”接触关系产生的基础。

“积极迎合性”使得罗斯选择与蒙古结盟。罗斯与草原民族共同享有欧亚大陆广袤的土地，从宏观上讲，其“包容性地理环境”相同。具体而言，虽然罗斯人主要在森林河谷地带，从事打猎和种植业，草原民族基本都从事畜牧业，但二者经济互补性强，相互贸易和交流由来已久，彼此不可或缺。在接触的过程中，罗斯与草原民族各个阶层的“通婚”现象十分普遍，民族融合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后来的波洛伏齐人接受了罗斯的基督教信仰，其后代也成了后来扎波罗热和城郊哥萨克人的主体。尽管罗斯和草原民族的冲突时有发生，但是总体而言，规模都不大，且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罗斯与草原民族的融合。长期的共存，使得罗斯与草原民族的关系为“积极迎合性”所支配。所以，对于同属草原民族的蒙古，也没有排斥和厌恶的感情。俄罗斯面临的最大挑战却始终来自于西方。“西欧天主教超级民族体”，与罗斯民族体的“民族过程”阶段有所区别。12世纪，罗斯民族体已处在“民族过程”的尾声阶段，进取精神耗损殆尽，民族内讧不断，而此时的西方“进取精神强度”已达巅峰。处在巅峰时期的西欧，对罗斯充满了鄙夷和敌视。这种发展阶段的差异，是造成罗斯与西方超级民族体之间心理障碍的原因。因此，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直被“消极迎合性”所控制，彼此互相厌恶、排斥。983年，德意志皇帝就宣称要“征服希腊教徒和萨秦人”^①。13世纪，西方天主教会更是将信仰东正教的罗斯人和东方的伊斯兰教徒视为“异教徒”，并发动了十字军进行征讨。13世纪，个别罗斯王公与西方的合作，在本质上也只是被西方人利用来抵挡蒙古人的西征，最终目的还是占领罗斯并迫使罗斯人改信天主教。与西欧结盟的西南罗斯被波兰、立陶宛等国占领，沦为西欧超级民族体的“二等公民”。^②1269年，德意志骑士团再次侵略诺夫哥罗德，企图劫掠这个罗斯最富裕的城市，却被蒙古阻止。而在13世纪蒙古的西征大军中，却有众多的罗斯人。这充分展现了罗斯与东西两个民族体“迎合性”的差别，对蒙古的“积极迎合性”也成为罗斯与鞑靼蒙古民族

① 转引自李晶晶：“列夫·古米廖夫与其民族接触理论”，载于邱运华、林精华编《俄罗斯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 Гумилев Л.Н. Ритмы Евразии// Лев Гумилев: pro et contra. СПб., 2012. С.135.

结盟的根源。

其次，“俄罗斯-金帐汗国同盟”是俄罗斯-蒙古“共生”接触关系的表现形式。古米廖夫彻底否定了传统的“鞑靼蒙古桎梏”的说法，他认为13-15世纪罗斯（俄罗斯）与鞑靼蒙古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具体表现为“俄罗斯-金帐汗国同盟”的建立。第一，古米廖夫认为，罗斯和蒙古最初的接触虽然伴随着流血战争，但是战争的目的并不是要征服或毁灭罗斯，战争的残酷程度也不像之前史学家描述的那样严重。古米廖夫在《从罗斯到俄罗斯》一书中讲到，1223年，蒙古征讨波洛伏齐人，本无意与罗斯开战，而罗斯与波洛伏齐当时有着同盟的关系，蒙古便遣使者前去梁赞劝说梁赞公与波洛伏齐人断绝关系，并索要马匹和补给，遭到梁赞公的傲慢的拒绝，因此蒙古报复，梁赞被洗劫。古米廖夫认为：“梁赞在陷落后士兵和百姓没有被屠杀，蒙古人只是卷走所需马匹和财物而已。”^①而其他遭到毁坏的城市，诸如弗拉基米尔和科泽尔斯克城，也是因为不提供物资马匹，或杀害使者，违反了“大扎撒”中“不杀来使”的规定而遭毁坏。但大部分的公国城市，很快就和蒙古人找到了“共同语言”^②。如乌戈利奇公满足蒙古要求，如数提供了马匹而得以保全。随后，大部分的伏尔加河城市也都效仿，未遭破坏。第二，罗斯与鞑靼蒙古人之间存在着同盟关系。结盟之后，蒙古在攻打其他地区时，会从罗斯得到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蒙古西征大军中就有大量罗斯士兵，他们还被当时的匈牙利人称为“最恶毒的基督徒”。“在（蒙古西征）最困难的1389年，顿河王德米特里支付了5000卢布的巨额贡赋。”^③而当罗斯受到西方攻击时，也会得到蒙古的援助。鞑靼蒙古和罗斯的军队还参与到对方王公争夺权力的内部斗争中。被称为“钱袋子”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大大加强了莫斯科公国与金帐汗国的政治经济同盟关系。在金帐汗国的庇护下，莫斯科公国享受了长达40年（1328-1368年）的和平发展，伊凡一世也成为罗斯大地最有权势的王公。这种同盟属于蒙古和罗斯在超级民族体层面的接触，对双方的民族进程都有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蒙古鞑靼人和罗斯人相互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维护对方的独立性，这也充分体现了罗斯和

① Гумилев Л.Н. От Руси до России. М., 2007. С.117.

② Там же. С.131.

③ Там же. С.388.

鞑靼蒙古在共同的“超级民族体”中的和谐“共生”关系。

2、对罗斯-鞑靼蒙古的“共生”接触形式的评价

按照古米廖夫的理论,罗斯-俄罗斯与鞑靼蒙古的民族接触,促进了“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形成和发展。13 世纪初,罗斯民族体已经进入“蒙昧时期”,民族“进取精神强度”十分低下。此时与“进取精神”旺盛的蒙古人的接触,正好与十三世纪初的罗斯大地上的“进取精神震荡”重合。蒙古人对于罗斯民族系统的冲击和破坏,恰恰为新出现的“进取精神携带者”扫除障碍。王公内讧、维彻政治等固有传统被打破。而蒙古民族传统中对领袖的绝对忠诚、民族包容、宗教宽容等特点渐渐被罗斯吸收,推动了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在与蒙古人接触的过程中,形成了“莫斯科罗斯-蒙古超级民族体”并在 14 世纪末取代蒙古,成为欧亚超级民族体的主导民族,俄罗斯超级民族体逐步形成。与鞑靼蒙古的民族接触,促进了罗斯民族体“民族过程”的终结,促使俄罗斯民族体走向巅峰,并为后来的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蒙古-鞑靼与罗斯历史联系”,一直是俄罗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俄罗斯与苏联的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往往将二者关系视为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认为其严重阻碍俄罗斯的历史进程,称之为“蒙古-鞑靼桎梏”也有不少史学家试图淡化甚至忽略蒙古-鞑靼对于罗斯国家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如索洛维约夫 С.М. Соловьев, 克柳切夫斯基 В.О. Ключевский, 雷巴科夫 Б.А. Рыбаков, 格列科夫 Б. Д. Греков 等历史学家)。而“欧亚主义者”(特鲁别茨科伊 Н. С. Трубецкой, 维尔纳茨基 Г.В. Вернадский 和萨维茨基 П.И. Савицкий 等)通常重视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思想文化、国家制度,尤其是地缘政治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以证明俄罗斯的“欧亚”属性。

在这一争议问题上,古米廖夫可以说是继承了传统欧亚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并用“共生”的积极接触关系,分析俄罗斯与蒙古鞑靼的关系。并认为这种积极接触的产生,是建立在俄罗斯民族与蒙古民族之间的“积极迎合性”基础之上的。而“积极迎合性”出现,得益于俄罗斯与蒙古共同的“包容性地理环境”——欧亚大陆。这充分体现了古米廖夫理论的欧

亚主义色彩。杜金（А.Г. Дугин）、拉夫罗夫（С.Б. Лавров）等欧亚主义者，对古米廖夫有关蒙古-俄罗斯民族接触的论述大加赞赏，尤其对于其理论中的欧亚主义精神极为肯定。杜金甚至认为，当今正是“古米廖夫的时代”，其理论学说在当代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①

但是，古米廖夫对“鞑靼蒙古枷锁”这一传统历史观念的颠覆，遭到俄罗斯众多学者的激烈批判。其中，俄罗斯政治评论家科日诺夫（В.В. Кожин）在一次采访中曾讲道：“他（古米廖夫）为很多历史学家所不齿，因为它关于蒙古-俄罗斯历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杜撰出来的。”^②历史学家达尼列夫斯基（И.Н. Данилевский）也指责古米廖夫在描述 13-15 世纪俄罗斯与蒙古民族接触时，对所选择的史料“断章取义，具有强烈的倾向性。”^③连古米廖夫传记的作者别里雅科夫也不赞同古米廖夫关于俄罗斯与蒙古接触关系的说法：“古米廖夫（将这段历史）写得轻松而富有文采，而且我觉得也很有说服力，但是只是自己的创作而已。我不知道，读者会站在哪一边，我认为俄罗斯作家奇维利欣（В.А. Чивилихи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漫长、痛苦而又可怕的时代。”^④

结 语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012 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到：“（国家）前途取决于我们的国家意志，内在的能量，即，古米廖夫所说的‘进取精神’（Пассионарность）。”^⑤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为纪念欧亚主义思想家和突厥研究专家古米廖夫，1996 年将哈萨克斯坦新成立的综合性大学命名为“古米廖夫欧亚民族大学”（Евраз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① Дугин А.Г. Лев Гумилев и Наука «живой жизни»// Pro et contra. СПб., 2012. С.462.

② Беседа с Вадимом Кожинным// <http://kozhinov.voskres.ru/articles/pereplet.htm>

③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И.Н. Читая Л. Гумилева// Лев Гумилев: теория этногенеза-великое открытие или мистификация? СПб., 2013. С.499.

④ Беляков С.С. Гумилёв сын Гумилёва. М., 2013. С.600.

⑤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гласил ежегодное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118>

имени Л. Н. Гумилёва)。^①在外交战略上,俄、哈两国领导人都主张欧亚区域的融合和一体化。2016年6月19日,普京与纳扎尔巴耶夫会面时,共同启动了“大欧亚”方案,希望在欧亚经济联盟(ЕАЭС)的基础上,加强与中、印和欧洲国家的经济合作。^②俄罗斯“古米廖夫中心”(Центр Льва Гумилёва)^③所发布的时评和研究论文中,对于普京总统“欧亚主义”外交政策极力推崇。值得注意的是,受到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古米廖夫的追随者们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与古米廖夫在苏联时代对中国抱有的警戒和偏见的观点不同。在近几年“古米廖夫中心”网站上发布的有关中国的新闻和论文,除个别几篇担忧中国对于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领土要求”的“老生常谈”外,绝大多数是介绍中国民族政策和国家管理经验以及中俄合作的“正面”文章。这表明,新时期的古米廖夫理论已经与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色彩浓厚的主流地缘政治理论逐渐融合,为当今俄罗斯欧亚战略提供理论支持。

【Abstract】 According to L. Gumilev's Theory of Ethnogenesis, the ethnic group has a fixed life cycle, from generation to extinction. The internal momentum of "ethnogenesis" is a special bio-chemical energy, namely, the "enterprising spiritual shock". From the initial "enterprising spirit", the complete "ethnogenesis" generally goes through six stages including the rising phase, the peak phase, the trauma phase, the inertia phase, the obscuration phase and memorial phase, which lasts about 1200 to 1500 years. In Gumilev's view, the "ethnogenesis" of the "Rus ethnic group" began from the emergence of Slavs in the 1st century, and ended with the complete collapse of Kiev Rus in the 13th and the 15th centu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3th century, with a new round of "enterprising spiritual shock", the "ethnogenesis" of "Russian super ethnic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а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имени Л.Н. Гумилёва//Kremlin.ru. 10.10.2000.

② Компас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Проект «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 объявлен открыты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 июня 2016 года. №.132(7000).

③ 该中心系俄罗斯古米廖夫追随者与研究者发起建立的,主要发布与欧亚主义和古米廖夫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及欧亚大陆新闻和时评的网站,参见 <http://www.gumilev-center.ru/>

group” began and has lasted by now. Gumilev believes that ethnic contac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nd driving force for “ethnogenesis”, the “ethnic field” and “complementarity” is the basis of ethnic contact; the active contact mode among ethnic groups promotes the smooth process of “ethnogenesis”, otherwise the negative mode hinders “ethnogenesis”, making the ethnic resistance fall and even decay. In Gumilev’s theory, the contact between Rus and Mongolian ethnic group, from the 13th century to the 15th century, is a typical mode of positive contacts, which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formation of Russian super ethnic group. Nevertheles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elaboration of Gumilev’s theory, especially his arguments for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from a perspective of natural sciences have been widely criticized. His theory is not a “natural science theory”, but can just be regarded as a social science theory.

【Key Words】 Eurasianism, Russian Ethnic Group, L. Gumilev

【Аннотация】 По теории «этногенеза» Льва Гумилёва нация имеет фиксированный жизненный цикл, и процесс от её зарождения до вымирания — это «этногенез». Внутренняя мотивация «этногенеза» — это особый вид биохимической энергии — «пассионарность». Начиная с «пассионарных толчков», полный «этногенез» обычно проходит шесть фаз: фазу подъёма, фазу акматическую, фазу надлома, фазу инерции, фазу обскурации, фазу мемориальную, которые длятся около 1200-1500 лет. По мнению Гумилёва, «этногенез»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и» начался с появлением славян в I веке н.э. и завершился в XIII и XV веках н.э. во время полного гупадка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В начале XIII века вслед за новой волной «пассионарных толчков» начался «этногенез»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верхнародности», котрый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по сей день. Гумилёв отмечал, что этнический контакт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и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этногенеза», «этническое поле» и «комплементарность» являются основой этническ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между этническими группами могу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плавному прогрессу этногенеза, и,

наоборот,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е модели контактов мог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этногенезу», что приводит к сниже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иммунитета и даже к исчезновению этноса. В теории Гумилёва контакт между русским и монгольскими народами в XIII-XV вв. является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моделью позитивного контакта, что оказало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уп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Однако в процессе разработки теории Гумилёва много проблем, особенно его дискурс о «пассионарности» широко критикуетс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поэтому его теория не считается «теорией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а мож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только как теор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этнос, Лев Гумилёв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族群意识调控 及国家认同建构

王佳*

【内容提要】在当代多民族和多族群国家中，族群意识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其对维护族群的自主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容易造成作为国家主体的民族和作为非主体民族的各个族群之间产生不同水平的认同，不利于塑造整体性的国家认同。族群意识若调控不当，不仅影响着一国内部民族和睦及社会稳定，往往也会成为制约该国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受俄罗斯影响最早和最深的国家，其国内俄罗斯族人口的发展变迁史为独立初期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在哈萨克斯坦的兴盛提供了土壤。得益于哈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基本维持了和睦稳定的族际关系，在调控国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方面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成为后苏联空间乃至世界范围内构建和睦族际关系的范例。基于哈萨克斯坦国内民族人口构成的现实状况，实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将成为哈萨克斯坦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哈萨克斯坦民族问题 哈俄关系 俄罗斯族族群意识 国家认同建构

【中图分类号】D736.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 06-0113(27)

* 王佳，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2016 级博士生。

在当代民族国家的定义中,民族通常被视作一个政治意义的概念,更多具有政治、经济及文化层面的含义,而并非仅指人种学意义上的民族。从理论上讲,纯粹的民族国家应该是由单一民族建立的国家,但现实情况下,民族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往往并不吻合,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通常包含了众多人种学意义上的民族。由于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与人种学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这也成为多民族国家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必要性所在。

民族认同是民族在共同地域、生活、语言、风俗、宗教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自我特征的认同,具体表现为对所属民族的归属感、情感依赖、责任感和自豪感^①。民族认同使长久生活在同一种民族文化中的成员产生归属感,形成了对内具有内聚性和对外具有排他性的族群意识。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②。国家认同是维系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纽带,其核心是将一国领土内的各民族归属于整体性的国家之内,使各民族认同自己是该国家的一员。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是一种建构在全体公民基础上的整体性统一认同,而民族认同则是一种局限于单一族群的排他性认同,尽管它有利于增进族群的凝聚力及培养族群的自主意识,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构建整体性的国家认同。在当代多民族和多族群国家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矛盾是影响国内民族和睦及社会团结的关键因素。在族群意识失调的多民族和多族群国家内部,由于作为国家主体的民族和作为非主体民族的各个族群之间倾向于产生不同水平的认同,各族群间容易出现利益冲突,不利于整体性国家认同的建构。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在哈萨克斯坦有着深刻的背景和鲜明的体现,其中俄罗斯族的族群意识是哈萨克斯坦调控国内族际关系的重点。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在哈萨克斯坦的产生和发展,与哈国内的民族人口构成有

① 徐黎丽:“论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以中国为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② 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着紧密的联系。作为国家命名民族的哈萨克族与最大的非主体民族俄罗斯族的人口构成的历史和现状，为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在哈萨克斯坦的兴盛提供了土壤，也成为独立以来哈政府着手构建统一国家认同的基本出发点。

一、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在哈萨克斯坦产生的背景

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在哈萨克斯坦的产生和发展，与俄罗斯族人口在哈萨克斯坦的变迁密不可分。作为沙俄在中亚地区扩张的前哨，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受俄罗斯影响最早和最深的国家。哈国内俄罗斯族人口的变迁，与俄罗斯在哈的扩张史密切相关。自 18 世纪起，伴随着沙俄军事扩张和苏联时期开发中亚，大批俄罗斯族人开始迁入哈萨克斯坦。俄族人口数量最多时，一度曾超过土著民族哈萨克族的人口，从根本上改变了哈境内的民族人口构成。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由于哈政府推行主体民族优先政策，主体民族哈萨克族与哈境内俄罗斯族的人口变化均十分明显。哈国内民族人口构成较苏联解体前相比，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哈萨克斯坦国内哈族和俄族人口构成的历史及现状，是哈国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发展的重要背景和基础。

（一）苏联解体前哈萨克斯坦民族人口构成的发展历史

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人口构成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发展阶段。在 18 世纪沙俄向哈萨克草原扩张之前，现今哈萨克境内生活的民族主要是土著民族哈萨克族。从 19 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沙俄在哈萨克的影响不断深入，哈萨克斯坦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民族人口结构变动。沙俄和苏联时期，以俄罗斯族为代表的斯拉夫民族大规模迁入该地区，导致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哈萨克斯坦境内第一次民族人口结构变动，出现在沙俄政府在哈萨克斯坦确立殖民统治，到苏联政府在中亚开展民族识别及地理划界期间。伴随着沙俄军队不断在哈扩张，大批军人及其家属、哥萨克以及俄罗斯欧洲地区的农民，跟随沙俄军队开始迁入哈萨克草原。1881 年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农

村居民向吉尔吉斯草原迁移的暂行规定》^①，对向哈萨克移民实施扶持政策。1906年斯托雷平上台执政后推行的土地改革，使大批俄国欧洲部分的农民被迫迁移到哈萨克斯坦。随着斯拉夫人大量迁徙到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非哈萨克族人口急剧增加。这次迁徙对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人口构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民族成分，都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次民族人口结构变动，出现在苏联政府在中亚进行民族识别及地理划界到卫国战争爆发之前。苏联工业化时期，哈萨克斯坦被确定为重点开发地区，来自全苏各地的建设者大量进入哈萨克斯坦，其中主要是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等斯拉夫民族。而同期由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集体化和大饥荒等原因，哈萨克族人口大量流失，在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比重急剧下降。苏联1939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是年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人口已被俄罗斯族人口超越。^②此后，俄罗斯族人口占多数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前夕。

第三次民族人口结构变动，出现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方面，为了在战争中保存国民经济的有生力量，苏联政府将欧洲部分的大批企业迁往后方，其中哈萨克斯坦是主要迁入地。大量俄罗斯族的工人、技术人员随企业迁入哈萨克斯坦。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将一大批包括日耳曼族、朝鲜族、鞑靼族、土耳其族、车臣族在内的所谓被惩罚民族，迁入哈萨克斯坦接受劳动改造。此次人口迁移，不仅继续巩固了俄罗斯族人口在哈萨克斯坦的多数地位，同时丰富了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成分，为今后哈萨克斯坦国内多民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第四次民族人口结构变动，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对中亚实施垦荒运动时期。二战后，苏联为了生产建设的需要，在中亚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开荒种地运动。哈萨克斯坦是当时政府确定的重点地区。大批俄罗斯族移民在政府号召下迁入哈萨克斯坦。60年代后，大规模的人口迁入才基本

① 李发元：“哈萨克斯坦的民族结构与语言状况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5期。

②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9 года. <http://demoscope.ru/weekly/pril.php>

停止。此后，得益于哈萨克族人口的高出生率，哈族人口比重开始平稳上升。1959 年哈族人口所占比例仅为 30.0%，到 1970 年为 32.4%，1979 年达到 36.0%。到 1989 年时已达 39.7%，超过俄罗斯族人口，重新成为哈萨克境内的第一大民族。

根据沙俄 1897 年全国人口普查和苏联时期历次全苏人口普查的结果，可整理出哈萨克斯坦境内哈萨克族和俄罗斯族的人口构成变化表，表中清楚反映了上述四次民族人口结构变动。

表 1 哈萨克斯坦境内民族人口构成变化表^①（1897-1989），万人

民族	1897		1926		1939		1959		1970		1979		1989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哈萨克族	339	81.8%	363	58.5%	233	37.8%	279	30.0%	416	32.4%	529	36.0%	653	39.7%
俄罗斯族	45	11.0%	128	20.6%	246	40.0%	397	42.7%	545	42.4%	599	40.8%	623	37.8%
其他	30	7.2%	130	20.9%	136	22.2%	254	27.3%	324	25.2%	340	23.2%	370	22.5%
总计	415		620		615		931		1285		1468		1646	

资料来源：1897 年数据：Об истории переписей населени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http://textarchive.ru/c-2118941.html>; 1926-1989 年数据来自各年份全苏人口普查数据：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http://demoscope.ru/weekly/pril.php>

（二）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民族人口构成的变化

随着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为巩固国家主权，新独立国家大多将重建和复兴主体民族意识作为核心原则，采取措施强化主体民族地位，其中增加主体民族人口数量成为巩固政权的优先发展方向。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相比，哈萨克斯坦在国内民族人口构成方面的压力尤为巨大（见表 2）。

^① 由于统计偏差，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 1999 年人口普查结果中公布的 1970、1979、1989 年哈人口数据，与苏联公布的相应年份全苏人口普查数据有一定出入。例如，在哈统计局数据中，1970 年人口数量为总人口 13026274，其中哈族人口 4228367（32.5%），俄族 5542929（42.6%）；1979 年为总人口 14709508，其中哈族 5282481（35.9%），俄族 6019391（40.9%）；1989 年为总人口 16222324，其中哈族 6486029（40.0%），俄族 6092377（37.6%）。为避免歧义，本文中苏联时期的人口数据，均采用苏联官方公布的全苏人口普查数据。

表2 苏联解体前夕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人口构成表

(基于1989年全苏人口普查数据)

加盟共和国	总人口	主体民族		俄罗斯族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哈萨克	16464464	6534616	39.7%	6227549	37.8%
乌兹别克	19810077	14142475	71.4%	1653478	8.3%
吉尔吉斯	4257755	2229663	52.4%	916558	21.5%
塔吉克	5092603	3172420	62.3%	388481	7.6%
土库曼	3522717	2536606	72.0%	333892	9.5%
乌克兰	51452034	37419053	72.7%	11355582	22.1%
白俄罗斯	10151806	7904623	77.9%	1342099	13.2%
格鲁吉亚	5400841	3787393	70.1%	341172	6.3%
阿塞拜疆	7021178	5804980	82.7%	392304	5.6%
亚美尼亚	3304776	3083616	93.3%	51555	1.6%
摩尔达维亚	4335360	2794749	64.5%	562069	13.0%
立陶宛	3674802	2924251	79.6%	344455	9.4%
拉脱维亚	2666567	1387757	52.0%	905515	40.0%
爱沙尼亚	1565662	963281	61.5%	474834	30.3%

资料来源：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республикам СССР. http://demoscope.ru/weekly/ssp/sng_nac_89.php

如前所述,伴随着 19 世纪沙俄向哈萨克的扩张和 20 世纪苏联对中亚地区的开发,哈萨克境内的俄罗斯族人口数量显著增加,从最初仅占微弱比例的外来民族,逐渐发展成为哈境内的第一大非主体民族,人口数量甚至曾一度超过土著民族哈萨克族。根据 1989 年苏联解体前最后一次全苏人口普查结果,俄罗斯族人口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前达到 623 万人,占比 37.8%,哈萨克族人口数量为 653 万人,占比 39.7%,仅略多于俄罗斯族人,远未达到人口总数的一半。从人口学角度看,将哈萨克族称为主体民族甚至有些名不副实。因此,独立后哈萨克斯坦政府将增加哈萨克族人口比例作为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一方面,鼓励国内哈萨克族家庭多生多育;另一方面,号召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哈萨克族人回归“历史祖国”,并为从国外回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人提供住房、土地和贷款等优惠条件。这一政策很快在周边国家的哈萨克族居民中产生巨大反响。哈萨克斯坦卫生和社会发展部 2016 年 2 月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自 1991 年至 2016 年 1 月 1 日,在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 25 年间,共有约 95.78 万境外哈萨克人迁入哈萨克斯坦,占哈萨克斯

坦全国人口总数的 5.5%，其中由乌兹别克斯坦迁入的占 61.6%，另有 14.2% 来自中国，9.2% 来自蒙古国，6.8% 来自土库曼斯坦，4.6% 来自俄罗斯^①。境外哈萨克族人纷纷迁入哈萨克斯坦，提高了哈族的人口数量和比例。

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受国家推行主体民族优先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大批俄罗斯人、德国人和乌克兰人等欧洲民族人口选择迁离，其中俄罗斯族人的外迁占了绝大部分。1989–1999 年，俄罗斯族人由 623 万减少到 448 万，在哈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由 37.4% 下降到 30%。1999–2009 年，俄罗斯族人进一步减少到 379 万，在哈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也下降到 23.7%。其他民族人口的数量也有了很大规模的下降。1989–2009 年间，德意志人从 95 万减少到 18 万，乌克兰人从 88 万减少到 33 万，白俄罗斯人从 17.8 万减少到 6.6 万，波兰人从 5.9 万减少到 3.4 万，分别减少了 81.16%、62.08%、62.72% 和 42.59%^②。

由此，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人口结构自独立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得益于哈政府采取的刺激哈萨克族人口增长的有效措施，加上俄罗斯族、德意志族、乌克兰族等少数民族居民在独立后大量外迁，哈萨克族在人口构成中的比例大幅上升。1997 年，哈萨克族人口数量首次达到全国人口数量的半数以上，为 50.6%。1999 年，哈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比例为 53.5%，2009 年全国人口普查时，这一比例已上升到 63.1%。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哈萨克斯坦国内总人口为 1767 万人，其中哈萨克族 1175 万人，占比 66.5%；俄罗斯族 364 万人，占比 20.6%。哈萨克族人口全面超过俄罗斯族，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民族（见表 3）。

① За 25 лет в Казахстан прибыло более 957 тыс оралманов – МЗСР РК. 09.02.2016. https://primeminister.kz/ru/news/sotsialnaya_politika/za-25-let-v-kazahstan-pribylo-bolee-957-tys-oralmannov-mzsr-rk.

② 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 2009 年人口普查数据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2009 года. 05.07.2017. http://stat.gov.kz/faces/wcnav_externalId/p_perepis?_adf.ctrl-state=9gybpd2j_52&_afLoop=4294869031125981

表3 独立后哈萨克斯坦民族人口构成表（1989-2016），万人

民族	1989年		1999年		2009年		2016年1月1日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哈萨克	653	39.7	801	53.5	1009	63.1	1175	66.5
俄罗斯	623	37.8	448	29.9	379	23.7	364	20.6
其他	370	22.5	249	16.6	212	13.2	228	12.9
总计	1646		1498		1601		1767	

资料来源：1989年数据来自1989年全苏人口普查数据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ода. <http://demoscope.ru/weekly/pril.php>; 1999、2009及2016年数据来自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http://stat.gov.kz/>;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по областям, городам и районам на 1 января 2016 год. <http://www.stat.gov.kz/>

（三）当前哈萨克斯坦国内民族人口构成的分布特点

哈萨克斯坦国内民族人口构成有着鲜明的地理分布特点（见表4）。哈萨克斯坦目前共有14个州及2个直辖市，按照地理及经济特点划分，哈全国通常分为五个区域：西部、北部、中部、东部和南部。根据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1日的统计数据，从民族人口分布上看，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占比最高的5个州分别是克孜勒奥尔达州（95.98%）、阿特劳州（92.12%）、曼吉斯套州（90.26%）、阿克纠宾斯克州（81.68%）和西哈萨克斯坦州（75.16%）。独立之初，哈西部和南部就是哈萨克人传统意义上的聚居区。而哈境内的俄罗斯族人，主要集中在与俄罗斯联邦接壤的哈萨克斯坦东部和北部地区。俄族人占比最高的5个州分别是：北哈萨克斯坦州（49.76%）、科斯塔奈州（41.58%）、东哈萨克斯坦州（37.11%）、卡拉干达州（36.52%）和巴甫洛达尔州（36.49%）。从沙俄时期开始，随着领土扩张由北向南逐渐推进，沙俄陆续在今天哈俄两国交界地区建立起乌拉尔斯克、古里耶夫、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和卡缅诺戈尔斯克等军事要塞。自俄国迁入的俄罗斯族人，便主要聚居在这些地区。苏联解体之初，哈萨克斯坦北部、东部及中部各州的俄罗斯族人比例，几乎都大幅高于哈萨克族。独立之后，随着俄罗斯族人的大量迁离，加上哈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平衡哈俄两族人口比例的措施，包括通过迁都带动国内哈萨克族人北迁，将回归的境外哈萨克人安置在哈北部地区，将哈族人占多数的州并入俄族人占多数的州等，哈北部和东部的哈族人数量和占比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表 4 哈萨克斯坦各州哈萨克族及俄罗斯族人口分布表（单位：%）

哈萨克斯坦各州		1989		1999		2009		2016年1月1日	
		哈萨克族占比	俄罗斯族占比	哈萨克族占比	俄罗斯族占比	哈萨克族占比	俄罗斯族占比	哈萨克族占比	俄罗斯族占比
哈国北部	科斯塔奈州	22.86	43.73	30.93	42.27	35.61	40.85	39.71	41.58
	巴甫洛达尔州	28.49	45.38	38.65	41.88	45.72	38.56	50.87	36.49
	北哈萨克斯坦州	18.61	62.08	29.57	49.79	33.71	48.35	34.62	49.76
	阿克莫拉州	22.42	44.66	37.49	39.40	44.60	35.78	50.40	33.58
	科克舍套州	28.89	39.54	(1997年并入阿克莫拉州和北哈萨克斯坦州)					
哈国东部	东哈萨克斯坦州	27.24	65.92	48.54	45.38	53.91	41.04	59.37	37.11
	塞米巴拉金斯克州	51.86	36.02	(1997年并入东哈萨克斯坦州)					
哈国中部	卡拉干达州	17.20	52.21	37.55	43.57	44.14	39.56	50.35	36.52
	杰兹卡兹甘州	46.07	34.90	(1997年并入卡拉干达州)					
哈国西部	阿克纠宾斯克州	55.58	23.65	70.66	16.76	77.96	12.76	81.68	12.09
	阿特劳州	79.82	14.99	88.96	8.63	91.32	6.51	92.12	5.67
	西哈萨克斯坦州	55.78	34.39	64.69	28.21	70.94	22.84	75.16	20.23
	曼吉斯套州	50.90	32.94	78.70	14.82	86.04	8.97	90.26	6.10
哈国南部	阿拉木图州	41.62	30.10	59.42	21.81	64.20	17.71	70.71	14.33
	塔尔迪库尔干州	50.34	32.86	(1997年并入阿拉木图州)					
	江布尔州	48.84	26.52	64.76	18.13	69.00	13.89	72.55	10.28
	克孜勒奥尔达州	79.38	13.34	94.20	2.88	95.78	1.91	95.98	1.98
	南哈萨克斯坦州	55.67	15.31	67.78	8.19	70.11	6.12	72.93	4.60
	阿斯塔纳市	17.71	54.10	41.83	40.55	63.41	25.18	75.51	15.31
	阿拉木图市	22.48	59.15	38.46	45.19	50.11	33.98	58.19	27.49

资料来源：同表 3。

不过，目前俄罗斯族人在哈北部及东部地区的影响依然很大。北哈萨克斯坦州和科斯塔奈州的俄族人比例仍然高于哈族人，且在两州的首府俄族人口均大幅多于哈族人。北哈州首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俄哈两族人口占比为 61.91%：27.60%；科州首府科斯坦奈市为 45.05%：37.50%。由于俄族人基本聚居在大城市，因此尽管从全州人口比例上看，部分州的哈族人占比已远超俄族人，然而在这些州的首府人口中，俄族人数依然领先或持平于哈族人口，例如东哈萨克斯坦州的俄哈两族人口占比为 37.11%：59.37%，而该州首府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市的俄族人占比则高达 55.92%，哈族人仅占 40.51%。巴甫洛达尔州俄哈两族人口占比为 36.49%：50.87%，州府巴甫洛达尔市则为 44.54%：43.63%。卡拉干达州俄哈两族人口占比为 36.52%：

50.35%，而州府卡拉干达市为 41.59%：43.49%^①。

(四) 哈萨克斯坦国内语言使用的历史及现状

语言使用情况是分析民族人口结构时的重要参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民族人口构成情况。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特征，该民族所操语言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变化，与其族群意识的演变有着很大的联系。哈萨克语和俄语作为哈萨克斯坦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两大语言，其使用情况的历史及现状也成为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在哈失调的重要背景之一。

表5 1989年哈萨克斯坦主要族群掌握母语、哈萨克语和俄语基本情况（%）

民族	母语			除母语外，熟练掌握第二语言情况	
	本民族语	哈语	俄语	哈语	俄语
哈萨克族	98.57	-	1.36	-	62.84
俄罗斯族	99.94	0.01	-	0.86	-
德意志族	54.40	0.07	45.39	0.64	50.59
乌克兰族	36.62	0.02	63.26	0.58	32.31
乌兹别克族	95.57	1.28	2.77	4.61	52.15
鞑靼族	68.94	3.43	27.33	3.22	64.32
维吾尔族	95.07	1.51	3.07	9.11	62.05
白俄罗斯族	34.48	0.03	65.29	0.40	31.77
朝鲜族	51.71	0.15	48.01	0.97	46.97
阿塞拜疆族	87.10	0.53	10.43	5.69	64.73

资料来源：1989年全苏人口普查数据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по наиболее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ям и языку. http://demoscope.ru/weekly/ssp/sng_nac_lan_89_ka.php

哈萨克语作为哈主体民族哈萨克族的民族土著语言，在俄罗斯族人口大规模向哈迁徙前，一直在哈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从沙俄时期起，随着俄罗斯在哈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俄语逐渐在哈萨克斯坦得以推广。苏联解体前夕，俄语不仅在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

① 上述人口数据均来自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 2016 年 1 月 1 日统计数据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по областям, городам и районам на 1 января 2016 год.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05.07.2017. <http://www.stat.gov.kz/>

在各民族的族际交往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哈境内不仅生活着与主体民族数量相当的俄罗斯族人，而且 60%以上的哈萨克族人能够熟练掌握俄语，部分哈萨克族人甚至已将俄语视为母语。此外，当地的非俄罗斯族居民，也大多视俄语为母语或熟练掌握俄语（见表 5）。

由此可见，受沙俄及苏联时期推广俄语政策的影响，俄语在哈萨克斯坦的普及程度相当高，基本所有人都能熟练使用俄语。相比之下，哈国内除哈萨克族以外，绝大部分民族人口都难以熟练使用哈语。在此情况下，居民缺乏学习哈语的动力，普及哈语困难重重。但为了巩固主权独立、提高主体民族自豪感以及复兴主体民族意识，哈国家又必须大力推广哈语。为此，独立之后，哈萨克斯坦尤为重视哈语发展。哈政府在 1993 年通过的宪法中确定哈语为国语，俄语为族际交流语言，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哈语的优先地位。1996 年 11 月 16 日，哈萨克斯坦发表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政策构想》，要求国家优先发展国语，以行政手段推广哈萨克语，在一切正式场合都要使用国语，国家对国语和其他语言的政策要有区别^①。

在国家不断出台措施强化哈语国语地位的影响下，俄语在哈萨克斯坦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了较明显的影响，尤其在易受国家语言政策影响的行政事务、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领域。在行政事务领域，2006 年 5 月 30 日，哈总统颁布第 127 号总统令，规定在遵守 1995 年宪法中俄语地位的同时，所有国家机关的公文、统计核算、财务和技术文件等，必须在 2010 年前逐渐改为使用国语。同时，在国际条约和协议、机关文书、官员发言、教育和科研等活动中，逐渐推广应用哈语。^②在学校教育领域，以俄语为媒介语言授课的学校不断减少，与此同时，哈语授课的学校不断增加。例如，在中小学学校里，2000 年以哈萨克语作为授课语言的学校为 3545 所，以俄语作为授课语言的学校为 2356 所；到了 2003 年，这一数据分别为 3636 所和 2122 所。

①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4 ноября 1996 года № 3186 «О Концепции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Счет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исполнением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го бюджета. 22.08.2017. <http://www.esep.kz/rus/showin/article/1836>.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30 мая 2006 года № 127 «О внесении дополнений в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7 февраля 2001 года № 550». 05.07.2017. <http://www.zakon.kz/72542-ukaz-prezidenta-respubliki-kazakhstan.html>

短短的几年时间，以俄语为媒介语言授课的学校就减少了 234 所。在大众传媒领域，哈萨克斯坦于 2001 年 3 月通过了《大众传媒法》，规定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的电子媒体用哈萨克语言的播出时间最低限度必须达到 50%。在此背景下，截至 2008 年，用俄语播出的电台与电视节目仅占 34%，而哈萨克语节目则占了更大的比例。^①

尽管自哈独立以来国家一直推行扶持国语的政策，各民族掌握哈语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俄语实际上依然是哈萨克斯坦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 2009 年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见表 6），除了哈萨克族和同属突厥语族的乌兹别克族的哈萨克语熟练程度超过俄语之外，其他主要民族的俄语熟练程度均超过哈萨克语，俄语在哈萨克斯坦的优势地位仍难以被哈语所取代。

表6 2009年哈萨克斯坦主要族群掌握哈语及俄语情况（%）

民族	哈语			俄语		
	听懂口语	其中		听懂口语	其中	
		流利阅读	其中 流利书写		流利阅读	其中 流利书写
全国	74.0	64.8	62.0	94.4	88.2	84.8
哈萨克族	98.3	95.4	93.2	92.0	83.5	79.1
俄罗斯族	25.3	8.8	6.3	98.4	97.7	96.7
乌兹别克族	95.5	74.2	61.7	92.9	78.6	68.3
乌克兰族	21.5	7.2	5.2	98.9	98.0	97.1
维吾尔族	93.7	70.5	60.8	95.8	88.2	81.8
鞑靼族	72.6	40.0	33.7	98.4	96.4	94.7
德意志族	24.7	10.5	7.9	99.0	97.8	96.9
朝鲜族	43.4	14.1	10.5	98.0	96.9	95.5
土耳其族	91.0	51.3	43.4	96.1	87.8	83.6
阿塞拜疆族	81.2	49.5	43.2	96.9	89.4	85.4
白俄罗斯族	19.0	6.7	4.8	98.9	97.8	97.0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2009年统计数据 Население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и степени владения языками.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2009 года.
http://stat.gov.kz/faces/wcnav_externalId/p_perepis?_adf.ctrl-state=9gybpds2j_52&_afriLoop=4294033816802195

① 刘宏宇：“建国后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变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二、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在哈萨克斯坦的具体表现

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政府基于巩固主权独立的目的，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保障主体民族权益的民族政策。由于未充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民族人口构成和语言使用状况，国内哈萨克和俄罗斯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一度曾陷入微妙局面。俄罗斯族人不甘被“边缘化”，在双重国籍、俄语地位和民族权利等问题上，与主体民族关系紧张。哈境内俄罗斯族的族群意识失调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部分俄罗斯族人成立了维护族群利益的团体，向哈政府提出政治要求，希望成立俄罗斯族人的民族自治实体，或者在哈国内实行联邦制，甚至要求将哈北部和东部地区并入俄联邦。

根据政治目的和态度取向，哈国内的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失调的具体表现，大致可以划分为旨在争取族群利益、捍卫民族权利的温和民族主义，和谋求主权及领土独立的极端分离主义这样几种表现。

（一）哈国内俄罗斯族的温和民族主义

哈国内俄罗斯族温和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俄族人成立的旨在捍卫俄语群体语言文化权利的社会组织，其代表是1992年9月建立的“哈萨克斯坦社会斯拉夫运动（拉德）（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е слав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Лад»）”。该组织目前共有约5万名成员，在哈全国设有24个分部。其主要目标是向哈政府争取双重国籍，以及俄语第二国语地位等要求。^①虽然在哈独立初期，该组织也曾提出在哈北部和东部设立自由经济区、实施联邦制等政治诉求，但基本上只是追求行政自治，并未谋求实质意义上的分离主义。类似性质的组织还包括：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人社团（Русская община Казахстана）、哈萨克斯坦俄语中学教师协会（Ассоциация учителей русских школ Казахстана）、斯拉夫文化-教育协会《起源》（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Славянское культурно-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стоки»）和斯拉夫文化中心（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Славянский культурный центр»）

^①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е слав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ЛАД». 05.07.2017. <http://www.arvedi.kz/lad.html>.

等。^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哈萨克斯坦对独立之初推行的主体民族优先政策进行了调整，从国内民族人口的现实情况出发，更多考虑了境内俄罗斯族和俄语群体的诉求。哈国内民族关系得到了有效改善，俄罗斯族的不满情绪有所缓和。“拉德”等组织开始更多地将活动目标放在保障俄语地位和民族权利平等上，对于建立民族自治实体和实施联邦制等政治诉求明显平息。

（二）哈国内俄罗斯族的分离主义

如果说俄罗斯族的温和型民族主义，仅限于以政治运动的形式谋求政治权利，尚不足以对哈萨克斯坦主权及领土安全造成威胁，哈国内的俄罗斯族分离主义势力，则一直以来都是哈政府警惕和打击的对象。哈国内的俄罗斯族分离主义势力具体表现为，以哈境内哥萨克组织为代表的分离组织，他们不仅要求维护俄语群体的平等地位，而且将最终目标设定为谋求哈北部和东部地区独立及并入俄联邦。与“拉德”组织相比，哈境内的哥萨克组织带有浓厚的分离主义色彩，而且与俄罗斯境内的哥萨克组织联系紧密，因此自成立以来一直为哈政府所警惕。

哥萨克人是旧俄时代特殊的军人阶层。沙俄政府扩张中亚时，哥萨克人就曾经发挥重要作用。苏联解体后，俄政府放宽了对哥萨克人的政策，鼓励恢复哥萨克传统，由此，哥萨克组织开始在俄罗斯活跃起来，并带动了哈萨克斯坦境内哥萨克组织的复兴。哈境内的哥萨克主要分为乌拉尔哥萨克、奥伦堡哥萨克、西伯利亚哥萨克和七河地区哥萨克四个分支。他们成立了“乌拉尔哥萨克联盟”、“支持七河地区哥萨克协会”和“高尔基哥萨克联盟”等哥萨克组织，^②并与边界另一边的俄联邦哥萨克人相呼应，成为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族分离主义因素。哈萨克斯坦的哥萨克运动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高潮。他们不承认哈俄两国间的现行边界，认为在 1917 年以前哈萨克斯坦北部都是俄国的领土。1990 年 2 月 24 日，哈萨克斯坦乌拉尔州（今

①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ов за рубежом. 05.07.2017. <http://www.materik.ru/nationals/database/migrants/index.php?country=105>.

② 周明：“乌克兰危机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评估”，《国际论坛》，2015 年第 2 期。

西哈萨克斯坦州)的哥萨克人举行了“乌拉尔哥萨克人历史文化协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乌拉尔哥萨克人自治,变更苏联哈萨克共和国边界线,恢复1917年以前领土区划的宣言》。自此,乌拉尔哥萨克人要求自治的呼声日益高涨。1991年9月13-15日,乌拉尔哥萨克历史文化协会与俄罗斯哥萨克协会共同组织了庆祝乌拉尔哥萨克效力俄国400周年大会,期间发生了俄罗斯族居民与当地哈萨克族人之间的冲突。这次冲突之后,乌拉尔的哥萨克人仍不断提出争取本民族平等地位的要求,并于9月22日成立了乌拉尔哥萨克人的“民族复兴运动。”^①1994年11月,七河地区哥萨克举行集会,要求与俄罗斯合并,并于1995年1月在阿拉木图举行非法集会和游行。哈政府最终采取措施停止“支持七河地区哥萨克协会”的活动,并逮捕其首领贡金(Николай Гунькин)。^②1996年春,西伯利亚哥萨克科克舍套分部的首领尤里·安托什科(Юрий Антошко)和维克多·安托什科(Виктор Антошко),预谋在科克舍套州举行叛乱,并成立类似德左共和国和阿布哈兹那样的国家。^③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哥萨克人组织化、跨国化、武装化和军事化,已发展为哈境内主要的俄罗斯族分离主义势力,成为哈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棘手问题。

在哈政府的严厉打击下,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哈境内哥萨克组织为代表的俄罗斯族分离主义势力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不过,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导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哈萨克斯坦国内对于俄罗斯族分离主义的担忧有所上升。在此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对国内的俄罗斯族分离主义势力加强了警惕,通过完善立法,加大了对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打击力度。2014年,哈政府对刑法中关于分离主义活动的条款进行了修订,规定从2015年起,从事分离主义活动的量刑由之前的处罚金或五年以下监禁修改为最高可判七年监禁。同时,补充规定,哈公民参与外国武装冲突将被判处三至七年监

① 李琪:《历史记忆与现实测观:中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33页。

② Русск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 заложники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22.08.2014.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s/8225>

③ Аресты русских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03.11.1999. <http://litresp.ru/chitat/ru/3/zavtra-gazeta-gazeta/gazeta-zavtra-313-48-1999/5>

禁。^①

总体而言，由于哈政府近年来采取了务实主义的民族政策，有策略地放缓了主体民族优先政策的推进力度，同时适当兼顾国内俄罗斯族和俄语群体的诉求，使国内的俄罗斯族族群意识总体处于可控范围。目前看来，哈国内的俄罗斯族族群意识仍以温和型为主，主要倾向于以政治运动的形式争取族群利益，更多将活动目标放在保障俄语地位和民族权利平等上，连独立初期关于建立民族自治实体和实施联邦制的民族自治运动如今也已难成规模。通常而言，民族自治主义是分离主义的先声，一旦自治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则很容易演变为分离主义。哈国内的俄罗斯族群中尽管也存在极端性质的分离主义势力，但在当前哈国内民族关系较为缓和的背景下，由于缺乏民族自治主义为其提供舆论基础和人员准备，预计难以对哈主权和领土安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三、哈萨克斯坦调控国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的具体经验

哈萨克斯坦作为后苏联空间内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多民族和多族群国家，独立以来基本维持了和谐的族际关系和稳定的社会局势，成为苏联解体后各原加盟共和国中为数不多的未发生大规模族际冲突的国家。当前哈萨克斯坦的国内民族关系总体和睦，稳定可控的族际关系成为哈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哈萨克斯坦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也为哈萨克斯坦国际地位的提升增加了分量。为此，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不无骄傲地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和平共处的典范，哈萨克斯坦的经验完全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借鉴的样本”^②。

作为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民族关系领域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哈国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的有效调控成为哈政府构建和谐族际关系的基础。哈萨克斯

①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ужесточат наказание за сепаратизм. 08.04.2014. <https://lenta.ru/news/2014/04/08/kazakhstan/>

② Президент Назарбаев: Казахстан — образец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народов. 01.03.2016. <https://eadaaily.com/ru/news/2016/03/01/prezident-nazarbaev-kazahstan-obrazec-mirnogo-sosushchestvovaniya-narodov>

坦调控国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的经验可具体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完善制度建设，构建对话平台

针对独立之初紧张的国内族际关系，哈政府意识到有必要构建有效的族际沟通平台，从国家层面协调族际关系。为此，1992 年在哈萨克斯坦独立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首次提出关于创建各民族大会的理念。1995 年 3 月 1 日，纳扎尔巴耶夫正式批准成立哈萨克斯坦各民族大会（Ассамблеи народов Казахстана，2007 年更名为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 Ассамблея народа Казахстана^①），作为哈总统领导下的咨议机构，负责实施国家民族政策、保障社会政治稳定、提高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在族际关系领域的协作效率。2007 年 5 月，哈萨克斯坦通过宪法修正案，给予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宪法地位，并赋予其选举 9 名议会代表进入哈议会下院（马日利斯）的权利，从而显著提高了该机构的政治地位。2008 年 10 月 20 日，纳扎尔巴耶夫签署《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法》，以国家法的形式，赋予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国家政治体系全权机构的地位。作为协调哈国内民族问题的咨议机构，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由哈总统亲自担任大会主席，大会成员以哈萨克族和俄罗斯族为主，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会，针对民族问题进行探讨，并为国家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提出建议^②。

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自成立以来，为哈萨克斯坦构建和睦的民族关系搭建了有效的族际沟通平台，已成为哈政府巩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宽容和打击极端主义的重要保障。哈萨克斯坦国内的族际和睦、宗教宽容和社会团结，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的作用。鉴于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在保障民族和睦领域的贡献，2015 年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哈政府宣布该年为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年^③。

（二）强化国家认同，淡化族群认同

① 另译作“哈萨克斯坦民族和睦大会”。

② Ассамблея народа Казахстана.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22.08.2017. http://www.akorda.kz/ru/national_projects/assambleya-naroda-kazahstana.

③ Там же.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中,构建整体性的国家认同是调控国内族群意识的有效途径。相反,倘若过分强调排他性的族群认同,则很有可能激发国内民族矛盾,滋生不利于族际和睦的民族主义情绪。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国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失调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于哈政府当时未考虑民族人口国情而推行的民族政策。

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出于巩固主权的目,为改变主体民族哈萨克族在民族人口构成中的不利地位,将复兴主体民族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原则,全方位确立主体民族优先原则,在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大力推行主体民族优先政策。首先,以法律形式将主体民族在本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确定下来。哈萨克斯坦于1993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就体现了强烈的主体民族自主意识。其中规定,哈萨克斯坦是“自决的哈萨克族的国家组织形式”,从根本上确立了哈萨克族的核心地位;其次,在国家权力和资源分配上优先考虑主体民族。在国家立法、执法及各重要部门中,主要安排主体民族干部,在军队、内务、安全、外交等强力部门中,主体民族占比普遍更高;再次,出台多种措施增加主体民族人口数量,扩大哈萨克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最后,从社会生活和语言文化等多方面实施有利于主体民族的措施。在国家推行主体民族优先政策的影响下,政府要求在政治、科学、文化和生活以及其他领域充分使用国语哈萨克语,在国家和地方机关公务人员的录用、提升方面优先考虑哈萨克族人,并将是否会哈语作为重要条件之一;在高等院校、专业学校的招生方面,向哈萨克族人倾斜^①。

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政府推行的主体民族优先政策,一方面造成哈国内大量俄罗斯族人口外迁,使国家面临人才流失的困境;另一方面导致哈国内族际关系失调和哈俄两国关系紧张,对哈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在总结独立初期国内民族关系紧张的经验教训后,哈萨克斯坦在处理国内俄罗斯族的族群问题时,逐渐主张以整体性的哈萨克斯坦公民意识来淡化单一性的族群认同,塑造统一的“哈萨克斯坦人民”概念,培养不同民族的公民对统一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的整体认同。正如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① 包胜利:“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创建”之间的悖论——论哈萨克斯坦族际政治的困境”,《世界民族》,2006年第4期。

所言,“塑造新的哈萨克斯坦公民已经成为关系我们国家基础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之一。我们正在向政治统一、公民团结的方向努力。而且哈萨克斯坦民族并不是以什么新的民族联合体形式出现,而必须以多民族公民联合体的形式出现。我们所说的民族统一,指的不仅仅是哈萨克一个民族的统一,而是整个哈萨克斯坦民族的统一,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命运相同,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要点”^①。为此,哈萨克斯坦从多角度入手,构建多民族统一的哈萨克斯坦公民身份认同。首先,哈政府从法律层面入手,在全体公民中树立统一的国家认同。1995年宪法删除了1992年宪法中关于“哈萨克斯坦是自决的哈萨克族国家”的表述,从宪法角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其次,在实际操作层面,采取多种途径塑造整体性的国家认同,构建统一的公民意识。例如,2007年纳扎尔巴耶夫颁布总统令,将“哈萨克斯坦各民族大会”更名为“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通过强调统一的“哈萨克斯坦人民”概念,弱化个体性的“各民族”认同。此外,2016年1月14日,纳扎尔巴耶夫颁布总统令,宣布从2016年起,将每年的3月1日定为“感恩日(День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庆祝活动,用于纪念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成立,以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②。近年来在哈政府的积极推进下,哈国内构建整体性国家认同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根据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2016年年度报告的数据,97.6%的受访者认同自己是哈萨克斯坦统一民族的代表,98%的受访者以“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的身份为荣^③。

(三) 实施务实的语言政策,缓和国内民族关系

语言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特征,也是维系民族情感的核心纽带之一。在当代多民族和多族群国家中,族群意识的失调,与该民族所操语言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状况有着很大的联系。因此,一国实施的语言政策是否妥当,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该国的族际关系。

① [哈]纳扎尔巴耶夫:《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哈依霞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② День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впервые отмечаетс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01.03.2016. <http://www.kazpravda.kz/news/kultura/den-blagodarnosti-vpervie-otmechaetsya-v-kazahstane/>

③ Отчет Президенту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Н. А. Назарбаеву 2016 года.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Ассамблеи народа Казахстана. 22.08.2017. <http://assembly.kz/ru/otchyoty>.

哈萨克斯坦国内的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失调问题，与哈萨克斯坦实施的语言政策同样紧密相关。哈独立之初，出于巩固主体民族意识的考虑，确立了以国语哈萨克语为绝对中心的语言政策。然而，事实证明，以哈语为绝对中心的语言政策，未充分考虑当时哈国的语言环境，忽视了以俄罗斯族为代表的俄语人口的权利，为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在哈国的膨胀提供了土壤，影响了哈国内的民族和睦和社会稳定。为此，哈政府开始从国内的民族人口结构和语言使用现状出发，对语言政策进行了适度调整。1995年宪法提高了俄语的地位，其中第七章规定：“哈萨克语是哈萨克斯坦的国语。在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构中，俄语与哈萨克语同等正式使用。^①”1997年7月11日，哈议会通过《哈萨克斯坦语言法》，进一步明确了俄语的地位，规定俄语在哈萨克斯坦的各级国家机构和组织中、在各类法律文件和技术标准中以及商业往来活动中，广泛地与哈语同等使用^②。由此可见，俄语尽管未被确立为官方语言，但在哈的地位高于族际交流语言，从功能上看，实际相当于官方语言。针对独立二十余年来哈萨克斯坦国内和国际语言环境的变化，2012年12月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2050》国家发展战略中提出了“三位一体”的语言政策，强调“语言应当成为哈萨克斯坦民族的凝聚力。为此，国家应实施妥善合理的语言政策，确保不损害每位哈萨克斯坦公民的语言权利”^③。

《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在强调哈语作为国家精神支柱的核心地位的同时，还要求促进俄语和英语的推广。哈扎尔巴耶夫尤其对俄语在哈国的意义给予了积极评价：“掌握俄语是哈萨克斯坦民族的历史优势，哈萨克斯坦人民借助俄语获取知识、开阔视野、拓展自身的交际圈，因此必须像对待哈语一样，认真对待俄语”^④。

乌克兰冲突爆发后，哈萨克斯坦吸取了乌克兰在语言政策方面的教训。在制定国家语言政策时，尽管哈政府依然将巩固主体民族自主意识作为重要

①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08.22.2017. http://www.akorda.kz/ru/official_documents/constitution.

②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11 июля 1997 года № 151-І «О языках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 22.08.2017. http://online.zakon.kz/Document/?doc_id=1008034#pos=0;0.

③ Стратегия "Казахстан-2050".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22.08.2017. http://www.akorda.kz/ru/official_documents/strategies_and_programs.

④ Там же.

出发点，但在语言政策实施过程中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态度。以国语的拉丁字母拼写改革为例。一方面，独立以来，哈政府一直着手推动哈萨克语的字母拼写由西里尔字母改为拉丁字母。2012年12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发表“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国情咨文时，便要求在2025年前将哈语字母由基里尔字母改回拉丁字母，还要求届时哈语应成为国家生活各个层面的通用和主导语言^①。2017年4月12日，纳扎尔巴耶夫再次重申必须于2025年前完成哈语的文字转换，届时所有哈语的公文、期刊和书籍都应以转换后的拉丁字母进行书写^②；但另一方面，鉴于字母改革的难度及哈国内语言环境的现状，国语的字母改革进展缓慢。与此同时，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拉丁字母改革进程也证明，倘若急于求成推行字母改革，不仅将造成哈语文化遗产和人才培养的断层，也不利于哈语作为国语的进一步普及。从国语字母的拼写改革进程可见，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尽管仍以巩固哈萨克语的国语地位为基本目标，但总体上依然秉承了维持各民族统一、兼顾族群发展诉求的原则。为此，在实施务实性语言政策的原则下，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呼吁哈族民族主义者及哈语支持者，勿将国语问题尖锐化，指出解决语言问题必须有耐心。2014年8月25日，他在接受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采访时强调了上述立场，并指出如果哈萨克斯坦仅允许使用哈语，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③2016年2月16日，纳扎尔巴耶夫下令开除那些拒绝使用俄语与俄语居民交流的官员，并重申哈萨克斯坦是多民族国家，不允许强制要求所有公民必须使用哈语。^④

哈政府在语言政策领域做出的务实调整，从国内民族人口结构和语言使用现状出发，考虑了以俄罗斯族为代表的俄语群体的利益，力争在巩固主体民族意识和保障族际关系和睦层面寻求平衡点，有效缓和了独立初期紧张的

① Власт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объявили, что страна должна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кириллицы. 14 декабря 2012 года. https://www.itv.ru/news/2012-12-14/81575-vlasti_kazahstana_ob_yavili_chno_strana_dolzhna_otkazatsya_ot_kirillitsy

② Назарбаев поручил перевести казахский алфавит на латиницу. 12 апреля 2017 года. <https://ria.ru/world/20170412/1492074155.html>

③ Назарбаев: языковые запреты могут привести Казахстан к судьбе Украины. 25.08.2014. <https://ria.ru/world/20140825/1021371883.html>

④ Назарбаев приказал увольнять отказывающихся отвечать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чиновников. 16.02.2016. <https://lenta.ru/news/2016/02/16/skorovybory/>

族际关系。现阶段哈政府实施的务实性语言政策，成为哈国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整体可控的重要保证。

（四）加强与俄合作，巩固战略互信

跨境民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两个相邻国家间的合作。在调控国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时，哈萨克斯坦政府同样意识到与俄合作的重要性。一方面，哈萨克斯坦国内至今生活着的占全国总人口近 1/5 的俄罗斯族居民和远超此比例的俄语人口，使哈政府在制定国家发展政策时势必考虑该部分人口的利益，保持与俄罗斯的合作是现实选择；另一方面，哈国内俄罗斯族人口族群意识的发展，与俄罗斯处理对哈事务的态度和立场紧密相关，因此，哈俄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是哈政府调控国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的保障。

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一直重视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是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积极倡议者和响应者。哈萨克斯坦在独联体框架内与俄罗斯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加入了俄倡导的包括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内的各类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组织，为巩固双方战略互信搭建了全方位的合作平台。作为拥有漫长边界线和人数众多的跨界民族的邻国，哈俄之间的战略互信有利于双方在涉及主权与领土安全的合作中增信释疑，为两国在处理跨界民族问题时开展合作提供了可靠保障。

在调控国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时，哈政府积极寻求与俄罗斯合作，携手解决跨界民族问题。首先，夯实法律基础，完善制度建设。哈俄通过签署一系列双边条约^①，声明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并于 2005 年 1 月 18 日签署《俄哈边界条约》^②，妥善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此外，两国较为妥善地

① 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25 мая 1992 года, Декларац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азахстан о вечной дружбе и союзничестве,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м в XXI столетие, от 6 июля 1998 года, 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6 июля 1998 года, Протокол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амерений по делимит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12 октября 1998 года.

②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азахстан о российск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е от 18 января 2005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supplement/2165>

解决了苏联解体初期的“双重国籍”问题。根据 1995 年 1 月 20 日双方签署的关于简化双方公民获取对方国籍程序的协议，在一方长期居住的公民移居到另一方时，可以按照本人意愿立即获得另一方的国籍，不再受居住时间的限制^①。至此，困扰双方的跨界民族的双重国籍问题得以最终解决。尽管哈方未同意俄方提出的关于给予哈境内俄罗斯族居民双重国籍的要求，但双方通过妥协，基本搁置了争议。对于哈方而言，该协议的签署有效缓解了独立初期俄罗斯族人口大量外迁的不利局面，为哈国内民族关系稳定提供了保障；其次，加强沟通对话，寻求俄方对哈国内族际关系的理解与支持。哈政府实施的务实性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为哈在建设和睦族际关系领域赢得国际认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俄罗斯的肯定。2012 年 4 月，时任俄罗斯独联体事务、国外同胞和国际人文合作署署长的康斯坦丁·科萨切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сачев）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表示，尽管哈萨克斯坦国内包括俄语地位在内的族际关系问题仍有待改善，但“哈萨克斯坦在多语言、多文化和多宗教信仰共存方面拥有许多积极的经验，这对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而言都是值得借鉴的”^②；再次，在打击极端分离主义势力领域，积极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俄政府基于遵守俄哈双方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对哈方行动给予支持和配合。俄官方一再申明尊重哈主权和领土完整，针对外界尤其是俄国内民族主义者关于俄觊觎哈领土的言论予以明确否认。2017 年 2 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卢茨基（Леонид Слуцкий）在澄清俄杜马议员巴维尔·什别洛夫（Павел Шперов）于同年 1 月 26 日在国家杜马圆桌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哈萨克斯坦领土问题的言论时，驳斥了外界关于俄对哈存在领土要求的揣测，并重申：“俄国家杜

① Статья 1 Согла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20.01.1995 об упрощ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гражданства граждан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бывающими для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прожива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у Казахстан, и гражданам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прибывающими для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прожи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22.08.2017. <http://www.zaki.ru/pagesnew.php?id=1113>.

②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сачев: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ес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которые, как минимум, вызывают вопросы,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лож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1.04.2012. <http://rumol.org/konstantin-kosachev-v-kazaxstane-est-opredelennye-tendencii-kotorye-kak-minimum-vyzyvayut-voprosy-s-tochki-zreniya-polozheniya-russkogo-yazyka-konstantin-kosachev-v-kazaxstane-est-opredelennye-t/>

马从未提出过变更俄哈边界的想法。俄哈作为友好邻邦和亲密伙伴，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紧张关系”。^①此外，针对采取实际行动损害俄哈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原则的俄国内民族主义者，俄官方协助哈方予以打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俄国内持民族主义立场的著名政治人物爱德华·利莫诺夫（Эдуард Лимонов）曾在哈当地哥萨克组织支持下，预谋在哈国科克舍套州发动起义，之后因密谋建立游击队基地以武装进攻哈萨克斯坦，于2001年被俄罗斯武装力量逮捕^②。由此可见，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保持与俄罗斯的良好合作关系，不仅是调控哈境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手段，也是哈国内族际关系和睦及社会局势稳定的重要保证。

四、结论

在当代多民族和多族群国家中，族群意识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其对维护民族的自主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容易造成作为国家主体的民族和作为非主体民族的各个族群之间产生不同水平的认同，从而不利于塑造整体性的国家认同。但从实质上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冲突，个人的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完全可以共存于同一主体。族群认同可以且应该在承认国家认同的范畴内发展，而国家在提倡公民认同的同时，也应充分尊重族群的多元化发展。建设平等、团结、和谐的国内民族和族群关系，是多民族和多族群国家实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重要途径。在民族和族群关系问题上，多民族和多族群国家面临的难题，是如何确保国族属性塑造与民族和族群特性保障之间的平衡。在国家意识的层面，多民族和多族群国家应在保持各民族和族群特性的同时，加强国族建设，逐步协调民族和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将族群意识的诉求置于国族属性和国家认同之下，从源头上消除民族主义尤其是极端民族分离主义的土壤。

基于哈萨克斯坦国内民族人口构成的现实状况，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① Слуцкий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л слухи о пересмотре границ Росс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01.02.2017. <https://ria.ru/politics/20170201/1486947763.html>

② Эдуард Лимонов предложил Кремлю захватить Северный Казахстан. 20.02.2014. http://total.kz/politics/2014/02/20/eduard_limonov_predlozhi_kremlyu

俄罗斯族族群意识的调控仍将是哈萨克斯坦构建统一国家认同需面临的棘手问题。乌克兰危机爆发及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哈国内的主体民族自主意识持续高涨。在此背景下，哈萨克族民族主义者不赞成国家现行的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主张进一步推进主体民族优先政策，要求逐步强化哈语地位以限制俄语影响。鉴于哈萨克斯坦国内至今仍生活着占全国总人口近 1/5 的俄罗斯族居民和远超此比例的俄语人口，这势必将激化哈国内的族际矛盾，刺激俄罗斯族族群意识膨胀，很可能导致俄罗斯族族群意识重回独立初期的失调局面。

当前，哈国政府在调控俄罗斯族族群意识的应对上远非容易：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争端的前车之鉴，使哈不得不在对待国内民族问题时更加慎重，对境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给予足够重视，妥善调控俄罗斯族族群意识，防止类似问题在哈重现；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也向哈证明了继续强化主体民族意识以平衡境内俄罗斯族势力的必要性。针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哈政府已经意识到，在实施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的过程中，应从实用主义原则出发，在强化主体民族自主意识的同时，还需妥善兼顾俄罗斯族人和俄语群体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哈萨克斯坦多民族共存的现实不会改变，在可预见的将来，哈境内仍将生活着数量可观的俄罗斯族人。淡化族群意识，强化国家认同，培养各族人民对哈萨克斯坦国家的公民认同，实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共存，是哈萨克斯坦国内的俄罗斯族族群意识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必要保障。

【Abstract】In contemporary multi-ethnic state, nationalism is undoubtedly a double-edged sword, which is although beneficial to the maintenance of ethnic identity, yet fundamentally, is not conducive to shap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due to different identities of ethnic groups between those as the body and others not. The improper handling of nationalism not only affects the domestic ethnic harmony and social stability, but also becomes a significant constraining factor against national development. For Kazakhstan, a country under the earliest and deepest Russian influences in Central Asia, the evolution of its Russian ethnic

demographic provides fertile soil for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of Russian ethnic group soon after its independence. Thanks to a series of regulation measures of Kazakhstan government, Kazakhstan basically maintains harmonious and stable inter-ethnic relations and accumulate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domestic ethnic Russian nationalism issues, which enables Kazakhstan to become a model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inter-ethnic relations both within the post-Soviet space and worldwide. Considering the status quo of Kazakhstan ethnic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the integrating of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may provide a feasible path for Kazakhstan to solve its domestic ethnic problems.

【Key Words】 Kazakhstan Ethnic Issue, Kazakhstan-Russia Relationship, Russian Ethnic Conscious,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Аннотация】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и многоэтниче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этниче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несомненно является обоюдоострым мечом, который хотя и выгоден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этнической самобытности, но в целом, не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общ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еш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ненадлежащим способом не только негативно сказывается на внутреннем межэтническом согласи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но и становится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 сдерживающим фактором в развитии страны. Находящийся под древнейшим и сильнейшим российским влиянием среди центрoазиатских стран, Казахстан прошёл своеобраз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уть эт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сохраняет специфическую эт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на текущий момент. История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го этнос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благоприятную почву для роста 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После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благодар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м усилиям в принципе сохранились 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и стабильные межэтн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копилс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успешный опыт по разрешению проблем с русским национализмо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Казахстан

становится образцом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разных этнических групп как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так и во всём мире. Учитывая нынешнее состояние этнического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состав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в обозримом будущем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ической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ожет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Казахстану один из приемлемых способов для реш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их этн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знание русской этнической групп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国农业、工业经济

俄罗斯区域农业经济空间异质性研究

曲昊月 肖金波*

【内容提要】俄罗斯地域辽阔,劳动力、土地、资本和物质投入等农业生产要素在各联邦区分布不均衡,农业生产要素禀赋、农业收入、农业总投入增长率、农业总产出增长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农业生产格局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区域空间异质性特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南部联邦区农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农业总投入、总产出和总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是全俄最快的;伏尔加联邦区对俄罗斯农业经济增长贡献非常显著,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也是农业收入最高的地区;中央联邦区是主要农业区之一,农业总投入增长率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位居全俄第二。俄罗斯各联邦区农业生产格局的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南部联邦区农作物生产优势显著,粮食作物、油料作物和蔬菜产量均位居榜首;中央联邦区畜产品具有明显优势,猪肉、禽肉和甜菜产量最高;伏尔加联邦区农作物和畜产品发展比较均衡,产量均位居前列,其中牛肉、蛋类和奶类产量是全俄最高的。西伯利亚联邦区农业经济发展虽然在全俄只处于中游水平,但具有很大的后续发展潜力。乌拉尔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的各项农业经济指标都比较低,农业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

【关键词】俄罗斯农业 俄罗斯地区 俄罗斯粮食生产 俄罗斯肉类生产

【中图分类号】D751.2 ;F3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I1009-721X(2017) 06-0140(37)

* 曲昊月,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肖金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俄语系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俄罗斯幅员辽阔,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一位,拥有丰富的淡水资源和牧场等农业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但农业生产比较分散,不同地区的土地、气候、交通和基础设施等条件各不相同,区域农业经济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点。伏尔加联邦区、中央联邦区、南部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生产大约 90%-95%的农业总产值,占全国总播种面积的 90%,是俄罗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俄罗斯总人口中的 68%居住在这四个地区)。^①乌拉尔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

按照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标准,俄罗斯分为七个联邦区:中央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南部联邦区、伏尔加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西伯利亚联邦区、远东联邦区。^②这七个区域在农业生产要素禀赋、农业收入、农业投入和产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生产格局方面呈现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文中涉及俄罗斯主要农产品产量、生产要素禀赋、农产品生产格局的数据时间段为 1992-2015 年,其中 1992-1999 年数据来源是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发布的 2001 年《俄罗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标》,2000-2009 年数据来源是 2010 年《俄罗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标》,2010-2015 年数据来源是 2016 年《俄罗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标》^③。文中涉及农业收入、农业总投入、农业总产出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时间段为 1994-2013 年,数据来源是美国农业部 2017 年发布的经济研究报告《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evival of Russian Agriculture》。该报告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模型运算,因为不清楚作者具体运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模型及相关软件,无法进行新数据的补充和完善,因此时间段是 1994-2013 年,没能和论文其他部分的时间段保持一致。

① K. Gluschenko, "Price convergenc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Russia",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1, Vol.41, No.2, pp.160-172.

② 2010 年北高加索联邦区从南部联邦区分离出来,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并未单独统计北高加索联邦区的数据,而是将其并入南部联邦区。

③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二、俄罗斯农业发展概况

农业在俄罗斯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农业经济严重下滑，21 世纪初有所好转，但由于历史和制度等原因，发展比较缓慢。1992 年到 2015 年期间，虽然一些农产品增长速度比较可观，但仍有很多农产品，尤其是畜产品，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尚未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如表 1 所示，与 1992 年相比，2015 年俄罗斯油料作物增长非常显著，增长了 2.54 倍。蔬菜和甜菜增长幅度也比较大，分别增长了 62.8%和 52.9%。粮食作物和蛋类产量基本与 1992 年持平。2015 年畜牧产品产量与 1992 年相比普遍下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其中牛存栏量从 1992 年的 5270 万头下降到 2015 年的 1890 万头，下降了 65.4%；猪存栏量从 1992 年的 3540 万头下降到 2015 年的 2130 万头，下降了 39.8%；绵羊和山羊存栏量从 1992 年的 5530 万头下降到 2015 年的 2470 万头，下降了 55.3%；2015 年奶类产量也比 1992 年下降了 34.7%。

表 1 俄罗斯主要农产品产量

	1992	2000	2005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粮食作物（百万吨）	106.9	65.4	77.8	61.0	70.9	92.4	105.4	104.1
油料作物（百万吨）	3.9	4.5	6.5	7.5	10.6	13.1	12.9	13.8
蔬菜（百万吨）	9.7	10.8	11.3	12.1	14.6	14.7	15.4	15.8
甜菜（百万吨）	25.5	14.1	21.3	22.3	45.1	38.3	33.5	39.0
牛（百万头）	54.7	27.5	21.6	20.0	19.9	19.6	19.2	18.9
猪（百万头）	35.4	15.8	13.8	17.2	18.8	19.1	19.4	21.3
绵羊和山羊（百万头）	55.3	15.0	18.6	21.8	24.2	24.3	24.5	24.7
奶类（百万吨）	47.2	32.3	31.1	31.8	31.8	30.5	30.5	30.6
蛋类（亿个）	429.0	333.2	360.8	406.0	420.3	412.9	413.0	420.7

数据来源：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三、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异质性

（一）劳动要素禀赋空间异质性

俄罗斯农业劳动要素禀赋在各地区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1992-2015 年间，农业劳动力数量占全国比重最高的三个地区是伏尔加联邦区、南部联邦区和中部联邦区，而西伯利亚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这四个地区农业劳动力数量比较少。

和俄罗斯大多数其他农业生产要素一样，俄罗斯农业劳动力数量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始终呈下降趋势。各地区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的速度存在差异，中央联邦区和伏尔加联邦区是农业劳动力流失最严重的地区。1992 年中央联邦区和伏尔加联邦区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占全国农业劳动力的一半，1992-2015 年间这两个地区平均每年至少流失了 3% 的农业劳动力。在所有地区中，南部联邦区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最慢，年均下降 1.7%。^①

（二）土地要素禀赋空间异质性

俄罗斯土地要素禀赋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土地播种面积从 1992 年的 1.15 亿公顷下降到 2015 年的 7860.7 万公顷，下降了 31.4%。如图 1 所示，伏尔加联邦区是俄罗斯播种面积最多的地区，也是土地播种面积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区，2015 年比 1992 年下降了 31.7%。中央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的播种面积比较接近，下降的速度也相差不多，1992 年这两个地区的播种面积分别为 2305.7 万公顷和 2280.3 万公顷，2015 年分别下降到 1535.5 万公顷和 1502.7 万公顷，2015 年播种面积比 1992 年分别下降了 33.4% 和 34.1%，均高于全国平均下降幅度。

南部联邦区 1992 年到 2003 年播种面积基本呈下降趋势，2003 年达到最低值 1477.3 万公顷后逐渐上升，到 2015 年增加到 1600.3 万公顷。乌拉尔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这三个地区播种面积之和不到全国总播种

^① N. Rada, W. Liefert, O. Liefert,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evival of Russian Agricultur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2017.p.16.

面积的 10%，1992 到 2015 年间，这三个地区的播种面积均呈下降趋势。^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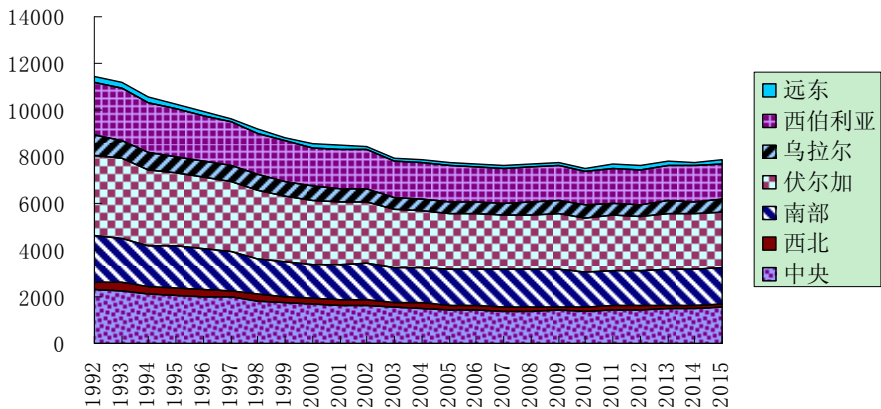


图 1 俄罗斯播种面积区域分布（单位：万公顷）

数据来源：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从俄罗斯农用地所有权结构来看，国家（含俄罗斯联邦和地方层面的政府部门）仍然是最大的农用地所有者。根据2013年1月1日的数据，农用土地的66.8%（2.578亿公顷）为国家所有。公民所有的农用地占总数的29.6%（1.143亿公顷，但是大部分是以土地份额的形式，未必是实际的土地所有权）。而俄罗斯主要的农业生产者，即作为法人的农业企业和私人农场，它们虽然使用着俄罗斯绝大多数的农用地，但是其对农用地的所有权仅占3.6%（1400万公顷）。^②

①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② 肖辉忠：“俄罗斯农用地私有化以及流转问题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1期，第32-43页。

表2 俄罗斯农用土地所有权结构^①

所有权的种类	面积（百万公顷）	比重（%）
公民	114.3（主要以土地份额的形式）	29.6
法人	14	3.6
国家	257.8	66.8

数据来源：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земель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Москва.2013.С. 7-8. 转引自肖辉忠：“俄罗斯农用土地私有化以及流转问题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1期：第32-43页。

在俄罗斯不同的地区，由于地方的政策差异，农用土地所有权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在农业发达、农业生产比较优势大的南部联邦区、伏尔加联邦区和土地价格较高的中央联邦区，农用土地的私人所有权以及法人所有权的比例较高。而在其他地区，国家对农用土地所有权的比重高。^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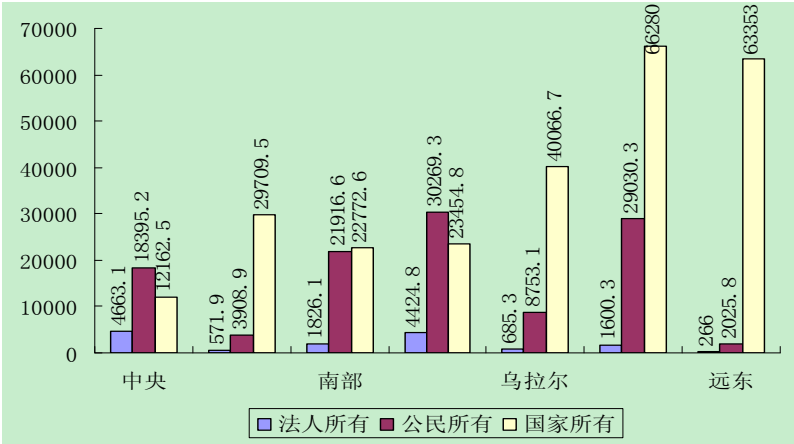


图2 俄罗斯各联邦区农用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情况^③（单位：1000公顷）

数据来源：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кадастра и картографии (Росреестр). земельный фонд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я на 1 января 2013 года. Москва.2013.С.246. 转引自肖辉忠：“俄罗斯农用土地私有化以及流转问题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1期：第32-43页。

① 表中数据截至2013年1月1日。
② 肖辉忠：“俄罗斯农用土地私有化以及流转问题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1期，第32-43页。
③ 图中数据截至2013年1月1日。

（三）资本要素禀赋空间异质性

农业资本要素禀赋包括投入到牲畜和机械的资本。牲畜主要包括牛、猪、绵羊、山羊和家禽。从 1992 到 1998 年，俄罗斯牲畜存栏量大幅下降，1999 到 2005 年间牲畜存栏量下降速度有所放缓，平均每年下降 3%，2006–2015 年间小幅上升。俄罗斯不同牲畜品种存栏量变动情况不一样，牛的存栏量从 1992 年的 5467.7 万头下降到 2015 年的 1887.9 万头，下降了 65.5%。猪的存栏量 2005 年以前一直下降，后来有所增加，但 2015 年的存栏量（2134.5 万头）仍远低于 1992 年的水平（3538.4 万头）。1992 年绵羊和山羊的存栏量为 5525.5 万头，到 2015 年下降到 2466.9 万头，比 1992 年下降了 55.4%。^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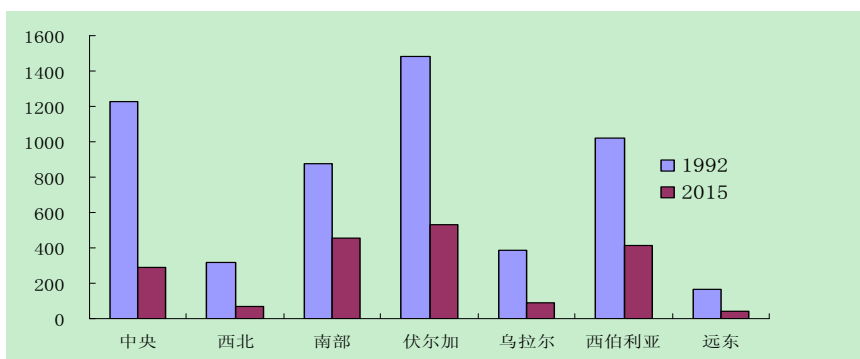


图 3 俄罗斯牛存栏量区域分布情况（单位：万头）

数据来源：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①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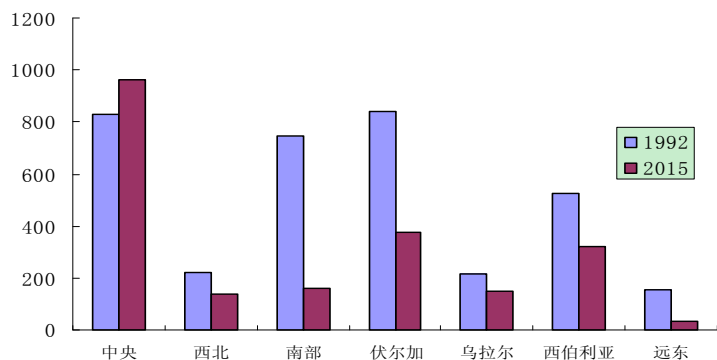


图 4 俄罗斯猪存栏量区域分布情况（单位：万头）

数据来源：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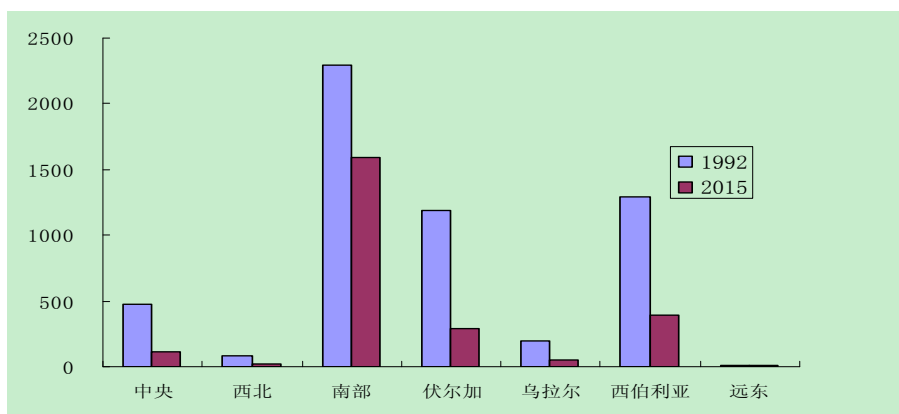


图 5 俄罗斯山羊和绵羊存栏量区域分布（单位：万头）

数据来源：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从各联邦区牲畜存栏量情况来看，伏尔加联邦区的牛存栏量是全国最高的（见图 3），占全国牛存栏总量的比重为 28.2%，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 1992 年的 1482.5 万头下降到 2015 年的 531.5 万头，下降了 64.1%。中央联邦区的猪存栏量是全国最高的（见图 4），2015 年该地区猪存栏量占全国

猪存栏总量的比重为 45%。南部联邦区绵羊和山羊存栏量是全国最高的（见图 5），2015 年为 1593.4 万头，占全国绵羊和山羊存栏总量的比重高达 64.6%。西伯利亚联邦区牛、猪、绵羊和山羊存栏量在全国都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乌拉尔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牲畜存栏量都非常少，且呈下降趋势。

农业机械主要包括拖拉机、犁、中耕机、播种机、收割机和割草机。如表 3 所示，1992–2015 年间，俄罗斯各种农业机械资本数量都大幅下降，与 1992 年相比，2015 年拖拉机数量下降了 81.9%，犁的数量下降了 86.1%，中耕机数量下降了 82.8%，播种机数量下降了 83.9%，收割机数量下降了 85.6%，割草机数量下降了 84.5%。从各联邦区来看，除了南方联邦区外的几乎所有其他地区的农业机械资本都迅速下降，只有南部联邦区机械资本下降的速度有所减缓，因此该地区占全国机械资本总份额的比重上升。伏尔加联邦区和中央联邦区的机械存量之和占俄罗斯总机械存量的一半，南方联邦区占 18%。^①

表 3 俄罗斯农用机械投入（单位：万台）

	拖拉机	犁	中耕机	播种机	收割机	割草机
1992	1290.7	460.3	541.6	582.8	565.0	208.2
2015	233.6	64.1	93.2	93.6	81.1	32.2

数据来源：Russian federation 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en/figures/agriculture/

（四）物质投入禀赋空间异质性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矿物肥料生产国之一，但俄罗斯却是化肥使用量最低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俄罗斯每年每公顷只使用16公斤化肥，美国每年每公顷使用131公斤化肥，德国这一数据为198公斤，中国为647公斤。从化肥使用量的变动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农产品贸易条件极度恶化，化肥价格大幅度上涨，致使国内化肥使用量大幅下降，1992年至2005年间化肥使用量略有增长，2005年到2015

^① N. Rada, W. Liefert, O. Liefert,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evival of Russian Agriculture”, pp.17-18.

这段时间化肥使用量增加比较快。^①

从区域空间异质性来看，伏尔加联邦区、中央联邦区和南部联邦区是化肥使用量最多的三个区域，而乌拉尔联邦区、西伯利亚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这四个地区的化肥使用量非常少，每年使用量基本都不超过10万吨，1992-2015年间，这四个地区的化肥使用量基本比较稳定，没有太大幅度的变化。1992年，伏尔加联邦区的化肥使用量是七个地区中最多的，但自1996年起，该地区的化肥使用量开始急剧下降，经历1998年金融危机后，化肥使用量下降速度趋缓，2003年达到最低值，低于中央联邦区和南部联邦区的使用量，虽然2006年有所回升，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次呈下降趋势，一直没有恢复到1994年的水平。中央联邦区和南部联邦区化肥使用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略有下降，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增加化肥的使用量目前已成为俄罗斯农业部门发展农业的策略。2003年中央联邦区化肥使用量超过伏尔加联邦区，成为俄罗斯化肥使用量最多的地区。南部联邦区化肥使用量虽然没有中央联邦区多，但在1992-2015年这二十年间，化肥使用量增长速度高于中央联邦区。

机械燃料主要包括柴油和汽油。俄罗斯农业中柴油使用量大约是汽油使用量的两倍，这两种燃料使用量自1994年以来都有所下降，而1998年金融危机后全国柴油使用量保持稳定状态，汽油使用量继续缓慢下降。1998年金融危机前，除了南部联邦区的燃料总使用量有所增长外，俄罗斯所有其他地区机械燃料使用量都呈下降趋势。

伏尔加联邦区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主要的饲料消费区，这与该地区的肉制品生产在俄罗斯的比重和地位是一致的。1992-1999年间，南部联邦区是俄罗斯第二大饲料消费区，自2007年该地区饲料消费量超过伏尔加联邦区后，直到2015年都保持领先地位，南部联邦区的饲料主要用于家禽生产。

^① N. Rada, W. Liefert, O. Liefert,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evival of Russian Agriculture”, p.19.

四、农业收入空间异质性

俄罗斯各地区的农业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的比重在 1994-2013 年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七个联邦区中只有南部联邦区的农业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他地区农业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的比重，除了个别年份上升外，总体上基本都呈下降趋势。1994-1998 年间，南部联邦区农业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份额为 16%，2009-2013 年间，这一比重增加到了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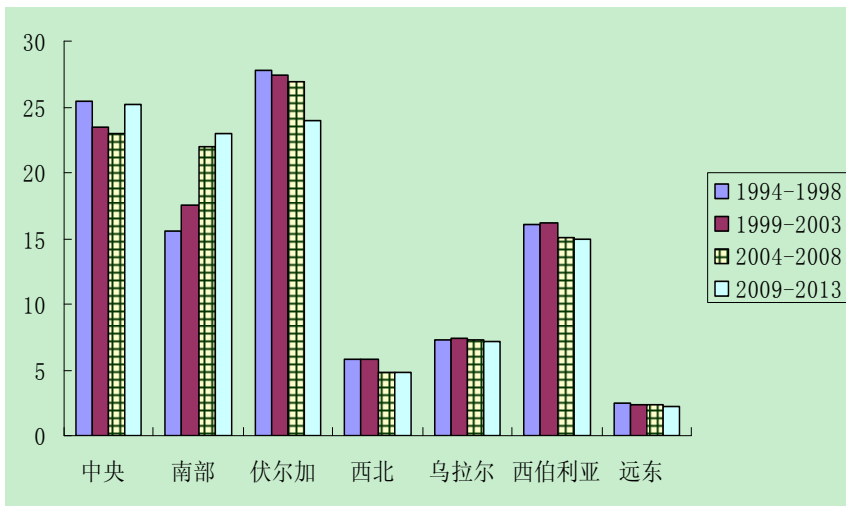


图6 俄罗斯各联邦区农业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的比重 (%)

数据来源：N. Rada, W. Liefert, O. Liefert,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evival of Russian Agriculture", pp.37-39.

如图 6 所示，1994-1998 年间，中央联邦区农业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的比重居第二位，仅次于伏尔加联邦区，但 1999-2008 年间，这一比重持续下降，2009-2013 年间重新回升，农业收入占到全国农业总收入份额的 25%，基本恢复到了 1994-1998 年间的水平。伏尔加联邦区从 1994 年到 2008 年，农业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的比重都是所有地区中最高的，但 2009 年以后，

其比重和西伯利亚、乌拉尔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及远东联邦区一样呈下降趋势，而且下降幅度比这几个地区都大，但依然位居七个联邦区的第二位。西伯利亚联邦区 1994-2013 年期间农业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基本稳定在 15%左右的份额。乌拉尔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 1994-2013 年期间农业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的比重偏低，分别位列第五和第六名，远东联邦区农业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的比重是七个地区中最低的，年均值不到 3%。

五、农业总投入增长率和总产出增长率空间异质性

（一）农业总投入增长率空间异质性

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农业总投入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 2005 年才转为正增长，但增长幅度非常小（如图 7 所示）。1994-1998 年间，俄罗斯农业总投入迅速下降，年均下降 8.8%，下降幅度是农业总产出下降幅度（年均下降 4.6%）的近两倍。1998-2005 年，农业总投入继续下降，但下降速度有所减缓，年均下降 2.3%。2005-2013 年，俄罗斯农业总投入开始增加，年均增长率为 0.6%，除了伏尔加联邦区外，其他所有地区的农业投入逐步回升，虽然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总体趋势上已经不再下降了。俄罗斯农业总投入及各区域平均农业投入的正增长反映了农业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逐步复兴。

俄罗斯各地区农业投入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的时间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所有地区中，南部联邦区是农业总投入最早由负转正的地区，也是农业总投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其他地区农业总投入增长速度都非常缓慢。和其他地区一样，1994-1999 年南部联邦区农业投入一直呈下降趋势，1999 年南部联邦区农业投入达到最低点，但仍高于其他地区，随后直到 2013 年为止，南部联邦区的农业投入平均每年增长 1.8%。该地区各类农业投入变动情况不一样，劳动力、种子和机械使用量持续下降，但化肥和饲料投入量增长迅速，土地、燃料和牲畜投入量虽然增长比较缓慢，但保持了正增长。远东联邦区的农业总投入 2004 年达到最低点之后开始回升。乌拉尔联邦区、西伯

利亚联邦区和中央联邦区的农业总投入分别于2005、2006和2007年开始停止下降并逐渐回升。西北联邦区农业总投入一直到2011年才达到最低点，伏尔加联邦区农业总投入自1994年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2013年才开始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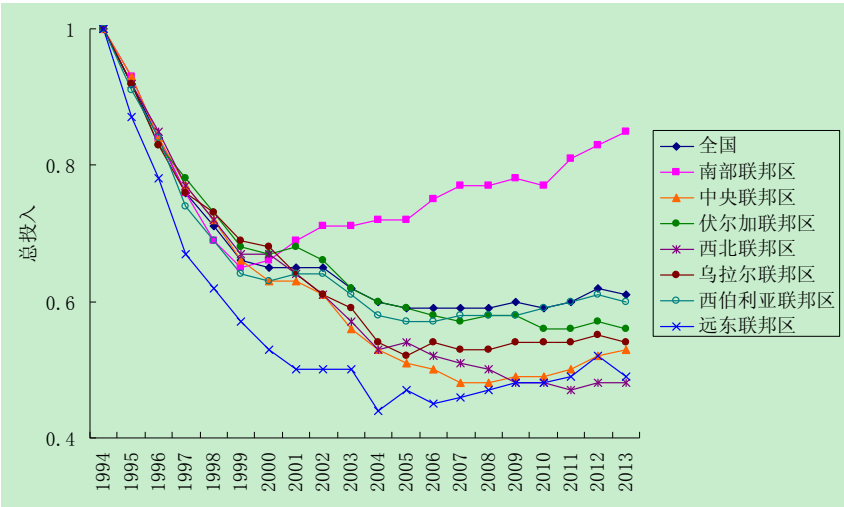


图7 俄罗斯各地区农业总投入增长率^①

数据来源：N. Rada, W. Liefert, O. Liefert,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evival of Russian Agriculture”, pp.37-39.

南部联邦区在俄罗斯农业复苏的过程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一地区的气候、基础设施、制度环境都比其他地区优越。南方联邦区比全国其他地区农业复苏的速度快，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农业总投入在1998到2005年间下降速度有所减缓。南方联邦区占全国农业生产的份额足够大，因而1998年以后南部联邦区农业投入的增长缓解了全国农业总投入增长率的下落（1999年除外），但因为其他地区农业投入都是下降的，只有一个南部联邦区不足以逆转全国农业总投入增长率为负的趋势。直到2005年，远东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的农业投入下降到最低点后开始回升，全国农业总投入才变成正增长。

① 图5中各年份的数据是以1994年为基期（取值为1）计算得出的。

（二）农业总产出增长率空间异质性

1994-1998 年间，俄罗斯农业总产出迅速下降，年均下降 4.6%。这一期间内，每个地区的农业产出都出现了下降趋势，但生产下降的程度和随后的复苏情况因地区不同而大相径庭。南部联邦区产量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西伯利亚联邦区和中央联邦区。1998-2005 年，农业总产出开始回升，年均产出增长了 3.1%。2005-2013 年，俄罗斯农业总产出增速放缓，平均每年上升 2.3%。南部联邦区在 1998 年金融危机后产出增长最快，到 2013 为止，平均每年增长超过 5%，因此，俄罗斯农业总产出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南部联邦区的贡献（如图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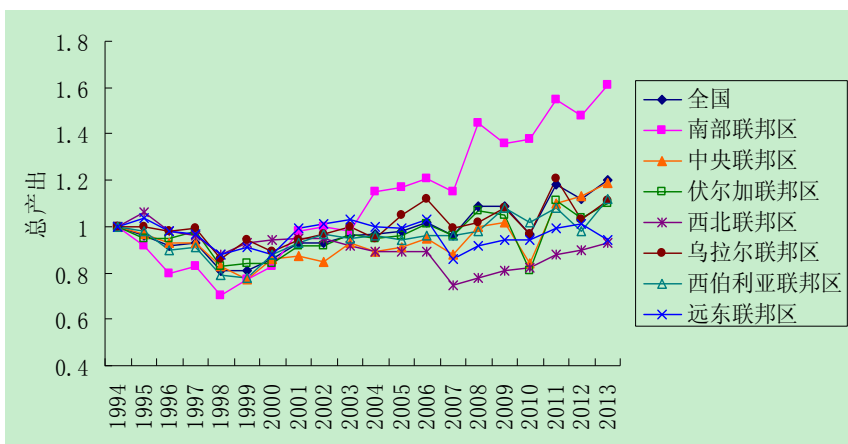


图8 俄罗斯各地区农业总产出增长率^①

数据来源：N. Rada, W. Liefert, O. Liefert,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evival of Russian Agriculture”, pp.37-39.

农业产出复苏速度仅次于南部联邦区的是乌拉尔联邦区（见图 8），1998 年金融危机后，农业产出逐年稳步回升，但回升幅度不大，回升速度与南部联邦区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高于其他地区。中央联邦区 1994-1998 年农业产出下降幅度较大，1998 年金融危机后农业产出迅速复苏，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到 2013 年已经远超 1994 年的水平，达到当年全国平均产出水平。

^① 图 8 中各年份的数据是以 1994 年为基期（取值为 1）计算得出的。

伏尔加联邦区是俄罗斯重要的农业区，和其他地区一样，1994–1998 年间，农业总产出呈下降趋势，1998 年金融危机后农业产出逐渐复苏，个别年份出现波动，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但产出增长乏力，1994 至 2013 年间，该区平均每年农业产出只增长了 0.7%。

俄罗斯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经历了产出下降之后的复苏，都回到并超过了 1994 年的水平，伏尔加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的农业产量增长虽然幅度不大，但到 2013 年时也已略高于 1994 年的水平。远东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农业总产出却一直未能恢复到 1994 年的水平，西北联邦区农业产出从 1994 年到 2008 年，基本上一直都是下降趋势，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才有所回升，但因为连续多年的下降造成农业产出水平偏低，因此到 2013 年尚未能恢复到 1994 年的产出水平。

俄罗斯农业总产出和各地区的农业产出在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深层次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引起卢布汇率的大幅度贬值，卢布贬值对进口农产品起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肉类、禽类、鱼类等农产品进口额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2008年1–10月，农产品进口额相对于2007年同期增长了34.2%，但2009年1–10月农产品进口额已经下降到236.38亿美元，相对于2008年同期下降了18.3%。农产品进口数量的下降，相当于扩大了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空间，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数量，这对俄罗斯农业发展的作用非常明显。^①

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异质性

俄罗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②的增长可以用滚动加权的Tornqvist-Theil指数来测度。滚动加权的Tornqvist-Theil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可以表示为：

① 王志远：《国际视野下中俄农业发展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② 全要素生产率的英文全称是“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缩写是“TFP”。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反映除劳动、资本等物质要素投入以外的所有其它因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规模效益等）变动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

$$\ln \left(\frac{TFP_{i,t}}{TFP_{i,t-1}} \right) = \left[\sum_j \frac{(R_{ij,t} + R_{ij,t-1})}{2} \ln \left(\frac{Y_{ij,t}}{Y_{ij,t-1}} \right) \right] - \left[\sum_l \frac{C_{il,t} + C_{il,t-1}}{2} \ln \left(\frac{X_{il,t}}{X_{il,t-1}} \right) \right]$$

其中， i 表示地区或国家， j 表示商品， l 表示生产要素， t 表示时间， $t = 1994, 1995, \dots, 2013$ ； R 是收入份额， Y 为产出， C 是成本， X 是投入。方程式表示某地区 t 期和 $t-1$ 期相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如图 8 所示，俄罗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1994—1998 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4.2%；第二阶段，1998—2005 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5.4%；第三阶段，2005—2013 年，俄罗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低，下降到每年增长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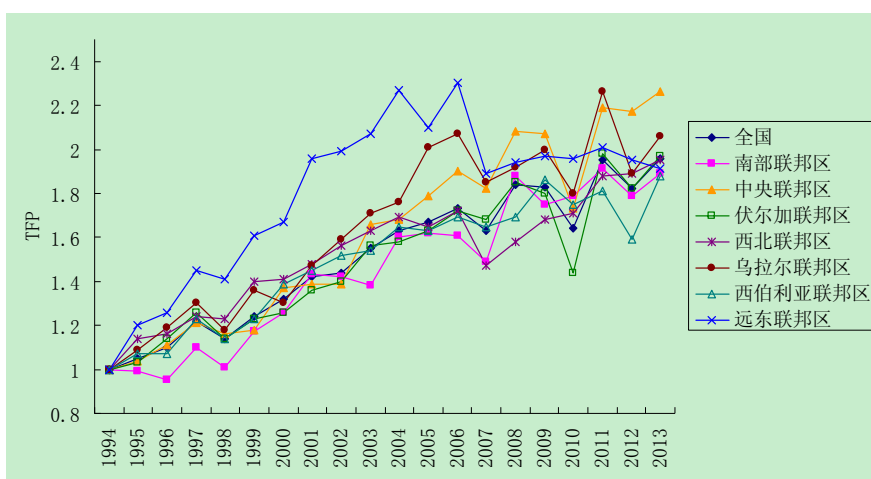


图9 俄罗斯各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据来源：N. Rada, W. Liefert, O. Liefert,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evival of Russian Agriculture”, pp.37-39.

前两个阶段俄罗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可以持续增长，是因为苏联计划经济时期农业部门过度扩张，成本过高，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到 2005 年，农业总投入下降，因此，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比较高。2005 年到 2013 年，农业总投入见底并开始略有上升，因此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速度有所下降。尽管农业总投入的变化减缓了这一时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₁增长,但由于苏联时期大规模低效率农业资源投入的减少,农业总投入的效率有所提高,对俄罗斯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俄罗斯各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按每个地区对全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大小,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对俄罗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率最高的伏尔加联邦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占全国四分之一左右;第二层级是中央联邦区和南部联邦区,1994-1999年间,这两个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和占全国的39%的份额。1999-2004年,虽然中央联邦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但南部联邦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占全国比重上升,抵消了中央联邦区比重的下降,因此,这两个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占全国比重之和依然是上升的,2009-2013年间,这一比重达到51%;第三层级是西伯利亚联邦区,这一地区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位居全国第四位,占全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5%的水平;第四层级是乌拉尔地区、西北地区和远东地区,这三个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和仅占全国的15%左右。

南方联邦区对俄罗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幅度很大,该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占全国的比重从1994年的16.5%提高到2013年的21.5%,平均每年增长2.8%。全要素生产率对南方联邦区农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1998-2013年,南部联邦区农业产出增长的69%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31%来自生产要素投入的贡献。即南部联邦区农业总产出的增长是源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₂增长,而不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①

中央联邦区是除了南部联邦区以外的其他地区里唯一一个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比重一直上升的地区,从1994年的26%增加到2013年的30%。中央联邦区1994-2007年的农业产出平均每年下降了0.3%,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5.1%,这几乎完全是靠减少农业投入量而实现的。2007年后,中央

① N. Rada, W. Liefert, O. Liefert,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evival of Russian Agriculture", p.19.

联邦区年均农业产出增长率达4.3%，农业投入增长率攀升到1.5%，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2.9%。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央联邦区农业产出能够由降转升的贡献非常显著。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即：俄罗斯南部联邦区的农业总投入和总产出都比其他地区恢复得快，而且农业全要素增长率占全国的比重也上升了很大幅度，对全国农业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非常显著，在俄罗斯农业复苏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南部联邦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条件，与其他地区相比，农业生产比较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南部联邦区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多的优质土地，土地生产率高于其他地区^①；其次，南部联邦区人力资源也比较丰富（见表4），为农业生产提高了必要的劳动力；再次，南部联邦区的气候环境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如表4所示，该地区的气候指数为0.663，是俄罗斯气候指数最高的地区，说明该地区是俄罗斯最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地区。南部联邦区气候温和，夏季长，可以生产冬小麦、玉米和大豆；第四，南部联邦区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交通十分便利，黑海和亚速海港口是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港口，为南部联邦区带来了许多商业机会和贸易利益，俄罗斯将粮食等农产品运往这两个港口，再出口到其他国家；第五，南部联邦区农业的现代化也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因为南部联邦区拥有土地、人力资源、气候、交通基础设施和技术等诸多优势，该地区成为整个俄罗斯农业最先复苏的地区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优势也吸引了新的农业经营者和农业控股企业，这些新的经营主体已经为南部联邦区粮食和畜牧业（尤其是家禽）的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②

俄罗斯各联邦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异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

① F. Beinroth, H. Eswaran, P. Reich, “Global Assessment of Land Quality”, in D. Stott, R. Mohtar, G. Steinhardt, eds., *Sustaining the Global Farm*, the International Soil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 2001, pp.569-574. [http://tucson.ars.ag.gov/isco/isco10/sustaining The Global Farm/P233-Beinroth.pdf](http://tucson.ars.ag.gov/isco/isco10/sustaining%20The%20Global%20Farm/P233-Beinroth.pdf).

② N. Rada, W. Liefert, O. Liefert,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evival of Russian Agriculture”, p.23.

气候、人力资源、交通及基础设施。^①如表4所示，中央联邦区的气候、人力资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指数都比较高，因此该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西北联邦区交通及基础设施指数是所有联邦区中最高的，气候指数位居前列（见表4）。南部联邦区和伏尔加联邦区的气候指数及人力资源指数都排在前面，南部联邦区的气候指数是全国最高的，良好的气候条件有利于该地区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南部联邦区是俄罗斯农业发展最好的地区。人力资源指数最高的是乌拉尔联邦区。虽然表4中的数据表明，西伯利亚联邦区的气候、人力资源和交通及基础设施指数都相对落后，但该地区土地广袤，在俄罗斯农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远东联邦区无论是气候、人力资源还是交通及基础设施指数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因此农业经济发展最为薄弱。

表4 俄罗斯各联邦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因素

	气候指数	人力资源指数	交通及基础设施指数
中央联邦区	0.572	0.353	0.465
西北联邦区	0.623	0.295	0.494
南部联邦区	0.663	0.351	0.238
伏尔加联邦区	0.482	0.386	0.283
乌拉尔联邦区	0.391	0.436	0.217
西伯利亚联邦区	0.335	0.341	0.102
远东联邦区	0.356	0.262	0.113

数据来源：R. Bokusheva, H. Hockmann, S. Kumbhakar,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Russian Agriculture”,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2, Vol.39, N.4, pp.611-637.

① R. Bokusheva, H. Hockmann, S. Kumbhakar,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Russian Agriculture”,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2, Vol.39, N.4, pp.611-637.

七、主要农产品生产格局空间异质性

俄罗斯农业生产区域格局在1992–2015年这二十多年时间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俄罗斯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种植业受自然灾害和气候条件影响严重，产量极其不稳定。^①

俄罗斯中央联邦区畜产品生产优势显著，猪肉、禽肉产量都是全国最高的，牛肉产量也位居前列。该地区是全国最大的甜菜产区，但是20世纪末期，中央联邦区甜菜产量持续下降，21世纪初期有所回升，2009–2013年期间，中央联邦区的农业经营者调整了农作物的品种结构，增加了甜菜产量，减少了马铃薯产量，该地区甜菜产量持续上升，占全国甜菜总产量的比重高达56%，是甜菜产量第二的南部联邦区的两倍多，也就是说，全国一半以上的甜菜都是由中央联邦区生产的。

南部联邦区的生产优势体现在农作物上，粮食、油料作物和蔬菜的产量都是各联邦区中最高的，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伏尔加联邦区是俄罗斯第三大农业产区，伏尔加联邦区农作物和畜产品发展比较均衡，是牛肉、蛋类和奶类产量最高的地区，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猪肉和禽肉产量均为全国第二。

西伯利亚联邦区、西北部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这四个地区位于俄罗斯的最北部和东部地区。1999年以来，这四个地区肉、蛋产量有所增加。西北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主要生产畜产品（肉类、牛奶、蛋）。^②

（一）主要农作物生产格局空间异质性

1、粮食作物生产格局空间异质性

俄罗斯粮食作物总产量在1992年到2015年期间波动较大（见表5）。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粮食产量急剧下滑，从1992年的1.069亿吨下降到1996年的6340.6万吨，下降了40.7%，1996和1997年有所回升，受金融危机冲击，

① 郭晓琼：“俄罗斯农业形势及发展因素研究（1991–2011）”，《俄罗斯东欧中亚市场》，2012年第10期，第7–17页。

② N. Rada, W. Liefert, O. Liefert,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evival of Russian Agriculture”, p.13.

1998年达到了最低点4785.8万吨，之后逐年回升，自2001年起粮食产量基本在七、八千万吨左右波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卢布贬值，进口粮食作物减少，使得俄罗斯本国粮食作物获得了市场机会，粮食作物总产量逆经济形势大幅增长，达到了最高值1.082亿吨，2009年粮食作物总产量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远超过2007年以前的产量水平。2010年俄罗斯遭受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受到严重打击，仅为6096万吨，2011年反弹到9421.3万吨，2014和2015年达到1亿吨以上，和1992年产量持平。

如表5所示，伏尔加联邦区粮食作物产量在1992-2003年间居全国首位，俄罗斯30%左右的粮食作物都产自该地区。2004年后粮食作物产量被南部联邦区赶超，占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比重下降，但依然是俄罗斯粮食主产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对伏尔加联邦区粮食作物产量冲击很严重，从上一年的3395.8万吨急剧下降到1097万吨，下降了67.7%。伏尔加联邦区2008年粮食作物产量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比较小，产量波动不大。2010年自然灾害造成伏尔加联邦区粮食作物严重减产，从前一年的2173.2万吨减少到655万吨，减少了70%，占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的比重也从22.4%下降到10.7%。2011年粮食作物产量回升到2124.2万吨，占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的比重也回升到22.5%。2011年以后的几年内，粮食作物的产量一直不稳定，波动幅度很大，2015年产量为1887.6万吨，占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的比重为18.1%。

南部联邦区粮食作物产量在1992-2003年期间总体来说仅次于伏尔加联邦区，位居全国第二位，占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2004年以后，该地区粮食作物产量后来居上，超过了伏尔加联邦区，占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比重上升到三分之一左右。和全国的生产情况一样，1998年该地区的粮食作物产量受俄罗斯金融危机冲击，降到最低点1143.4万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达到3697.8万吨，比前一年增长了55.4%。在2010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下，俄罗斯各地区的粮食作物产量都大幅下降，而南部联邦区粮食作物的产量虽然比前一年有所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因此，该地区粮食作物产量占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的比重在2010年上升到44.7%，之后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三分之一以上的水平。2015年粮食作物产量达到3872.1万吨，占全国37.2%。

中央联邦区也是俄罗斯粮食作物的主产区。1992和1993年粮食产量为2000多万吨，约占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的五分之一，1994-2007年间中央联邦区粮食作物产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卢布贬值造成俄罗斯进口粮食减少，中央联邦区粮食作物产量大幅度增加，达到2385.3万吨，比2007年增加了983.3万吨，增长了70%。

表 5 俄罗斯各地区粮食作物产量（单位：万吨）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国	10685.6	9909.5	8129.8	6340.6	6934.1	8855.4	4785.8	5470.6
中央	2215.4	2157.3	1870.1	1163.7	1347.9	1625.9	1092.6	842.6
西北	121.5	111.9	80.3	77.3	83.3	76.0	53.3	37.2
南部	2654.0	2736.6	1943.3	1622.8	1438.3	1861.3	1143.4	1459.7
伏尔加	3320.3	2786.4	2618.9	1613.8	2418.8	3395.8	1097.0	1660.4
乌拉尔	758.6	469.4	423.6	423.5	479.1	674.1	308.0	496.7
西伯利亚	1494.8	1554.0	1125.5	1390.7	1109.5	1165.6	1034.7	932.3
远东	121.0	94.0	68.1	48.8	57.2	56.7	56.8	41.7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全国	6542.0	8508.4	8647.9	6696.2	7783.2	7780.3	7822.7	8147.0
中央	1105.2	1390.7	1565.3	1256.9	1335.1	1460.3	1295.6	1402.0
西北	58.5	60.1	51.4	51.8	59.6	55.1	44.9	51.4
南部	1733.4	2369.7	2626.2	1610.4	2747.0	2665.9	2591.5	2379.1
伏尔加	1939.4	2471.4	2518.3	2207.8	1977.5	1915.2	2088.2	2232.3
乌拉尔	390.8	523.9	436.0	412.5	325.4	481.0	561.5	525.7
西伯利亚	1283.8	1653.1	1393.2	1124.8	1312.1	1164.8	1198.0	1500.5
远东	30.9	39.6	57.4	32.0	26.5	38.1	43.0	56.0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全国	10817.9	9711.1	6096.0	9421.3	7090.8	9238.5	10454.1	10410.1
中央	2385.3	2155.1	970.4	1706.9	1819.5	2251.4	2599.7	2502.5
西北	61.9	66.5	46.1	56.9	62.0	69.2	94.5	112.5
南部	3697.8	2890.8	2725.4	3281.6	2460.8	3206.8	3801.0	3872.1
伏尔加	2715.2	2173.2	655.0	2124.2	1453.0	1703.8	2091.9	1887.6
乌拉尔	515.2	532.7	333.9	730.2	341.2	431.9	454.9	528.6
西伯利亚	1392.1	1834.7	1335.5	1460.2	899.7	1532.5	1301.8	1380.4
远东	50.4	58.1	29.7	61.3	54.7	42.8	110.3	126.4

数据来源：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2010年自然灾害对中央联邦区冲击比较大，粮食作物产量从前一年的2155.1万吨减少到970.4万吨，减少了55%，占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的比重也从22.2%下降到15.9%。2011后，中央联邦区粮食作物产量逐年增长，到2015年达到2502.5万吨，占全国比重回升到24%。

西伯利亚联邦区粮食作物产量低于伏尔加联邦区、中央联邦区和南部联邦区，但高于乌拉尔联邦区、远东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该地区粮食作物产量占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的比重起伏不定，最高达到21.9%，最低则为12.5%。乌拉尔联邦区粮食作物产量位居全国第五位，占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的比重在5%左右，远东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的粮食作物产量都比较少，每个地区占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的比重都不到1%。

2、油料作物生产格局空间异质性

俄罗斯主要生产三种用作食用油的油料作物：葵花籽、大豆和油菜籽。葵花籽一直在俄罗斯油料作物中占主导地位。1992-2015年间，油料作物总产量波动比较大，有升有降，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俄罗斯油料作物产量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增加了对食用油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市场对生物能源的需求。^①1992年，俄罗斯油料作物总产量为311万吨，2005年油料作物产量大幅度增加，达到647.0万吨，比2004年增加了166万吨，增长了34.5%。2011年油料作物再次大幅增加，达到969.7万吨，比2010年增加了435.2万吨，增长了81.4%，之后有所下降，2015年产量为928万吨（见表6）。

俄罗斯油料作物主要产自南部联邦区，1992年该地区油料作物产量为188.2万吨，占全国油料作物产量的60.5%。1992-2015年间南部联邦区的产量起伏不定，波动比较大。2011年以前，南部联邦区油料作物占全国产量的比重基本保持在一半以上，2011年这一比重下降到36.3%，2015年南部联邦区油料作物产量为310.6万吨，占全国的份额下降为33.5%，但仍占据全国油料作物产量第一的位次。

① 郭晓琼：“俄罗斯农业形势及发展因素研究（1991-2011）”，《俄罗斯东欧中亚市场》，2012年第10期，第7-17页。

表6 俄罗斯各地区油料作物产量（单位：万吨）^①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国	311.0	276.5	255.3	420.0	276.5	283.1	300.0	415.0
中央	47.3	38.1	27.0	73.6	45.9	52.4	55.3	77.6
南部	188.2	180.2	181.3	274.6	167.0	152.1	173.7	219.6
伏尔加	64.0	44.9	34.6	55.4	53.2	71.1	60.8	99.5
乌拉尔	2.2	1.2	1.0	1.2	1.4	1.4	1.1	4.2
西伯利亚	9.2	12.1	11.3	15.1	9.0	6.1	8.9	13.9
远东	0.12	0.12	0.12	0.11	0.14	0.13	0.17	0.14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全国	391.9	268.2	368.8	488.7	481.0	647.0	674.3	567.1
中央	74.7	55.4	69.5	88.9	71.8	98.9	93.4	104.0
南部	213.5	145.7	225.4	286.8	293.6	401.1	413.3	310.1
伏尔加	84.8	54.6	60.1	92.7	100.6	125.1	138.2	124.0
乌拉尔	1.7	0.9	0.6	1.1	0.6	1.6	1.5	0.9
西伯利亚	17.1	11.6	13.3	19.1	14.4	20.3	28.0	28.0
远东	0.08	0.06	0.05	0.03	0.03	0.01	0.01	0.01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全国	735.0	645.4	534.5	969.7	799.3	984.2	847.5	928
中央	132.0	155.6	115.6	262.3	237.0	273.3	240.2	281.7
南部	412.1	316.8	285.8	352.0	305.0	327.5	304.0	310.6
伏尔加	164.3	143.9	103.8	322.4	228.0	334.7	266.7	280.4
乌拉尔	0.9	0.7	1.3	3.9	1.6	4.3	3.1	5.0
西伯利亚	25.8	28.5	28.1	29.3	27.6	44.26	23.4	39.6
远东	0.01	0.01	0.01	0.01	0.01	0.16	0.00	0.00

数据来源：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т).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伏尔加联邦区1992–2015年油料作物产量波动比较大，时升时降，最低时降到34.6万吨（1994年），最多时达到322.4万吨（2011年）。到2015年，

① 因为向日葵籽是俄罗斯最主要的油料作物，产量约占油料作物的80%左右，所以表中所列数据是向日葵籽的产量，不包括其他油料作物。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关于向日葵籽的区域产量统计中不包括西北联邦区，所以表中只有六个联邦区的数据。远东地区向日葵籽产量很少，表中数据单位是“万吨”，如果远东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数据一样只保留一位小数，按四舍五入的原则，2003年该地区向日葵籽产量约等于0万吨，而实际上产量是300吨，并不为零，2003年以后的数据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因此本文对表中远东地区的数据做了特殊处理，保留了两位小数。

产量为280.4万吨。伏尔加联邦区油料作物产量占全国油料作物产量的比重仅次于南部联邦区，位居全国第二。

中央联邦区油料作物产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发展非常迅速，2015年达到281.7万吨，是1992年产量（47.3万吨）的5.96倍。该地区油料作物产量占全国油料作物产量比重也持续上升，从1992年的15.2%上升到2015年的30.4%，居全国第三位。

西伯利亚联邦区、远东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油料作物产量都很少，2015年这四个地区产量之和占全国油料作物总产量的比重不到5%。

3、蔬菜生产格局空间异质性

俄罗斯蔬菜总产量在1992–2015年间除个别年份外，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受金融危机和2010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不是很显著。1992年蔬菜总产量为971.8万吨，1992到2015年基本保持稳步上升态势，2015年达到1575.5万吨（见表7）。

从各联邦区的生产情况来看（见表7），中央联邦区、伏尔加联邦区和南部联邦区是俄罗斯三大蔬菜产区。苏联解体后直到2002年，中央联邦区都是俄罗斯蔬菜产量最高的联邦区，伏尔加联邦区的蔬菜产量仅次于中央联邦区，和中央联邦区的蔬菜产量相差无几，这两个地区占全国蔬菜总产量的比重都是五分之一左右。

2003年，南部联邦区蔬菜生产后来居上，跃居全国第一，无论是产量还是占全国的比重都超过了中央联邦区。产量从1992年的228万吨增加到2015年的587.6万吨，增长了1.58倍。占全国蔬菜总产量的比重，从1992年的23.5%上升到2015年的37.3%。

西伯利亚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的蔬菜产量都不多，其中西伯利亚联邦区的产量在1992到2015年期间，平均而言占全国蔬菜总产量的12.6%左右，西北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蔬菜产量之和占全国蔬菜产量的比重为15%左右。

表 7 俄罗斯各地区蔬菜产量（单位：万吨）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国	971.8	982.7	962.1	1127.6	1073.1	1113.0	1054.5	1228.8
中央	273.1	257.3	256.7	308.6	323.4	307.0	293.2	329.3
西北	62.3	61.7	63.7	77.0	78.0	81.7	78.3	94.0
南部	228.0	213.2	187.0	192.6	141.7	162.5	174.5	200.6
伏尔加	231.4	230.7	240.2	282.9	284.2	297.0	265.3	320.5
乌拉尔	52.5	56.7	57.2	71.9	66.0	73.7	59.6	80.2
西伯利亚	122.9	127.7	127.5	144.2	134.9	153.8	132.2	157.9
远东	1.7	35.4	30.0	50.4	45.0	37.4	51.3	46.4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全国	1082.2	1116.9	1066.5	1173.9	1121.4	1134.8	1137.0	1150.9
中央	299.7	273.1	260.8	279.6	251.1	243.9	255.9	260.0
西北	78.5	75.6	68.9	69.1	63.4	58.7	54.7	53.4
南部	196.6	230.9	240.9	280.9	285.2	303.7	310.2	315.2
伏尔加	254.9	267.9	240.7	272.0	262.5	259.4	261.0	257.5
乌拉尔	64.5	73.7	65.9	78.7	71.2	81.6	77.9	79.0
西伯利亚	146.1	151.8	147.5	152.4	148.7	151.8	140.0	150.5
远东	41.9	43.9	41.8	41.2	39.2	35.6	37.2	35.2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全国	1296.0	1340.1	1212.6	1469.7	1462.7	1469.0	1504.1	1575.5
中央	275.6	282.3	224.5	293.7	294.4	291.3	296.3	312.8
西北	57.1	57.5	55.4	63.3	59.6	59.0	59.7	61.3
南部	393.3	414.7	425.6	493.2	514.9	515.1	543.0	587.6
伏尔加	286.6	292.7	235.8	315.0	317.2	322.1	330.0	341.5
乌拉尔	82.5	86.7	75.2	92.0	73.2	82.6	77.0	76.7
西伯利亚	161.7	167.4	156.0	169.5	160.0	159.8	153.0	155.5
远东	39.3	38.9	40.1	43.0	43.4	39.1	45.0	40.1

数据来源：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4、甜菜生产格局空间异质性

俄罗斯甜菜总产量波动比较明显，1992年总产量为2554.5万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导致甜菜总产量降到最低点1079.8万吨，2011年达到苏联解体后的最高产量4764.4万吨，到2015年产量为3903.2万吨（见表8）。从甜菜的区域生产格局来看，中央联邦区、南部联邦区、伏尔加联邦区和西伯利亚

联邦区是俄罗斯甜菜的主产区，其他地区很少种植。

表 8 俄罗斯各地区甜菜产量（单位：万吨）^①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国	2554.5	2546.8	1394.6	1907.2	1616.7	1388.0	1079.8	1522.7
中央	1339.0	1290.1	665.7	1017.8	797.8	655.3	588.8	737.5
南部	645.4	725.2	459.6	531.0	476.2	432.1	278.3	363.4
伏尔加	475.1	438.1	234.1	298.6	305.2	278.1	191.1	388.5
西伯利亚	95.0	93.4	35.1	59.7	37.5	22.5	21.6	33.4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全国	1405.1	1455.3	1565.9	1935.5	2180.9	2127.6	3067.3	2883.6
中央	748.0	755.8	810.9	1161.9	1038.9	1086.0	1633.7	1618.4
南部	333.4	368.6	513.0	414.2	676.4	504.9	746.9	657.5
伏尔加	288.4	303.7	216.7	329.6	433.7	505.5	653.0	560.6
西伯利亚	35.3	27.2	25.3	29.8	32.0	31.2	33.7	47.2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全国	2899.5	2489.2	2225.5	4764.4	4505.6	3832.1	3351.3	3903.2
中央	1525.4	1380.1	1016.6	2729.3	2637.0	2196.9	1804.4	2172.3
南部	805.1	615.1	954.0	1241.3	1110.6	813.2	943.1	985.0
伏尔加	523.0	4479.0	214.6	736.7	712.5	755.9	548.3	663.9
西伯利亚	46.1	46.2	40.3	57.1	45.5	66.1	55.5	82.0

数据来源：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т).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如表8所示，1992–2015年间，中央联邦区的甜菜产量在所有联邦区中占绝对优势，俄罗斯一半以上的甜菜都是该地区生产的。南部联邦区是俄罗斯甜菜第二大产区，产量占全国甜菜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伏尔加联邦区的甜菜产量占全国甜菜总产量的比重在1992–2015年间平均为18%左右。西伯利亚甜菜产量非常少，占全国甜菜总产量的比重不到2%。

俄罗斯幅员辽阔，甜菜主要种植区农业气候条件各不相同。表9列出了甜菜主要产区的气候指标，南部联邦区、中部联邦区和伏尔加联邦区气候温和，温度适宜，不仅温暖的夏季是甜菜的生长季节，而且冬天也不是很冷，

① 俄罗斯甜菜生产主要集中于中央联邦区、南部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这四个地区，其他联邦区的产量非常少，因此，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只包括这四个联邦区的甜菜产量数据，没有其他联邦区的数据。

因霜冻灾害造成甜菜产量受损的风险比较低,温暖的气候使这些地区甜菜产量颇丰。相对于南部联邦区和中央联邦区而言,伏尔加地区联邦区冬天更冷更长,在最适宜甜菜生产的夏季降雨量也偏低,这样的气候条件限制了伏尔加联邦区的甜菜产量。

表9 俄罗斯甜菜主产区气候指标

气候指标	温度		降雨量
	4月-9月生长季	10月-3月冬季	4月-9月生长季
南部联邦区	18.5	1.4	346
中央联邦区	14.5	-5.6	322
伏尔加联邦区	13.6	-9.7	291

数据来源 FAO, “Russian Federation Sugar sector review”, 2013.

俄罗斯的甜菜主要用来加工成糖,甜菜糖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三个地区:中部联邦区、南部联邦区(包括北高加索)和伏尔加联邦区(包括西伯利亚)。平均而言,南部联邦区的糖产量约占全国 20%—30%,伏尔加地区产量占 20%左右。精制原糖的产量主要集中在南部联邦区和中部联邦区,南部联邦区是精制原糖的主要产区,因为南部联邦区毗邻黑海,从世界市场采购原糖加工为精制原糖是非常便利和便宜的。伏尔加联邦区承担很少的精制糖生产量。^①

（二）主要畜产品生产格局空间异质性

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点,可以将俄罗斯的畜牧业分为农区养畜业和荒漠、半荒漠及山地放牧业两大类,前者主要分布俄罗斯西部地区 and 西伯利亚南部,以养牛、养猪为主,后者则主要分布在中亚和伏尔加河流域南部等地区,以养羊为主,也有一部分养牛。此外,在北部苔原带和森林苔原带还分布着养鹿业。^②

① 参见 FAO, “Russian Federation Sugar sector review”, 2013.
② 田荣华、周博：“俄罗斯农产品生产与消费市场初探”，《世界农业》，2016 年第 9 期，第 125-130 页。

自2004以来，由于俄罗斯实施关税配额，并制定了“2006-2007年国家优先项目”、“2008-2012年农业规划”和“2013-2020年农业规划”，对银行投资信贷给予利率补贴，促进了经营肉类的民营生产组织迅速崛起，肉类产量增长迅速。俄罗斯禽肉行业发展势头最好，其次是生猪，因为这些行业投资回报周期相对较短。^①

1、牲畜和禽类生产格局空间异质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牲畜和禽类生产大幅下滑，2001年产量开始回升，逐渐恢复并超过1992年水平。1992年俄罗斯牲畜和禽类总产量是826万吨，1992-2000年间，牲畜和禽类总产量一直呈下降趋势，2000年总产量降为443.1万吨，比1992年产量减少了46.4%。2001年起牲畜和禽类总产量开始回升，并一直保持上升态势，2015年增加到945.7万吨，比1992年增长了14.5%（见表10）。

伏尔加联邦区和中央联邦区畜牧业都比较发达，是俄罗斯牲畜和禽类的两大主产区，这两个地区牲畜和禽类产量之和占全国牲畜和禽类总产量一半左右。1992-2007年间，伏尔加联邦区是俄罗斯牲畜和禽类总产量最多的地区，其次是中央联邦区。2008年以后，中央联邦区牲畜和禽类总产量超过伏尔加联邦区，跃居全国第一，2015年该地区牲畜和禽类总产量占全国牲畜和禽类总产量的35.6%，伏尔加联邦区退居第二位。

南部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牲畜和禽类总产量分别排在全国第三和第四位。西北联邦区和乌拉尔联邦区牲畜和禽类产量比较接近，约占全国牲畜和禽类总产量6%-7%左右。远东地区牲畜和禽类产量是所有地区中最少的，占全国牲畜和禽类总产量的不到2%。

从牲畜和禽类的细分类别来看，俄罗斯猪肉产量最多的地区是中央联邦区，该地区猪肉产量增长幅度也是全国最大的。俄罗斯所有联邦区的牛肉产量都呈下降趋势。牛肉产量最多的地区是伏尔加地区，该地区牛肉产量占全国牛肉总产量的将近三分之一。中央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的牛肉产量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位，这两个地区的牛肉产量都占全国牛肉总产量的将近五分之一。中央联邦区是禽肉产量最高的地区，也是禽肉产量增长最快、增长

^① 参见 FAO, “Russian Federation Meat sector review”, 2013.

幅度最大的地区。伏尔加地区禽肉产量的增长幅度也比较大，在全国排名第二。南部联邦区的禽肉产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三位。^①

表 10 俄罗斯各地区牲畜和禽类产量（单位：万吨）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国	826	751.3	680.3	579.6	533.6	485.4	470.3	431.3
中央	186.7	165.7	150.4	127.5	118.2	102.2	100.5	95.1
西北	56.8	50.1	43.2	32.6	26.7	23.9	24.6	22.2
南部	153	133.4	118.9	97.9	91.9	81.4	75.5	72.9
伏尔加	210.7	199.6	185.2	163.4	146.5	138.1	138.9	126.5
乌拉尔	56.5	56.3	51.3	44	42.2	37.2	37.7	34.2
西伯利亚	135	123	111.4	99.3	95	91.2	83.9	73.2
远东	27.4	23.3	19.9	15	13	11.4	9.1	7.2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全国	444.6	447.7	473.3	499.3	504.6	499.0	527.8	579.0
中央	97.9	95.5	100.1	104.4	106.6	110.5	122.7	142.8
西北	23.2	25.3	26.8	27.9	27.3	25.6	27.9	27.7
南部	78.0	80.6	86.8	93.7	95.5	98.8	106.1	118.6
伏尔加	127.7	127.2	132.6	137.7	138.6	134.6	140.9	149.6
乌拉尔	34.5	36.0	37.3	38.3	38.7	37.1	37.6	41.9
西伯利亚	75.1	74.8	81.1	88.2	88.2	82.7	82.7	88.3
远东	8.3	8.5	8.7	9.1	9.7	9.7	10.1	10.3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全国	626.8	672.0	716.7	752	809.1	854.4	893.3	945.7
中央	165.7	185.9	205.2	221.8	256.2	294.3	307.4	337.1
西北	31.5	35.4	41.7	47.2	52.3	53.4	57.6	60.7
南部	122.8	128.1	132.4	142	143.7	134.1	140.5	149.2
伏尔加	154.6	161.8	168	164	170.6	179.2	188.7	199
乌拉尔	46.4	49.0	52.5	55.1	58.9	64.2	69.8	71.3
西伯利亚	94.9	99.7	104.6	109.1	114.5	115.8	116.2	116
远东	11.1	12.0	12.4	12.8	12.8	13.4	13.1	12.4

数据来源：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2、奶类生产格局空间异质性

表 11 数据表明，俄罗斯奶类总产量自 1992 年以来一直在持续下降，从

① 参见 FAO, “Russian Federation Meat sector review”, 2013.

1992 年的 4723.6 万吨下降到 2015 年的 3055 万吨，减少了 35.3%。从各地区的情况来看，除了南部联邦区 2006 年之后略有回升之外，所有地区的奶类产量基本上都呈下降趋势。

表 11 俄罗斯各地区奶类产量（单位：万吨）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国	4723.6	4652.4	4217.6	3924.1	3581.9	3413.6	3325.5	3227.4
中央	1145.3	1137.7	1025.8	966.6	861.7	795.1	778.9	763.1
西北	335.4	317.4	273.6	242.9	226.0	217.9	217.0	206.8
南部	644.3	617.6	575.3	527.4	468.3	410.2	403.4	408.5
伏尔加	1317.1	1342.8	1237.1	1160.7	1045.4	1075.4	1065.3	999.3
乌拉尔	334.2	341.5	287.0	263.6	251.8	250.6	238.8	231.5
西伯利亚	819.5	776.2	720.7	681.0	651.6	593.1	554.8	551.3
远东	127.9	119.3	98.2	81.9	77.1	71.1	67.4	67.0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全国	3227.7	3290.5	3350.7	3337.5	3217.5	3114.9	3144.2	3218.0
中央	755.6	762.9	754.4	731.0	686.7	644.2	635.6	625.6
西北	218.6	224.2	221.2	214.1	201.6	193.2	190.5	185.1
南部	434.4	451.2	467.0	473.1	483.3	476.5	491.7	526.0
伏尔加	964.9	998.3	1028.5	1048.3	1021.9	1000.9	1022.6	1061.0
乌拉尔	229.6	218.6	218.1	220.6	212.0	196.3	202.8	206.7
西伯利亚	557.7	570.5	596.8	587.4	551.1	545.4	543.5	555.3
远东	67.0	64.8	64.7	63.0	60.9	58.4	57.5	58.3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全国	3236.3	3257.0	3184.7	3164.6	3183.1	3052.9	3049.8	3055.0
中央	617.2	600.4	575.3	570.8	578.4	549.4	539.3	540.6
西北	180.8	179.1	174.7	174.6	177.6	168.5	170.9	177.6
南部	544.3	557.5	562.2	577.3	601.3	598.1	600.6	604.4
伏尔加	1063.0	1084.3	1040.9	1002.3	1002.5	948.1	946.7	949.3
乌拉尔	205.5	210.5	209.6	208.7	207.8	202.4	199.8	190.7
西伯利亚	567.1	565.6	562.9	572.6	558.3	529.9	538.9	538.7
远东	58.4	59.6	59.1	58.3	57.2	56.5	53.6	53.7

数据来源：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中央联邦区奶类产量的下降幅度最大，从1992年的1145.3万吨下降到2015年的540.6万吨，下降了52.8%，高于全国奶类产量下降的平均水平。伏

尔加联邦区是俄罗斯奶类产量最多的地区，占全国奶类总产量近三分之一的份额。其次是中央联邦区，但该地区奶类产量占全国奶类总产量的比重逐渐下降。南部联邦区因为奶类产量2006年后回升，所以占全国奶类总产量的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15年成为俄罗斯第三大奶类产区。西伯利亚奶类产量占全国奶类总产量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维持在17.5%左右的水平。乌拉尔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的奶类产量都比较少，2015年这三个地区奶类产量之和才占全国奶类总产量的13.8%，远东联邦区是所有联邦区中奶类产量最少的地区。

3、蛋类生产格局空间异质性

苏联解体后的几年内，俄罗斯蛋类产量下降速度非常快，从1992年的429亿个下降到1996年的319亿个，仅4年时间蛋类产量就减少了110亿个，下降了25.6%。1997年俄罗斯蛋类产量开始逐渐回升，到2015年达到420.7亿个，基本恢复到苏联刚解体时的水平（见表12）。

中央联邦区1992-1998年间是俄罗斯蛋类产量最高的地区，该地区蛋类产量超过俄罗斯蛋类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但这比重从1999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到2015年已经降到五分之一左右了。1999年伏尔加联邦区蛋类产量超过了中央联邦区，成为俄罗斯蛋类产量最高的地区，截至2015年一直都位居榜首。

南部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的蛋类产量及其占全国蛋类总产量的比重都比较接近，2015年这两个地区蛋类产量之和占全国蛋类总产量的29.8%。

乌拉尔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蛋类产量比较接近，占全国蛋类总产量的比重都是10%左右。远东联邦区蛋类产量非常少，是俄罗斯所有地区中蛋类产量最低的地区，占全国蛋类总产量的比重不到3%（见表12）。

表 12 俄罗斯各地区蛋类产量（单位：亿个）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国	429.0	403.0	374.8	338.3	319.0	322.0	327.4	331.3
中央	116.8	108.8	101.0	88.9	79.9	81.3	83.7	84.1
西北	45.1	43.3	39.5	34.9	32.0	32.6	33.6	34.0
南部	56.7	51.0	48.0	44.0	43.0	40.1	40.3	40.6
伏尔加	98.2	93.2	89.7	83.4	78.4	80.8	82.3	84.2
乌拉尔	36.5	35.9	32.2	30.4	30.9	33.7	33.4	33.7
西伯利亚	58.5	56.0	51.6	45.7	44.7	44.9	46.1	47.6
远东	17.1	14.7	12.8	10.9	10.0	8.6	7.9	7.2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全国	333.2	344.2	354.4	356.6	348.6	360.8	371.5	370.9
中央	81.8	84.6	83.6	82.6	78.3	78.3	82.1	82.1
西北	36.4	37.4	39.3	38.3	37.4	39.1	39.7	38.6
南部	45.2	49.1	52.6	51.4	50.8	54.9	57.4	57.5
伏尔加	84.5	86.2	89.2	907.7	89.9	93.9	98.0	97.6
乌拉尔	35.2	35.8	37.3	39.1	39.6	40.1	39.1	38.5
西伯利亚	50.0	51.0	52.3	54.5	52.6	54.5	55.2	56.6
远东	7.7	8.2	9.3	9.6	10.4	10.6	10.6	11.2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全国	369.5	383.0	406.0	411.1	420.3	412.9	413.0	420.7
中央	79.9	82.3	85.6	85.6	87.7	85.0	86.2	88.5
西北	38.0	41.6	42.1	43.7	46.4	44.5	43.3	42.1
南部	56.4	57.7	60.6	60.4	60.5	59.3	58.5	60.1
伏尔加	98.0	103.5	106.9	109.0	109.9	106.7	105.6	107.1
乌拉尔	39.5	40.7	40.6	41.4	42.2	43.3	44.2	45.8
西伯利亚	57.6	57.2	58.4	59.4	61.8	62.5	63.3	65.3
远东	11.1	11.3	11.9	11.7	11.9	11.5	11.9	11.8

数据来源：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та) . М.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ublications/catalog/doc_1138623506156

结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各地区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土地、资本和物质投入要素禀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数量、播种面积、牲畜存栏量、农用机械数量、化肥和燃料使用量的减少。俄罗斯不同区域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伏尔加联邦区是全国农业劳动者数量最

多、作物播种面积最大的地区，中央联邦区则是化肥使用量最多的地区。

俄罗斯农业总投入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 2005 年才转为正增长，但增长幅度非常小。农业总产出在 1994-1998 年间迅速下降，1998 年后农业总产出开始回升，2005 年之后农业总产出增速放缓。除了南部联邦区之外的其他地区农业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的比重除了个别年份上升外，总体上基本都呈下降趋势。俄罗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但 2005 年之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放缓。

俄罗斯农业收入、农业总投入增长率、农业总产出增长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区域空间异质性特征。伏尔加联邦区对俄罗斯农业经济增长贡献非常显著，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也是农业收入最高的地区；中央联邦区是主要农业区之一，农业总投入增长率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位居全俄第二；南部联邦区农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农业总投入、总产出和总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是全俄最快的。

俄罗斯各联邦区农业生产格局的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南部联邦区农作物生产优势显著，粮食作物、油料作物和蔬菜产量均位居榜首；中央联邦区畜产品具有明显优势，猪肉、禽肉和甜菜产量最高，也是牛肉、蛋类、奶类和其他农作物的主产区；伏尔加联邦区农作物和畜产品发展比较均衡，牛肉、蛋类和奶类产量全俄最高，粮食作物、向日葵籽、蔬菜、猪肉和禽肉产量全俄第二。西伯利亚联邦区农业经济发展虽然在全俄只处于中游水平，但其畜产品生产能力相对比较强，具有很大的后续发展潜力。乌拉尔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的各项农业经济指标都比较低，农业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

【Abstract】 Russia has vast land area.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labor, land, capital and material input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in each federal reg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 endowment, agricultural income, total agricultural input growth rate,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growth rate,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rat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attern show very obvious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federal reg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mentum is strong in the Southern Federal District. The total input, total output in agriculture and total revenue growth rate of this district is the fastest of Russia. The Volga Federal District is very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agriculture in Russia. agricultural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growth rate is the highest in this region. The agricultural income of this region is the highest of Russia. The Central Federal District is one of the main agricultural areas. The total investment of agricultural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growth rate of this district ranked second in Russia.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attern in the federal regions of Russia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s: The Southern Federal District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crop production. The yields of grain crops, vegetables, oilseeds are the highest in Russia. The Central Federal District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animal products. The yields of pork, poultry and beet are the highest. The development of crops and livestock products in the Volga Federal District is balanced. Both the yields of crops and livestock products are at the forefront in Russia. The yields of beef, eggs and milk of this district are the highest in Russia.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Siberia Federal Region is only the middle level of Russia, it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subsequent development.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Ural Federal District, the Northwest Federal Region and the Far East Federal Region are relatively low, and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backward.

【Key Words】 Production Factor Endowment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patial Heterogeneity

【Аннотация】 Россия имеет обширную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абочая сила, земля, капитал и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вложения как основные факторы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неравномерно распределяются по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округам, как природные данные основных факторов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ак 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доходы,

темпы роста общего объёма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темпы роста валовой продукци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темпы роста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всех элементов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аграр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несут очевид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различий.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аграр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Южном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округе получило мощный импульс развития, темпы роста общего объёма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аловой продукци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доходов является быстрым; Волгоградски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округ внёс заметный вклад в развитие аграр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 Ф., является регионом, где получились высочайшие темпы роста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всех элементов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доходы; Центральны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округ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основных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районов, занимает второе место по темпам роста общего объёма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всех элементов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ая неоднородность структуры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 разных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кругах Р. Ф. выглядит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в Южном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округе имеет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Южны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округ занимает первое место по урожайности зерна, семян подсолнечника и овощей; продукты животноводства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имеют очевид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выход мяса свинины и птицы и урожайность свёклы занимают первое место; развитие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культур и животноводческ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во Волгоградском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округе хорошо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о, и выход продукции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самых высоких, в том числе выход говядины является самым высоким во всей России. Хотя развитие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ибир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находится в среднем течении, но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й потенциал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азные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Ураль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изкие, там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отстало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риродные дан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общая факторная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ь,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е различия

(责任编辑 黄翔)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俄国工业发展特征*

邓沛勇**

【内容提要】19世纪下半叶伊始,俄国工业迅速发展,工业化成就举世瞩目。与西方国家相比,俄国工业发展特征既有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又有其独特性。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工业发展特征如下:第一,工业发展具有典型的循环性和周期性特征,19世纪下半叶尤为突出;第二,工业对外资依赖程度高,外资掌控俄国工业的半壁江山;第三,俄国工业分布不平衡,主要工业部门集中于中部工业区、乌拉尔工业区和南部工业区;第四,在工业分布失衡的过程中,俄国工业重心逐渐南移,以高加索和南俄地区最具代表性;第五,俄国大工业与手工业博弈颇具特殊性,手工业具有顽强生命力;第六,交通运输业是工业发展的推力,水路和铁路运输分别带动石油、煤炭和冶金等工业部门的崛起;第七,大型垄断集团形成,重工业尤甚。

【关键词】俄国工业化 俄国工业周期 俄国垄断集团

【中图分类号】D751.2;F1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I009-721X(2017)06-0177(30)

19世纪下半叶起,在外资、政府政策和交通运输革命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俄国工业化进程开启。19世纪末,俄国工业发展速度世界领先。就具体工业部门而言,1887-1897年间俄国石煤产量从1.1亿普特增至6.8亿普特,铸铁产量从2300万普特增至1.3亿普特,生铁产量从1600万普特增至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17FSS002)的阶段性成果、贵州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科研启动项目《18-20世纪初中亚史研究》阶段性成果。

** 邓沛勇,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3000 万普特，钢产量从 300 万普特增至 7400 万普特，石油产量从 1300 万普特增至 5 亿普特，1890-1899 年间俄国工业产品数量增长 1 倍，其中轻重工业产品总额分别增长 0.6 倍和 1.8 倍。^①19 世纪下半叶俄国工业一度崛起，重工业成就更是突出。通过与西方工业化进程对比，会发现俄国工业化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下文将对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国工业发展特征进行重点分析。

一、工业发展的循环性和周期性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俄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逐渐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对俄国经济史进行归纳和分析，就会发现具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经济发展周期性和循环性特征十分明显，但每个经济周期都有其特殊性；第二，各阶段改革都遇到一定阻力，但经济现代化潮流势不可挡，同时反改革事件不断出现，社会冲突异常尖锐，有时甚至演变成革命和战争；第三，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俄国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行情的掣肘。为更好地分析俄国工业的循环性和周期性特征，笔者除对 19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初俄国工业周期进行梳理外，还分析其理论基础。

俄国经济危机理论以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及其学生康德拉季耶夫的学说最为著名。图甘-巴拉诺夫斯基主要研究俄国经济危机和工业发展循环性和周期性特征，他认为经济危机产生原因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遭到破坏，在市场状况良好时商品需求量增加，生产规模扩大，最终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影响整个工业领域，最终致使所有商品价格降低，市场萧条。康德拉季耶夫在 18 世纪至 20 世纪初世界各国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首创长波理论，他指出经济周期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规律，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其周期为 7-11 年。康德拉季耶夫发展图氏的经济周期理论，首创长波，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在每个长周期上升波开始前，有时在上升波最初阶段社会经

^① Доннгаров А.Г. Иностраннй капитал в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М.,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0. С.30.

济生活条件会出现显著变化；第二，通常上升波时段的重大社会动荡和巨变（革命、战争）明显多于下降波时段；下降波通常伴随着工农业长期萧条；第四，与长周期下降波重叠的中周期应当表现出长期极度萧条、上升短暂乏力特征。^①康德拉季耶夫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分为3个波长为48—55年的长周期，并且每个长周期都由上升波（也称上升期）和下降波（也称下降期）组成。工业提升时期为创业高涨期，萧条时期为创业低谷期。工业提升和衰落期交替性特征在俄国工业史中表现明显。

为更好研究俄国工业周期性和循环性特征，笔者分两个阶段进行研究，第一阶段为19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第二阶段为19世纪90年代至一战期间。选择上述两个阶段的原因有二，一是足以突出俄国经济的周期性；二是通过分析经济周期可得出俄国工业发展的循环性特征。经济高涨和萧条交替出现是俄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这也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影响俄国工业波动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具有的周期性。下面就对19世纪90年代前俄国几次工业危机进行阐述：

第一次，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对西欧和北美冲击严重，但对俄国影响较弱。即便如此，19世纪50年代末期部分银行、股份公司、工商业企业还是相继倒闭，出现贸易萧条和生产停滞状况，此次危机一直持续至19世纪60年代。

第二次，19世纪70年代初西欧出现疯狂创业热潮，德国和奥地利尤甚，加上1873年5月美国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欧洲。1870—1872年间俄国经济飞速发展，1873年工商业危机来临，此时恰逢俄国第一次铁路建设热潮，经济危机波及范围有限。随着产品需求量大增、居民购买力增加、金融业快速发展，工厂主纷纷扩大生产。即使后期商品价格开始回落，产品销售困难，生产仍持续增长。1875年粮食歉收后俄国经济危机到来，商品价格快速降低，生产缩减，银行相继倒闭，工业受其波及最为严重。

^① Кондратьев Н.Д. Большие циклы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опросы конъюнктуры. 1925. Т.1. Вып.1. С.48, 54, 55, 58; Кондратьев Н.Д. Мир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его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о время и после войны. Вологда, 1922; Кондратьев Н.Д. Спорные вопросы мир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кризис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1923. №.4-5.

第三次, 经历一段时间萧条后, 1878 年起, 市场行情变好, 投资热潮重新出现, 生产又快速增长, 一直持续至 1879-1880 年冬季。此次增长在棉纺织工业表现尤为突出, 1879 年纺锤数量增加 90 万个, 俄国纺锤总量达 350 万个,^①但 1879 年下半年开始第三次经济危机来临, 危机一直持续至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

第四次, 1882 年俄国第四次经济危机来临, 1882 年巴黎联合银行倒闭, 1884 年美国的经济萧条再次出现。1882-1886 年间生产萎缩和商业萧条景象随处可见, 机器制造业和纺纱工业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为严重。1882 年商品交易量明显降低, 下诺夫哥罗德展销会棉纱交易量下降 25%,^②1887 年之前工业一直萧条。1882 年工业危机与前三次工业危机相比, 影响范围较广。

1895-1896 年起, 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史无前例的经济提升时期,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国工业周期性特征最为明显。19 世纪 90 年代是俄国工业飞速发展和高涨时期、受 1901-1903 年间世界经济危机、日俄战争和 1905 年国内革命影响, 1901-1908 年是俄国工业衰退和萧条时期, 1908-1914 年间为俄国工业复苏阶段,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各工业部门发展状况各异, 下文将对此经济周期进行专门阐述。

第一, 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工业高涨期。19 世纪 90 年代为俄国工业布局 and 结构都发生明显变化。新工业中心出现, 新式企业大量诞生。根据轻重工业发展状况, 此时期可划分为三个子阶段, 即 19 世纪 80 年代末的经济增长期、1890-1891 年低谷期和 1892-1900 年高涨期。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工业企业数量增长 1/5, 工人数量增加 2/3, 生产总量增长 1 倍, 煤炭、矿石、石油、铸铁和钢产量分别增加 1.7、2.5、1.6、2.2 和 1.8 倍, 其中石油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 南俄金属产量增长 6 倍, 工业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五位, 经济增长规模遥遥领先。^③经历 19 世纪 90 年代经济高涨后, 1900 年俄国工

①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И. Избранное.Русская фабрика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Истор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Т.1.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усской фабрики в XIX веке.М.,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22. С.254.

② Ковнир В.Н.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и России.М., Логос, 2005. С.215.

③ Чунтулов В.Т, Кривцова Н.С, Чунтулов А.В, Тюшев В.А.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7. С.94; Конотопов М.В, Сметанин М.В.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М., Логос. 2004. С.78.

业达巅峰期。1900 年世界经济危机来临，俄国工业也步入萧条期。

第二，1901-1908 年是俄国工业衰退和萧条期。1901 和 1902 年俄国倒闭企业数量分别为 1016 和 840 家，大量工人失业。^①1903 年工业开始回暖，但因日俄战争和 1905 年革命影响，此势头被迫中断，军费就达 26 亿卢布，^②此次俄国工业萧条一直持续到 1908 年，某些部门持续至 1909 年。国际金融市场上俄国债券和股票滞销，外资流入量锐减。工厂和仓库中存有大量原料、燃料、建筑材料和工厂制品，产品大量积压。重工业部门只有能源工业缓慢增长，木材加工和化学工业停滞不前，采矿、冶金和硅酸盐工业明显衰落。铁路建设速度放缓，建筑业日趋萧条，但轻工业发展迅速。

第三，1909-1913 年为俄国工业复苏期。1909 年俄国工业再次步入经济提升期，与 19 世纪 90 年代相比，铁路和外资虽然仍是促进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次复苏主要归功于国内资源广泛开发和各经济部门平衡发展。一战前夕俄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接近 1887-1900 年水平，个别工业部门甚至超过 19 世纪末增长速度，但能源工业增速明显低于 90 年代同行业增长速度。一战前夕经济提升改变俄国各经济部门间关系，众多工业部门重新崛起。粮食收成较好也是该阶段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粮价提高致使俄国粮食出口量大增，农民收入增加导致国内市场范围扩大。

与 19 世纪 90 年代经济提升一样，20 世纪经济提升期重工业部门中加工业，如燃料加工、金属冶炼、建筑材料、酸碱制品生产等行业快速发展，同时高技术工艺部门发展势头良好，如炼焦、石油蒸馏、有色金属冶炼等工业部门。与 19 世纪 90 年代经济提升不同的是，此时经济增长并非依靠铁路和建筑行业，经济增长多元化特征十分明显，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都有所提升。虽然笔者只是着重对 19 世纪中期至一战期间俄国工业的周期性和循环性特征进行描述，但从中亦可看出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俄国工业发展的循环性和周期性特征，以及世界经济周期对俄国工业的影响，俄国工业发展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外资依赖程度高，外资渗入俄国诸多工业部门。

① Ковнир В.Н.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и России. М., Логос, 2005. С.254.

② Чунгулов В.Т, Кривцова Н.С, Чунгулов А.В, Тюшев 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7. С.114.

二、俄国工业对外资依赖程度高

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政府认识到工业重要性，但在资金、技术匮乏的状况下，只能引进外资发展本国工业。同时，外国企业主也意识到，与出口商品和购买债券相比，直接投资利润更高，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外国资本不断涌入俄国。在外资作用下，俄国诸多工业飞速发展，重工业尤甚，但因外资涌入众多工业部门，对俄国工业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更好阐述外资对俄国工业的影响程度，笔者从俄国引进外资的开端和强化、主要投资领域、20 世纪经济危机和提升时期外资状况和不同时期各国外资比例等角度，分析俄国工业对外资的依赖程度。

俄国引进外资的开端。借助外资发展俄国工业的思想始于彼得一世，1702 年彼得一世颁布法令鼓励外国人赴俄投资，欲借助外资在俄国创建先进工业部门。19 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后，手工工场被资本主义工厂所代替，手工劳动也被机器劳动所代替，俄国政府也意识到本国工业的落后性，打算利用外资、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本国工业。1861 年农奴制改革前就有大量外资涌入俄国，外资主要投入纺织部门，外国公司在俄国主要采用两种经营模式，即独资公司和股份制企业。

1805 年德国人创办的亚历山大洛夫纺织工厂第一次安装蒸汽发动机和英国纺纱机，此后英国机器和纺织技术在俄国迅速传播，1812 年莫斯科已拥有 11 家大型纺织工厂，^①但多属法国人和德国人所有。外国企业主参与俄国纺织工业后，纺织品产量增长近 50 倍，俄国棉纺织品不但可以自给，且开始出口亚洲国家，纺锤数量已从 19 世纪 40 年代的 35 万个增加至 50 年代的 160 万个，棉纺织生产技术日趋完善。^②与此同时，进口纱线数量大幅度降低，棉纺织品产量迅速提高。俄国政府依靠国际金融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筹集资金，1832-1861 年，发行国债和股票收入达 68 亿卢布，但支出金额

①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С.72.

② Чунтулов В.Т, Кривцова Н.С, Чунтулов А.В, Тюшев 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74;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С.73.

为 81.8 亿卢布，亏损 13.8 亿卢布，俄国政府也因此债务缠身。^①为保护本国工业，俄国政府以提高关税为依托来增加外国企业家投资俄国工业的兴趣，借助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发展俄国工业。

1861 年改革后外资投入领域改变。改革后初期，外资仍主要投向纺织工业。1861 年股份制公司佩特洛夫纺纱和织布工厂成立，工厂注册资本为 1200 万银卢布，英国人为该工厂大股东。此后，比利时人、法国人也开始投资纺织领域，同时外国企业主开始关注其他工业部门，如食品和造纸等行业。^②19 世纪下半叶，俄国境内外国人创办企业数量共 374 家，其中德国人创办企业数量最多，其次为奥地利、英国、法国、瑞典、土耳其、希腊人所建企业，其创办的企业数量分别为 212、41、37、29、16、12、8 家。^③1877 年，俄国政府规定进出口货物以黄金结算，关税提高近 40–50%。^④国外投资者对俄工业直接投资的兴趣倍增，提高关税成为刺激俄国工业增长的有力杠杆。改革后外国企业家投资俄国实业的热忱提高，1861–1881 年外国人创办的股份公司数量从 54 家增至 356 家，股份资本从 3500 万卢布增加至 3.3 亿卢布。^⑤

在政府推行新关税政策之后，国外投资者开始关注俄国重工业部门，如采矿、冶金、金属加工、化学、机器制造和电力等部门。这些部门都需雄厚的资金做后盾，因本国企业主资金有限，很多重工业部门中外资占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俄国重工业部门快速发展。俄国石油产量从 1870 年的 170 万普特增至 1880 年的 2150 万普特。^⑥19 世纪末俄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石油出口

①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С.75; Ковнир В.Н.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ки России. М., Логос, 2005. С.176.

② Лаверычев В.Я.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тексти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С.140.

③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в.). С.102.

④ Чунтулов В.Т, Кривцова Н.С, Чунтулов А.В, Тюшев 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93.

⑤ Гусейнов Р.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М.,1999. С.217;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С.99; Чунтулов В.Т, Кривцова Н.С, Чунтулов А.В, Тюшев 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92.

⑥ Чунтулов В.Т, Кривцова Н.С, Чунтулов А.В, Тюшев 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92;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С.104; Конотопов М.В, Сметанин М.В.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С.78.

国之一，20 世纪初其石油产量达世界总采油量的一半，出口量大增，曾一度超过美国。在外资和外国企业主帮助下，新式石油、煤炭、金属冶炼、机器制造和化工企业数量大增，1890 和 1900 年俄国 25%和 50%的股份资本由外国人掌控。^①

经济危机期间外资投入量降低。20 世纪初俄国政府继续推行引进外资政策，但世界经济危机致使俄国经济状况恶化，各国对俄投资数额明显减少，许多股份公司状况也不佳。20 世纪初国外投资占俄国经济总投入 40%左右，^②因俄国经济对外资依赖程度较高，外资投入量减少和股份公司状况恶化对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重工业部门外资比例最高，1900 年外资分别占采矿、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化学工业投入资本的 70%、72%和 31%，南俄 18 家大型冶金工厂中只有 4 家属俄国人所有。^③1908 年俄国经济行情好转，1909-1913 年间俄国外资涌入量明显增加，此阶段外国资本年投入量高于 1893-1900 年间，外资在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也从 1885-1899 年的 7.7%增至 1909-1913 年的 13.5%。^④俄国工业的集约化程度逐渐增强。

一战前外资投入量增加。一战前夕俄国共有 327 家外国人参股的股份公司，外国资本所占比例达 33%。^⑤各工业部门中外资所占比例如下：采矿和冶金工业、化学、电力、银行和建筑工业中外资比例分别为 53%、40%、75%、40%和 40%。^⑥1906-1913 年间俄国共创建 88 家外资公司，其资本达 1.6 亿卢布，至 1913 年，俄国工业中外资投入已达 13.4 亿卢布，外资主要投向采

① Чунтулов В.Т, Кривцова Н.С, Чунтулов А.В, Тюшев 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92.

②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в.). С.158.

③ Чунтулов В.Т, Кривцова Н.С, Чунтулов А.В, Тюшев 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93.

④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в.). С.158.

⑤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С.160; Крицман Л. Рус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перед революцией// Ежегодни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М.,1923. С.334.

⑥ Сидоров А.Л. Значение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удьбах нашей родин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Т.25.С.8; 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С.160.

矿和冶金工业，外资投入比例高达 54.7%。^①需强调的是，各国资本投资俄国工业的方式有所不同，法国和比利时投资者主要通过直接投资和购买俄国公司股票方式投资俄国工业，德国投资者新建公司和购买股票比例分别为 1/4 和 3/4，而英国投资人主要以新建公司方式投资俄国工业。一战前，法、比、德和英国投入俄国的外资数量为 25.3 亿、14.4 亿、37.8 亿和 22.6 亿卢布，大多流入重工业领域。^②

不同时期俄国工业中各国资本的比例不同。1880 年法国资本占据第一位，数额为 3140 万卢布，占外资比例的 32.4%，其后相继是英国和德国，其投资数额和比例分别为 3010 万、2980 万卢布和 31.1%、30.6%。1890 年德国资本占据第一位，其数额和比例分别为 7900 万卢布和 36.7%，法国和比利时资本紧随其后。1900 年占据第一位的是比利时资本，与上一阶段相比，其投资额增长了近 11 倍，数量和比例分别为 2.9 亿卢布和 32.5%。随后是法国、德国和英国资本，其比例分别为 24.8%、24.1%和 15 %。1915 年法国资本又占据第一位，其数额为 6.8 亿卢布，其次是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资本，其金额分别为 5.3 亿、4.3 亿和 3.1 亿卢布。^③

俄国工业高度依赖外国资本。1914 年俄国 52%的银行资本由 7 家大型银行掌控，^④这些银行实际上都是外国银行子公司。1861 年改革后，俄国通过贷款、发行有价证券和鼓励外国人赴俄建厂等方式引进国外资本。1900 年外资约占俄国股份公司总资本的 29%，一战前夕提高至 33%。工业严重依赖外国资本，1916 年俄国外资总投入量增加到 22.5 亿卢布，约占工业投资

① Чунтулов В.Т, Кривцова Н.С, Чунтулов А.В, Тюшев 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116.

② Доннгаров А.Г.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С.20-21; Бовыкин В.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 России от истоков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101.

③ Оль П.В.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капиталы в народн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Дово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С.28.

④ От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СССР 1917-1937 гг. В 2-х томах. М., 1981. Т.I. С.55.

总额的三分之一。^①外国资本垄断南俄 70%的冶金业、高加索地区 60%的石油开采量和 90%的电力企业。^②以上描述足以说明俄国工业的外资依赖程度，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可左右俄国经济。除外资依赖程度高外，俄国工业布局严重失衡，大工业主要集中于中部工业区、南俄、乌拉尔和波罗的海工业区，伏尔加河流域、远东、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工业发展严重滞后。

三、俄国工业分布不平衡

俄国工业布局严重失衡，大工业集中于欧俄地区，西北部地区大企业都集中于圣彼得堡。中部工业区、南俄、乌拉尔、西北部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企业数量占全俄企业总数的 57.8%，产值占全俄工业总产值的 64.7%，工人数量约为全俄工人总数的 68.5%。^③各地区生产集约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差距较大，如南俄和波罗的海地区为集约型生产模式，而乌拉尔和中部工业区则为粗放型生产模式。因篇幅有限，笔者只对乌拉尔工业区、中部工业区和西北部区进行阐述，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业城市加以论述，南俄和高加索工业区将在下文着重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乌拉尔工业区。乌拉尔工业区西邻伏尔加河流域，东接西伯利亚工业区，北与北部工业区相连，南达哈萨克斯坦边境。因乌拉尔工业区地理位置优越，它在沟通俄国中部与西伯利亚地区，以及中亚和中国商品交流中作用巨大，其中卡马河水路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尽管乌拉尔工业区距首都较远，人口稀少，但河流为该地区创造便利的运输条件，矿产资源丰富为该地

① 俄国学者对革命前投入至俄国工业中外资数额存在分歧，B.C·季夫教授认为，1917 年投入俄国工业的外资数额为 14.3 亿卢布，其中采矿工业为 7.7 亿卢布、冶金和机器制造业为 3.5 亿卢布、化学工艺为 8000 万卢布，纺织和食品工业分别为 1.2 亿和 3600 万卢布。[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99 页；Доннгаров А.Г.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21;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 России от истоков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100.

② Истор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ССР. В 6-ти т. Т.I. Совет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1917-1920 гг. М., 1976. С.19.

③ Динам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связи с развитием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за 40 лет(1887-1926). М.-Л., 1929. Т.I. ч.I. С.7-8.

区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该区域主要河流为丘索瓦河、卡马河、乌法河和白河等，这些河流可把乌拉尔冶金产品运至俄国中部地区。因乌拉尔地区工业以冶金业为主，笔者从冶金业入手分析乌拉尔工业区的发展特征。

1917 年以前乌拉尔是俄国著名冶金中心，南俄冶金业崛起之前，乌拉尔铁制品产品独占鳌头。1800 年乌拉尔生铁产量约占全俄生铁产量的 81.1%、铸铁比例为 88.3%。1740–1800 年乌拉尔生铁产量增长 6.4 倍，其中国有工厂生铁产量只增长 1.2 倍，私人工厂冶金产品数量激增。^①19 世纪乌拉尔冶金业飞速发展，生铁和铸铁产量无人能及，曾跃居世界第一位。

19 世纪中期以后乌拉尔冶金业逐渐衰落。1860 年乌拉尔地区有 154 家冶金企业，只有 7% 的冶金工厂使用蒸汽机。因技术落后，乌拉尔冶金业无力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竞争。^② 19 世纪下半叶乌拉尔仍是俄国重要冶金中心，1869 年乌拉尔铸铁产量为全俄总产量的 70.7%，但 1900 年降至 27%，同期生铁比例从 78.5% 降至 27%。^③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乌拉尔冶金工厂仍采用传统生产方式，农奴制残余明显，严重阻碍冶金工业的现代化。即便乌拉尔冶金业衰落，但该地仍是俄国重要的工商业中心。20 世纪初乌拉尔工业区贸易最发达地区为叶卡捷琳堡省，1900 年该省共有 866 家商业机构，流动资金数量达 2800 万卢布，奥伦堡、彼尔姆和乌法省商业机构数量分别为 1068、877 和 795 家，流动资金数量分别为 2360、1900 和 795 万卢布。^④

中部工业区。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中部工业区工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工业区，该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丰富资源和便利的交通，工业发展迅速。中部工业区包含省份诸多，其中以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卡卢加、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特维尔、雅罗斯拉夫省最为著名。中部工业区西与波兰、南俄工业区相邻，北接北部工业区，同时因其便利的交通位置，又通过奥卡

① Алексеев В.В, Гаврилов Д.В.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Урал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Наука. М., 2008. С.352.

② Алексеев В.В, Алексеева Е.В, Зубков К.И, Побережников И.В. Азиатская Россия 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динамике XIX–XX века. Наука, М., 2004. С.500.

③ Там же. С.501.

④ История Урала в период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 1990. С.112; Скубневский В.А, Гончаров Ю.М. Города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я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начале XX в. Часть I. Насе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лта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Барнаул., 2003. С.208.

河与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相连。因该地区森林覆盖率较高,燃料充足,又与中部黑土区相邻,粮食供应有保障,乌拉尔地区铁制品也可经卡马河转运至莫斯科,这些因素都是刺激中部工业区崛起的重要推力。中部工业区是俄国传统工业区之一,该地工商业发达,为更好阐述本工业区状况,笔者分别以莫斯科工业和下诺夫哥罗德商业为例论证该地区的重要意义。

工业。中部工业区以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省工业最发达,纺织业最为繁荣。莫斯科有很多大型工厂,也是俄国农民外出打工的主要场所,特维尔、科斯特罗马和雅罗斯拉夫等省则是俄国产粮大省。丰富资源和便利交通奠定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莫斯科近郊煤田虽无法与顿巴斯煤田相比,但19世纪中期以前燃料足已自给。中部工业区实际上是俄国重要的经济、工业、金融和文化中心之一。中部工业区人口稠密,其中以莫斯科省居民数量最多,1811年莫斯科人口仅为27万人,19世纪中期和1917年人口分别增至40万和240万人。^①莫斯科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地处水陆交汇处,便利的交通为工商业发展奠定基础。莫斯科纺织工业发达,周围农民纺织手工业迅速发展,18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周围居民开始从事手工织布。农民手工工场逐渐转换为大型工厂。19世纪末莫斯科棉纺织工业最为发达,大型工厂数量明显超过彼得堡和弗拉基米尔省,该省大型纺织厂数量为21家,而彼得堡和弗拉基米尔省该类工厂数量分别为16家和13家。^②十月革命前莫斯科已成为大都市,工商业繁荣,此外,莫斯科冶金业、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也十分发达。

商业。中部工业区除莫斯科工业发达外,还有19世纪俄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即下诺夫哥罗德展销会。马卡里耶夫集市为下诺夫哥罗德展销会前身,该市场产生于16世纪,1917年前数百年间都是俄国乃至欧洲重要的贸易场所。1817年后,马卡里耶夫展销会定期在下诺夫哥罗德举行,1825、1832、1840年下诺夫哥罗德展销会的销售额分别为1146万、2904万、3883万卢

① Водарский Я.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города (факты, обобщение, аспекты).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М., 2006. С.232;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А. От Волги до Балт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о водных путях и судоходстве. С-Пу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одны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С.38; Сахаров А.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начала XVIII до конца XIX века. С.302.

② Пажитнов К.А.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тексти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и СССР. М., 1958. С.91.

布,该展销会销售额长期独占鳌头。1825年和1852年下诺夫哥罗德集市销售额分别为1270万和5750万卢布,^①该地区发展规模不容小觑。19世纪下诺夫哥罗德展销会在俄国的地位首屈一指,工业品交易比例逐渐上升,50年代初期冶金产品占市场产品总量的15%、纺织品占26%。1856年和1860年下诺夫哥罗德展销会商品交易额分别为1.4亿和2.6亿卢布。^②19世纪中期俄国共有4000多个展销会,各展销会参展商品价值为1.6亿卢布,运至下诺夫哥罗德展销会的货物价值为0.8亿卢布。^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下诺夫哥罗德展销交易额明显下降,但下诺夫哥罗德港口仍是俄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转运地之一。中部工业区不但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而且还拥有弗拉基米尔、莫斯科等大型工业城市和发达的下诺夫哥罗德展销会,19世纪中期以前在各大工业区中独占鳌头。

西北部工业区。该区主要包括圣彼得堡、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等省份。^④圣彼得堡为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该地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仅1861-1900年圣彼得堡省工人数量增长9倍,1917年圣彼得堡省人口达200万。^⑤西北部工业区是俄国最小的工业区,与波罗的海相连,也称之为波罗的海工业区。为更好探析西北部工业区在俄国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笔者以圣彼得堡为例,以其工商业状况入手论述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征和重要性。

贸易。圣彼得堡崛起始于彼得一世迁都,1712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贸易额从300万卢布降至30万卢布,18世纪20年代圣彼得堡贸易就达400万卢布,港口停泊国外船只数量达数百艘,19世纪初波罗的海沿岸港口贸易量占国内海洋贸易额88.5%。^⑥圣彼得堡最初兴起主要依靠对外贸易和俄

①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著:《俄罗斯史》,第316页。

② Халин А.А. Система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го поволжья и ее роль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региона(30-90 гг. XIX в.). Н.Новгород, 2011. С.91.

③ Там же. С. 91-93, 105-106, 183.

④ Сметанин С.И., Конотопов М.В. Развити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крепостной России. С.46, 49, 52.

⑤ Водарский Я.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города(факты,обобщение, аспекты). С.232;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А. От Волги до Балтик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о водных путях и судоходстве. С-Пу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одны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С.38; Сахаров А.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начала XVIII до конца XIX века. АСТ,М., 2001. С.302.

⑥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линка. Ветер Балтики. Лениздат, 1980. С.76, 98.

国政府的政策。18 世纪彼得堡就已成为俄国最大的贸易中心，通过西北三条人工运河、伏尔加河水路与内陆城市相连，国内货物也通过伏尔加河水路和铁路运至圣彼得堡，19 世纪圣彼得堡还是俄国重要粮食交易中心。伏尔加河水路主要向圣彼得堡运送粮食、木材、石油和盐等货物，其中以粮食和石油为大宗，1901 年运往圣彼得堡的小麦、小麦粉、黑麦、黑麦粉、燕麦和大麦的数量为 1.06 亿普特。^①1909-1913 年伏尔加河水路和铁路粮食输出量分别为 1.14 亿和 1.42 亿普特，粮食主要输往西北部工业区。^②十月革命前圣彼得堡一直是俄国大型粮食贸易港口之一，也是重要的工业和贸易中心。

工业。因圣彼得堡矿产资源贫瘠，所以不能像乌拉尔和南俄一样发展冶金工业，最初以轻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为主。18 世纪圣彼得堡纺织业就有所发展，因该地交通便利，可从国外运进先进设备和廉价原料，棉纺织工业明显较其他地区发达。1798 年圣彼得堡就创立俄国第一家大型纺纱工厂亚历山大洛夫国有手工工场，19 世纪中期，圣彼得堡已成为俄国大型工业和贸易中心之一，但因劳动力、燃料和原料所限，工业发展处处掣肘。农奴制改革后自由劳动力数量增加，工业革命后西欧先进技术传入俄国，圣彼得堡工业快速发展。圣彼得堡是俄国大型工业中心，1860 年初就已有 140 家工厂，此年度又新建 70 家工厂，1870 和 1880 年新建工厂数量分别为 100 和 120 家。^③1850-1860 年初圣彼得堡主要工业部门为纺织、金属加工工业，手工业也十分发达。1860-1880 年圣彼得堡建成许多现代化机器制造厂，产品不但可保证本地居民需求，且远销国内其他地区。

19 世纪下半叶中部工业区比重开始强化，不论是工人数量，还是产品总价值以及产品质量，该区域都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纺织、机械制造、电力、化学及水泥等工业部门。西北部地区因机器制造业、纺织工业和造纸业发展速度放慢，但化学和皮革加工业发展迅速。尽管乌拉尔冶金工业未迈向新发展阶段，但其发展速度仍不亚于国内工业发展总速度。19 世纪末俄国

① Давыдов М.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рынок в конце XIX-начале XX вв. 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С.53.

② Тагирова Н.Ф. Рынок Поволжь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С.195.

③ Даринский А.В, Старцев В.И. Истор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XVIII-XIX вв.: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Изд. 2-е. Филма «Глагол», СПб., 1999. С.141.

工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是高加索的石油工业、南俄冶金和采煤工业，高加索和南俄地区在俄国工业体系中的比重增加，俄国工业重心南移特征凸显。

四、19 世纪末俄国经济重心南移

19 世纪末俄国传统工业区逐渐衰落。乌拉尔工业区因技术落后，金属产量锐减，其冶金中心地位被南俄代替，加上高加索石油工业飞速发展，南俄和高加索地区在俄国工业中所占比重较高，俄国工业重心出现南移趋势，笔者就以南俄煤炭和高加索石油工业成就来探析俄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

燃料结构矿物化是衡量一个国家能否完成工业化进程和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矿物燃料推动各国工业化进程，俄国也不爱如是。虽然 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煤炭工业就有所发展，但每年仍需从国外进口大量煤炭，木质燃料所占比例较高，传统乌拉尔冶金基地和诸多工业部门燃料仍以木柴为主。19 世纪 80 年代能源工业崛起后，石油和煤炭产量迅速提升。因能源工业勃兴，19 世纪末燃料结构中矿物燃料比例已达 70%，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国完成燃料结构由木质燃料向矿物燃料的转变过程。^①

1917 年以前俄国石油工业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8 世纪至 19 世纪 70 年代初，是俄国石油工业初始阶段，该阶段采油量低、开采方式落后，但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俄国采油量在世界上依然独占鳌头。第二阶段为 19 世纪 70 年代至 1900 年，该阶段凭借资源、资金、技术和政策等优势，高加索地区石油工业迅速崛起，石油不但可以自给，还大量出口国外。此阶段俄国采油量一度超过美国，主导世界石油市场，1898 年俄国石油产量达 6.3 亿普特，占世界总采油量的 51.6%，1901 年俄国石油开采量达最高

^①Баканов С.А. Уголь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Урала: Жизненный цикл отрасли от зарождения до упадка. Челябин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ОО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2. С.45; Кафенгауз Л.Б. Эволю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России(последняя треть XIX в. — 30-е годы XX в). М., Эпифания, 1994. С.131.

值，超 7 亿普特；^①第三阶段为 1901 年至十月革命期间，该阶段俄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历经世界经济危机、日俄战争、1905 年革命、一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石油工业长期衰落，很难再回到 1900 年以前的水平。

巴库油田。1884、1890、1895 和 1901 年高加索地区采油量占全俄总采油量的 98.9%、98.7%、93%和 95%，20 世纪初高加索地区仍是俄国最大的石油开采地，1913 年高加索地区采油量约占全俄总采油量的 97%，而巴库采油量占全俄总采油量的 82%。^②虽然格罗兹尼和迈科普等地石油工业有所发展，但无法与巴库石油工业相媲美。1870–1879、1880–1889 和 1890–1899 年间，巴库地区年均采油量分别为 744 万、1.0 亿和 3.6 亿普特。90 年代巴库地区采油量增长 1.3 倍，此时美国石油开采量只增长了 0.2 倍，世界石油市场上俄国采油量比例由 1890 年的 38%增加至 1900 年的 51%，而美国采油量比重从 60.1%降至 43%。1897 年起俄国采油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③19 世纪末矿物燃料结构中石油作用首屈一指，俄国国内石油燃料需求量从 1887 年的 1769 万普特增至 1900 年的 3.3 亿普特，燃料动力体系中石油产品比例从 3%增至 24%。^④随着采油量的大幅度提高，石油加工业也迅速崛起。

① Ахундов В.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23;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1883-1914. С.19; Маевский И.В. Экономика рус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8; Натиг А. Нефть и нефтяной фактор в экономике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в XXI веке. С.111; Матвейчук А.А., Фукс И.Г.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39-40; Менделеев Д.И.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444; Ковнир В.Н.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ки России: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М., Логос, 2005. С.87; Хромов П.А.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Изд-во ВПШ и АОН при ЦК КПСС, 1963. С.137; Лившин Я.И. Монополии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М.,Изд-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1. С.323, 328.

② Менделеев Д.И.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М.,Изд-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С. 445; Мир-Бабаев М.Ф.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й нефть. Баку., Азернешр, 2009. С.40;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54. С.345.

③ Ахундов В.Ю.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13; Иголкин А.А. Источники энерги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188.

④ Кафенгауз Л.Б. Эволю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России(последняя треть XIXв.-30-е годы XXв). С.31.

石油加工业快速发展。随着阿普歇伦半岛采油量迅速增加，石油加工业也快速发展，19 世纪 70 年代起巴库炼油厂数量迅速增加。1872 年石油加工工厂数量为 50 家，煤油产量约为 40 万普特，1879 年工厂数量达 193 家，煤油产量达 622.5 万普特。煤油产量的迅速增加，使巴库地区成为全俄煤油生产和贸易中心，1884 年起俄国停止从国外进口煤油。^①至 1887 年，国内采油量达 1.6 亿普特，巴库地区煤油供货量为 2440 万普特，煤油出口量为 1159 万普特。^②1890 年巴库地区已有 148 家石油加工厂，1893 年其数量缩减至 73 家，但煤油产量从 1890 年的 6800 万普特增加到 9000 万普特。^③自 19 世纪 80 年代起，俄国煤油开始出口国外，因巴库煤油价格低于美国煤油，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断加强，逐步冲击美国石油。^④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南俄煤炭和冶金工业对俄国经济影响更为突出，20 世纪初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超过高加索石油工业。

俄国煤炭工业发展较早，彼得一世时就成立专门机构勘探煤炭，但 18 世纪俄国煤炭主要从英国进口。随着俄国经济不断发展，煤炭开采量迅速增加，1860 年，俄国采煤量已达 1800 万普特，但远落后于西欧国家。^⑤俄国主要产煤区为顿涅茨克、莫斯科近郊、东布罗夫和乌拉尔煤田。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东布罗夫和莫斯科近郊煤田采煤量较高，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顿涅茨克煤田采煤量无人能及。

19 世纪下半叶顿涅茨克煤田崛起。19 世纪中期以前顿涅茨克煤田小煤

① Менделеев Д.И.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440;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 С.260; Першке С.и Л. Русская нефтя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ее развитие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в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данных. С.29.

② Кафенгауз Л.Б. Эволю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последняя треть XIXв.-30-е годы XXв). С.27.

③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360.

④ Наниташвили Н.Л. Экспанс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С.47.

⑤ Баканов С.А. Уголь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Урала: Жизненный цикл отрасли от зарождения до упадка.С.42; Иголкин А.А. Источники энерг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1. С.137; Дьяконова И.А. Нефть и уголь в энергетике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ях. М., РОССПЭН, 1999. С.165.

矿占主导，但南俄铁路修建后，大企业作用日渐突出。19 世纪 60-80 年代，顿巴斯矿区先后修建格鲁什夫-顿涅茨克铁路、格鲁什夫-叶卡捷琳斯拉夫、康斯坦丁等铁路，铁路修建对煤炭工业影响巨大。当时铁路多为私人所有，税费较高，铁路运输高税率严重制约南俄工业发展。19 世纪 60 年代顿涅茨克未通行铁路之前，燃料需求量有限，顿涅茨克煤田产量波动较大，其采煤量为全俄总采煤量的 28-49%。70-80 年代铁路修建后，其采煤量比例为全俄总采煤量的 40%-50%。90 年代上半期其采煤量比例已稳定在 50% 以上，1897-1900 年更达到 60% 以上，大型冶金工厂都使用顿巴斯焦炭充当燃料。19 世纪末顿巴斯煤炭比重逐年增加，1898、1899 和 1900 年其比例分别为 61.5%、66.0% 和 68.1%。^①能源工业对俄国工业的影响主要包括两部分，其直接影响为能源工业发展直接推动诸多工业部门崛起，如石油工业带动石油加工业和造船业、煤炭工业拉动冶金业和炼焦部门发展，此影响较为直观。其间接影响主要体现于矿物燃料在工业和运输业广泛使用后，俄国燃料结构矿物化最终完成，交通运输革命也随之完成。能源工业成为促进俄国工业化顺利完成的有力杠杆。随着俄国煤炭工业发展，莫斯科近郊和东布罗夫煤田采煤量逐渐下降，顿涅茨克煤田作用与日俱增。革命前俄国持续从国外进口煤炭，但因煤炭资源丰富和交通设施逐步完善，除波罗的海地区外，俄国煤炭逐渐垄断国内市场。与此同时，俄国煤炭工业生产集中程度逐渐加强，大公司垄断煤炭工业。俄国工业和运输业发展都与煤炭工业密不可分，该部门不但为南俄冶金业繁荣奠定了基础，还是南俄经济迅速崛起的重要推力。因 20 世纪初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局势所致，俄国石油工业停滞不前，燃料结构中煤炭已占据主导地位，经济重心南移特征逐渐凸显。

虽然 19 世纪 90 年代各工业区工业部门迅速崛起，但所占比重却发生明显变化。因新工业区快速发展和旧工业区每况愈下，乌拉尔工业区迅速衰落，波兰和波罗的海等地工业发展速度也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南俄和高加索等新兴工业区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19 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主要工业基地为中部工业区、西北部工业区和乌拉尔工业区。19 世纪末，南俄地区成为俄

① Тихонов Б.В. Каменноуголь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черна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С.36.

国最大的冶金和煤炭基地，乌拉尔工业区逐渐衰落；高加索地区石油工业飞速发展，采油量和钻探米数一度跃居世界第一位，石油工业成为一匹黑马，其发展速度无人能及，此时工业企业明显具有向东南部原料产地迁移的趋势。随着黑海和里海地区贸易量逐年增加，彼得堡等波罗的海港口货物交易量逊色于黑海和亚速海等南部港口，俄国对外贸易中心转移至南部港口。因此，随着南俄和高加索地区能源和冶金工业蓬勃发展，中部、西北部工业区和乌拉尔工业区的地位逐步下降，俄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五、大工业与手工业间博弈的特殊性

资本主义社会大小手工业竞争的结果，一般是以小手工业落败而告终。但在俄国 1861 年改革前，俄国大小工业的博弈特征正好相反，手工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改革后俄国工商业发展势头良好，工业发展轨迹步入正轨，手工业的竞争力下降，大工业在竞争中获胜。为更好阐述大小工业间的博弈问题，笔者除对手工业发展模式进行阐述外，还分别对改革前后二者竞争状况和结果进行分析。俄国大工业与手工业博弈主要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在二者博弈过程中手工业获胜；第二阶段为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初，最终以大工业获胜而告终。

俄国手工业源于家庭生产。俄国手工业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莫斯科公国时期农民手工业就已初具规模，且保留传统父权制烙印。17-18 世纪，手工业不同程度地依赖贸易资本。收购商人为手工业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因此俄国旧式农民手工业并不具有资本主义特征。这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立的工业形式虽然服从于贸易资本，但仍具有自己的特征。农民手工业者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大部分手工业者按中间商订单为生产，只有个别手工业者产品直接在市场上销售，手工业者被迫服从于中间商，某种意义上此时俄国市场由中间商掌控。通常手工业发展之初只是满足家庭需求的家庭生产，然后发展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再进一步发展为依附于中间商的手工作坊，随后转化为资本主义类型的手工工场，个别手工工场则发展成为大工厂。

改革前手工业蓬勃发展。改革前俄国各工业部门中纺织业最为发达，因

此笔者以中部工业区纺织业为例阐述该阶段大小工业博弈的状况和结果。俄国中部工业区棉纺织工业发展速度无人能及，该行业为手工业者主要收入来源。俄国大型棉纺织工厂始于 18 世纪，由外国人创建。大工厂建立后，很多工人学成技术后在工厂周边建立手工作坊。大工厂周围，小手工业作坊犹如雨后春笋，与大工厂相竞争，最后致使市场行情恶化。18 世纪纺纱厂织工最初在工厂内工作，因手工织布工艺简单，很多工人开始在家中生产，工厂主为其提供纱线。18 世纪末棉纺厂工厂主为农民发放纱线现象司空见惯。

家庭手工业过渡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准确地说，是家庭雇佣体系过渡为商业体系。此时手工业发展模式与预想模式完全相反，并非由独立手工业发展为工厂工业，相反，工厂却通过家庭工业促进独立手工业发展。18 世纪末工厂主就已为织工提供棉纱，织工在家中生产。19 世纪上半叶，家庭棉纺织业与工厂的竞争以家庭手工业胜利而告终。19 世纪上半叶俄国工厂发展历程中机器生产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手工生产仍为主导，生产技术较为简单，熟练工匠需求量较低。当时俄国工厂建立的基础并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社会发展条件所致，俄国居民不愿意接受先进生产技术，新技术普及较慢。在居民掌握新技术后，小生产开始排挤大工业。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大生产不具有技术优势，工人学成技术后返乡生产，因此工厂主兴建工厂后，工厂空无一人的状况十分常见。当时技术水平也并不要求大生产出现，所以小生产模式逐渐取代大生产，手工作坊严重冲击工厂。

改革后大工业主导地位日增。改革前俄国工厂不但没有消灭手工作坊，反而促进俄国手工业发展。个别阶段小生产排挤大工业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受阻，它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另一个特征的体现，即工厂中工业资本仍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手工工业中商业资本占优势。改革前俄国工业资本作用逊色于商业资本，资本家更倾向于销售产品和管理市场，手工业者只关注生产。手工业受生产技术制约较大，机器并未在国内重要工业部门内大规模使用。随着技术条件和工业模式变化，开始大规模使用机器，改革后工厂优势明显高于手工作坊。

新时期工业发展特征在纺织业表现尤为突出。19 世纪 50 年代末，工厂主开始大规模使用机器，手工业者黄金时代终结，该过程耗时很短。19 世

纪 40 年代弗拉基米尔省已使用大机器生产，60、70 年代棉纺工业中机械织布已独占鳌头，对手工织工打击巨大。1866 年俄国只有 42 家大型机械纺织厂，1879 年已增至 92 家。工厂工人数量迅速增加，手工作坊工人数量剧减。1866 年手工业者为工厂工人数量的 70%，1894-1895 年手工业者数量只为工厂工人数量的 8%。^①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家庭手工业冲击工厂，但此后工厂迅速发展，手工业逐渐衰落。1851 年俄国已有 19 家机械制造厂，1861 年其数量达到 99 家，工人数量从 1470 人增至 1.1 万人，产品数量增长近 18 倍。此时俄国手工工场数量为 5471 家，但其产品数量只占产品总量的 43.2%。^②

中部工业区大机械纺织工业与小手工业者之间的斗争，是诠释该问题的最好例证。改革前贸易资本占优势，商业资本逐渐排挤工业资本；改革后因机械织布机广泛应用，手工业受到严重冲击。19 世纪 20 年代蒸汽机并未广泛应用，因此商业资本发展优于工业资本。小生产逐渐转换为大生产方式。但随着工厂影响力不断增加，手工业并未发现生产集中现象，反而出现生产分化过程。此现象发生在各类生产部门之中，棉纱工业就出现该状况。大工厂集中的地方，小生产者的数量也更多；大工厂数量较少区域，从事该行业的小手工业者数量较少。该状况可以证明，大工厂和手工作坊并行发展，在工厂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手工作坊倒闭。

改革后工厂与手工业者之间的博弈最终以大工厂的胜利而告终。大工厂凭借资金、技术等优势逐渐垄断各工业部门，换言之，大工厂数量增多和各行各业生产集中程度增强，可证明工业获得长足发展。需着重强调的是，手工业集中和分散程度主要取决于工厂的技术水平，如果工厂技术优势明显，那么手工作坊注定衰落，手工业必定消失；工厂技术优势较低，手工作坊将会逐步壮大，最终过渡为大型工厂。虽然俄国大小工业间博弈在纺织工业表现最为明显，但在煤炭、石油工业中，该状况也十分平常。二者斗争过程中最终垄断组织凭借资金和技术等优势击溃小手工业者和小工厂，这是俄国工业飞速发展的动力之一。

①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И. Русская фабрика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Истор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346.

② Ковнир В.Н.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С.177.

六、作为工业发展动力的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对工业的作用不言而喻，便利的运输是保障工业茁壮成长的杠杆，交通对工业的影响可谓包罗万象，笔者只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一二例证加以分析，其一是便利交通促进工业区的崛起，如伏尔加河水路拉动乌拉尔工业区发展，莫斯科经济发展仰仗伏尔加河和疏密的铁路网；其二是良好运输条件是工业发展的保障，石油和煤炭工业都是如此。就交通运输对工业区影响而言，笔者以乌拉尔和莫斯科为例，就交通运输对工业部门影响而言，笔者以石油和煤炭工业为例加以说明。

便利交通运输为乌拉尔地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18 世纪乌拉尔工业区虽然借助政府扶持和丰富矿石资源迅速崛起，但交通运输也是其快速发展的保障。19 世纪中期以前，乌拉尔铁制品主要通过水路和畜力运输运出，卡马河为主要运输线路，然后从卡马河转运至上游的下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雷宾斯克港口，通过马林斯基和季赫温运河运往彼得堡。乌拉尔地区四通八达的水路网络保障该地与欧俄、伏尔加河中下游流域和远东地区的联系。乌拉尔金属外运主要依靠卡马河，为便于产品运出，冶金工厂纷纷设在卡马河、丘索瓦亚河、乌法河、维亚特卡河沿岸，沿岸企业金属产量为乌拉尔地区生铁、铁和铜总产量的 70%、48%和 5%，这些产品主要沿瑟尔瓦河—丘索河—卡马河运出，运往伏尔加河各口岸。^①19 世纪上半期，丘索河和卡马河船只数量占整个卡马河流域船只总量的 79%，船只货物价值为卡马河流域货运总值的 99%。^②19 世纪铁路修建后，河运产品数量逐年减少，但 70 年代丘瓦索河货运量仍为 500 万普特。^③即便铁路修建后，水路对乌拉尔地区的作用也不可忽视，1905 年乌拉尔铁路货流量为 4.8 亿普特，水路货流量

① Струмилин С.Г. История черной металлургии в СССР. М., АН СССР. 1954. Т.1.С. 201-206, 479-484.

② Истомина Э.Г. Вод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в дореформенный период. М., Наука, 1991. С.146.

③ Алексеев В.В., Гаврилов Д.В.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Урал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Наука. М., 2008. С.439.

为 3.1 亿普特，水路货流量逐年降低，铁路的作用日益突出。^①便利交通运输、丰富自然资源奠定该地区工业发展的优势。即使 19 世纪末该地冶金工业开始衰落，但作为俄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其经济地位仍不容小觑。

莫斯科为中部工业区重要的交通枢纽，所以笔者以莫斯科为例论述交通运输对该工业区域形成的影响。莫斯科依傍的莫斯科河是奥卡河支流，奥卡河为伏尔加河的重要支流，通过该河流可以加深莫斯科与东部地区的联系，莫斯科通过莫斯科河和奥卡河可以到达梁赞和伏尔加河流域，还可与顿河流域相通，借助顿河可以通往亚速海和黑海流域。因此，莫斯科成为联系西欧、高加索、南俄、北部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交通枢纽。19 世纪下半叶开始，中部工业区运输以铁路为主，俄国铁路建设以莫斯科为中心，莫斯科为俄国铁路网络枢纽，它拥有 18 条总长度为 8000 千米的铁路线路。^②该地区主大部分原材料都源于其他地区，便利交通运输是该地区工业蓬勃发展的基础。

就具体工业部门而言，巴库石油多使用水路运输，铁路运输比例只占 20%，伏尔加水路是俄国石油工业迅速发展的保障。^③石油及其制品在伏尔加河流域所占的比例最大，1880、1890 和 1902 年伏尔加河流域输油量为 1000 万、6100 万和 3.5 亿普特，1913 年石油产品占伏尔加河流域水路货流量的 22%。^④俄国主要石油需求地为莫斯科、彼得堡和欧俄等地区，1892-1903 年巴库年均石油产品运出量为 3.9 亿普特，而年均石油开采量为 5 亿普特，78%石油产品需要外运。1882-1886、1892-1896 和 1902-1906、1912 和 1913 年通过铁路运送石油产品的距离为 658 千米、721 千米、667 千米、589 千米和 634 千米，通过水路运送石油产品的距离为 1386 千米、1464 千米、1785

① Гаврилов Д.В. Горнозаводский Урал XVII-XXвв.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УрО РАН.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5.С.210.

② Соловьева А.М. 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 XIXв. Наука.М., 1990. С.137.

③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С.325.

④Мавейчук А.А,Фукс И.Г.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ефтегазового дела. Часть 2. С.21;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324; Соловьева А.М.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в. М.,Наука, 1975. С.208; Бессолицын А.А. Поволжский региона на рубеже XIX-XXвв.(основны тенденции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поиск,решения: Ежегодник. Вып5.Волгоград.,Изд-во ВолГУ.2003. С.197.

千米、1783 千米和 1711 千米，1905 和 1913 年俄国内河石油产品的运输量分别为 2.5 和 2.7 亿普特，1913 年仅伏尔加河流域的石油产品运输量就达 2.4 亿普特。^①由此可见，巴库石油产品运输以水路为主，水运对石油工业的影响不言而喻。

就南俄煤炭工业而言，丰富矿产资源是其发展的保障，而运输是连接煤炭产地和市场的最重要环节。顿巴斯地区河运状况较差，铁路修建之前运输问题已严重制约顿巴斯煤炭工业发展。虽然南部海域贸易发展为顿巴斯煤炭开拓新市场，但因进口煤炭竞争，顿巴斯煤炭工业举步维艰。以铁路建设为界，顿巴斯煤炭工业发展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顿巴斯煤炭工业诞生时起至 19 世纪 60 年代，此时期南俄地区尚没有铁路，煤炭开采量也有限。1855 年俄国煤炭开采量为 951 万普特，此时英国、德国、美国 and 法国煤炭开采量分别为 38 亿、7.7 亿、7.1 亿和 4.4 亿普特，分别是俄国煤炭开采量的 400、81、75 和 48 倍^②；第二阶段为顿巴斯煤炭工业快速发展时期，因铁路大规模修建，煤炭运输距离明显加长，煤炭价格也随之降低，顿巴斯煤炭市场规模和范围明显扩大。1868 年开始，南俄地区建成科兹洛夫-沃罗涅日-罗斯托夫、顿涅茨克-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亚速铁路、康斯坦丁-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洛佐沃-谢瓦斯托波利、罗斯托夫-弗拉基米尔和马里乌波里等铁路。铁路修建之初，采煤量就迅速提高，1870-1874 和 1875-1879 年间，年均采煤量为 2901 万和 6087 万普特，1860-1900 年南俄采煤量增长 37 倍，从 1769 万普特增至 6.7 亿普特。^③19 世纪 80 年代南俄地区铁路建设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与 1861 年相比，1879 年全俄铁路长度平均增长 9.8 倍，而南俄地区铁路长度增长 14.6 倍。与此同时，煤炭价格迅速降低，从 1870 年的 18 戈比/普特降至 1872、1874 和 1876 年的 12 戈比/普特、9.5 戈

① Корелин А.П. Россия 1913 год. СПб., Блиц, 1995. С.131-132; Лисичкин С.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345.

② Братченко Б.Ф. История угледобычи в России. М., ФГУП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комбинат ВИНТИ», 2003. С.125.

③ Баканов С.А. Уголь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Урала: жизненный цикл отрасли от зарождения до упадка. С.43; Фомин П.И. Горная и горнозавод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Юга России. Том I. Харьков., Типография Б. Сумская, 1915. С.180.

比/普特和 9 戈比/普特。^①交通运输设施逐步完善是俄国工业发展的动力，随着俄国工业快速发展，众多工业部门都形成大型垄断集团。

七、大型垄断组织诞生

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俄国工业快速发展，随着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各工业部门迅速崛起和外资集团的涌入，俄国各大工业部门都诞生大型垄断组织，其中重工业尤甚。就石油工业而言，俄国石油工业中形成诺贝尔兄弟集团、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俄国石油总公司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控制俄国石油资本、开采、加工和销售业务的比例分别为 70%、60.7%、66%和 90%。^②一战前夕俄国石油工业外资比重占有所有股份资本一半以上，外国资本加速俄国石油工业垄断的进程。大公司掌控俄国石油开采、加工和销售业务，垄断组织对石油工业影响巨大，笔者在以前文章中已详细阐述俄国垄断集团，在此不再阐述，^③只以南俄顿巴斯煤炭工业为例简单阐述垄断集团的影响，着重分析促使垄断集团产生的因素、垄断集团的形成过程及其表现形式。

促使煤炭垄断集团产生的因素很多，其中政府保护政策、外资大量流入和国内煤炭需求量增加等因素最为重要。首先，关税保护政策使得外国廉价煤炭难以进入俄国，人为促使采矿工业垄断形成。为保护煤炭工业，俄国政府实施严格的关税保护措施，数次提高煤炭进口关税。最终，除波罗的海地区外，俄国煤炭垄断国内市场；其次，俄国政府为保障铁路燃料供给量，定期从企业采购大量煤炭，大企业因有国家订单，无须担心销路，甚至借机抬

① Фомин П.И. Горная и горнозавод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Юга России. Том II. Харьков., Хозяйство Донбасса, 1924. С.42; Фомин П.И. Горная и горнозавод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Юга России. Том I. С.176, 231.

② Волобуев П.В. Из истории монополизации нефтяной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1903-1914//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Т.52. М.,Наука, 1955. С.98, 102.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1883-1914.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10, 13; Карпов В.П., Гаврилова Н.Ю.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фтяной и газо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Тюмень,ТюмГНГУ, 2011. С.66; Гиндин И.Ф. Банк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XIX-начало XX в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типологии русских банков. М., Наука, 1997. С.177.

③ 邓沛勇：“1917年前俄国石油工业中的外资垄断集团及其影响”，《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3期，第76-104页。

高煤价；再次，南俄煤炭工业对外资依赖度较高，几乎所有大型企业都由外资掌控。外国企业主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是俄国企业无法比拟的，在与其竞争过程中，中小企业纷纷落败。受上述因素影响，南俄煤炭工业垄断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在外资大量涌入时，煤炭工业垄断趋势日益明显。1880 年，顿涅茨克、东布罗夫、莫斯科近郊和乌拉尔煤田大型煤矿数量分别为 22、13、7 和 2 家，采煤量分别为 5312 万、7579 万、2290 万和 721 万普特，其采煤量分别为上述煤田总采煤量的 61.5%、96.6%、91.2%和 100%。此时南俄地区小煤矿众多，集中程度逊色于其他地区。1880 年南俄地区 45 家大型煤矿采煤量为 1.6 亿普特，占南俄地区总采煤量的 79.8%，其中 13 家大企业采煤量都超 400 万普特，采煤总量达 1 亿普特，其采煤量占南俄地区总采煤量的 51.4%，^①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大企业垄断地位逐渐增强，1894-1895 年间其采煤量已占南俄总采煤量的 79%。1882-1894 年间大煤矿采煤量增长 6 倍，中小煤矿采煤量无明显变化。^②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顿巴斯煤炭工业生产集中程度加强，小煤矿虽数量众多，但产量有限。1890 年采煤量超过 100 万普特企业的采煤量占总开采量的 89.9%，1900 年其采煤量比例达 95.3%。^③

煤炭开采量增长导致生产集中化增强。1890 年，顿涅茨克煤田 104 家小煤矿采煤量比例仅为南俄总采煤量的 2%，37 家大型煤矿采煤量占顿涅茨克煤田总采煤量的 78%。1899 年南俄地区 17 家煤炭公司的采煤量约为 4 亿普特，约占该地总采煤量的 76.2%。1900 年 11 家大矿井的采煤量达 2000 万

① Тихонов Б.В. Каменноуголь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черна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С.40, 197; Бовыкин В.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 в.-1908 г. С.94.

②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И. Избранное. Русская фабрика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Истор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290.

③ Модестов В.В. Рабочие Донбасса в трех рус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ях. М., Мысль, 1974. С.19; Бовыкин В.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 в.- 1908 г. М., Наука, 1984. С.94; Тихонов Б.В. Каменноуголь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черна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С.182; Соловьева. А.М. 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 XIX в. С.229.

普特，其采煤量占顿涅茨克煤田总采煤量的 44%。^①因小企业采煤量占主导和煤炭开采技术落后，19 世纪 70 年代顿巴斯煤炭产量只占全俄开采量的二分之一，90 年代开始其采煤量比例达三分之二，此时，南俄金属产量也迅速提高，1910 年南俄金属产量占全俄总产量的三分之二。^②需着重强调的是，在南俄煤炭工业发展过程中股份公司具有决定性作用。1902 年 40 家石煤股份公司煤炭产量达 4.9 亿普特，其余公司煤炭产量只有 8080 万普特。^③股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金优势、先进设备和管理经验，在南俄煤炭工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08 年采煤量超过 100 万普特企业的煤炭开采量占顿涅茨克、莫斯科近郊、东布罗夫和乌拉尔煤田采煤量的比例分别为 77.5%、97.4%、99.7%和 96.5%，^④大企业垄断采煤业已毋庸置疑。

具体而言，1875 年南俄采煤量已占全俄煤炭产量的 72.3%，而格鲁什夫煤矿的年产量为 2093 万普特，其产量占南俄总采煤量的 40.7%。除格鲁什夫煤矿外，在南俄地区还有很多大型煤矿。以叶卡捷琳斯拉夫省为例，叶卡捷琳斯拉夫省以辛罗斯克公司、法国采矿公司、科尔苏尼斯克、乌斯别斯克和彼得罗夫斯克公司采煤量最大，这五家公司的年采煤量都超过 100 万普特，占叶卡捷琳斯拉夫省煤炭总开采量的 81.3%。在顿涅茨克铁路通行后，煤炭开采量迅速增加，1880 年上述公司采煤量增至 8634 万普特，占叶卡捷琳斯拉夫省总采煤量的一半以上。此时，石煤产量已超过无烟煤，比例分别为 66.1%和 33.9%。^⑤19 世纪 90 年代，煤炭生产集中程度进一步强化，以南俄叶卡捷琳斯拉夫省为例，1890 年叶卡捷琳斯拉夫只有一家煤矿年产量超过 2000 万普特，占该省煤炭总开采量的 21.1%。1895 和 1900 年采煤量超

① Соловьева.А.М. 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 XIXв. С.229; Шполянский Д.И. Монополии угольно-металлург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юга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М., Изд-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3. С.40. Бовыкин В.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России:конец XIXв.-1908г. С.96.

② Бакулев Г.Д. Черна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Юга России. С.113.

③ Шполянский Д.И. Монополии угольно-металлург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юга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С.42.

④ Бовыкин В.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России:конец XIXв.- 1908г. С.97.

⑤ Тихонов Б.В. Каменноуголь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черна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в. С.134-135.

2000 万普特的企业数量为 3 和 7 家，其比例为 46%和 50.3%，煤炭工业垄断趋势日益强化。^①因南俄地区采煤量最大，煤炭工业的集中化程度最高，大型煤炭销售辛迪加应运而生。

20 世纪初世界经济危机和萧条加速顿巴斯煤炭工业辛迪加化进程。为应对经济危机、垄断国内煤炭市场，且将煤炭出口至黑海和巴尔干半岛，1902 年南俄采矿主代表大会上，会议代表提出成立煤炭企业联合组织问题，为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意该提案。1903 年南俄采矿主第 28 代表大会做出建立煤炭辛迪加的决议，顿涅茨克矿物燃料贸易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煤炭销售辛迪加）正式挂牌成立。1906 年煤炭销售辛迪加正式开展业务，该集团由 13 家采矿企业联合而成，掌控顿涅茨克煤田 45%采煤量和 41%煤炭销售量。1909-1910 年辛迪加成员增加到 24 家，掌控顿涅茨克煤田 67%采煤量和 60%煤炭销售量。^②大型垄断组织和外资掌控诸多工业部门，这也是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俄国工业发展特征之一。

结 语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俄国工业成就举世瞩目，俄国工业化进程既出现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共性，如工业的周期性和循环性特征、交通运输是工业发展的推力和垄断组织诞生；但也有俄国工业发展的特性，如俄国工业分区失衡、大工业与手工业博弈的特殊性、俄国工业重心逐渐南移。俄国工业循环性与周期性特征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国工业化进程中体现最为明显，19 世纪末经济提升期间俄国轻重工业成就家喻户晓，但 1900 年经济危机、日俄战争和一战又让俄国经济雾霾重重；交通运输革命拉动俄国工业发展，其中河运蓬勃发展和蒸汽机船大规模使用加速石油工业发展进程，而铁路则促使冶金业和煤炭工业茁壮成长；垄断组织和外资为俄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益处，如加速经济制度和企业管理机构变革，推动新技术和发明的广

① Тихонов Б.В. Каменноуголь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черна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в. С.181; История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уго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нбасса. Киев., Наук.думка, 1969. С.98-111.

② Кушнирук С.В. Монополия и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в уго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юга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М.,УНИКУМ-ЦЕНТР, 1997. С.35.

泛使用，刺激工业革命和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但其阻碍技术和设备革新、抑制生产效率提高、破坏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和恶化工人生活水平等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在俄国，大工业主要集中于中部、乌拉尔和西北部工业区等地，而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地区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伴随工业分布不合理特性，俄国工业重心又凸显南移过程，究其原因，源于高加索石油工业、南俄冶金和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此外，俄国大工业与小手工业博弈具有特殊性，就马克思理论而言，大工业发展会消灭手工作坊，而 19 世纪上半叶俄国却出现逆向趋势，在大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迎来短暂春天，直到 19 世纪末手工业才失去竞争优势。除上述特征外，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俄国工业发展过程中还出现其他特征，因篇幅有限，笔者不再一一阐述，仅就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Russian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industrialization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Compared with western countries, Russia is characterized by both commonness of capitalist industry and uniqueness as well.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 as follows: firs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was typically featured by periodicity; second, industry depended highly on foreign capitals, which actually controlled half of Russian industry; third, the Russian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was not balanced and the main industrial sectors were in the Central Industrial Zone, the Ural Industrial Zone and the Southern Industrial Zone; fourth,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imbalance, Russian industrial centers gradually moved south to Caucasus and southern parts of Russia in particular; fifth, the game between Russian huge industry and handicraft industry was quite peculiar, and the latter had a strong vitality; sixth,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was a driving force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terway and railway transportation propelled the rise of oil, coal and metallurgical industries; seventh, large monopolies, especially in the heavy industry, were formed.

【Key Words】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 Russian Industrial Cycle, Russian Monopoly Group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начале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быстро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и её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 привлекала всеобщее внимание. 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не только были схожи с запад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но и обладали уникальными черта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России с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заключались в следующем: во-первы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отличалось цикличностью и периодичностью, особенно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во-вторых,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т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была высока, и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ли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третьих,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было неравномерным, крупнейшие 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секторы были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ы в центральных регионах, на Урале и в южных регионах. В-четвертых, в процессе не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г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центр тяжести Росси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смещался на юг, с Кавказом и Южной Россией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в-пятых, игра между крупной и ремесле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ю России была совершенно уникальна, ремесло обладало высокой жиз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ю, в-шестых, транспортная отрасль была основ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азвитие водных путей 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а,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ривело к развитию нефтяной и уго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металлургии и других отрасл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седьмых, стали возникать крупные монополии, особенно в тяжел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цикл, монополии в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7 年第 6 期

(总第 208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 公开发行 •

定价：30.00 元